

K250.6
131
2:39

合订本 第三十九册

(总一三一一一五)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B26564

文史资料选辑

第十三辑

(总113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目 录

话剧运动的先行官——洪深……………马彦祥(1)

· 抗 战 史 料 ·

淞沪会战……………张发奎(17)

沪战开始时空军动态……………陈栖霞(31)

平型关战役的前前后后……………陈长捷(40)

南口抗战后的形势推演——策划平型

关会战——平型关战役经过

“东教会”和《告东北民众书》……………胡石如(69)

· 人 物 述 林 ·

陈独秀的早期活动……………沈 寂(74)

章士钊和吴弱男……………吴业新(83)

参加爱国学社——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主编《苏报》，鼓吹革命——组织爱国协会，进行暗杀斗争——初会中山，游学英伦——主编《民立报》，主张两党制——会见袁世凯，积极讨袁护国——三办《甲寅》，三次欧洲行——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参加“和平谈判”——巨著永存“白宫”——上书毛主席——“主席

想得真周到”——为祖国统一鞠躬尽瘁

林业界的一代师表——记梁希教授生平……张楚宝(104)

书香门第——立志为林业而奋斗——桃李
满天下——治学严谨，孜孜不倦——为新
中国的林业建设作出贡献——主持两学会
的活动——领导科协、科普工作——“愿
抛鲜血荐黎明”

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罗哲文(121)

启蒙学艺——出版“汇刊”——重庆绘图
——古迹筒目——新都方案——长城审图
——牌楼调查——保护园城——避雷安针
——临别赠言

杨爱源轶事……卢宝朗(134)

· 唐绍仪史料 ·

两次“南北和议”中的唐绍仪……陈正卿(145)

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 1. 拥袁共和 2.
袁唐生隙 3. 公开破裂

在第二次“南北和议”中 1. 坚持法律解
决 2. 坚持救国主张 3. 协助孙中山联段
抗直倒桂

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件事……唐有淦 唐现挺(162)

中山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与中山港配
套的港区建设——轶事数则

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郑会欣(169)

日寇对唐绍仪的拉拢劝降——唐绍仪在抗
战初期的态度——蒋、孔等对唐绍仪的笼

络——唐绍仪被刺经过

· 阎锡山史料 ·

阎锡山与段祺瑞的勾结····· 周 珉(178)

联段倒洪——出晋远征——全军覆没——
不了了之

阎锡山投日反共见闻····· 秦 朝 张仲孚(194)

派干部去太原与日寇勾结——派部队投敌
改编为剿共军——派干部进入日伪政府

“固守”临汾纪实····· 梁培璜(201)

胡宗南进犯晋南及撤军经过——阎锡山的
打算——扩军、构筑工事、抢粮——部队
组成情况——“焦土政策”与“死命顽
抗”——滥事轰炸、发射毒弹——疯狂顽
抗、终于被俘

太原战役阎锡山残部被歼记····· 郭宗汾(215)

太原防御工事情况——太原防守部队及布
防情况——争夺机场及策反工作——最后
的顽抗及全部被歼

· 政坛琐记 ·

陈棺竞选国大代表····· 赵遂初(231)

两广事变的前因后果····· 李默庵(236)

· 订正 补充 质疑 ·

- 对《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的补充订正.....王寿山(240)
关于《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质疑》的订正.....宋瑞珂(242)
《珍妃其人》失实之处.....谢景芳(246)

话剧运动的先行官——洪深

马彦祥

作者系我国著名的戏剧家，曾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等职。本文着重介绍了我国话剧教育的开拓者，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局局长的民主人士洪深先生对我国话剧运动的巨大贡献，以及其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刚直不阿的斗争精神。

回顾自本世纪初才出现在我国舞台上的话剧的发展史，不难看出，它经历了一条曲折而又艰辛的道路，它始终是在民主革命和民族革命斗争的风风雨雨中成长起来的。当我们看到今天话剧发展蓬勃兴旺的景象时，便不由得不回想起过去几十年来，在话剧艺术的领域内奋力拓荒、辛勤耕耘的许多先驱者的功绩。其中最使我难以忘怀的，就是我的戏剧启蒙老师洪深先生。做为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之一，他对话剧艺术所做出的卓越建树，以及他那铁骨铮铮、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斗争精神，令人永远难忘。

中国的话剧，就它在现代政治和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来说，它一直是促进时代前进、鼓舞革命斗志的有力武器。洪深先生一贯主张戏剧必须反映社会，反映时代。他早期撰写的《贫民惨剧·序》和《属于一个时代的戏剧》等文章中就清楚地反映

了他的进步的戏剧观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他写戏不是以“号召观客为第一义”，从来不为“趋时”而作。他认为戏剧应该是“明显地、充分地描写人生的艺术”，而每个时代的人生、思想、精神各不相同，因之，“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戏剧”。他旗帜鲜明地提出“凡一切有价值的戏剧，都是富于时代性的。换言之，戏剧必是一个时代的结晶，为一个时代的情形和环境所造成，是专对了这个时代而说话，也就是这个时代隐隐的一个小影”。20年代初，洪深先生赴美留学归国后的第一部剧作《赵阎王》出版时，他曾说过：“一部剧本有没有价值，必须问作品能不能表现作者的时代精神。”他认为“一个负有文化使命的剧作家，不应该只效法‘走方郎中’，不求拔除病根，但得一时不痛就算把病医好，而应当也要负责，努力去推动促进那社会的改革”。

洪深先生的剧本创作就正是严格遵循这一思想原则进行的。所以他的作品，不论是话剧或是电影，总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立场和态度，总是力图向观众指出在人生道路上，什么是对的、正确的，什么是不对的、不正确的。从而引导观众从现实找出时代前进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方面，同时向观众指出一条合乎时代要求的出路。洪深先生生前所膺服的朋友夏衍同志在40年代就曾经评论他“从不离开时代，从不离开社会，从不把自己和国家民族隔绝，他永远和时代共呼吸，与人民同忧喜。因此，从他的著作、剧本和电影，乃至从他的工作态度，他是一个彻底的‘为人生而艺术’的作家，一个彻底的功利主义者。他一定是有所为而写，有所感而写，为一个当前的问题而写。”对洪深先生的这个评价，我认为是非常确切而公允的。他正是这样一位与国家民族血肉相连，与人民休戚与共的时代之子。

二

1916年，洪深先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去美国留学，入俄亥俄州立大学学习陶瓷工程，想以实业救国来振兴中华。但是对戏剧的强烈爱好使他学了一些文学和戏剧的课程。当时美国正在上演译成了英文的《王宝钏》，但译本有损原著，且原著故事本身就不高，舆论反映并不好。具有强烈民族自尊心的洪深，看后很苦闷。是年底，他组织了话剧《花木兰》的演出，受到华侨和美国人民的欢迎。这一事实使洪深领悟到戏剧能唤起民族觉醒，他决心改学戏剧。1919年秋，洪深先生转入哈佛大学学习文学与戏剧，同时在波士顿声音表现学校学习，又在考柏莱剧院附设戏剧学校学习表演、导演、舞台技术、剧场管理等课程，得硕士学位。

1922年，洪深先生学成回国，当时国内正是文明戏日趋没落的时期，洪深先生以他自己富有光采的艺术实践迅速地结束了文明戏的历史阶段，掀开了中国话剧运动史的新的一页。“话剧”这个名词就是由他首先提出来的。他认为过去称为“新剧”，是针对旧剧而言，而二者的区别则一是歌唱，一是说话。“新剧”是说话的戏剧，应该称之为“话剧”才适当。他的倡议得到了戏剧界的一致公认，此后“话剧”这一名称才逐渐通行起来。

洪深先生下决心要对文明戏加以彻底的改革。首先他要革掉的是不合理的男扮女装的恶习。但在当时要实现这一改革又谈何容易？他到哪里去找合适的女演员？于是他尝试着写了一本没有一个女角色的《赵阎王》。剧本主要描写了一个士兵由善变恶而内心矛盾而最后终于崩溃的复杂心理过程。这是洪深先生回国后的第一部剧本创作，也是他的成名之作。有了剧本，却又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演员，真是困难重重。最后他只得由自己出资邀请了几位文明戏的演员来参加演出，他自任导演并担任主角赵阎王。这次

演出，成绩很不理想。几年之后，当他为复旦大学剧艺社重又排演《赵阎王》时，曾对他的学生说：“我回国后第一次导演的戏就是《赵阎王》，同台合作演出的都是过去演文明戏的演员。我当时的意图是想通过导演来改变他们的一成不变的形式主义的表演方法，结果我失败了。”经过那次实验，他终于认识到，“当前最重要的是必须取得自己在社会上的信任和可以合作的同志。”^①不久，经人介绍，他正式加入了欧阳予倩、应云卫等同志主持、由一些爱好戏剧的青年学生组成的业余剧团——戏剧协社，并由他担任排演主任，规定了严格的排演制度。当时协社计划要排两个戏，一是胡适的《终身大事》，一是欧阳予倩的《泼妇》。据洪先生说，当时剧社里只有两位女演员，角色不够分配，而且有些社员还赞成以男扮女。洪先生刚参加剧社不久，亦不便多作主张。于是他想了一个办法：将两个剧目排在同场演出，一出男女合演，排在前面演；另一出用男人扮女角，排在后面演，让演员亲自去体验一下。果然，台下观众先看了男女合演，觉得说话动作都很自然，接着再看男的扮女的，憋尖了嗓子，动作扭扭捏捏，实在觉得可笑。观众的笑声使台上的演员感到十分难堪。从此，在戏剧协社的演出节目单上，再也看不到男人扮女角的怪现象了。

1924年初，洪深先生又为戏剧协社改译并导演了英国王尔德作的《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更名为《少奶奶的扇子》。这种改译的方法也是洪深先生的首创。它忠实于原著的情节内容，却把故事中所表现的风俗人情和人物的对话中国化了，使观众看了，听了，觉得完全合乎中国的风俗习惯，剧中的事情就象是发生在中国的一样。同时洪深先生在舞台艺术方面的大胆革新，也使看惯了文明戏的观众耳目为之一新。这些新的措施，如导演制度的确立，灯光、布景、服装、道具的合理运用，在60年后的今天

① 见《我的打鼓时期已经过了吗？》。

来看，自然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但在当时，却都属创举。这些变革，使新生的话剧舞台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的水平。茅盾同志1942年在一篇祝贺洪深先生50诞辰的文章中曾这样说：“当时（按指1924年）看了洪老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的观众都大为惊异，说这种话剧是在京戏和文明戏的夹缝中露头角，争得了生存的。”还说“洪老当年当了先行官，然后经无数人的斗争，才有了今天（按指40年代初）话剧蓬勃旺盛的局面。”这评价丝毫也不过分——洪深先生就是一位为我国话剧艺术奠定基础的先行官。

《少奶奶的扇子》在上海首演，不仅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而且引起了上海新文艺界的极大注目。在报纸舆论的一片赞扬声中，洪先生意外地接到了一位不相识的看客的一封信，信中除对《少奶奶的扇子》的演出表示出一定的满意之外，还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见。这位看客就是田汉同志。后来洪先生常对人说：“大家都称赞我的《少奶奶的扇子》，独有田汉写信骂了我一通。我认为他倒是我真正的知己。”由此他们两位就开始建立了友谊。不久，田汉又给洪先生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上海于剧文学及舞台艺术有真知灼见者不多，而旧势力、似是而非的势力又特大，望兄莫误于浮名，莫与旧势力握手，否则成功之希望有限也。”这是田汉同志向洪先生委婉地提出的一次诚挚的劝告。洪先生以当时第一位留美的戏剧专家、大学教授的身份，竟能从善如流，这是极为难能可贵的。1928年冬天，洪深先生参加了田汉同志领导的南国社。此后终其一生，他和田汉同志在共同献身戏剧事业的战斗中，互相切磋砥砺，互相支持合作，为我们后辈戏剧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洪深先生在戏剧方面的才能是多种多样的，他能编、能导、能演，还能管理舞台。在戏剧实践活动中，他无所不能，是位多面手。这里，我想就我记忆所及，谈谈当年我追随洪先生所受到的教诲，虽然是一鳞半爪，不成系统，却也可以从中了解到一些

洪先生在表、导演理论上的基本观点。

洪先生虽然在许多大学任过教，就我所知，他却从来没有开设过专门教授表、导演的课程。他认为要研究表、导演艺术，只空谈理论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结合舞台实践进行实地学习。2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讲授“戏剧编撰”课程，由爱好戏剧的同学自动组织的复旦新剧社，曾多次邀请他来给我们排戏，他总是推托。直到1926年，学校开始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学，他才主动来找我们，要给剧社排戏，并建议把剧社名字中的“新”字去掉，正式改名为“复旦剧社”。这时我们才明白他过去之所以不肯接受我们的邀请，主要是因为剧社没有女演员，因为他一向是反对男扮女的。

洪深先生为复旦剧社导演的第一个剧目是意大利哥尔多尼所作、焦菊隐同志翻译的《女店主》。在此之前，我在复旦新剧社时期已演过好几次戏，并多次扮演主要女角色，自以为是有些舞台经验的演员，这次洪先生却派给我一个不很重要的角色——茶房范升。这个角色在剧中出场次数不少，但大都是过场戏，没有一场可以让演员“过瘾”的戏，我心里有些不自在。有一天，排演刚结束，洪先生忽然找我谈话，他问我：“Mr. 马，你对范升这个角色感兴趣吗？”我不明白他的问话是什么意思，只得言不由衷地回答：“很感兴趣。”

他笑了笑：“我看不见得。”

听了这句话，立刻使我联想到排演前他曾讲到“在排演场上，我是导演，你们是演员，演员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导演的指挥”。我的心里不免有些紧张，我说：“洪先生是不是说我排戏还不够认真？”

他摇摇头：“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排戏很认真，台词也背得很熟，但是你的表演却毫无进步，你至今还没有钻进角色中去。”接着他就给我上了一节表演课。他说：“你要知道，演员不是搬场汽车，不仅仅是把剧本中所规定的对话和动作照搬到舞

台上去就算尽了责任，演员是要有创造的。演员的创造就是要把剧作者所没有写在剧本里的东西挖掘出来，丰富它，发挥它，要有你自己创作的东西。”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演戏好比挤柠檬汁，你一定要把最后一滴汁都挤出来，这样，你的人物才能显得饱满。”

谈到范升这个具体人物时，他进一步启发我说：“范升这个角色在全剧中接触的人物最多，出场的次数也最多，几乎每场都有他。他所接触的人物各不相同，所以他对每个人物的态度、感情和反应也应该有所不同。现在你演的这个人物，对待每个人物的态度、和每个人物的关系却没有不同的变化，因此你觉得这角色单调了，无戏可演了。其实这个角色的戏很多，而且复杂多变，只是你还没有挖掘出来就是了。”他这一席话，使我开了窍，初步懂得作为一个演员的职责。

20年代，中国话剧刚刚开始萌芽的时期，那时的所谓演员，都是一些业余爱好者，既没有受过什么专业训练，也缺乏演剧经验。洪深先生就是在这一片荒漠似的艰苦条件下，开始他对演员的培育工作。所以，他对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演员，从来不讲那些高深的学术性的表演理论，他总是从实际出发，用深入浅出的为我们所能理解的、通俗的语言，向我们灌输表演基本知识，而且学了就能运用。

洪先生还十分重视舞台上的整体表演。他最反对有些演员在舞台上只知照顾自己，不知道帮助同台的其他演员。轮到他自己时，他就行动，就表演，一到别人有戏时，他就休息了。他不断地在戏台上跳进跳出。这样的演员，他的表演就不可能是连贯的，而全体演员也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整体了。遇到这种情况，他总爱说一句话：“Art of doing nothing”，就是说“不做什么的艺术”，或是“没有表演的艺术”。意思是一个演员只要一上了台，尽管没有动作，没有对话，也应该入戏，不能象旧京戏中跑龙套的演员那样，身在舞台上，心里却想着后台。

他经常教导我们，如果你想胜任做一个演员，你就必须要能眼观六路，耳聆八方，必须有敏锐的感觉和观察的能力。凡是人生中所能发生的事，哪怕是极琐碎的人和事，你也得注意，甚至于亲自去体验；哪怕是极为复杂的事情，你也必须进行分析，把它搞清楚。这样你的生活阅历才能丰富，一个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是很难成为称职的演员的。此外，你还得有丰富的感情，不但要能为古人担忧，还得能设身处地把别人的喜怒哀乐当做自己的喜怒哀乐。你还得有理智，并具备一定的学识，对于科学中的生理学、社会学、心理学以及人类文化史等方面的知识，也必须要有一定的研究。这样，你才能把直接从人生中得到的感性知识，上升为理性，才不至于因为表面上的复杂混乱而茫然无所适从。一个称职的演员，如果他想在舞台上创造一个角色，就得这样去准备他自己。他认为这都是演员的基本功，属于最起码的要求。

洪深先生最不喜欢那种演员，就是在排演的时候，不肯认真用功，自以为一上舞台就什么都会的。洪先生认为这样的演员，根本不懂得表演艺术，不懂得什么叫了解人物、创造人物，因此也就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演员。

洪深先生排戏的办法很多。因为当时演员的水平很不一样，所以他的排演方法也因人而异。有的舞台经验比较多的演员，导演只要稍加分析、指点，他立刻就能心领神会。有的演员舞台经验比较少，甚至从未上过台，导演就用演员生活中所经历过的经验来启发他、引导他。当他还不能领会的时候，洪先生就不得不示范表演给他看。洪先生擅长表演，无论男女老少各种人物的各种动作，他都能做给你看。但做完以后，又立刻告诉你：“我做给你看，只是让你理解我的意思，你不要完全学我。”

作为一位导演，他对演员总是那么亲切、热情，但又要求十分严格，排起戏来，丝毫也不放松。他经常对我们说：“在教室里，我们是师生，你们必须听我的，在排演场上，我是导演，你们是演员，也必须听我的。除此两个场所之外，我们完全平等相

待，我们是朋友。”排戏中，一些有舞台经验或是有点名气的演员，当他们不够严肃或不能认真执行他的指导时，他也要发脾气，以至责骂演员，使得演员十分难堪。记得1930年，我从广州回北京，路过上海，那时我已离校一年多了，特地到母校去看望他。他正在给复旦剧社的同学导演法国新浪漫主义作家罗斯当的《西哈诺》，演员大都是没有登过台的新手。他自己不但担任导演，而且兼演主角西哈诺。这是一出古典剧，全剧五幕，需五堂布景，演员有六七十人。从布景、服装以至化妆头套的设计，都全部由他一人负责，工作实在是繁重。他见我去了，对我说：“你来得正好，我既要担任导演，又要兼任主角，还要负责全部舞台工作，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他一定要把西哈诺这个角色让我演。我推辞再三，推辞不掉，只得勉强答应试试看，因为外国的古典戏，我从来也没有演过。

排演中，有一天排到第三幕时，有一场戏，西哈诺需要跑着步上场，到了场上，要一边脱帽，一边行礼。洪先生做了个示范动作给我看，我随着照样的排了几遍，他总说我的动作不够潇洒利落。当时他对在场的副导演朱端钧同志说：“你替我看着他排20遍。”说完，他自己到一边坐着读剧本去了。我服从导演，一遍一遍地跑着，跑到大概是第十遍时，我实在跑得很累了，而且，这样机械地做着模仿动作，显而易见是越做越不象样。我实在沉不住气了，我说：“洪先生，我已经排了十遍了，是不是请你来看看，好不好？”他回过头来说：“好，那么你再走两遍吧！”我没有话说，只得再排两遍。当时，在旁边看排戏的几十位演职员也都看得纳闷，不知是怎么回事。等我排到第十二遍时，洪先生走过来，并不要求我做给他看，却对我说：“好，今天就排到这里，明天再接着排。”等大家都散了，我对洪先生说：“今天你把我整苦了！”他笑笑说：“对不起，这叫杀鸡吓猴。”我不明白他说话的意思，他说：“你不知道，现在这批演员，大都没有演戏经验，不知道排戏要这么认真，演员应该那么

服从导演。你是复旦剧社的老社员、老演员，今天我拿你开刀，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作为一个演员就该这样无条件地听从导演的指挥。”我这才恍然大悟，他是有意地拿我来开刀的。

以上所叙只是我还记得起来的一些零星回忆。我们要了解洪深先生对于表、导演的理论，还可以读他的著作。他在30年代曾写过两本专著：一本是《电影戏剧表演术》，一本是《戏剧导演的初步知识》，都是中国最早的关于戏剧表、导演技术的著作。田汉同志在给它写的序文中说：“如果周信芳先生是中国伶人最懂得Acting的，那我们洪深先生便是新戏剧家中，学理地、实际地最懂得表演艺术的。”这确非过誉之词。洪深先生是从心理和生理入手，研究表演的技巧；又从社会研究入手，说明人生在不同环境、不同条件下的各种反应。我认为他在解释表、导演和处理艺术问题时，他的方法是唯物主义的。

三

洪深先生在1925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曾一度加入过国民党。但在“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他认清了形势，转面向共产党靠拢。1930年，他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和“左翼剧作者联盟”，从此他不断追求进步，追求真理，在左翼文化运动中贡献出了他的全部热忱和力量。

在党的关怀和影响下，1930年冬和1931年春，他接连写了农村三部曲中的前两部——《五奎桥》和《香稻米》。在这两部剧作中，他对剥削农民的地主乡绅、放高利贷的资本家和代表帝国主义者深入农村进行经济掠夺的买办们作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反映了当时的江南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他们和反动阶级之间进行的自发斗争。中国话剧舞台上出现这样的农民，恐怕也是第一次。在这戏里，他已初步触及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但由于思想的局限性，还没有能为农民指出争取生存的光明大道。

“七七”事变前夕，他和一些同志集体创作了《走私》、《鹤》、《洋白糖》、《汉奸的子孙》等剧本，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的罪恶活动。这些戏在广场、街头和剧场广泛演出，对于激发广大群众的抗日情绪发生了巨大影响。

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了，洪先生高昂的爱国热情就象一团烈火，他放弃了从事十余年的大学教授的职位，积极投入当时由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的救亡运动，组织了上海救亡演剧队第二队，自任队长，深入大后方致力于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在徐州、郑州、武汉等地，演出了《九·一八以来》、《保卫卢沟桥》、《放下你的鞭子》等活报剧。他身为队长，不仅要负责演剧队对内对外的许多事务性工作，还得从事编剧、导演，甚至亲自登场参加演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每次演出以前，他还要亲自向群众作一番演说，宣讲抗日救亡的道理。熟悉洪先生的同志都知道，他不但是一位杰出的戏剧家，还是一位天才的演说家。他的慷慨激昂、富于煽动性的讲演，最能激励群众情绪，因而使得二队常常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演出效果。在13个救亡演剧队中，二队因为有了洪先生，这方面可说是得天独厚，为其他队所不及的。

尽管他在队里的工作这样繁重，但他在生活方面，丝毫不肯接受任何照顾，他和全体队员一样，睡通铺，吃大锅饭，每月只领取三元钱的生活费。以他的年龄（当时他已是44岁的中年，为全队中最年长的）和他一向的生活标准来说，他能这样和集体同甘共苦，一点都不特殊化，这种精神实在是难能可贵，值得我们向他学习的。

1938年春，国共二次合作。军委政治部在周恩来同志的主持下，成立了专司宣传的第三厅，由郭沫若同志任厅长。为了工作需要，洪深先生不得不暂时离开二队，到第三厅负责戏剧工作。虽然为时不久，由于武汉沦陷，三厅撤退了。但就在这短短的不到半年的时间里，洪先生把分散在各地的戏剧从业员重新组织起来，进行业务和军事训练，最后组成了10个抗敌演剧队，配备到

分布在全国的各个战区，以戏剧为主要武器，坚持演出抗战戏剧。这支庞大的戏剧队伍为后来国统区发展戏剧事业培育了大批的优秀干部，直到今天，还有不少同志依然坚守在戏剧岗位上继续奋斗。

1941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洪深先生仍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反对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团结的斗争，除了继续编写剧本之外，他还在重庆、在桂林，为一些进步的剧团导演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他和田汉、夏衍合编的《再会吧，香港》、宋之的的《春寒》、阳翰笙的《草莽英雄》以及集体创作的《黄花岗》等剧。这些戏的上演，有力地推动了国统区的革命话剧运动。

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了。在一片胜利的复员声中，大家都正在考虑如何安排今后各自的前途时，洪先生却没有停止他的工作，在不到半个月的短时间里，他又赶写了一部三幕剧《鸡鸣早看天》。剧本情节发生在胜利后川北公路上的一家小旅馆里，由于长途汽车中途抛锚，车上形形色色的旅客不得不投宿在这家旅店，随着，一场剧烈的冲突发生了。剧本尖锐而深刻地揭露了抗战胜利后国统区的种种丑恶现象和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最后启示人们应该抛弃黑暗，走向光明。洪先生把这剧本手稿交给我，对我说：“我在‘中青’担任了两年多的编导委员，只在今年上半年导演了《黄花岗》。现在我把这本《鸡鸣早看天》交给你，也算交了差。希望你来导演，尽快上演。”我遵嘱，终于在10月间把它搬上了舞台。这是洪先生写的最后一个有关抗战的剧本。

胜利后的第二年，洪先生复员到了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1947年，上海各大专院校的学生举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盛大示威游行，国民党派出了大批军警包围了复旦大学，准备逮捕进步学生。洪先生为了支持进步学生，当场挺身而出，对国民党的非法暴行，予以痛斥。在他的倡议下，复旦大学全体教授

举行罢教，向国民党政府公开表示抗议。

1949年新中国建立了，遵照周恩来同志的指示，洪深先生不得不暂时离开他从事了数十年工作的戏剧岗位，去担任对外文化联络局的局长。他以满腔热情和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党交给他的新的工作。不久，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爆发了，他按捺不住一颗赤子之心，一定要走在反帝斗争的前列。他终于在出色地完成他的本职工作之余，又重新拿起了戏剧武器，创作并导演了《这就是美国的生活方式》的五幕剧，剧本从本质上暴露了美帝腐朽的社会制度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以后，他还以满腔热情亲自率领了一个慰问团，奔向朝鲜前线，慰问了我们最可爱的人民志愿军。

直到洪先生逝世前，他一直坚持在党所指定的岗位上，为年轻的共和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工作，贡献出了自己的全部力量。

四

洪深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者。他为人襟怀坦荡，正直豪爽，富于正义感。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他一向不畏强暴，坚持真理，敢于斗争。尽人皆知的是发生在1930年2月的“大光明”事件，^①细节就毋需多说了。当时这部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虽因洪先生的强烈抗议而停演，但是斗争并没有结束。当洪先生被捕释放之后，他立即正式向特区法院起诉，控告大光明影院放映辱华影片，而且侵犯人权。开审时，洪先生在法庭上慷慨陈词，痛斥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在上海电影戏剧界以及社会爱国人士的热情声援下，斗争终于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主演这部影片的罗克在美国的报纸上公开向中

^① “大光明”事件指1930年2月上海大光明影院放映美国辱华影片《不怕死》时，洪深先生当场呼吁观众向影院提出抗议，遭到“大光明”方面的殴打和拘捕之事。

国人民道歉；2.《不怕死》影片禁止再在我国其他城市上映；3.大光明影院正式向洪先生登报道歉。大家都认为这是洪深先生多少年来在上海的社会活动中最强烈的一次政治事件。

1937年8月，洪深先生到南京去导演田汉同志的新作《卢沟桥》，8月9日正式在大华电影院上演。当戏正要开演前，南京卫戍司令部突然来人通知停演。洪先生和他们力争无效，他当时就打电话给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先生，据理力争。邵先生不得已只好批准演出。但是有一批混在观众席里的国民党特务，群起叫嚣捣乱，仍企图阻挠演出。这时，洪先生奋不顾身跳上舞台，激昂慷慨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向全场观众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驻华大使馆的压力的真相，以及在场特务们阻挠演出的无耻伎俩。洪先生的一片强烈爱国热情激起了全场观众和戏院职工们的抗日激情，终于把这批特务轰出了戏院，使戏得以顺利演出。

1938年春天，在武昌国民党召开的一次茶话会上，行政院长汪精卫在会上对抗战形势发表了一通悲观失望的论调。当时，洪先生也在场，越听越有气，等汪精卫的话刚一说完，他立刻站起来说：“我对汪先生的话有意见！”接着，就针对着汪的谬论痛加驳斥。结果，没有等他的话说完，汪精卫就在一群走狗的簇拥之下，狼狈地逃离了会场。

1941年，洪先生在桂林导演的《再会吧，香港》，也发生过临时被禁演的遭遇，洪先生也是当场大声疾呼地当众抗议，表现出了不向邪恶势力低头的正义精神。

综上所述，洪深先生从1930年加入“左联”以后，开始从不自觉到自觉地接受党的领导，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和党始终是一条心，是忠诚地跟着党走的。许多文艺界的老同志都知道，在三四十年代，他以一个非党员的身份，利用自己的社会声望，曾经为党做了很多当时党员们不便做也不能做的工作。田汉同志在1957年曾经说过：“有一些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出色

的文化人，一到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就暴露出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面目，过不了关，而洪深先生所已达到的觉悟水平，却完全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战士，因为他一贯拥护党，尊重党和党的领导，他一贯拥护社会主义。”当然，正是因为党对他的教育，使他的政治思想不断得到提高，他才迅速成长为一个左翼文化运动中的勇敢的战士。

五

洪深先生善于独立思考，研究问题，常常有惊人的独特见解，郭老生前曾称赞洪先生的文章是“大胆的文章”。他读书的范围非常广泛，中外古今，无所不读，所以他具有极为渊博的学识。他认为从事戏剧艺术的人，必须要有丰富而广泛的生活知识，因为舞台上的人和事是无所不包的，你如果不了解它，不熟悉它，你就无法表现它。他曾告诉我，他在国内读书时，虽然爱好文艺，但还是数理化功课的成绩最好，所以他赴美留学，学的是陶瓷工程，这门专业，如果没有扎实的科学基础是学不来的。他的文艺与科学两方面的根底都比较深厚，这对于他从事戏剧也是极为有利的条件。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对工作的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无论是教学、导演电影和戏剧，或是编戏、写文章，事先一定先做好充分准备。他的习惯总是先用打字机打好一个提纲，然后再着手进行创作。记得40年代初，我曾和他同在四川江安剧专教书，我们同住在一个院子里，他的住房和我的住房只是一墙之隔。我常常在清晨四五点钟的时候，听到隔壁屋里滴滴嗒嗒的打字声音，他就是这样勤奋认真地进行工作的。

抗战胜利那年的冬天，他为新中国剧社导演阳翰笙同志的《草莽英雄》，这是写辛亥革命时期四川保路同志会反对清朝封建统治的一出戏。洪先生为了导演这出戏作好充分的准备，事先

查阅了大量有关辛亥革命和青红帮的史料，并亲自带领演员们去访问帮会的龙头大哥，向他们请教各种帮规帮法，学习帮会的各种礼节。排演时又请他们来临场参观、指正。以这样严肃而认真的态度来导演一个戏，即使在今天，恐怕也是不多见的。半年以后，他自重庆写信给我说：“我写的《青红帮丛考》，已写出了一章，有两万多字，抄书居多，从正史以至稗官，真是无奇不有。全书预计要写30万字，准备半年写完它。”后来他复员回到上海，可能因为工作繁忙，这本著作没有写完。我至今只找到已经发表的第一章“安清会的兴起”，大约有两万多字。这是一篇对研究我国秘密会社非常珍贵的资料，也是洪先生一生著述中极为难得的一篇别开生面的著作。

洪深先生自1922年回国到1955年逝世的30余年中，共编写了大约有60多部话剧和电影的剧本，写了六七本关于戏剧和电影的学术性的专著，此外还有大约一百余万字的戏剧电影论文和杂文，散见在各个时期的报刊上。这是洪先生为我们留下的一份珍贵而丰富的精神财富，我们应该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习，从中了解我国早期话剧的成长过程，并且从中看到党在话剧发展的道路上发生的影响和作用。

对洪深先生这样一位以他毕生精力为我国话剧事业奋斗终生，并且做出巨大贡献的“先行官”、拓荒者，对他那赤诚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追求光明、追求真理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我们应当实事求是地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以正确恰当的评价，我想这应该是我们这一代戏剧工作者研究的一项十分重要课题。

· 抗战史料 ·

〔编者按〕为纪念全民族抗战50周年，这里选刊4篇回忆初期抗战的史料。其中有当时任淞沪会战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对淞沪战役的回忆（选自台湾出版的《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有原国民党空军第6大队大队长陈栖霞关于沪战开始时空军动态的叙述；有国民党原61军军长陈长捷对平型关战役的回忆；有旅美华人胡石如先生回忆“九·一八”事变后第一个抗日群众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淞沪会战

张发奎

战前受命与备战

日本军阀以向大陆发展为其传统之侵略政策，自民国20年9月强占我东北三省后，仍不断继续进迫，以蚕食手段，得寸进尺，企图先行逐次占领我华北各省市，以支解我国家，进而利用我国政客、奸伪为傀儡，以华制华之毒辣手段，控制全中国。

我在民国21年冬奉派以军事参议院上将参议的名义，赴欧美各地考察军事，作为建军之参考。先到欧洲之英、法、德等国，目睹列强三军的装备与军事教育技能，均随科学之发展而改良，突飞猛进，尤以德国之特种部队——如伞兵及装甲部队等之训练，与民族精神士气之激昂，深为感动；民23年冬转赴美国，又考察了8个月，见闻益深，耳目为之一新，真是胜过读万卷书。

依我考察所得，过去之平面战争，已进步到立体战争，无空防即无国防，我当时即有留美加学空军之意，惜体格检验不合未果。其时，适蒋先生电召回国，我即表示以希望为未来抗战之军职尽力。民25年1月被派闽、浙、赣、皖四省边区总指挥职，力辞未获，同年冬转调苏、浙边区主任，其任务乃兼负构筑国防工事。不消说，这是我国整个对日作战计划中主要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它对日后的抗战，至关重要，所以我欣然接受了。

苏浙边区主任的驻地在浙江省嘉兴县，主要任务为构筑苏、浙边境自乍浦——嘉善——西塘镇之线的国防工事，以杭州湾及太湖为左右两翼依托，并与左翼之苏州（吴县）福山国防工事相联系。这是对日抗战前我国国防设施计划之一部，也是为未来淞沪作战而设备的。我当时异常重视这项工作，曾不辞劳苦地缜密计划，经常分赴现地监督施工，恰好在“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前夕赶筑完成，但最可惜的是在淞沪会战前后，因兵力部署与作战计划及战术思想不一致，再加上军政两方面的不协调，结果，这些国防工事未能充分运用，发挥它的作用和价值。

民国26年间，日本军阀悍然侵华，敌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援师本庄繁“九·一八”之故技，纵其丰台驻军，于26年7月7日深夜，在卢沟桥附近非法演习，制造衅端，向我该地驻军第29军之第219团包围攻击，遂掀起中日全面战争之巨祸。

我于民国26年7月21日在紧急的命令之下，回到了嘉兴，并接受了应预期于淞沪作战之积极准备意旨，在这种情况下与任务之下，我必须考虑指导下述二种行动：第一、我如何去运用辖区人民的热烈情绪与不规律的意气行动，使其导入于有计划的发展与有秩序而镇静行为。因战争是不得已之艰巨任务，国民是战力的源泉，军队对敌的作战能力，胥视人民的知识与民族精神而定，人民不但须有强烈的战斗意志，而其在战时的生活，必须适合于战时的条件，正如蒋百里先生所云：“生活与战争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的名言。第二、我必须预先搜集战

争必要资料，判断将来状况的推移，和缜密部署军队与其他一切的战斗准备及各种措施，俾使在任何紧急情况之下获得主动作战的地位与自由，这是一种不易下达的决心，因为须有先知的谋算和特别的慧眼来做这个计划的基础。

8月上旬，我奉到立即从事上海作战右翼部署的命令，计划把辖下的部队利用夜间秘密推进于上海的边缘，以攻势行动，先歼灭上海驻留的日军，俾收得先制之利，并使敌人海上增援的部队，无法取得立足之地位。因攻击才能行动自由而立于主动的地位，而奇袭乃战术上最卓越的行动，胜利之冠，亦只有辉煌在攻击者的头上，故我始终反对消极作战的手段。犹忆民国21年“一·二八”之役的第一晚上，前十九路军蒋光鼐邀我和黄琪翔一同至虹桥商讨作战计划时，他告诉我在上海驻留的日军约3千人，我军于今晚可得使用的兵力约为两个团以上的状况之后，我就曾对他说：“应不顾一切，采取迅速而彻底的攻击，以车辆输送部队，突击虹口之日军司令部，并以商轮堵塞吴淞口，遮断其水陆之交通，只有这样才可以歼灭上海的敌人，并引导于我有利的战斗，为顾虑国际与外交，是战略政略上的最大错误。”但他终以“只有应战，不能求战”的见解，否定我的建议，而遭受失败的命运。那是对日战争采取消极抵抗的痛苦教训。

这次我把辖区原属我指挥仅有两个师，秘密地向上海附近推进，以李松山（第55师）进出浦东及右侧的沿海地带，阮肇昌（第57师）进出于上海龙华附近，我自己带了必要的幕僚在南桥设立指挥所，如果作战的重点在左翼方面，阮师可随时转用于该方面作战。我当时非常兴奋，并愉快地憧憬着辉煌战果的来临，我觉得这个任务是十分艰巨，虽然所指挥的部队，不能如已往自己建立亲自督训的前第4军的子弟兵一样的亲切而深刻了解，但此国家民族危难的时候，捍卫国家，乃军人应尽之天职，怯懦推诿，决不是一个忠勇的军人，故应以艰苦卓绝的精神，竭尽一己之智能来克服一切困难。旬日以来，我以非常紧张的情绪，静候

着战鼓的播动。

淞沪会战

8月9日，敌人的兵舰集中于黄浦江和长江口的江面，其陆战队万余人在上海登陆，并以武装士兵闯入我虹桥机场滋事为借口，要求我撤退驻沪之保安团队，经我方严词拒绝后，遂于13日正式揭开了淞沪会战的序幕。

最高统帅部适时下达了淞沪方面军队的战斗序列，张治中担任左翼军总司令，我担任右翼军总司令，并以李松山、阮肇昌、刘尚志各师及张奎基的独立旅，炮兵第2旅第2团编为第18集团军，该集团军之总司令亦由我兼任，同时刘建绪之第10集团军亦归入本右翼军之序列。我即令张旅推进浦东接替李松山师的防务，李师移动到上海方面，俾得适时策应左翼军之作战，并以刘尚志师推进至松江附近，控置为集团军之总预备队，刘建绪部则由衢州向杭州推进，作为右翼军的第二线兵团。



张发奎将军亲赴
淞沪战场督战时摄

8月13日敌我在上海的部队发生接触，我左翼军照原定计划开始攻击，经数日的战斗，因我军没有摧破坚固工事的兵器，且不熟练街市战，虽一度进出汇山码头，但敌人的整个防线，终未能攻破。当时我右翼军方面，因为在南市方面，隔着一个租界，暂作缓冲地带，在浦东方面，亦因受黄浦江之地障关系，敌我均非

主作战重点，战况较为沉寂；但左翼军方面战况吃紧，我必须用各种方法去策应支援该方之作战，除将阮师增加左翼军方面外，我并以炮兵在浦东之洋泾附近设置炮兵阵地袭击敌人之左侧背，收效甚大。

“神炮”——浦东炮兵对敌人的袭击，在这次会战中最值得回忆的一件事，这是一种运用炮兵奇袭的特别方法，当时曾被敌人誉为“神炮”曾打击了敌人的“出云旗舰”，也袭击了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发挥最大的威力，敌人感受了重大的威胁和伤亡。敌方曾费了很多的侦察手段，企图毁灭该炮兵，但终未得逞。盖我炮兵阵地位置在浦东之洋泾附近正对着虹口的日军司令部，可以瞰制黄浦江面上的敌舰及其后方部队的行动，并利用海底电线在对岸设置有一个秘密而良好的观测所，来指挥我炮兵之射击和修正弹着之偏差，虽在夜间亦能准确射击，且为避免日本空军之威胁，常利用夜暗作活动时间，白昼则巧妙地把它伪装起来，藏匿于低洼沟渠或竹林深处，且会战的全过程，“神炮”的阵地位置始终未为敌人发现，我非常地爱护它，常亲自去指挥它，在会战終了最困难的时期，我亦尽各种手段，把它安全地转移于另一次战役。

“神炮”还有一个更可回忆的故事：有一天，上海的几个新闻记者来战地采访新闻，对“神炮”特别羡慕，要求去看它的雄姿时，在竹林隐蔽的炮兵阵地里，炮兵营长和他们摄了一张照片，次晨他们把采访战地新闻，披露于报上，同时把这一张照片刊登出来。当我在时事新闻上，发现了这段消息后，我立即认为这件军事消息的泄露，对于“神炮”之安全，将有莫大的危险，我立即命令该营迅速变换阵地。是日中午，果不出我所料，一队敌机，把所有洋泾附近的竹林全部炸毁，其附近的居民也遭受了鱼池之殃，损失不少，但“神炮”因能及时变换阵地，而依然无恙。事后炮兵营长撤了职，报馆受了查究，记者亦被扣办，这件事的发生，对于新闻报道得了很好的教训，而一个指挥官对于细

末小节亦应时刻留意，不能疏忽。那时我只仅有这6门的“卜福斯”山炮，假如有较多的炮量和较大口径的炮种，相信对本会战中得更多的帮助，我曾建议统帅部，由乍浦附近海岸建筑一条可以运动重炮兵的临时道路直达浦东，效法海岸游动炮兵的运用，调派一部重炮兵使用于浦东方面，惜因炮兵过于缺乏，而未能采纳。

8月22日敌增加第3师团、第11师团及第1师团第8师团之各一旅团，同时在宝山，狮子林登陆，向我左翼军方面之宝山、罗店、浏河之线进攻，我右翼方面之川沙，及浦东各地，敌人亦分别作积极之蠢动，我军亦同样以京沪、沪杭两铁道输送后续部队，投入于左翼军方面。双方均以强大的兵力作阵地战之搏斗，战况异常激烈，使我们原来预期以攻势作战手段指导会战的计划顿挫，被迫变为一种纯粹的防御阵地战了。

我军最高统帅部在后方尽量地挹注兵力于淞沪方面，企图确保这个远东最大的都市。京沪、沪杭两铁路日夜不间断地奔驰，一师一师的部队逐次加入填补防线，其情况好象1916年法军为挽救凡尔登要塞的危机，从巴黎运送增援部队的状况相似。敌人方面新装备和战术技能，已达到了相当的高度，其多量的野战炮兵配合着海军的长射炮的盛炽火力，已在战场上获得优势主动的地位，我军则在战壕里，而且只有临时构筑之野战工事，以劣势之装备，凭着血肉之躯与敌搏斗，其牺牲之大，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常殚精竭虑地作状况之推移判断，倘我军以大量的兵力投入该方面的决战防御，仍无胜算把握时，则我们的纯粹的防御计划，应否加以修正？实有考虑之必要。目前已经过了两旬的激烈战斗，欲将敌人歼灭或遏止其攻势，在我军之现有条件之下，恐难以达成。因此，我和张治中曾建议最高统帅部，对上海会战可能适时运用兵力之最高点，作有效而精密的计算，若超过这个限度仍不能挽回战局以制压敌人时，则我们的战略，似应转变为持久消耗战，并先以约10个师兵力预行占领苏、嘉、吴、福之既

设国防工事，作为第二抵抗线，此10个师之兵力，除非用在扩张战果方面，不得为其他状况转用，我2人并愿意负责自接受敌人攻击起，固守此既设阵地3个月时间的责任。

最高统帅部否定了这个建议，他的意见以为上海是军事必争之地，应不惜一切来确保这个地区。当时敌人的后续部队尚未全部到达，战况较为沉寂，因而有些将领乃为此而受眩惑，满以为敌人攻势顿挫，冯玉祥当时亦有“淞沪方面的战事已经稳定了”的报道。

9月中旬以后，敌之增援部队——第1、第3、第6、第8、第11、第16、第102、第106、第107、第114、第116等11个师团番号已陆续发现。估计当时敌人的兵力总计约在20余万人，炮300余门，战车200余辆，飞机200余架，敌人在淞沪与我决战之企图，益加明显了。我左翼军方面，当时亦划分为2个区，以薛岳将军担任左翼，朱绍良将军担任中央、与我右翼军相联系。左翼军方面，自9月中旬以来，战况渐趋不利，阵地次第失陷，虽赖我后续部队逐次加入战斗，亦只能维持“寸土必争”之状况而已。其被突破之点，虽经逆袭，亦不能恢复，全线均处在被动挨打地位，别无进展，于整个战局无补。

我右翼方面的战况，敌虽迭次企图排除我浦东对其侧背之威胁，在我严密的戒备下，敌人几十次的登陆行动，都无法得逞。不过我常顾虑，敌人如在左翼军正面突破企图不能达成时，可能来个侧面迂回行动，因此我右侧背的金山方面是一个最可注意之地区。当时我有一个预感，回忆历史上戚继光于闽浙荡寇时代，日人曾在金山登陆而扰乱我浙境记载，如果敌人以往历史作为后事之师，则敌人从金山方面附近登陆之历史重演可能性甚大，况金山有40呎以上的水位深度，并有利于登陆运动之沙滩，可作为滩头阵地的据点，从战术上观点来判断，那里确为一个理想登陆地点。为了这个侧背的顾虑，我曾亲自实地侦察那里的地形，在该地配置一营步兵和一连炮兵，构筑坚固工事，并再三叮嘱他们

固守，对海面尤须特别警戒，且令他们编组了一队渔船，远出海面从事广正面的搜索及规定海面与陆上部队之联络信号，其附近之沿海地带，我常亲自或令幕僚人员巡逻，并把沿海和浦东全线的防御地带严密组织起来。因右翼地区辽阔，兵力有限，我必须以谨慎勤劳的精神去克服，以保持我全军右侧背之安全。

整个10月期间之主作战，敌我均保持在左翼军方面。该月下旬，敌人即以全力猛烈攻击，决战的时期迫在眉睫，战地悲惨的景况，一幕一幕地呈现在我的眼前，我们的增援部队陆续向前挹注，由后方输送到达战地，没有一刻的停留和准备，就填入了火线，敌人的炮弹如雨点一样散布在我方的阵地上，我劣势之炮兵，且因制空权掌握在敌方，无法与之抗衡，只有英勇之战士们用血肉来筑成长城抵抗敌之优势火力。敌机一天到晚飞翔在我阵地上空投弹，没有立体作战经验的部队，又未讲求疏散与伪装，致招致许多无谓的伤亡。我军行动以及军事部署或调整，白昼均受限制，在暗夜实施，时间、精神方面都蒙受莫大的影响，同时战地一片平野，其不能徒涉之河流，纵横交错，通讯联络倍感困难，各级指挥官对指挥一个防御组织不健全的大兵团作战，确是一件不简单的事，这时候各级干部士兵才认识现代战争中科学的地位重要。

在这时战况高度紧张中，最可歌可泣而又值得安慰的事，是人民对我军的协助，他们不仅帮助军队的运输和救护工作，并有的自动献出他们仅有的食品。妇女们自动看护我们的伤兵，慰劳队的歌声，鼓舞了我们的士气；工作队的崇高热情，减少了战士们的疲劳；大军作战最感困难的后勤业务，大部都由他们帮助解决。军队为国家而流血，人民为救国家民族的英勇军人而流汗出钱，这是民族战争的特质，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

10月30日，左翼军方面的战况已到了极度的不利情势，其突击我大场阵地的敌军，已在周家宅、姚家宅两处强渡苏州河。上海市区的我军，已感受侧背的重大威胁，敌人似有从大场以西向

我左右两翼席卷的趋势。朱绍良将军这时更调任甘肃省主席、所遗中央地区指挥任务，最高统帅部命令我接任，将原来我右翼方面指挥责任交由第10集团总司令刘建绪接任，其时刘集团的部队，正从杭州向前方推进，我一面担心右翼沿海地带的侧背和刘集团部队能否确实接防，一面感于上海方面的战况，将如何去挽救这时危殆的局面？我心灵上的焦虑，是我生命史上最难忘的回忆。

11月2日我的指挥所，由南桥移到龙华西侧的北干山，是极接近火线的位置。当我到达这里的时候，情况又变化了，第一线的部队已陷入混乱状态，其渡河的敌人，给我们侧背的威胁，益形扩大，我已没有可以抽调的预备部队来应战，而后续的兵团则迟迟未能到达，我除竭力而镇静地鼓励士气以期稳定其局面外，别无他途了。

11月5日，一件数月来日夜焦虑的事情，不幸而言中了。敌人以其第6、第8两个师团于金山咀、金公亭等地同时强行登陆，我薄弱的守军未几即被击破；而刘集团行动迟缓，未能适时对敌人夹击，让敌长驱直向松江前进；我吴克仁军集结未毕，仓卒应战，又遭敌各个击破。9日松江遂沦陷，我军腹背受敌，其不利之态势已暴露无遗了。

从整个淞沪会战的战略上着眼，自敌人强渡苏州河后，权衡当时的双方战况，我军适时退却，是不可迟疑的事。当时战事正酣，纷至沓来之各方不同的战况和敌情，如不能当机立断，适时适切下达决心，则影响以后作战甚大，指挥大军作战的指挥官所最感困难之条件也就在此。前敌总指挥陈诚将军来到了我的司令部亦有同感。但最高统帅部仍犹豫未决，等到情况到了危急境地之际，于9日始下达退却命令，时机已不确切了。而且通讯联络不确实，当我奉到撤退命令时，前线部队已先我奉到，开始撤退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我才发现，故有极度混乱而难于掌握之情形，狼狈不堪之悲剧一幕一幕地出现，伤心惨目之事，回忆起来，犹有

余悸。

在远东的战史中，这是日俄战争后最大的战役，也是抗日战争中第一次最大的屠杀，作战时间将近三个月之久，双方动员兵力百万以上，一切当代的兵器，都已搬上战场，我们在此役中虽然损失了巨量的兵员，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其稍堪告慰者，我们则由此而认识了现代战争的特质，获得了许多的经验与教训，增进了不少的各种战斗技能，同时惊醒国人救亡图存的观念，再接再厉，产生新、厚的丰硕力量，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去争取最后胜利。

苏浙战线之转进

最高统帅部对淞沪会战后失败之退却命令，是于11月8日未按正常指挥系统下达的，这是一种计划不周全面又不适切的退却。退却在战术上不是一个绝对失败的名词，在战史许多战例中，有计划战略退却，仍可转败为胜。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马肯生将军于华沙的退却指导，法军于马恩河以第6军侧击德军的右翼，都是转败为胜的退却战例，关键在于高级指挥官，对于战略与战术能否巧妙运用而已。

9日夜，一个黯淡而悲惨的黑夜，天空闪烁着稀疏的星光，没有月亮，紧密的枪声渐渐向我的司令部接近。后方人员呈现出特别仓忙的神色，附近的居民扶老携幼向西北方向逃避，人声象闹市一样的鼎沸，天空虽时有敌机轧轧的声音，但禁止不了四周照耀黑夜逃亡的火光，这一切均充分显露出极度的紧张的情况，我怀着万分焦虑的心情，注视着事态的变化。

记得民国26年11月9日我军自前线开始撤退时，曾经发生过一件使我吃惊的事件。那时我身任淞沪会战之中央军地区指挥官，竟不知道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时俞济时将军经过我的司令部门前时，恰好为我发现，俞当时属胡宗南将军指挥，而胡则

属我指挥的，当时我问他到何处？他才报告我说：“已奉命撤退，难道总司令不知吗？”事实上当时我确未接到撤退命令，其书面命令，乃后来经由第9集团军胡宗南将军转来的，他并且已先拆阅过，故我接到此命令前，上级并无任何预先指示。但是我辖下的各部队因先知上级的企图，未等到我的指示就先行开始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之错误，可以想象上级人员如何的慌乱。尤令我不解的，退却命令所选定之青浦、白鹤港之线，距现阵地仅约50公里，试问这短少50公里距离，如何可以作为百万大军之退却目标？但我仍基于上级的指示而下达三个集团的退却命令，以完成我的手续，而我命令中的各种规定，恐没有办法实施，因为各部队已早于我的命令下达之前而自动开始退却了。

当敌骑接近了北干山边沿的时候，我们的部队大部虽撤离，但仍有少数的落伍士兵和伤患，呻吟于沿途两侧。我怀着万分悲痛的心情向青浦转进，途中我看见了一些毫无规律而极度混乱的退却现象——各行进的交叉，方向的错误，军民的混杂，友军误会的冲突，指挥官不能掌握部下，部队寻觅不到自己部队长的位置种种的坏现象，都已暴露无遗。在此生死紧急关头中，部队之是否精练，将领以及各级指挥官之素养与责任心如何？是一个现实最好的考验。

敌之追击部队，紧蹙在我们的部队之后，到达青浦时不但未能妥善部署，且没有喘息的余裕时间，青浦又于11日失陷。那时松江已沦敌手，我虽奉令解除中央军地区总司令的职责，回复右翼军的指挥任务，但已不能从沪杭路线归队，因须绕道，不能及时到达，只有电令第10集团军迅速确实占领乍浦，嘉善之线既设阵地拒止敌人。

乍浦、嘉善之阵地，是战前我亲自监督完成的。这一带地形，我特别的熟悉，希望在此线以最大的努力来迟滞敌人由沪杭线南下，遂决心亲赴嘉善督师。幕僚们为我个人的安全而担忧加

以劝阻，我未予采纳。我于13日到了嘉善，当我在弹雨之下视察阵地时，得知保存工事图表之人员，与掌管掩体钥匙的乡保甲长均已逃避了，部队无法进入既设工事，而且当时仅有一师装备窳败的兵力，占领了约30公里之正面，在暴露的土堆上构筑临时野战掩体，与当面第16师团和近卫旅团之一部优势装备之敌抗衡。在这不利的状况下，14日失了嘉善，19日嘉兴沦陷，敌人的铁蹄即踏入杭州门户。

左翼京沪线，亦陷于同样的命运，部队退却更为混乱，没有一个部队作过有组织的抵抗，亦没有一个部队稳定的占领过阵地拒止敌人，吴县、福山、锡澄两线的既设阵地均无兵力加以利用，任令敌人毫无阻碍而从容地跨进了这两道南京的门户。这时我再忆起我前面所述的建议未被采纳之失策，否则我们不仅可以迟滞敌人向南京进犯的时间，而从淞沪撤退的大军，亦决不致落到如此狼狈的地步。

11月下旬，敌以主力沿京杭公路、一部沿京沪铁路以钳形的战略攻势向南京前进。南京是我们的首都，其得失对于国际与国内的影响，较上海的关系更为重大，最高统帅部最初原有意保卫南京，但作战如弈棋一样，满盘之差，错落一子，即不可收拾。我们在淞沪会战既已损失了精锐部队的主力，其由该方面转进的兵团，数量虽不少，但大都残破不堪，战力薄弱，非有相当人马及装备时间整补，一时难以复元，况当时我军态势上又处于内线作战被动地位，欲在南京外围各个击破由京杭、京沪两路齐头并进的敌人，依现有兵力及态势来看，其不可能公算甚大。因此我们必须从坚守据点着眼，指导南京的战斗，故对于时间、兵员、弹药、给养以及外援兵团的运用，转移攻势时日的策定，均应从速准备和详密的谋算。

无疑的，保卫南京，乃一个重要的决策，最高统帅部召集我们在南京开了一个会议，结果，唐生智自告奋勇，肩起了保卫大南京的责任。我被改派在宜兴方面指挥刚从广西调来的廖磊兵团，在该地附近，占领一个侧面阵地，以策应南京的保卫战。杭州

方面的指挥责任则交由刘建绪接替。当我到达宜兴的时候，广德与常州已发现敌人，江阴要塞亦失陷了。

敌之行动是迅速的，由京杭路前进之敌，在吴兴及在安吉、泗安方面分别击破了廖磊及刘湘军后，12月4日已进出于白容及秣陵关附近。由于外围我军兵力的脆弱及南京防御组织不健全，战斗仅一周的短暂时间，我中华民国之首都即被异族——日寇占领了。

南京于12月12日沦陷，太阳旗13日晨竖上南京的城楼，这是一个最悲痛的记忆，也是我中华民族最大的耻辱。不过南京的失陷，在淞沪会战失败后，早为一般人意料所及，在军事立场上说，南京的保卫战，不能成为一次会战，仅可认为淞沪会战的尾声，亦可认为是敌人追击目标的最后一次战斗而已。

南京失陷后所带来的灾难，其悲惨情形，我真不忍卒述，居留南京之未及逃离千万民众，被日本军阀屠杀，其保卫南京的战士，抱着保存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虽在敌人包围之下，亦不愿屈膝投降，仍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苦斗，实施突围，或只身横渡或泅水长江而归队，在突围与渡江中，千万的战士壮烈牺牲了；京、沪一带的民众，为着不愿做敌人的奴隶，扶老携幼，成群结队跋山涉水，向后无目的地流浪逃避，只知保存忠义气节，至于流浪到何地与将来的生活如何，都不加以考虑。我从宜兴向於潜转进途中，到达於潜附近，遇见一个松江县的土人，他带着妻子和几个孩子，肩挑着一担行李，跟着我们向於潜方向行进。他对我说：“我是松江人，11月9日，鬼子进了松江城，我就逃出过着流浪的生活了。”我问他为什么逃离家乡？现在向哪里去？将来的生活如何？他流着眼泪说：“这于我是没有办法考虑的，因我不愿做亡国奴，不愿在日本鬼子的统治下做顺民，只知跟着部队跑，你们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不过我希望现在能稳住脚，使我们不致流浪到很远的地方，至于生活，则无法计及，只有一天挨一天就算了。”这是战争带来的灾难，也是民族精神

的表现，当时我非常地悲痛而惭愧，这种宝贵义不事秦，有敌无我，不甘奴役，爱国家爱民族之精神，使我十二万分地敬佩而感慨万千。

南京失陷后，我们在长江下游有体系的抗战已受挫折，转进中的疲惫兵团，只得进入皖北，皖南山区，一面整补，一面从事游击战与敌人周旋到底。我们不可讳言，这一阶段的军事方面，是失败了，我认为不要带着阿Q的精神以自慰之口吻，夸说我们的战略如何成功。反之，我们更要承认错误，切实地去检讨，虚心地去接受教训，不要讳疾忌医，应即面对现实，承认事实，勇于进行改革，扭转一切颓风，以复仇雪耻……

选自台湾出版的《张发奎将军抗日战争回忆录》

沪战开始时空军动态

陈 栖 霞

1937年“八·一三”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登陆。这时我正在国民党空军中任第6大队大队长，驻防南京，我队的任务是“监视青岛以南，舟山群岛以北，东海敌舰行动……”当时我的大队辖有3个中队，每中队有九架美制道格拉斯式侦察机，除前后座有两挺机枪外，还可以带炸弹250公斤。我的部署是大队部驻南京通济门外大教场空军总站，调一个中队进驻淮阴，并以海州连云港、上海、苏州，作预备降落加油站。

在此之前一个多月，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北方大战已经揭开。平津战事正在激烈地进行，蒋介石的直系陆军有汤恩伯、刘峙、顾祝同等几张王牌参加，但他始终没有派出空军，他把空军的主力，都控制在东南。我记得当时可以作战的飞机约有200多架，9个大队和几个独立中队。其布置的概况大概是这样的：扬州驻一个驱逐大队，南京两个侦察大队，广德两个轰炸大队，杭州一个驱逐大队，曹娥一个攻击大队，南昌一个重轰炸大队，还有第7大队，忘记驻在哪里。这构成了以上海为前方要塞来保护南京的阵势。

但当7月下旬，日本的海军又在上海方面活动，增加舰只，最多达到20多艘大小军舰时，蒋介石看到东面的战事，势不可免，想突然封锁吴淞口，把日海军的几十条军舰封闭在黄浦江内，来个瓮中捉鳖。可是他这一妙着，又被他的幕僚汉奸出卖了情报。事情是这样的：大概是8月初，一天晚上约7时左右，我

在大教场大队部接到周至柔的电话，叫我立刻到山西路他公馆去。到时看见参谋处长张有谷，轰炸大队长张廷孟、王叔铭、南京总站长石邦藩。周至柔的神色非常严肃，说有要紧的话和我们说，弄得我们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到前后看看无有他人，才关好门窗，用很庄重的语调，低声和我们说：

“你们的部队都准备好了吗？”

我们大家一齐回答：

“早准备好了，只要有命令，随时可以出动！”

他说：“好的，我刚才从委员长那边回来，今晚12点钟，我们要封锁吴淞口。”

他说过这几句话后，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接着又说：

“据今天下午上海的情报，日军已有大小20多艘舰艇进入黄浦江。战事难免，委员长决心先下手解决了这一部分敌舰，所以今晚动手，封锁吴淞。到半夜12点钟，日军一发觉我们封锁吴淞后，立即就会发生反抗，明早我们的空军就要全部出动，投入战斗，协同陆海军解决了黄浦江内所有敌舰。任务是艰巨的，要绝对保守机密。”

他接着又说：“现在你们大家一个也不要走，就坐在我这里，商量一下作战的行动。要等到12点上海最后的情报。封锁吴淞口的目的达到后，你们就立即各回本队，连夜准备，明天绝早就飞往上海轰炸。”

当时我们几个人坐在周至柔公馆的客厅里神情都非常紧张，看看手表，又看看壁上挂钟，觉得钟表走得特别慢。将近12点钟，大家又去注视着电话机，可是12点钟到了，电话机不声不响，但是壁上时钟滴嗒滴嗒地一秒一秒走过去了，这是怎么回事？周至柔也坐立不安，起来在厅中踱方步。一直等到一点多钟，电话机好象是坏了似的，总是不响。周至柔又不敢打电话去问。只好叫我们大家且先回队部，听候命令。我虽然回到大教场本队

部，一夜都不曾睡，并且在天还未亮之前就叫全大队的飞机都挂好炸弹。准备天亮出动，但在作战命令没有到达前，不把任务目的告知各队，只叫三个中队作好战斗准备。

但在飞机场上等了一天，也没有消息。后来我才风闻到是蒋介石内部一个高级机要秘书把情报出卖给日本人。日本海军在当夜12点钟以前就将大兵舰都退出吴淞，停泊在口外，并用几只驱逐舰通宵不断地在吴淞口开进开出。探照灯把吴淞口照得雪亮，使人无从下手。过了几天，日本人只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为日本人不会在东南发动全面战争。就把空军主力北调。我记得那时候只留我第六大队驻防南京，其他的部队大都奉密令北飞。可是先行的部分空军刚到蚌埠，“八·一三”沪战开始了。

“八·一三”的上海战事是以日本借口日海军军官二人在沪西虹桥飞机场被我机场卫兵击毙的事件而发动的。事发当天，有一小队日本海军陆战队要进入虹桥机场，卫兵阻拦不让，日军就开枪打伤我方一卫士，我们的卫队开枪还击。当双方在机场门口发生争吵时，上海航空站与南京航委会用长途电话不间断地在联系，航委会参谋处又立刻将情况转告我大队。我们都时刻守听情报。最初航委会叫上海航站极力忍耐，阻止日本兵进入机场，避免流血，但日寇是故意寻衅的，还先开枪打伤卫兵，于是双方打了起来。

当天夜里，我大队就奉到出击的命令。14日天还未亮，我们就在机场做好准备。但那两天正有台风在上海附近登陆。14日早，台风中心正沿长江西进，南京整日都是大风雷雨，阴云笼罩，无法出动。这天上午接到杭州情报，日本空军已出动向我杭州笕桥机场空袭，是从东南面进入杭州上空的。笕桥机场和空军军官总校被轰炸，有部分损伤，但这一次我方打得非常漂亮，我驱逐机队立即凌空迎战，当场就击落敌机好多架，其余均向南方逃去。从击落的敌机残骸和尸体中证明被击落的是木更津的轰炸

机队的93式重轰炸机，喜报传来，士气颇为振奋。

当时国民党的空军从1932年在笕桥积极训练以来，素质有一定提高，但未和敌人接触较量过。此次初逢大敌，一战胜利，证明我们当时所采用的美国霍克式驱逐机性能尚未落伍，新训练出的头二、三期学生，都能胜任。这就增强了其他各大队每一个队员的信心。

8月15日的早晨，南京仍然是阴雨，且云雾很低，连中山陵后面的山顶都盖住了。风也很大。我在大教场机场上非常焦急，参谋处已经打来几次电话，问我怎样？我只好回答他们：“请自己看看天气好了，能不能出动？”但到8点钟左右，参谋处长张有谷给我又来电话，他说：“栖霞，你为什么还不出发？”我仍然说：“你看天气吧！”他说：“刚才接到广德、杭州的情报，敌机又空袭我广德机场，现在我杭州、广德两地空军正在迎击和拦截中，此刻尚在空中。你还不出发，万一上面说你临时畏缩，可受不了。”我想，这话也对，蒋介石万一真个说我作战不力，岂不冤枉。他不懂当时南京尚在台风附近，而杭州、广德等地都没有什么风雨（此种情况应有天文台记录可查）。开始，参谋处也同意我等候天气转好再出动。但杭州、广德两地发生空战的情报到南京后，参谋处也沉不住气了，催我出动，我也就不顾一切遵命前进。

不到半小时，我第6大队就全部凌空向上海飞行，我自己驾大队部的飞机领队出发；同时，停在机场整装待命的第5大队看见我第6大队起飞，他们亦随即全部起飞，两个大队共有50多架飞机，列队东进。这时候，大雨如注，云雾低垂，才到汤山一带，队形就被云雾迷散了。到了句容，简直就看不到部队跟进。我心中非常焦急，但以为部队一定在附近云雾中前进。当时视线很差，飞行眼镜都被雨水弄湿了，看不大清楚。甚至连飞行衣也被淋湿了。这一次大雨，可以说是我学成飞行以来，第一次所遇到的最大的雨。这一天在雨中飞行时间过久，到了江阴接近常熟

一带，雨才小了，快到吴淞，天空才露出了晴天，总计在大雨中飞行了一个多小时。要不是大敌当前，任务重大，又看不见部队，我早已飞回南京去了。我怕万一部队都到达上海，而我当大队长的人独自退回南京，那就真个变成临阵脱逃，要受军法处置了。因此我决心单机也要飞到敌人的头上抛下几颗炸弹。另一希望是在上海上空遇到本队的飞机，所以一直飞到上海。我是沿江先到吴淞上空的，看看地面，也不见什么动静。在吴淞上空盘旋了几圈，始终看不到我机前来，也没见到敌机。遂沿淞沪路向上海市飞去，想找一个目标，投下炸弹。到了江湾上空，忽然听到后座机关枪响，我以为遇到敌人的驱逐机了，急忙回头一看，却又不见有敌机来攻。我就鼓着眼睛，怒目责备坐在后座的参谋，怪他不该乱放机枪，浪费子弹。哪晓得他对我指指飞机左后方约100多公尺远的高射炮子弹爆炸的烟雾。好险！差点被命中。不过敌人也暴露目标给我，我就回敬了他几个炸弹。等我钻出云来时，飞机已在北站上空。这时仍不见我机踪影，再在上海停留也没有多大意义了，看看黄浦江面，也只有几只兵舰停靠在外白渡桥附近英领馆旁边。我就沿京沪路向西飞回，希望在沿途遇到我机。一直到了苏州，见在阊门外机场上面停放七八架飞机，我就在苏州降落，这才看见是我第6大队的飞机，也有一两架第5大队的。我问他们有没有看见其他飞机，有没有到上海。据他们的报告，亦是飞过汤山就飞散了，各人的中队长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但是这几个年轻的飞行员竟也独断专行地飞到上海，在江湾上空投了炸弹就走，因恐南京天气不好，所以在苏州降落。我慰勉了他们几句，觉得我中华这班年轻的子弟兵可爱，他们都是我们在笕桥航空学校亲手教出来的雏鹰。于是我叫他们在机场警戒着，就跑去用电话和南京联络，把情况向参谋处报告，并请他查究我队其他飞机的下落。当时参谋处已收到各地机场的情报，说第5大队的大部飞机已降落在滁州，也有几架是第6大队的，其他的仍在南京降落。我一计算3处的飞机总数不差，无损失，就

放心了。参谋处本意叫我在苏州待命，就近向驻在苏州的司令长官张治中先生请示，并了解前方地面部队动态。但我认为苏州太近前线，一切防空情报设备都没有，飞机摆在此地是很危险的，主张让这几架分散了的飞机，先回南京队部，我也要回京收集队伍，重新整顿出发作战。得到参谋处同意后，我就叫那几架可爱的雏鹰于第二天早天亮即飞南京。我在第二天早晨去见张治中，张先生那时候住的是一座庭院深邃的大公馆，警卫森严。当时由卫士引我进去，转弯抹角到第3进屋，再上楼，这才看到张先生。他一个人，坐在一间很大的楼房中的大办公桌边。我说明来意，但他当时对于前方的消息也不尽了解，对于我们空军今后作战的方针，也没有明确的指示。

辞别了张先生，我雇一乘人力车，到飞机场去，才到阊门，就听到空袭警报。我下车立在人家屋檐下，叫人力车夫把车子也弄到檐下来，刚站定，就听到炸弹爆炸声，判断方向是在车站和机场，但我只看到车站上空约有两个中队的敌机，在约1000多公尺的低空向西南飞来。机场离城较远，不知有多少敌机。我庆幸我的几架雏鹰已飞走，但又担心我自己的座机被毁。敌机刚一过去，我就叫车夫拉我奔向机场。机场离城有好几里路，面积很小，周围又没有村落，老远就看到我的飞机还摆在场地上，走拢一看，飞机前前后后都是弹坑，但没有炸中我的飞机，而且还有一架敌机摔坏在我飞机后面几丈远的水田中，两个日本飞行员已摔死了。站长告诉我，一队敌机来炸过。敌机见没炸中我的飞机，就俯冲下来扫射，被卫兵用步枪击下来了。那是日本航空母舰上起飞来的飞机。我仔细检查飞机，竟没有一点损伤。我怕敌机再度来袭，就起飞回南京，将上面情形向航空委员会报告。

在8月16日我集中飞机向上海轰炸，并派机向东海侦察敌航空母舰。这一天在上海遇到敌人的驱逐机，我第5大队被击落飞机一架，同时又听到驻曹娥的攻击机队，亦被日军击中多架，虽只是枪伤，但士气颇有动摇。因为战争初期，我航委会集中轰

炸、驱逐、攻击、侦察各种机队都用于轰炸。

这时候，航空委员会为了作战指挥的便利，即成立空军前敌总指挥部，以周至柔为总指挥，毛邦初为副指挥，以参谋处副处长罗机作参谋。另外又派出3个司令：以张廷孟为轰炸司令，高志航为驱逐司令，陈栖霞为侦察司令。为了避免敌机轰炸空袭，空军总指挥部亦从城内移到中山陵东南紫金山麓的运动场。这时候，飞机队也调整了一下，除意大利制的重轰炸机队摆在南昌始终未参战外，将驻南京的第5大队调西安，驻曹娥的攻击机队调南阳（豫西）去整训待命，轰炸机队的重心位置在广德，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已西迁昆明，校中训练用的驱逐机，和扬州的驱逐机大队都集中到南京。这时候，南京已受日机空袭威胁，不时发生空战，因此，将我的第六大队侦察机移驻合肥，由我自编组一个精粹的中队，飞到杭州笕桥乔司海滩上一个临时机场，对上海之敌，作彻夜不间断的疲劳轰炸。

9月下旬，我到杭州笕桥时，看见笕桥机场和校舍，已是断壁颓垣，人去楼空，一切警卫都没有。我们只好在白天就将飞机飞到建德，黄昏时分进至杭州乔司。

就在这一段时期中，在南京守卫首都空防的驱逐机队，既要防卫南京，还要到上海去轰炸。因为当时我们所用的美制霍克式驱逐机可以携带500公斤炸弹，其载量约等于当时所用的轻轰炸机，可以进入敌人阵地，施行轰炸，投了炸弹后遂即可以对敌的驱逐机作战。这种飞机的性能和敌人当时所使用的93式驱逐机对比起来，还胜一筹。日本93式驱逐机虽灵活，但速度不及霍克机，而且93式只有两挺小口径机枪，霍克机则除一挺0.79小口径机枪外，还有一挺1.3的大口径机枪，火力比93式机强多了。我们当时这种飞机很少，总共只有两个大队和一个中队的老霍克机。但在“八·一三”以后到上海撤退前，这两个多月的京沪空战中，也曾击落敌机几十架，如当时被称为中国红武士的刘粹刚（东北籍航校二期毕业生）一人就创击落敌机九架的记录。击落

三架、两架、一架的记录者还有多人，有一位飞行员在上海浦东，强迫降落敌人阵地后方，在杀伤了前来围捕的许多敌人后，用手枪自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

同时，蒋介石预先在美国订购了6架马丁式重轰炸机。头一批运到两架，大约在9月下旬10月上旬，在南京机场投入战斗。这种飞机的携载量有1000多公斤，可以携带800公斤的炸弹两枚，头一天晚上有一架开始在夜间飞到上海去轰炸，在吴淞江湾投下炸弹后，轰然一声，震得公共租界的房屋门窗为之动摇而破裂，其威力很大。可是在第二天夜晚又拟飞去轰炸时，在南京机场刚刚起飞，就着火焚毁了。第三天再拿第二架出动，又同样在同一情形中焚毁了。两机的失事，完全相同，似被汉奸特务预放定时炸药似的。当时蒋介石的部队中汉奸也很多，连旧国府和军委会内部都有汉奸。这两次失事，死了好几个青年优秀飞行员。从此以后，马丁机也再没有组成新队。

当上海的战事正在激烈进行的时候，北方占领平津的日军，又分道南向平汉线的保定和平绥路进兵。驻保定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二人告急的文书雪片似地飞来，并要蒋介石抽调空军北上助战。上面已经说过，从卢沟桥事变以来，蒋介石始终没有派一架飞机到北面战场。特别是山西王阎锡山，一向是不欢迎蒋家军进入他的防区的人。这一次竟然请调空军，蒋介石当然不能拒绝，当即令周至柔抽调空军北上助战，弄得周至柔啼笑皆非。因为当时的空军全部实力，只能应付京沪的东面战事，而且因没有补充，已渐感困难，若再抽去实力，就难以支持了。但因为是蒋介石的命令，他还得遵令去敷衍一下。在空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决策之下，把我叫到南京，给我一个空军北正面支队司令部司令官的名义。要我立刻组织一个支队司令部，克期北飞太原。划给我的空间范围可够大了。命令上规定“从四川万县以东迄湖北信阳之线以北，所有黄河两岸除甘肃一省外的空军和地面场站统归该支队司令部指挥区处”。这无异

是叫我去独挡一面。但支队部的编制又是很小的，只是一般空军大队部的编制，除司令官外，有参谋、副官、书记、军需、机务等几个干部和一些司书、译电、械、弹等助理员。不过另给我一个活动的办法，就是战务费不加限制，实报实销，并可以调用别部人员和临时雇用人员。至于部队呢，除叫我将我的基本部队第6大队，仍留东面战场，交由副大队长张毓航率领，仍在杭州作战外，另拨驻西安的第5大队和南阳的第27攻击机中队听我指挥作战。当时我就向总部提出意见，认为支队司令部的编制小，给我作战的部队太少，太弱，这两支部队都是东线作战受有损失，调去整训的。这时候第5大队虽已补充完备，但27攻击机队只有飞机5架。因此我要求再抽调一个霍克式驱逐机中队给我。经过再三讨论，才不得已抽出一个第28驱逐机中队给我。这是一个独立中队，是从广东收编过来的老霍克机，中队长陈智光和其他的队员已经有击落敌机的记录，但该队损失很大，那时候也只有5架驱逐机了。

决定之后，总部立即电令汉口总站派一架运输机飞来南京，限我第二天就飞洛阳，并准我尽量带走我第6大队部的班底人员，这大约是10月中旬的事。从此以后，我就脱离东线战场，转到北面去了。

平型关战役的前前后后

陈长捷

华北抗战在第二战区范围内的重要战役，最初是南口战役，随着南口战役后的形势推演，应以平型关战役为主。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参与了本战役，以运动战给敌以重创，首开全国抗战的光荣记录。

当平型关会战进入高潮时，我从晋北代县率第61军投入平型关北翼团城口战场，正在配合八路军，攻夺鹞子涧、东西泡池要点中，战地后方的雁门山线支战场，被雁北之敌突破茹越口，繁峙县城失守，平型关后方主要交通线阻断，形势陡变。主战场胜利在望，竟付流水。于今回首，犹怀余痛！

兹将亲身经历与全盘见闻，记述如次：

南口抗战后的形势推演

（一）南口弃守后各作战军的转进

1937年8月下旬，南口正面作战的我军抗拒着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的强烈攻击，等待从河北涿州的卫立煌第14军准备反攻。这时，后方张家口被敌东条纵队所袭击，第29军刘汝明部不战而放弃张家口。晋绥军李服膺第61军反攻不力，南口守军陷于腹背受敌的窘境。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在大同负责平绥线的作战指挥，遂令在怀来的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指挥南口前线各部放弃阵地，向山西雁北地区转进。而蒋则径令汤率部随着到达白洋河

(永定河上游)的卫立煌军，退回平汉线。阎锡山要留南口前线各部队仍在第二战区，向蒋力争。其时，汤恩伯已照蒋令率第13军的王万龄第4师、王仲廉第89师和朱怀冰第94师，经小龙门向平汉线而去。只留下所谓“准中央军”的高桂滋第84师、李仙洲第21师，和晋绥军陈长捷第72师、马延寿独立第7旅等部。于是，阎命马延寿旅向大同转进，归第35军序列；高桂滋、李仙洲两师向晋东北的灵丘转进。高、李两师名义上合编为第17军，以高桂滋为军长，归入在浑源、灵丘地区集结的杨爱源第6集团军序列；陈长捷第72师向晋北应县转进，准备扩编为第1预备军，置于战区长官的直辖之下。

(二) 策定晋北作战

阎锡山判断侵犯华北西线的日军，攻占南口、张家口后，将循平绥线进犯大同，战场可能局限于雁门山以北的所谓雁北地区。初未虞日军之从察南径犯平型关，而直抄雁门山后方。

阎根据错误的敌情判断，作了所谓“大同会战”的准备。

会战方针：诱敌进于大同以东聚乐堡地区已设国防工事地带，集结强大兵团于南翼的浑源、东井集间，和北翼绥东的丰镇、兴和间，发动钳击；并以骑兵集团向张家口挺进。这个主观臆想计划，得到蒋介石的欣赏。蒋又从皖北输送刘茂恩第15军两个师入晋，作为拉走汤恩伯三个师的补偿。

基于上述计划，命从张家口退下来的李服膺第61军及其所辖李俊功第101师和刘譚馥独立第200旅，共7个团，附属一个山炮营，于山西东北边界的西湾堡、天镇、阳高地区占领既设阵地，拒止西进之敌，以掩护聚乐堡主阵地和南北翼主力军的集结。

以赵承绶、门炳岳两骑兵军为集团骑兵，位置于兴和东北地区，刘奉滨第73师位置于广灵、灵丘东边境，警戒南北两翼军的活动，待机向察省张家口南北挺进。

以王靖国第19军及其所辖田树梅、杜瑩、段树华三个独立旅，共9个团，附属山炮团、野炮营又一个重炮连，于大同以东

30里的聚乐堡南北线上，占领主抵抗阵地，吸引敌军于熊耳山和外长城间的南浑河盆地。

杨澄源第34军于东井集、浑源间集结，军辖梁鉴堂独立第203旅和姜玉贞独立第196旅，附属1个山炮营。但姜旅在晋南，尚未赶到。第34军与刘茂恩的第15军（正从太原北上）为南兵团，以第6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为雁门关指挥。

于绥东的丰镇和大同以北得胜堡地区，集结傅作义第35军孙兰峰第211旅，董其武第218旅和马延寿独立第7旅，共计9个团和两个绥远骑兵旅（石玉山等伪军反正的四个骑兵团），又一个山炮团，一个野炮营，为北兵团。并预拟李服膺第61军于天镇、阳高间予敌以层层打击后，北移于长城线镇边堡附近，归入北兵团序列，以第7集团军总司令傅作义为指挥，在大同指挥北兵团在聚乐堡正面主抵抗阵地作战。

南北兵团乘敌胶着于聚乐堡既设阵地前时，立即包围钳击。

从南口突围撤回的陈长捷第72师集结于雁北应县，增加于镇河新编独立第4旅，编成预备第1军，为大同会战的预备兵团，直辖于战区长官部。

雁门山以南仅以孙楚的第33军所辖孟宪吉独立第八旅位置于雁门关，章拯宇独立第3旅位置于龙泉关、平型关间。

（三）中途停止的大同会战

从察哈尔犯晋的日军，于9月上旬发动进攻。先以东条纵队（关东军）1个旅团为基干和伪蒙军两个骑兵师，沿平绥路西进，即冲破李服膺久在雁北所预筑并为其所部据守的、从永嘉堡到天镇间的国防阵地。日军直冲到阳高城下，李服膺在阳高城不但未能收容所部，依据阳高预设的依托城寨的第二线，设阵抵抗，也不按预示向长城线北移，竟然弃城随着溃军向大白登南逃，一直跑到桑干河以南尚未落脚。

李服膺军溃于天镇、阳高，敌东条纵队向大同西进。配属第19军的熙树华独立旅于聚乐堡前方，和敌接战两日夜，损失约两

营，受敌压迫日紧，犹在强毅抵抗中。第19军主力尚未接战，王靖国军长鉴于段旅受日军飞机、重炮的严重损伤，张皇失措，屡向阎预作告急，请早推进在应县的预备军，并电陈长捷准备应援；又不断要求傅作义把集结在丰镇的第35军权行南移大同，给他以直接支持。当时所谓“大同会战”的基础，已被李服膺和于靖国搞得动摇了。

聚乐堡阵地未受到敌人强攻前，傅总司令还镇定地掌握着第35军，要等待刘茂恩军度越雁门关于浑源集结好后，增强了南兵团，再行同时发动，作有力的钳击。

日军主力板垣师团从察南蔚县进攻山西广灵，把在边境洗马店附近警戒的第73师打垮。师长刘奉滨力战负伤。这时始发现敌主力所趋向的方向。第73师受敌主力猛攻，转移于平型关方面。此时刘茂恩第15军的先头尚未到达浑源县，在浑源北东井集地区集结的第34军，只有梁鉴堂一个旅。该旅既受李服膺军南溃的影响，侧背又受广灵方面的威胁。阎锡山在雁门关内岭口行营，对当时情况惶惑不安，但仍着眼在雁北，拟转移主作战方面于浑源，以为应付。

出乎意外，敌板垣师团进攻广灵，把杨澄源第34军、刘茂恩第15军牵制在浑源、东井集间后，即紧追第73师，直捣灵丘。至此阎锡山才恍然警悟到：板垣师团主力将循着板垣在一年前强横地假借游历五台山而亲事勘查的路线，进攻平型关，以抄击雁门山后方。阎锡山感到正在进行的“大同会战”计划已经全盘皆非，为了应急，即着在雁门关他跟前的孟宪吉独立第8旅驰向平型关，增援转移到那里的第73师；又令第6集团军总部到大营镇（平型关后方）统一指挥第17军高桂滋的第21师、第84师和从广灵退下来的第73师（王思田代理师长），以及孙楚第33军的孟、章两独立旅，就平型关、团城口线上布防，拒止敌人的进犯。

阎锡山决定放弃“大同会战”，立即尽撤雁北各作战军于雁门山以南，依靠恒山、雁门山为侧背屏障，东向平型关方面，与

侵入灵丘的敌板垣军主力进行会战。但仍以过多的兵力部署于恒山、雁门山线上，大都置于无用之地，再次陷于失算。

策划平型关会战

(一) 雁北撤兵

初到浑源的刘茂恩第15军南向恒山口撤退，于恒山口左右和沙河间集结，保持主力于恒山南，准备机动。

在东井集的杨澄源第34军经应县的下社退入茹越口，守备雁门山、恒山间的茹越口两侧，以联系恒山中的刘茂恩军。属该军建制的郭宗汾第71师和新编第11旅续儒林部，合编为预备第2军，以郭宗汾任军长，控置于繁峙。

守大同聚乐堡线上的第19军，向雁门关撤退，增加方克猷独立第2旅和姜玉贞独立第196旅，以守备雁门山线，保持重点于雁门关方面。

集结在绥东丰镇的第35军，向宁武阳方口转进。

赵承绶骑兵军南退于朔县地区，警戒雁门、宁武西翼。

门炳岳骑兵军和马占山收集的东北挺进军（系伪军反正的两个骑兵旅）向丰镇、平地泉西撤，共同警戒绥东。

绥远是空虚的，为傅作义代理省主席的民政厅长袁庆曾，还兼任第35军副军长，但未曾组织民众进行抗敌，却率省、厅各机关和第35军后方在绥宪兵和所征训的国民兵，离开绥远省会，经绥南清水河，循黄河转到山西西北的保德县，实际已把绥远放弃了。

李服膺部随着东升集的第34军南奔，到达雁门山的沙河附近，才收容整理起来。第101师李俊功部尚够4个团，刘懋馥独立第200旅仅仅撑起3个团的架子。李服膺军长撤职，李部的旧第61军番号撤销，原辖的第101师和独立200旅归入杨澄源第34军序列。

在应县新编组的陈长捷预备第1军，分从雁门关、狐峪口转移于代县，予以新的第61军番号。

(二)对侵入灵丘敌军的作战策划

阎锡山犹忆他1927年和奉军混战于灵丘、五台、繁峙地区时，让奉军进入平型关内予以打击的“成功”经验，仍拟放纵日军逾越平型关，诱其深入到砂河以西地区，而后从五台山、恒山南北发动钳击，同时截断平型关险隘，把敌板垣主力围歼于滹沱河上游的盆地里。阎自诩为：“把敌人放进口袋里，给以狠狠的打击！”遂作了如下的部署：

A.平型关正面

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33军军长孙楚，指挥第33军（独立第3旅和孟宪吉独立第8旅）以及高桂滋第17军第21师、第84师，以及从广灵退下来的第73师各部，于灵丘、繁峙间，沿内长城线已设省防阵地，阻止从灵丘西犯之敌，掩护大军从雁北撤入雁门山南集结。第33军在南，主力保持于平型关；第17军在北，主力保持于团城口。

平型关、团城口两军，对敌人的进攻先依险挫敌锐进，须支持较长时间，而后适机撤退，转移于五台山内，集结为机动的南兵团，待机北击接近繁峙城之敌。

B.雁门山北侧

主作战军东向平型关方面，左侧背以恒山、雁门山的险阻为屏障，监视雁北敌人的动静，机动戒备。

第19军军长王靖国负责守茹越口（繁峙城北）以西至雁门关既设阵地，以新归入第19军序列的方克猷独立第2旅守五斗山、马兰口、狐峪口间，警戒50余里山隘，把第19军主力3个旅排列于水峪沟至雁门关两侧，保持重点于雁门关方面。

第34军军长杨澄源负责守备北楼口（砂河北）西至茹越口间，第101师李俊功守北楼口及大小石口，控置整理起来的刘懋馥独立第200旅为之支援，兼与恒山中的刘茂恩机动军取联系，对平

型关方面警戒。以军主力梁鉴堂独立第203旅专守茹越口，巩固雁门山东远翼，正在北调的姜玉贞独立第196旅准备控置于繁峙城附近，保持军守备重点于茹越口。但在第35军未到达宁武时，姜旅暂停止于阳明堡，作为对雁门关以西的策应，盖犹虑平绥线上有敌后续主力到达，将南冲雁门关。

C. 决战地带

阎锡山称为捕捉敌主力军的“口袋底”阵线，选定沙河以西和繁峙间地区为主决战地带。以收容整理起来的刘骥馥旅附以山炮两连于沙河以东，南连五台山、北连恒山的两机动兵团，占领广大正面，对平型关西犯之敌，遮蔽繁峙主决战阵地。在沙河、繁峙130华里间，作逐次抵抗，诱敌于繁峙的坚阵下，然后撤入主决战阵地后方。

我的第1预备军是在南口和日军较量过的，能耐苦战恶斗，经得起震荡的部队，郭宗汾的第2预备军是有作战经验的生力军。两军共12个团，并各附属1个山炮营，在繁峙县东，以五台山的北台顶、繁峙城垣、恒山顶构成3个支撑点，于其间占领主决战的抵抗阵地，并预筑纵深坚固工事，吸引敌强攻，消耗敌战力，使之陷于顿挫胶着，从而发动五台山、恒山集结隐存的南北机动兵团，加以钳击，与敌进行决战。陈军在南，保持重点于五台山北麓，郭军在北，保持重点于繁峙城。

另准备集结野炮团、重炮营于繁峙城西，并招致第19军、第34军所属工兵营，加强主决战阵地的主要设备，且拟到决战时期，以第34军军长在繁峙城任主决战阵地带的总指挥，集结第34军的第101师、独立第200旅、独立第196旅各部，加入主决战线的关键点，进击反攻。

D. 机动兵团

从平型关、团城口南移，隐蔽在五台山中的孙楚、高桂滋两军，为南机动兵团。警戒五台山的东台、北台各口，以高桂滋的第17军为主力，等待部署在沙河的诱敌部队逐步诱敌深入到繁峙城东地

区我主决战阵地前，展开决战。其受到我集团炮步的压制时，分从茶坊、峨口北出，先牵制敌军于五台山北麓，于北机动兵团从恒山发动南击时，同时呼应夹击。另以第33军孟旅和王思田第73师支援即将到达五台山东侧的八路军林师，共同抄击平型关、团城口，以强力截断敌后方。

刘茂恩第15军先隐蔽于恒山中，警戒浑源、大营南北两方，和团城口第17军、北楼口第34军东西联系，等待第35军到来，合为强有力的北机动兵团。

傅作义第35军进入阳方口，于宁武集结后，侦明敌未在大同集结强大兵团，即再向代县、繁峙东进，适机潜出于繁峙东北的北岳恒山地区和第15军联合。以傅作义指挥北机动兵团的2个师、3个独立旅、1个山炮团乘繁峙正面鏖战之时，进出恒山南侧，向敌右侧背发动包围痛击。

阎锡山对上述策划，自赞为：“布好口袋阵，让敌进得来，出不去。”为了选定能坚强抵抗的主决战阵线，特招负责守备主抵抗线的陈长捷、郭宗汾两个新任军长到雁门关岭口“行营”，面示方略，并着同到繁峙、砂河间作详细的实地侦察，要求选定极扼要的“口袋底”阵线，构成强固并且韧性、绝对不可贯穿的纵深阵地网，借以胶着有强大攻击力的敌军，使其大量的消耗。

拟定上述方略，即时分派高级参谋前往砂河、平型关、团城口向刘茂恩、高桂滋、孙楚各军长预作指示，又把屡违节制的李服膺军长从砂河招到岭口“行营”拘押起来，以严肃军纪，表示抗战决心。

E. 八路军参加作战

1935年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号召全面抗日的红军于抗日战争爆发后，改编为八路军，9月又组编为第18集团军，进入第二战区序列。全军渡黄河到晋，以扩大正面分进：第120师贺龙部到达五寨、神池；第115师林彪部，同朱总司令到达五台；军政委周恩来来到雁门关岭口和阎锡山商议第二战区作战方略。当时我正到

雁门关“行营”，初次见到周政委。一次，周政委讲授游击战、运动战要旨与抗战前途。特敦嘱必须发动民众抗日，搞民众运动，以壮大抗战势力，争取最后胜利。后来，林师东越五台山向灵丘、涞源；贺师越长城出朔县，向山阴，各行潜击，以运动战分别抄击敌后方，负起艰巨任务。

平型关战役经过

（一）初战使动接拟方针

孙楚在平型关直后方的大营镇东山底村主持第6集团军总司令部，代杨爱源总司令负实际指挥之责。孙楚对当时全面敌情的判断，尚在迷惘。他认为从察南蔚县攻广灵的日军，不直趋空虚的浑源以抄击大同后方，捕捉集结于雁北的第二战区主力军，而间关轻进，指向灵丘，这只能是一支较有力的游动骑兵。他肯定会有强大的敌主力，准备利用铁道输送的便利，突然向大同集结，以南攻雁门关。雁门山线才是主决战方面，平型关只能是支战场。如果把平型关外之敌放进关里来，就正合敌的分进合击的要求，而非掌握内线作战要领。他估计以其当前所指挥的在平型关、团城口间的三个师、两个独立旅，不下十六、七团实力，守住险要，御敌侵入，尚有把握；另外配合的八路军林师抄到敌后，很可能打个局部胜仗，而为雁门方面的主决战创造良好形势。本着如此信念，他说服杨爱源总司令回岭口“行营”，向阎锡山陈说。其时第19军军长王靖国正日夜纠缠在阎锡山左右，妄参“大计”。他惟恐其所负责的雁门山守区兵力单薄，从而强调雁门山线是敌进攻晋北的主要目标，亟请留傅军和一个预备军在代县、阳明堡地区，为雁门山线的决战，准备充分实力。他极力地赞同孙楚的建议，虽似同趣而实则私图。于是，阎锡山原来的意志被夺，对其所自赏的“狼的计划”起了怀疑，遂以傅军未即集中到来，及繁峙东地区的主抵抗线的设阵尚费时间为词，批准了

孙楚“坚守平型关”的建议；让孙楚指示高军展延团城口北翼和恒山的刘茂恩军连接起来。原来隐蔽在恒山北岳中的刘军是作为机动运用的，亦因而转变为对雁北方面守备军之一部。这样被粘着在侧背守线的兵力就更多了。

八路军林师到达五台山，派人到大营和孙楚联络，通报林师正向灵丘南的太白山潜进，将在平型关东的东河南地区伏击敌寇，希望平型关、团城口守军适时响应林师的抄击，起而夹击平型关前之敌。

孙楚虽以新的打算向两军发布了坚守平型关、团城口、阻敌西进的指示。但是高军仍固执其先接受的“放进平型关内打”的预示，且为了向五台山变换方面的便利，早将两师的后方预移五台县。其前线部队长均怀待机即行转进的思想，在既设阵地上亦疏于配备。高等对孙的延翼固守新指示，置诸不理。原来孙楚在晋军将领里，资望较高，亦比较具有战术思想，但在指挥上常以花样时翻，举措恍惚，而有“孙神经”的浑号。高桂滋在陕北进行反共作战时，受孙指挥过，早有不相信的成见；孙亦以“客军”对待高部。彼此间都在虚伪敷衍，等待形势的变化而各行其是。

（二）改计划于平型关外决战

9月中旬，日军板垣师团主力从广灵、蔚县分路向灵丘急进，第73师被敌紧追，撤退到平型关以南，不及据守关的正面。阎急调在雁门关跟前的孟宪吉独立第8旅前往应援，责成该旅抢守平型关，以掩护雁北大军退入雁门山内，进行集中部署。孟旅17日从雁门关工地仓卒出发，两日急进，于19日抢占了平型关前方既设阵地，沿着内长城线，右起察沟西南高地，联系第73师左翼东长城村，左至东泡池以东高地，和高桂滋师的东泡池右翼相邻，并在阵地前的白崖台、察沟、关沟各要点，赶筑据点，增加纵深。部署甫定，即遭敌猛攻，剧战两昼夜。日军碰上坚壁，为图急进，避开平型关正面，循着阎所新辟的浑源、灵丘间的临时

公路线，北绕蔡家峪，转攻团城口，正打上第17军高、李两部的守区。高部初受敌的压制炮击，即向孙告急。孙楚手里再无控置部队，只作了空口鼓励。高怕为孙楚所牺牲，转向在雁门的阎长官直接告急，旨在仍旧执行所谓“放进关内打”的老计划，早让他和敌脱离。

八路军林师于9月20日迅速越过五台山，22日潜出平型关东南，插入灵丘南的太白山南边的上寨地区，依托人民的掩护，未为敌所察觉。24日于平型关东南的东河南镇西的公路两侧秘密部署，伺机抄击。八路军方面传达林师进展的有利情报，正盼平型关、团城口间守军发动攻势，抓住辗转在隘区艰于展开的敌人，加以痛击，争取共同将敌人围歼于蔡家峪、东河南间。

阎锡山和孙楚未能明瞭团城口高军告急的虚伪性，他们多少还不尽相信八路军林师已插进敌后，造成了特别有利的形势。在对全局情况的迷惘下，耍了两面派手法，尚自谓“出于慎重处理”，对高军说：即派郭宗汾预备军增援；对八路军说：待预备军到达平型关，即从北翼团城口出击。实际只命郭宗汾的预备第二军到大营，听孙楚相机使用，仍留陈长捷的预备第1军在代县，而不以全力坚决出击。举措失着，致误战机。

（三）高桂滋军放弃团城口阵地

郭军有三个两团制的旅，即：陈光斗第202旅，赵晋第214旅，续儒林新编第11旅，另附一个山炮营。他们奉命从太原北上。该部初次上抗日战场，士气犹锐。郭部到大营受孙楚指挥时，孙据平型关外人民报告，八路军确已到达太白山区，始转变决心，出关决战，指示郭军向齐城联系高军进击团城口，以击敌侧背。

在郭军到达前，高部的团城口、鹞子涧、西泡池间阵线，虽不断受敌炮击，守军依托强固阵地，配备稍疏，尚无重大伤亡。由于攻平型关之敌源源北展，高部发生了恐慌。一闻郭军到达大营，更加紧向孙楚呼告不克支持，且直接要求郭军即刻增加前线守御。郭以奉令出击为辞。孙对双方争执，未加明确节制，固知

高部意存避战，以为郭军集结好，一展开出击，便得立解纠纷。24日晚，敌对高部阵地右翼西泡池和团城口两处，发动夜攻。高益觉形势严重，要求开到齐城的郭军一部就近增加于西泡池，郭又未允。当夜孙楚适得八路军高参通报：林师已阻截平型关、东河南敌后的公路，即对敌发动抄击，并以一部向大小含水岭挺进，接应团城口、平型关大军进击，形势大好，敌已陷我掌握中。孙楚认为高部纵感紧急是暂时的，可以坚持的，郭军须集结全力作大规模出击，万不宜分割应付，陷于胶着。遂要求高、李须镇定固守，不得动摇，转变以前的虚伪敷衍态度，而出以强制言词。高桂滋根本藐视孙的指挥权能，认为孙楚是有意识地要牺牲他们，来让晋绥军独占风头。由于错觉而怨怼，竟至倒行逆施，非被敌人攻垮，擅自放弃团城口，鹁子涧、东西泡池各守部亦均退迷回村，再缩避于恒山方面，依刘茂恩军，共同保存实力，耍着杂牌军的故态。他们根本否认八路军已到敌后，以为向蔡家峪、东河南间合力歼敌，为虚构的愿望。为了对孙、郭泄愤，故意闪开团城口、鹁子涧险隘，让贸然出击的郭军碰钉子去。他向阎报告，则以执行所预示的“砂河会战计划”为词。阎锡山作为战区司令长官，在当时的紧急状态下，苦在心头，对杂牌军的故态复萌无可奈何。以后阎在吕梁山集训中，偶尔同晋军将领回忆起平型关之败，犹愤慨地说：“高桂滋放弃团城口，比刘汝明放弃张家口，更为可杀！”

（四）郭军出击被围

郭军向团城口外出击，以陈光斗旅向六郎城以北，带动高军左翼第21师，向敌侧背压迫，相机迂回于蔡家峪、东河南方面和八路军取联系；军主力经迷回村，越第84师阵地，直出团城口攻击敌人。部队于半夜出发，在静谧行动中，决不虞高部早已悄悄地放弃了阵地。时值八路军于前一日抄击敌后，于东河南以西地区，歼敌近一个联队。敌从前线抽部回顾后方，当夜对团城口、平型关停止进攻，遂形成对峙的沉寂状况。孙楚尚能正确判断，

认为平型关敌后方受到八路军的攻袭，便催着郭军大胆出击。郭军两纵队经涧头、迷回分进活动中，突然受到来自团城口、鹞子涧原来高军防线上机关枪和迫击炮火的猛击，引起一阵混乱。初尚以为和守军发生误会，但是立即证明前方高部竟不存在，敌人已经占领鹞子涧、团城口并东、西泡池一带的我军原来阵地。拂晓后，敌全线陵高下迫，既占有利地形，又出郭军不意，其北翼从鹞子涧突进，隔断郭军左纵队陈旅，南翼从东泡池击溃郭军续旅上山之一部，把郭军主力纵队压迫于迷回、涧头地区。郭宗汾军长同赵晋旅长处于严重危机下，紧急收集所部，于涧头、迷回及北山间就地进行坚定的抵抗。所幸的是，八路军林师于敌后东河南以西大捷后，复向大、小含水岭上挺进了有力之团，使得被隔离于六郎城北的陈旅藉为犄角，也立下脚来，尚牵制住从鹞子涧突进之敌，不及直逼迷回北山。郭军主力虽局促于涧头、迷回一侧，但已站稳阵地，且监视着西泡池，使东泡池之敌不得直扑大营。守平型正面的第33军孟旅幸而一时未受影响。

（五）第61军急援平型关

阎锡山据灵丘秘密电台情报，证实八路军林师伏击平型关东方获得辉煌胜利，同时雁门以北迄未发现敌之活动，虽有孙楚团城口失守，大营后方濒于危急的报告，但尚觉平型关外的局势大有可为，始坚决放弃沙河会战计划，要郭军坚守迷回地区，贯彻以大力进击平型关外，歼击敌板垣师团主力的企图。

令在代县的陈长捷第61军立即从代县向平型关进发。第61军即原来的第72师同新编独立第四旅编成的预备第1军。阎锡山押起李服膺军长，遂改预备第1军为新61军。由陈长捷任军长兼72师师长。第72师经过南口战役的剧战消耗，整编为三个团，又一个干部营。第217旅旅长梁春溥率第433、第434两团，第208旅旅长吕瑞英率第415团和干部营（第416团），独立第4旅旅长于镇河率新编的第2、第12两团。新的第61军实际只有5个步兵团1个干部营，配属1个山炮营。以第72师为骨干，经过南口同日军久战，

素质尚强。

高桂滋第17军放弃团城口阵地，谎言受敌“猛攻”、“伤亡惨重”，郭军到达未作应援，以致被敌“突破”阵线，未能立脚，且在太原各报对郭军特加诬枉。

阎锡山鉴于杨爱源、孙楚对“客军”没有笼络统御能力，特命傅作义前往大营，把高桂滋和刘茂恩两军置于傅的第7集团军序列下，并给傅以指挥平型关方面的全责，期于陈军到达时，仍调度高、刘两军，协同反攻团城口，争取于平型关、东河南间，联合八路军歼灭敌板垣师团。

傅作义奉命急驰大营杨爱源总司令部时，正值日军攻逼迷回郭军，军和大营联络被阻断，前方情况不明。傅设法与高军取得联系，尚假借阎长官名义代作慰劳，告以陈长捷第61军正从代县兼程前来和八路军于平型关、东河南间歼敌的胜利消息，传达了阎长官决定配合八路军争取于平型关外歼敌的新的计划。为目前保持涧头、迷回要点，便利陈军从北翼进击，盼高军勉力回援团城口。高亲到大营，辞以所部残破散逸，尚未收集整理。傅转商于李仙洲，亦同样未得急切的效用。傅虽到前方，也无能为力。这时下起大雨，陈军奔驰在途。傅、杨切盼陈军赶到以为应急，犹虑为雨所阻，以急电致繁峙军电局迎送陈军长，要求冒雨飞速驰援。

陈长捷第61军经繁峙向大营前进，梁春溥旅在前，军部和骑兵连、通信连随着先头梯队行动；吕瑞英旅、于镇河旅并炮兵营由吕旅辖区继进。入夜雨更大，梁旅已过繁峙，部队即于行进中且行且以干粮充饥。听前方炮声紧续不断，偏在平型关北方，判断团城口方面情况当较严重。同时繁峙军电局追送来杨、傅催援急电，却未详前方具体形势，乃以兼顾平型关而急援团城口的要领，部署所部，连夜冒雨以战备姿态急行东进。梁旅附山炮1连为右纵队，经砂河以南取平型关目标前进，过大营时向傅总部联系，听取指示；军主力为左纵队，骑兵连直趋大营北的齐城，向

团城口方向搜索；吕旅附山炮营在前，经砂河、代堡和大营以北地区向齐城急进；于旅因未领到干粮，于途中炊爨饭食后，赶上吕旅。一夜冒雨续驰80里，梁、吕先达大营，平型关方面尚平静无激战，傅令该旅即北向驰援迷回、暂受郭军长指挥。军主力过砂河后，陈长捷先乘马驰向大营，于微明到达。总部幕僚熟睡安然，询知只团城口方面由于高军引避，郭军3旅贸然出击，被敌分隔，尚据守西泡池的一小据点和迷回、涧头与六郎城各处，但不相联系。夜里收到郭军的无线电报告，各部虽有较重损失，犹能据守待援，敌亦未向涧头以西深入。待晓见傅，傅甚叹息前线将领不相协作，败坏良好战局，且喜第61军来得快，已先令梁旅驰往涧头、迷回方面，暂归郭军长指挥，为应付敌可能于拂晓发动进攻的准备。他希望第61军主力于齐城集结后，即进击解脱郭军各点的围困，再乘势攻夺鹞子涧、团城口，进而联系挺进在大、小含水岭的八路军，以攻敌之侧背。

27日晨，第61军参谋长李铭鼎从齐城接上通大营已断电话，报告第61军主力的先头到达齐城。军独立骑兵连报称我梁旅已将围逼涧头之敌驱逐，续向迷回村方面前进中，我骑兵占领涧头，警戒北翼，吕旅即在齐城东展开戒备，但部队连续两日夜冒雨急行，十分疲乏，请陈长捷注意，非不得已不可即令投入战斗。经指示就地整饬战备，并速集结于旅，使充分用餐休息，待明瞭梁旅战况和迷回当面敌情后，再推进吕旅，注意东、西泡池方面，协同梁旅进攻。

陈长捷别傅，赴齐城时，傅嘱：对从团城口方面退下的零乱于途的部队，无论何部，均就齐城线上加以遏止，强制收容，勿任流窜大营、砂河，摇动后方。在途中所遇除郭军新1旅的部分外，尚鲜见高军的流散官兵，但在齐城、砂河道上，遇到整队而来的炮兵，查是配属高军在迷回作战的晋军山炮营的两个整连，炮件驮马都整备。责其为何擅撤后窜，领队李营长答称是奉高军长命令，于前夜撤到迷回，又奉令向大营归还团建制，并举出高的

命令为证。询以高军去向，则不明白，但云24日夜团城口、鹞子洞、西泡池各前方尚无激战，比前两日安静好多。依此证实团城口、鹞子洞“被敌攻垮”，确是谎言。陈长捷遂依傅总司令指示，转谕李营长开赴齐城，暂属第61军作战。

(六) 第61军反攻团城口

第61军梁旅奉傅令从大营北进到齐城东北遇敌，即展开战斗。先头程继贤第434团向洞头进攻，把困守的郭军续旅一部救出，并继续向迷回村前进。军骑兵报告：迷回东南之敌向洞头西进，和陈长捷之梁旅在激战中；西泡池山上郭军一部受敌压迫撤下山来，敌续有增加，向梁旅右侧接近。陈长捷遂命炮兵两营就公路两侧分别占领阵地，由军李参谋长统一指挥，对迷回南地区准备火力，并封锁鹞子洞、西泡池间隘路；命令吕旅进出于梁旅右侧，迎击从西泡池下山之敌。

攻击发动后，几阵炮击，掩护梁旅前进，第一线程继贤团扑向迷回。包围迷回东南侧之敌两度反攻，均被我方增加的曹炳第433团击退，守迷回南的郭军赵旅一部同时出击，梁旅程团乘势从迷回西冲上北山。时近黄昏，在夜色苍茫中，敌狼狈分向鹞子洞和东、西泡池退去。郭军续旅一部尚被围在西泡池的一个据点里，吕旅向西泡池山上逆击，进展受阻，加上于旅的一个团于吕旅右侧，压迫敌后退，遂向西泡池追击，把困守西泡池的续旅一部救出。敌向东泡池退去，吕旅继续向东泡池进攻。鹞子洞之敌冲过我炮火封锁地带，陆续南援东泡池。深夜，我吕旅遂与敌相持于东泡池的南山头线上。军推进于旅（欠第2团）和炮兵营于洞头及其东南地区。和吕旅并迷回的郭军相联系，于洞头设了指挥所。

郭军收容续旅于迷回，守军经两日苦战，伤亡颇重。陈长捷命令梁春溥旅乘夜于迷回北山向北进展，以应援尚阻隔在六郎城方面的陈光斗旅。梁旅左翼程继贤团冲上迷回北山，气势甚锐，立即尾踵敌后，夜攻鹞子洞。

第61军之进攻，按预定计划解了迷回之围后，梁春溥旅即可归

还第72师建制，以转用于吕旅右方，使一气攻下东泡池，越过1386.6高地，直趋上、下铺西。以团城口公路线和郭军划分作战地境，进而协力发动平型关外的对敌决战。两军参谋长进行协商，鉴于郭军当时的实际情况，六郎城陈旅尚未靠近，迷回、鹁子涧之敌仍威胁着迷回北山，如果抽下梁旅，可能让敌占据了六郎城西南的1625.9高地，则迷回郭军复处于敌的隔离和瞰制下，仅凭一个赵晋旅，难期攻击团城口。据梁旅长报告，程团已向六郎城方面北展。若未和郭军陈旅相接应时，遽令撤移，亦复影响士气，遂指示梁旅长，循当时态势，于攻下六郎城、联系上郭军陈旅后，即和陈旅协力，一气攻下鹁子涧、团城口，并与进击和挺进在大、小含水岭上的八路军联系，相机绕攻敌后方，会合于蔡家峪、东河南间。

(七) 东泡池、鹁子涧的激战

梁春溥旅进攻迷回时，正值鹁子涧之敌向迷回北山郭军压迫，梁旅左翼队程继贤第434团气势最锐，一直插上迷回北山，将敌击退，即踵敌后向鹁子涧尾追。该团出乎寻常的表现，是由于第72师于8月间从雁北进军南口抗战时，该团被阎指定留在雁北看守所谓“国防工事”，未得参预，大同会战初期，又被调到阳高，临时置于无心抗战的李服膺指挥下，辗转避战，深以为耻。待第72师从南口横岭城突围回到雁北，该团始在应县归复原师建制。在准备此一会战时，团长程继贤基于全团官兵的忠愤情绪，屡次申陈要争取攻打前锋，其临敌奋勇轻锐盖基于是。当夜程团乘敌南援东泡池，便顺利攻占鹁子涧，扼阻山隘，将团城口和东、西泡池之敌隔开，立刻以一连占领1386.6高地，威胁东、西泡池敌后方，并派军官与八路军取得联系；又派团附郭唐贤率张景舜营西向六郎城和被敌隔离的郭军陈旅打通联系后，等待他的旅主力推进到来，协同六郎城的郭军向团城口攻击。郭团附置通信班于鹁子涧西山上，向迷回延伸通信，报告团的进占鹁子涧和发展形势，亟请旅主力推进。张景舜营于半夜打通六郎城。由于程

继贤团长的勇锐努力和官兵的果毅接续战斗，一夜间已造成出击的大好形势。可惜的是，迷回守军狃于两日夜受攻的困厄，幸得解围，急于整理恢复，未敢抓紧战机派部东击，以加强程团所勉力占领的1386.6高地的阵线前主要制高点，加以扩大战果；相反地，对从鹞子涧被我程团击溃南窜于东、西泡池之敌，侧行在迷回东北和1386.6高地下时，不但未行侧击，又错以为敌增兵南来，反扑迷回。初就迷回东阵地的续旅特别恐慌，于是将向鹞子涧西山推进的梁旅主力强留于迷回北侧以为应急，遂致程团活动于鹞子涧，既分散孤立又无后继。梁旅长尚以为打通了六郎城，可得郭军陈旅相为犄角的援应，对于程团的过分突出和分散部署，未及予以节制。更可憾的是，程团张营顺利地打通六郎城，而隔离在那里的陈旅，未和鹞子涧的程团联系，积极呼应为进攻团城口的准备，反趁机急速南移，以靠近迷回北山，同样被所谓敌将夜攻迷回的错觉所诱致，搞得程团更形孤立突出。

第61军吕瑞英旅附独立第4旅的第2团和山炮两连，进攻东、西泡池，把被围在西泡池仅余一小块山头阵地的续旅一部救出，夺回西泡池全部阵地，接续向东泡池进攻中。敌从鹞子涧南援西泡池，一再反击吕旅左翼，独立第4旅第2团于夺占了既设阵地后，对敌的强烈炮火尚能抵御，几次击退敌的反扑。占据东泡池之敌最为顽强，经吕旅右翼刘崇一第415团（团长高金波于南口战役负伤，由团附刘崇一代理）反复强攻，始于25日黄昏占领。被击溃于山沟下的敌人，立刻得到从灵丘大道增加而来的应援，连夜攻扑鹞子涧程团一个连占领的1386.6高地制高点，以瞰制东泡池，并在辛庄路旁展开重炮，轰击东、西泡池和鹞子涧。

26日拂晓，敌在其强大炮火支援下，再向东泡池扑上，我阵地大部被敌炮毁。刘团长鉴于坚守前沿，伤亡惨重，遂令守兵退凭第2线反斜面抵抗，敌每冲上棱线立即起反突击。敌不断地发起冲击，在几度反复鏖战中，团长刘崇一胸部和腿部各中两弹，犹坐地指挥所部坚决反扑。最后紧急时，吕旅长以仅余的第416

团干部营（尽是晋绥军军官教导团新拨的300多学生）令团长宋恒宾亲率增援，一直以冲锋枪、手榴弹近逼决斗，一场血战，直到近午，终把再次占领我东泡池阵地之敌击垮于东泡池山下。刘团在被敌炮击和反复格斗中，伤亡团长刘崇一、营长宋干卿、李凌汉等官兵300余；宋团干部营营长范占元、马宗俊均负重伤，学生预备干部亦牺牲82人。阵地前后杀敌累累，获步枪、机枪和掷弹筒等200余件。当反复冲杀、决斗吃紧时，东泡池右方的第33军孟旅，鉴于敌占东泡池即将压迫平型关的左侧，孟宪吉旅长基于傅总司令的指示，从平型关正面抽出两个营亲自率领赴援吕旅，终于夺回东泡池阵地。

灵丘之敌，被阻于东泡池不得进，一面收容溃部，一面续有增加，遂坚据1386.6高地以为掩护，而转向鹁子涧进攻。

日军后方东河南地区于25日受到八路军的伏击，急从平型关、团城口抽部回援，正是郭军出击的绝好机会，而高桂滋军却先期放弃了团城口，让敌出乎意外地垂手袭占了阵地，给分离出击的郭军以不意的打击，陷于不利的窘境，但敌以后方的顾虑，亦未敢前进。八路军在敌后的大捷，未得到平型关、团城口正面大军的响应进出，再转移于伏击准备位置。敌遂于26日举其全力西进。从灵丘大道南来之敌，被我孟旅、吕旅协力阻止于关沟和东、西泡池线上。但攻占了1386.6高地之敌，藉以掩护并瞰制鹁子涧而转移北向，和从团城口循公路南攻之敌相呼应，以夹击突出于鹁子涧的程团。28日，孤立在鹁子涧的程团实际不过两营，承担的却是不下一个旅团之敌的南北两路夹击，当警戒在1386.6高地上之连被敌强袭时，程团长命傅冠英营长率部上山反攻。在高地前沿对峙中，北方团城口之敌拥出隘口，直冲鹁子涧，程团团部和另一个梁世荣营被包围于村中。傅冠英营从东山回援，占领1386.6高地之敌随之下冲，团长和两营长分途应战，均亲挥手掷弹同士兵一起和敌拼杀到最后，团、营长及以下官兵全部壮烈地为国力战牺牲。

团城口之敌冲击鹞子涧时，团附郭唐贤和营长张景舜率初从打通六郎城、夜回鹞子涧西山上之营，侧击围攻鹞子涧之敌，与敌激战于涧西，又被优势之敌包围攻击，郭团附、张营长均负重伤。梁春溥旅长在迷回北山上，闻报急率曹炳团赴援，已鞭长莫及。鹞子涧恶斗结果，程团全部殉国。敌复以其大力阻止梁旅曹团于鹞子涧西南，陈长捷仅收容得负伤的程团郭团附、张营长和通信排一部与不及一连的伤兵。梁旅主力遂退守迷回北山，和从六郎城退回的郭军陈旅于1635.9高地迄迷回北山间，站稳阵地，以拒止敌之南扑。

第72师程继贤第434团在鹞子涧孤立失救，9月28日午被敌围歼，为第72师继南口战役后，又一个团的壮烈牺牲，其经过是经仅存的团附郭唐贤、营长张景舜和通信排排长所详报。程继贤团长富勇略，他夺取鹞子涧所造成的极有利的战势，乃竟无后继而孤危陷没。旅长梁春溥不能辞失机之咎，陈长捷予以戴罪图功的处分，到以后忻口战役中始予撤消。

敌占鹞子涧后，两路分进，会合于迷回以北。该方成为决战的焦点，不得不仍将梁旅主力留在郭军的作战地区内，两军各部尚相参插，未及调整。

敌从鹞子涧进攻迷回北山，为陈光斗、梁春溥两部协力所阻。27日以后，敌逐渐向六郎城西北的盖房沟、黄圪塔窟进展，包围1635.9高地。郭军陈旅仍专意迷回北山的守御，于其左翼1635.9高地上仅置小部警戒，被敌猛攻失掉，而且秘而不宣。敌据该高地后，将直下涧头。在涧头的第61军军部受到从1635.9高地而来的敌炮击。第61军参谋长李铭鼎在炮兵指挥所发觉，向迷回梁旅长查询，经证实后，觉得情况严重，两军后方有被截断包抄的危机，立命在涧头东的炮兵营转移射向，以强大火力集中轰击1635.9高地，对敌制压；于镇河旅长急从西泡池抽出两营，从涧头村北仰攻1635.9高地。敌陵高下瞰，仰攻多受损失，约同附近高地东麓的陈旅左翼团协力反攻，该部士气不扬，迄无进展；于旅第2

团进逼再三，蒙受重大损失，勉力与敌相持于山麓，掩护了涧头后方。

(八) 调第35军参加团城口决战

敌人延翼包围，夺占1635.9高地，威逼迷回、涧头后方。傅总部估计敌我形势，认为敌板垣师团已无后续之部，其后方正遭我八路军袭击，尚感受威胁，倾其全力延翼已到极限。第61军已加入阻击。敌今后只可能于调整部署下抽些部队，勉强再兴决斗。我方同样可以乘机调整部署，掌握余力，以为对抗。在平型关正面的寨沟、关沟迄东、西泡池间，我军较占优势。迷回、涧头地区虽感压迫，而郭、陈两军指挥所正顶住要冲，镇定军心，并运用两军全部炮兵，集中优势炮火，倾击于1635.9高地，亦可以保证阵线不至动摇。若使第61军调整东翼，抽下于旅全部到涧头方面，使郭军调整两翼，腾出梁旅，归陈长捷节制，运用士气尚强的第61军为主力，发动进攻，则不难夺回1635.9高地，趁锐进击六郎城，攻夺鹞子涧、团城口。傅作义总司令同意上述意见，以电话命令陈长捷：“大胆调整部署，抽调有力部队，掌握起来，攻夺1635.9高地。只要能攻占团城口半面，坚守几日，待第35军到来，就可大有作为。”

傅定了在团城口决战的决心后，亲到雁门关岭口和阎锡山商议。得到同意后，即令从绥东长途跋涉初到雁门以西的第35军全部续向平型关方面急进。阎亦一时心血来潮，鼓勇偕傅同到大营，招集前敌将领会议，决定：

A. 以第35军董其武、孙兰峰两旅用于团城口方面，从涧头向团城口出击，归第61军陈军长统一指挥，于夺回1635.9高地后，进出于郎城、鹞子涧线上；同时使东、西泡池的第61军吕瑞英旅夺取1386.6高地；然后以第35军和第61军全力协同冲出团城口外，向蔡家峪、东河南旋回席卷，再配合八路军林师的伏击，以围歼敌人于灵丘以西地区。

B. 以马延寿独立第7旅分置于平型关，归孙楚第33军序列，

于第61军夺取鹁子涧的同时，增加马旅于平型关正面孟宪吉旅右翼的东长城村和寨沟间，使孟、马两独立旅沿着平型关、灵丘大道两侧，压迫当面之敌，直取东河南，和从浑源、灵丘公路向东旋回的第61军会合，共歼敌人。

C. 郭军和第73师先就原阵地支援第61军、第35军、第33军发动攻势，随着平型关、团城口攻击的发展，相机推进，作为第二线兵团。

D. 保持重点于团城口方面。

决战部署议定后，28日晨，傅以汽车迎召将达繁峙的第35军先头旅董其武旅长先来大营，面授要旨。董又先其部队来到涧头的第61军指挥所，了解到第61军于旅正向1635.9高地进攻。董旅长再进到于旅前线，详察激战中的涧头北山形势，觉得占领1635.9山头之敌，火力特强，但兵力犹稀，于旅长正督部利用山地死角进逼，将行夜攻夺取。他和第61军参谋长李铭鼎预计第35军隔日赶到时，如于旅已占领了1635.9高地，则在于旅的支援下，第35军先到达的董旅立即投入前线，进出六郎城，以抄击鹁子涧，先歼敌一部，待孙兰峰旅到来，即举两军全部直击团城口。董回大营报傅，拟招致其所部于齐城集结。

郭军方面的迷回前线仍不断告警。梁旅主力适当迷回北山对鹁子涧的要冲，终于不敢断然抽出，以致于、梁两部协力夜攻涧头北1635.9高地计划，以梁旅不能前来，又顾虑到于旅未习夜战的新兵弗能胜任，势须延待第35军董旅的到来，遂未能发动。

(九) 雁北之敌进入茹越口

当发现敌板垣师团主力从广灵趋灵丘将进犯平型关时，第二战区作战军悉从雁北退入雁门山南，转变东向，准备从事平型关内或外的会战，但尚顾虑雁北方面有平绥铁道交通之便，被敌用于增兵，突然进攻。本来着眼倚恃雁门山和恒山为战地北面的屏蔽，可以节约守备兵力，却竟部署刘茂恩第15军于恒山、杨澄源第34军于雁门山右，王靖国第19军于雁门关东西，并拟控置第35

军于雁门关后以为策应。这种双方兼顾的平衡布局，把4个军闲置于主战场平型关的侧方的过多警戒，畏葸多虑，正被占领大同仅仅一部的敌人所牵制。而所拟决战地带，却在平型关内或关外。此又是逡巡观望，进退失据。用在主战场上的仅是不完整的孙楚第33军、高桂滋第17军和郭、陈两预备军。且这些军队又是陆续应急投入的，其被动失机，莫此为甚！平型关、团城口鏖战经旬，已经明确在大同和平绥线上之敌只是一部分日军和若干伪蒙军，尚遥隔三百余里，无有动静。因此闲置在恒山、雁门山上的各部均麻痹起来，既对平型关主战场坐而观战，又对广漠的雁北地区，疏于机动监视，形同排列着等待挨打。

侵占大同的东条纵队，仍旧只是关东军3个旅团并配属两师伪蒙骑。其初徐徐南展到怀仁县，装出指向雁门的姿态而故意宣传。把守雁门关的王靖国被吓住，在日日张皇中。迨板垣师团主力进攻团城口，敌后方东河南地区被八路军林师打截击，陷于进退维谷时，敌东条纵队为策应板垣师团，解其危难，突起活动，从大同、怀仁转向东南方应县方面急进，寻找雁门山和恒山接合部的茹越口进攻。一日夜的骑兵和装甲汽车的突奔，出乎第34军的意外。先头伪蒙骑一部的扑击，就夺占了茹越口，而直上铁甲岭。

原来雁门山阵线的防御设计，主阵地是决定在茹越口内尚有25里的铁甲岭和五斗山相犄角极为峻险的分水岭上。根据1927年晋军和奉军混战于该地区的经验，奉军张作相以强大的吉黑军5万多，从雁北浑源、应县进攻茹越口，逼上铁甲岭、五斗山，张作相亲驻茹越口，督战甚厉，终受阻于铁甲岭、五斗山晋军依险构筑的强固主阵地。坚持悉斗月余，优势的奉军，伤亡惨重，结果被反击溃下山去。过去的实地战绩，原可借鉴，而第34军未加考虑，它原属的第71师（即郭宗汾预备第2军前身）被抽出，新添入序列的姜玉贞独立旅尚未到来，竟使仅有的梁鉴堂一个独立旅背险布防于隘口前方，后方25里险要的铁甲岭、五斗山，

虽有既设阵地，竟未布置守兵，犹待姜旅到来再为填守。前方渺无敌情，第34军军部接近梁旅，同处于茹越口的长沟谷地里。

阎锡山鼓着勇气去平型关时，尚未发觉雁北敌人南进，予第19军军长王靖国以指挥雁门山全线之责。王靖国发现大同、怀仁间敌人悉数转向应县，并知茹越口前方正相接触，繁峙北方面临严重形势；所谓第34军，实际在杨澄源军长指挥下的仅有梁鉴堂一个旅和在砂河的李服膺原第61军残部，在繁峙没有应急策应部队。但王靖国仍不肯把到达雁门的姜玉贞独立旅归还第34军序列。

9月28日，敌骑两师冲垮茹越口前方守部，日军一个联队以汽车输入战场，继之逼入茹越沟。梁鉴堂旅长只掌握余下的一个营的预备队，仍勇敢地亲自指挥，沿着山沟拚死堵击。但在敌炮火的集中轰击下，梁鉴堂旅长在前线阵亡，所部大溃，敌骑长驱直冲。沟顶的铁甲岭险要，以无兵扼守，竟为敌唾手抢占，反凭我已设阵地侧击五斗山。守雁门关右远翼的方克猷独立第2旅和梁旅相邻，临急抽部从五斗山侧攻茹越口。步骑联合之敌，在强烈炮火掩护下，源源冲进茹越沟，五斗山亦被攻占。敌骑于29日夕插到雁门山后方占领了繁峙城。第34军剩了孤单的军部，退到繁峙城再不能立脚，遂向峨口转移。

当茹越口受攻紧急时，在茹越沟内的杨澄源军长曾令守备右翼北楼口、大小石口一带的李俊功第101师断然向应县南出击，抄袭敌侧后以为牵制；并调在砂河的刘禪馥第200旅余部向繁峙以北，赶占铁甲岭已设阵地。均以集结稍时，未及适当策应，让敌长驱突入繁峙城。

先一日，第35军3个旅，奉令参与平型关、团城口的决战，以董旅、孙旅、马旅的梯次，经代县兼程东进。28日，先头董其武旅已过繁峙，到达砂河镇。孙兰峰旅于29日夜次于繁峙县南的峨口以东地区，受到侵入繁峙城敌骑的袭击。马延寿旅则被阻于代县方面。

(十) 平型关弃守

敌板垣师团从灵丘进攻平型关、团城口，在前方被阻、后方被抄的旬日间，接济几乎断绝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势已穷促。敌东条纵队的插入茹越口，占据繁峙城，虽在威胁我平型关前线的侧背，但其实力有限，对其板垣主力师团的被困在百余里外，仅起声援的作用。当时我战区作战军闲置在雁门关和恒山双方，尚是雄厚。若对此作正确的判断处理，仍可藐视占领繁峙之敌为冒险的偶尔成就。将帅果毅协衷，出以断然的积极行动，悉移雁门、恒山坐若无事的大军，以围击孤军侵入茹越口和繁峙的有限之敌，正可先与歼灭，打破危局，并可进而争取平型关前的辉煌全胜。无奈作为“主帅”的阎锡山稍临前敌，猝然受阻中途，即已心怯胆寒，充满失败意识。9月30日深夜在砂河南山麓一个小村里，招集将领会议，傅总部幕僚预立两个方案：

其一：认为进据繁峙之敌仅是伪蒙骑，速以次于代县的马延寿和姜玉贞两独立旅，协助从五斗山进攻铁甲岭的方旅，驱敌于茹越口以外。已过繁峙以东的第35军主力的董、孙两旅仍使用于团城口方面，以增强第61军的进攻，努力进击，再配合八路军的抄击，歼敌板垣主力于平型关外东河南地区。

其二：平型关、团城口线上，对无后继的敌板垣师团，坚持抵抗。先以次于繁峙东西的第35军为主力，夹击进入繁峙之敌，驱敌于茹越口以北，然后带动在恒山的刘茂恩、高桂滋两军，转向团城口以北，发动更大规模的出击，以消灭敌板垣师团。

阎先以第一案问各将领，均顾虑分力兼顾双方，各难速决，万一侵入繁峙之敌骑四出窜扰，势将动摇平型关主决战方面的后方。尚有人不相信八路军林师已在敌后方起着巨大作用，而提出疑问说：“进击平型关、团城口前，如果不能即时解决战局，再对峙起来，后方对大军的补给被阻，又将如何？”

提出第二案时，平型关、团城口前线负责部队长说：“1635.9高地和六郎城、鹁子涧、1386.6高地虽然一时未即夺回，而东、

西泡池和迷回、涧头北山间阵线，相信尚可坚持对抗，不至动摇，且让第35军先以全力从速解决侵入繁峙之敌。”并均认为消灭了从大同入侵之敌，巩固了我后方，使平型关当前之敌气夺，即不出击而倚险和敌为持久对阵，亦是胜利。傅作义着意支持此案，且拟亲去峨口指挥第35军攻夺繁峙城，恢复茹越口，以打开危局。

尚在讨论中，平型关前线传报，敌渐向平型关以南移动，似在转变主攻方面于平型关南翼。孙楚负责平型关方面，感觉到南翼的第73师和独立第3旅，既是残破之部，所占正面又宽，对此新情况，有待生力军支持的必要。由是动摇了傅作义原来支持先让第35军去进攻侵入繁峙敌人的意见。阎锡山犹在迟疑中，又传来代县王靖国的报告（敌虽占繁峙城，而东逼沙河，但大营的军用电话路线尚未被破坏，因为繁峙电局工人的英勇负责，避到城外犹在接线保持通话）：“从五斗山反攻铁甲岭的方旅撤回代县，他留第35军的马旅在代县东地区警戒，另调远在雁门关西的段树华独立旅开代县以为应付。”在代县和平型关双方均有顾虑的情况下，傅作义依然坚定地主张先行急攻繁峙。杨爱源却以其五台人的微妙意识提醒阎锡山说：“热察蒙古人年年朝拜五台山，走熟从繁峙峨口上五台山的大小路径，伪蒙军既占繁峙城，可能再冲击峨口，直窜五台山。”被隔在繁峙以东的阎锡山，视其所初辟的从峨口上五台山的土公路，为他当前唯一可以坐车逃生的道路。（阎锡山向来不敢乘马，只能勉强骑驴，还得有人前后扶持缓行，加以照料）经杨爱源一提示，认为他想逃走的路，明且可能即为敌骑所截，于是意识一震，击案而起，喊道：“我看如此战局，无法补救了，迟退且陷全灭！星如（杨字）、宜生（傅字）就下令全线撤退吧！”

平型关、团城口间，孙、郭、陈3军，先后投入战场，对敌板垣师团主力苦战半月，牺牲兵员逾万。由于八路军林师抄到灵丘敌后方，创造了大军出关围歼敌人的大好形势。仅仅为了侧后方

雁门山支战场上，一部敌人的侵入茹越口，侵占繁峙城，而守军一再退避，方面主帅复疑惧丛生，无有斗志，坐使平型关外八路军截击东河南的大捷战果，没有得到主力军的适时进击，共收歼灭敌板垣师团的大效，辜负多矣！

（十一）向忻口转移

阎锡山既决心弃守平型关，且连雁门山全线均予放弃。会议后，即以电话指示代县的王靖国，而电话已不通，阎更感仓皇不安，急和杨、傅、孙等拟议，举晋北大军转向五台山、云中山、芦牙山之线移动，集中主力于石岭关（太原北百余里）以北的忻口地区，以保卫太原，照顾其20多年所积累的封建家当。

阎当夜乘傅军孙旅尚在峨口，即藉以掩护，坐汽车绕上五台山，到了台怀镇，由那里电令雁门关上的“行营”参谋长朱绶光 and 代县王靖国，同时撤军。失守茹越口、繁峙城的第34军军长杨澄源，未受到应得的处分。阎过峨口时，还命他先带所收容的梁鉴堂旅和在砂河的刘懋馥旅残部到太原以北的石岭关，筹划构筑对忻口之准备阵地，为忻口再作弃守的打算。

平型关外敌人受了八路军林师截击后，不断从前线抽部警戒后方，并非如孙军前线所报的将转移进攻南翼；侵入繁峙的伪蒙军，亦为第35军董、孙两部在砂河、峨口的监视下，只据城暂守，不敢有所活动。为此，我军的撤退虽出于仓卒，但尚未受扰害。

9月30日夜，发布撤退命令。10月1日先让在恒山方面的所谓“客军”刘茂恩、高桂滋、李仙洲等部和在北楼口外的李俊功师，依第35军在砂河、峨口之间的掩护，撤过砂河，转向五台山西麓的定襄、五台两县以北地区集结。李俊功的第101师暂停止于五台山，转归第81军序列。

团城口方面的撤退，于10月2日夜间才行开始。陈、郭两军互相掩护，撤下战线，退往砂河，南入五台山。郭军又经五台县向忻县集结。陈军增添第101师，接受了守备五台山的新任务。

平型关方面的孙军最后撤退，待涧头陈军和敌脱离走向沙河转变正面后，孙军孟旅在平型关外对敌犹作一度反攻威胁，才行撤退，由章旅的一部掩护退入平型关，经五台山，同郭军均移忻县集结，留下章旅于五台山东的龙泉关归入五台山守备军序列。第73师撤到五台县整理。

第35军除马旅外，在沙河、峨口间护卫阎锡山仓皇爬上五台逃避和刘、高两军安全通过五台山后，随之经五台、定襄到忻县集结。当董、孙两部在沙河以西和峨口地区停止掩护时，同繁峙城之敌，整整对峙了一日夜，迨南撤进入五台山，敌终不敢追逼。敌我对峙中，亦未曾以火力交加。因为我大军经历两日退入行动艰难的隘区，敌机可能明白察觉，除了以轰炸干扰外，却未曾以部队急起直追。此非坐而失机，殆亦力所不及，犹惊悸我八路军的窥伺在后也。

雁门关、代县方面，以毫无敌情顾虑，更得安然地撤退。阎在雁门岭口的“行营”，由参谋长朱绶光代阎颁发命令：以马廷寿独立旅于代县东地区，对繁峙之敌警戒，掩护雁门关战区“行营”和第19军各部退过代县后，经阳明堡，到宁武、轩岗镇地区，归入赵承绶骑兵军序列，为骑兵军的支援部队。

段树华独立旅于阳明堡地区，掩护雁门山线的大军向崞县南撤，以后仍归第19军序列，和宁武、轩岗镇间的骑兵军取联系，拒止从雁门关和代县方面南进的敌人。

第19军从雁门关向崞县、原平地区转进，段树华、姜玉贞两独立旅归入序列。王靖国军长任崞县地区守备总指挥，于崞县集中主力，拒止敌人南进，掩护大军于五台、忻县间集结，准备忻口地区的会战。

姜玉贞、方克猷两旅，从五斗山退到代县收容后，姜旅即到原平镇整理，归入第19军序列；方旅到忻县整理，归入第35军序列。

赵承绶骑兵军移于神池、宁武地区，仍旧警戒朔县及阳方

口。马延寿独立旅到轩岗镇归入骑兵军序列，和阳明堡、崞县、原平镇间的第19军各部保持联系，警戒军之两翼。

雁门关上的第2战区“行营”，经参谋长朱绶光率领，连同在押的李服膺军长，均回太原，“行营”撤销。

傅作义的第7集团军总司令部先退到忻县，指挥转进到达的各部队，就忻县、忻口地区集中部署。杨、孙的第6集团军总司令部则退到太原去了。

在大军转移的同时，部署了：

八路军林师以五台山为根据地，向平型关外的灵丘、涞源地区活动。章拯宇独立第3旅警戒龙泉关，与河北第1战区相联系，为东翼。

陈长捷第61军附属李俊功等101师守备五台山；王靖国第19军附以姜玉贞独立196旅，守备崞县、原平间，为正面。

赵承绶骑兵军附以马延寿独立第7旅警戒宁武、轩岗间，和八路军贺师以五寨、神池为根据地，向雁门关外朔县、神头一带活动，为西翼。

以上部署，形成五台山、云中山、芦牙山和其间的盆地相呼应的一道前进地带，并借为次一战役——忻口会战的展开决战线。

“东救会”和《告东北民众书》

胡石如

“九·一八”事变迄今，为时已历56年。“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组设成立，发表了一篇“宣言”式的文章，是我代应迺麇（广绩）先生之嘱而起草的。我本不习文，又非籍隶东北，惟其时甫逾弱冠之年，胆大妄为，且亦义不容辞，乃开了二三小时夜车，勉为写出报命，未易一字，即予印发，题为《告东北民众书》，而于文末署“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名义。发表后，旅平之东北人士多以为出诸高崇民（健国）先生手笔。有知其经过者则以区区姓氏为告。不识以何因缘，“胡石如”之名居然传留下来。近阅《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刊载的《东北人民的第一个抗日救亡组织》中，作者何世芬、康雅丽二君“荣赐”本人以“秘书”头衔，则不知何所据而来，或想当然耳。

这篇《告东北民众书》本人并未保留，近年回忆往事，虽愿一温旧迹而无从查寻。今悉吉林大学竟存有此文，并荷何君抄示。历56年而重读，实惭粗疏，敝帚不足自珍。惟“九·一八”事变之后，代表中国人面对日寇明文申讨者，此殆为第一声，或尚稍具历史性意义，故附于篇末。文中所写“彼国人士更加如疯如狂，变本加厉”云云，乃属当时实况。在“九·一八”事变前数月，日本派驻东北之“关东军”即指使日侨肆意妄动，既有所谓代表团回日“请愿”“强硬膺惩”，复于东北各地“游行示威”，捏词诋毁东北当局，毫无忌憚。其蠢蠢欲动之处心昭然若揭。加以日本人在沈阳发行之《盛京日报》，兴风作浪，极尽挑拨煽动之能事。其时我参与编辑之《东北商工日报》，主编要闻

者为邵丹甫君，精通日文，就日本通讯社传布而公然不讳之电讯，加以融会贯通而撮要译为中文，发表报端，刊诸首栏，以期唤起地方人士注意。此君体弱多病，有时困卧家中，则由我代庖。无奈一般人似陷入麻木，对本报所载惊心动魄之新闻反应颇为漠然，似乎抱有一种侥幸心理。其先知先觉者还数青年学生。闻东北大学学生已有外出游行以示对抗之酝酿。地方当局则仍“本忍耐负责之训，为息事宁人之图”，示意大学主持者加以劝阻，民意总致无由表现。至于文中“出我不备”云云，就军实言，当年中国固非日本之敌。惟日本“关东军”虽配备坚甲利兵，以号称30万之东北大军似亦未始不可拼力一战。实际上张汉卿受蒋介石重任，以副司令头衔坐镇北平主持行营后，东北劲旅已纷纷奉调入关。其留守沈阳者为王以哲统率之部队。“九一八”之夕，日军首先对北大营开炮，守军以遵奉“不抵抗”之命，居然未发一枪而束手退让。此种情事殆属难以想象矣。而且对日方动静事先毫无情报，其疏忽又何以自解？

何、康二君据陈觉所撰《国难痛史》，于文中谓：“1931年9月27日，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聚集了400多位东北流亡同胞和其他各省的爱国人士，举行了‘东救会’成立大会。大会在卢广绩主持下，选举了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杜重远、王卓然、王化一、陈先舟、车向忱、金哲成、彭振国、熊飞、黄显声、李梦兴、孙一民、韦锡久、梅佛光、黄剑秋、钱公来、杨士光、韩立如、韩奠邦、谷秀岩，卞宗孟、顾翌棠、苏上达、吴焕章、霍维周、王捷侠、王兴东、林耀山、张希尧等31名执行委员。又由执行委员推选出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金哲成、彭振国、熊飞、苏上达、李梦兴等9人组成常务委员会为‘东救会’的最高领导机关”。

就我本人记忆所及，初组设时似无400余人之多，文中所列执行委员31名之数，亦待查核。以最先参加者原不为多，我亦忝属委员之一，也许是惟一不属东北籍者。至列名单内之金哲成

(原任“东北商工总会”会长)仿佛在“九·一八”事变后并未入关,即或匆匆一来,亦早已匆匆归去,更不在常委之列矣。实际上,“东救会”之幕后人乃张汉卿也。卢、阎、高、王(化一)诸氏都与张素有渊源。会中亦拉拢了几位东北国民党籍人士,如梅佛光、齐世英、钱公来等。梅属CC系;钱接近汪精卫之“改组派”;齐原任郭松龄秘书,郭事败后,齐即转风了。梅、齐均随国民党政府迁台,梅早逝,齐不知以何言论开罪于老蒋而被开除党籍。霍维周则为青年党之东北籍大将,据闻以与该党中央意见冲突而在北平乘人力车过市时,突遇狙击而暴毙街头。何、康二君文中所列之东北名人,其硕果仅存者为卢广绩老先生,今年亦已九十有二,仍任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兼省工商联主席并主民建分会。卢老为卢广绵之胞兄,张汉卿之小同乡,西安事变时在张汉卿幕下任行营第4处(即政治处)处长。周恩来先生秘密到西安晤张汉卿,代张司令接待者即卢老,谈次始知彼此原是奉天省立第一小学同学,用是倍增亲切之谊。

“九一八”事变时我适在沈阳,日间在一中学教我本行数学,入夜则在《东北商工日报》工作。我在“东救会”工作并不久,以肺疾咯血几死而不得不中辍。在“东救会”短期工作时,还为人代笔胡诌过两三篇不成文章的东西,后来连题目都记不起了。关于“东救会”的记载本少,时历50余年,更多散佚。何、康两位年岁度在50以下,多方搜集史料,自属不易,所述不免有脱节之处,固不容求全责备矣。

附 录

告东北民众书

呜呼,吾东北三千万民众,数万里国土,今日已在日人铁蹄蹂躏之下矣!决旬之间,破坏我城镇,屠戮我人民,焚毁

我房屋，劫掠我财产，豺牙密厉，魑毒恣睢，以致闾里骚然，死伤狼藉，大好山河，尽葬送于倭奴炮火之下。是真所谓危急存亡之秋，千钧一发之时也。

夫日人非世所称为文明之国，尝以保障东亚和平自负者乎？又非尝以共存共荣，提倡亲善，召于吾人者乎？乃竟于9月18日深夜之间，出我不意，乘我不备，肆其烧杀淫掳之暴行，以逞其封豕长蛇之夙图。其事变之剧，屠杀之惨，不惟在中国为空前未有，即征诸世界，亦乏先例。且也，易帜设官，进兵吉长，既据我辽吉，复窥我黑哈。此种不讲人道，违背公理，破坏和平之野蛮举动，实为人类所不齿，抑亦国际所难容。咄彼倭奴，欺我太甚，此而可忍，孰不可忍！

吾人回忆过去日人对东北之设施，无一非亡我之工具，所谓满蒙积极政策，殆其全国上下公然不讳之事。盖欲完成其大陆发展计划，侵略我东北，实为其吞并朝鲜后唯一之工作。而近半年来，彼国人士更如疯如狂，变本加厉，昔也口蜜腹剑，犹张亲善之伪帜，今则悍然不顾，实施武力之侵略。由是而万宝山事件，虐杀在韩华侨惨案，相继发生。与夫中村事件之捏造，在在寻衅，不惜破坏和平。而我当局本忍辱负重之训，为息事宁人之困，始终开诚布公，藉以期其悔悟，稍知顾忌。孰知彼倭奴者，冥顽不灵，竟难理喻。直以我之容忍退让为彼暴力有效朕兆。睥睨一切，毫无顾忌，且更进一步为实际并吞之行。古人云，怒我息寇，今之时也。我同胞乎，盍群策群力，同舟共济，以与倭奴决一雌雄乎！吾人为主持正义而战，为保障和平而战，为民族生存，国家安宁起见，均不得不出于最后之一战。

最后更郑重为国人告者：日人占据辽吉后，即实行其吞并朝鲜之故技，先使东北各省独立，然后进而“保护”以达其鲸吞之夙愿。切望国人勿堕其狡计，甘为傀儡，以自弃国人，而同招灭亡。夫东北者，乃我祖我宗，辛苦经营，方有今日

之繁荣，今则强邻凌辱，已非我有，清夜自思，上无以对祖宗，下无以对子孙。倘此时而犹泄泄沓沓，听其宰割，堕军实而长寇仇，则全国覆亡之祸，即在眉睫。望我同胞，其速起自救！本会甚愿追随全国民众之后，共效驰驱。一息尚存，誓死靡它。时机迫切，急不择言，凡我同胞，曷兴乎来！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

陈独秀的早期活动

沈 寂

陈独秀生于1879年，至创办《新青年》的1915年已是37岁。据他自己说，他的发展历程是：康党、乱党、共产党。本文所介绍的是他经历康党、乱党两个阶段的活动情况。

康党——乱党

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世家，生父早亡，嗣父陈昔凡是个举人，官至道台。陈独秀幼年时期，科举仍支配着全社会一般人的实际生活。正如他在《自传》中所说：“那时人家生了儿子，恭维他将来做刚白度（即买办）的，还只有上海十里洋场这块小地方，其余普遍的吉利话，一概是进学、中举、会进士、点状元。”这也正是象陈独秀这样家庭出身的青年所追求的唯一前程。可是，陈独秀却视“学八股文和应考”为灾难。他去考秀才和参加乡试，是母命难违。他母亲因独秀的生父没有考取举人就死了，要他中个举人，“替父亲争气”。

陈独秀对八股文不感兴趣，是因为他认为八股文没有用处，是“富贵功名的俗套”。他说：“我们中国人，从出娘胎一直到进棺材，只知道混自己的功名富贵，至于国家的治乱，有用的学问，一概不管。这便是人才缺少，国家衰弱的原因。”陈独秀在1904年说：“我10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

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一国的盛衰荣辱，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呢。……我生长20多岁，才知道有个国家，才知道国乃是全国人的大家，才知道人人有应当尽力于这大家的大义。……若是大家坏了，我一身也就不能快乐了，大家也就不能荣耀了。”于是他就关心国家大事了，并开始把视野扩大到世界各国。这时康有为、梁启超正在提倡维新运动，陈独秀就此成了康、梁的信徒，接受康有为维新派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提倡新学、改革政制，使国家富强的主张。在他以后批判康有为复辟活动时，还这样说：“吾辈少时，读八股，讲旧学，每疾视士大夫习欧文谈新学者，以为皆洋奴，名教所不容也；前读康先生及其徒梁任公之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可观，茅塞顿开，觉昨非而今是。”又说，在顽固守旧派引用湖南叶德辉的《翼教丛篇》攻讦康有为的新思想时，“吾辈后生小子，愤不能平，恒于广座为康先生辩护，乡里耆儒，以此指吾辈为康党，为孔教罪人，侧目而远之。”

不过，陈独秀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十分敏感的。早在1897年，当英帝国主义把魔爪伸向整个长江流域，并使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时，他提出了设防长江的方略。陈在《扬子江形势论略》的后记中指出：“近时敌虜卧榻，谋堕神州。俄营蒙满，法伺黔滇，德人染指青齐，日本覬觐闽越，英据香澳，且急急欲垄断长江，以通川藏印度之道路，管辖东南七省之利权。万一不测，则工商裹足，漕运税饷在在艰难，上而天府之运输，下而小民之生计，何以措之，时事日非，不堪设想。”如此及时，清晰地指出帝国主义在华划分势力范围的形势，在当时还不多见。它表明在戊戌变法的前一年，陈独秀的爱国主义思想就已形成了。但这时他指出这些危亟形势，是“引领于我国政府”的。这点与康、梁欲依靠现政府变法图强是一样的。

1901年陈独秀留学日本，在帝俄出兵侵占我东北三省、全国各界人民的拒俄声中，他积极投入了这场爱国的拒俄运动。由日本两次回国，在安庆藏书楼举行革命演说会，尤其是1903年春（5月17日）的一次，动员群众300余人集会。是日正值大雨，否则参加的人一定不止此数。藏书楼的会场甚窄，许多人只好站立在门外冒雨听演说。据当时上海的《苏报》（1903年5月25日）报道：“众情踊跃，气象万千。由陈君仲甫开演大旨，谓当今非提倡军人精神，断不足以立国。外患日亟，瓜分立至，吾辈恐有不足为牛马奴隶之一日。词情慷慨、满座唏嘘。”可谓盛况空前。安庆的大学堂、武备学堂、桐怀公学等学校的学生，都参加了。在会上由陈独秀发起成立爱国会。议定在会中分设演说、体操等分会，还计划要出刊一个报纸，名曰《爱国新报》。陈独秀把东京留学生中拒俄义勇队的一套都移植到安徽来了。并且当众宣布：“如办有基础，拟与上海爱国学社通成一气，并联络东南各省志士，创一国民同盟会，庶南方可望独立，不受异族侵袭。”1903年在全国开展起来的拒俄运动，仍是争取清政府领导的爱国运动。陈独秀在安徽举行的演说会，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但是清廷则视之为“名曰拒俄，实则革命”，密令“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两江总督端方闻讯安庆的藏书楼演说会后，当即密电皖抚缉捕为首者。皖抚聂缉规就在演说会后的第三天，即“命首县访捕陈某”。因此，爱国会原定在下星期继续召开大会的计划落空了。安徽的拒俄运动就此被镇压，陈独秀逃匿到上海。

同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与章士钊共主《国民日报》时期，已倾向革命了。他在与苏曼殊合译的《惨社会》（即法国名著、雨果的《悲惨世界》）中“穿插”了一段杜撰的故事，即借法国的王党与雅各宾党的名义，批判保皇派，而自诩为雅各宾革命党。翌年回省创办《安徽俗话报》（实即《爱国新报》易名）兼以“安徽公学”，作为宣传新思想鼓吹革命，和组织革命力量

的手段。1905年暑期，陈独秀与柏文蔚、常恒芳等在联络全省革命力量的基础上，成立岳王会。“岳王会”既寓岳飞精忠报国的爱国思想，又寓反清的革命意义。这时，《安徽俗话报》和安徽公学的所在地芜湖，就成了中江革命的策源地。它不仅成了全省革命的中心，全国的革命力量也瞩目于此。于是遭两江总督和皖抚恩铭所注意，终于被“奸人”告密，安徽公学教员中的革命者纷纷离去，陈独秀也于1907年再赴日本留学。直至辛亥革命，又出任安徽民军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失败，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夺了辛亥革命的成果，才使陈独秀重新考虑中国的革命问题，酝酿创办《新青年》杂志。

1914年陈独秀在为章士钊的《双桠记》所作序中说：“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如赵伯先、杨笃生、吴孟侠、陈星台、何廉施者。”陈独秀亦然，他在这个阶段正是“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

不参加同盟会

1905年8月，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它是以前原有的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为基础，又吸取各省在东京的留学生代表联合而成。它由此成了全国革命派的中心。岳王会成立于同年暑假，略早于同盟会的成立。年底，参加筹组同盟会的安徽代表吴暘谷由东京回国，把同盟会在安徽的分部命名“武毅会”，并首先同岳王会在南京的分会联合。吴暘谷把同盟会的纲领等文件带回后，均为岳王会的成员所接受。据常恒芳说：“丙午夏，（岳王会）总会决议接受吴暘谷、张根仁之介绍，全体加入同盟会。于（是）在各学校各机关者，另组华族会，在军营另组慰心，是乃外围组织。”不过，据常恒芳说，岳王会的组织并没有解散，岳王会的名称也仍保存了的。1908年的熊成基马炮营起义，就是由岳王会领导的。1906—1907年岳王会

安庆分会的负责人正是常恒芳。

陈独秀没有加入同盟会。陈曾对人言，我不加入同盟会照样也革命。1907年陈独秀离开芜湖再次去日本留学，刘光汉也是这时赴日本的。他一到日本就加入了同盟会（刘原是光复会会员）。但据孙毓筠的长子孙伯醇（伯纯）说，陈独秀在东京没有加入同盟会，苏曼殊在他的影响下，也没有参加同盟会。

陈独秀为什么不参加同盟会？有人说：“其时孙中山正组织同盟会，主张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兴汉灭清’为口号，他即表示反对，他不赞成这种‘民族残杀’的政策。辛亥革命就以这种汉族残杀满族而终结，仅仅在形式上推翻了专制政体，实际上对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丝毫没有解决。由此可证他对革命之卓识。”此说有一定根据。陈独秀对同盟会的口号与方针有过这样的批评：“排满”为唯一的革命口号，只是一种感情的煽动，“不能贯彻革命宗旨”。“当时民众真实的物质要求，是对外收回利权（矿山铁路等），是对内反对中央官有企业（浙路川路等）。革命党人忽视了这种适合国民革命之真实的物质要求”。同时指出，同盟会“专力军事行动，轻视民众宣传及党的训练”。还说以孙中山为首的左派，过分迁就右派的势力等。但是，陈独秀在行动上还是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民国初年，他在安徽都督府任职，“治皖有功”。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他仍没有参加。据当时在安庆的孙雨航说，陈虽不属国民党员，但“畅谈革命，乃是国民党的立场。”

有人还说，“他独树一帜，始终拒绝参加同盟会，以后他也始终没有参加过某党”。这里所说的“某党”，是指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虽有人听说陈独秀在国共合作时参加了国民党。可是在国共破裂时，在国民党开除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党籍的名单中，就是没有陈独秀的名字。许多人还说陈独秀担任过国民党的职务，如斯诺《西行漫记》中就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委员”，尼姆韦尔斯《续西行漫记》中也如是说。陈独秀本人却是否认的。陈独秀1933年4月在国民党的法庭上，“审判长屡讯陈独秀曾否在国民党担任职务？独秀坚称无有。”因为在协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1922年8月由马林召开的西湖特别会议上，决定建立联合战线时，规定共产党员除总书记外，可根据工作需要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参加其政府工作，与不参加同盟会一样，将他自己除外了。

在陈独秀的一生中，我们知道他曾组织过励志学社、爱国会、岳王会等，民国以后，参加组织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尚没有可信的资料证明他在民国以后还参加过别的政党。

有名的诗人

陈独秀在早期，爱好做诗，也是一个有名的诗人。他写诗最多的时候，是1907年第二次赴日留学期间。当时有一批诗友，如苏曼殊、刘季平、诸贞壮、黄晦闻、邓秋枚、蔡哲夫、李晓暉等六七人，相互以诗歌酬答。在他们中间陈独秀是为首者。陈独秀还帮助苏曼殊把中国的古诗翻译成英文，把英国拜伦、雪莱等著名诗人的作品译成中国的五言或七言旧诗。

陈独秀的诗，辞句较浓艳，在艳情丽辞中，也偶有壮语，寓意沉郁，有深远的寄托。章士钊说陈独秀的诗“思旧迈苏程”，胡适也说他是学的宋诗。不过他后来在杭州陆军小学任教，“寄居萧寺时，能背诵杜诗全集，一字不遗”。时人评他的诗“思想绝高，胎息亦厚”，“气体之称，均有非时人士流所能窥者”。他写的许多感遇诗，“皆忧时感世之作，说者谓有陈伯玉、阮嗣宗之遗”。陈伯玉（子昂）的诗，标举汉魏风骨，强调兴寄，所作感遇等诗，指斥时弊，风格高昂清峻，是唐代诗歌革新的先驱。阮嗣宗（籍）是竹林七贤之一，他蔑视礼教，尝以白眼看待礼俗之士。

陈独秀也是清末诗歌革新的先驱者。胡适说“他的诗有很大胆的变化，其中有一首哭亡兄（即《述哀》）可说是完全白话的，是一种新的创造。”他把当时所出现的新名词，如“联邦新制度”、“自由”、“革命”等均引进旧体诗中，但又有出韵，说它为“解放体”亦未尝不可。“1921年以还，仲甫忽摒弃旧诗不作，众方以为异。有人以此询诸守常，守常解说云：‘仲甫平生为诗意境本高，今乃大匠旁观，缩袖袖间，窥其用意，盖欲专致志于革命实践，遂不免蚁视雕虫小技耳。’后仲甫闻此语亦不置辩。”

章士钊说：“仲子当年有存歿口号绝句 20 首，流传海内，于吾称‘文章今已动英京’，吾甚愧之，然文章固非诗也。”陈独秀的诗尤为革命青年喜爱，他的存歿六绝句，周恩来在 50 年代尚能一字不误地背诵。陈独秀在清末民初所作的旧体诗歌甚多，但从未有人为之搜集整理过，多半已散佚。

名号的意义

“独秀”是他在民国以后才改用的名字。在民国以前，一般的人都叫他陈仲甫。他的谱名陈庆同，官名陈乾生，字仲甫。

在他参加政治活动以后，直至“五四”运动，在其著作、文章、报名注册，以及与友人的通信，或别人提及他时，所用的名号计有：众甫、重甫、程仲辅、陈乾生、陈由己、由己、三爰、熙州仲子居士、陈仲居士、盛唐山民、陈仲、仲子、仲、陈仲甫、CC生、独秀山民、独秀、陈独秀、志孟、程志孟等。在与友人通信和写诗时，大体用“陈仲甫”或“仲”、“仲子”署名。创办《新青年》期间，与友人通信时，有用“志孟”之名的。在早期著作和反清、反袁革命时，多用“陈乾生”、“众甫”、“重甫”、“程仲辅”、“陈重辅”、“陈仲”等。

在以上的这些名号中，“由己”、“三爰”、“独秀”，

可代表他思想发展阶段，在此三个名号中可寻其时代的足印。

“由己”是他1902—1903年期间，参加东京青年会和《国民日报》编辑时所用的名号。表示他独立思考和抉择问题。20世纪初，先进的革命者都把目光注视西方，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思潮，象春潮一样被介绍到国内来。陈独秀留学日本，置身于欧风美雨传至中国的中转站，有深刻的感受。在当时留学生中的政治思想，有康、梁的保皇派（或唐才常式的勤王），也有如章太炎等主张的排满革命派。他在1902年参加“青年会”（少年中国）是从马志尼少年意大利的角度求得我国民族独立，对这二派主张似乎并非完全赞同。1903年清政府镇压了拒俄爱国运动，他的思想明显地趋向革命，但并非是接受排满革命主张。有诗为证：“勤王革命皆形迹，有逆吾心罔不鸣。直尺不遗身后恨，枉寻徒屈自由身。驰驱甘入荆棘地，顾盼莫非羊豕群。男子立身惟一剑，不知事败与成功。”他“自出心裁”，提出了“联邦新制度”的主张，这就是他的“由己”之意。

1904—1905年，他在《安徽俗话报》上撰文，所用的署名为“三爱”。它反映了该报所宣传和提倡的基本内容，寓爱国家、爱科学、爱民主的意思。在民族危机的关头，陈独秀接受了西方的国家观，并开始把国家与政府分开，爱国与忠君分开，提倡科学与民主，是他所以救国之道。《安徽俗话报》在一定意义上说，它是《新青年》的雏型。

“独秀”是一个最关键的名字。有人说“独秀”这个名字，是他的祖父望孙成龙而为之取的。不知根据是什么？据查考，首次用“独秀山民”与“独秀”署名的，是《甲寅》杂志上《〈双桺记〉序》和《爱国心与自觉心》两篇文章。当时正是袁世凯紧锣密鼓准备复辟帝制，啦啦队中竟有辛亥革命的元老。他在署“独秀山民”的《〈双桺记〉序》中说：“泥城公校（按：即爱国学社），因革命精神所充满者也，靡施为之魁。旋以内訌外患交逼而仆，其凌乱可怜之状，不啻为今日民党写一小影。靡施以一死

解脱其无穷悲愤，诚无聊之极思，使靡施尚在，其悲愤恐更甚于当年，岂复有解脱之善计。”在署“独秀”名的《爱国心与自觉心》文中，针对被袁世凯窃权的中华民国，提出固有的“爱国心”应以“自觉心”加以补充，否则“爱国心”就会被统治者利用、愚弄。文章最后提出“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呜呼！国家国家，尔行尔法，吾人诚无之不为忧，有之不为喜。”世人不能领会其中深意，群斥之为“不知爱国，宁复为人，何物狂徒，敢为是论。”在此政象危机、思想又是一片混乱的时际，这个名字则含有世事皆丑我独秀之意。他的老友汪孟邹见到后，曾对他说：“你太不客气了，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人是秀的。”他回答说：“哪里！我们安庆（怀宁县境内）有一座独秀山，我不过说我是这座山下的居民而已。”癸丑、甲寅年间，社会上风行以“山民”、“山人”为号，无非是表示自己超脱浊流，洁身自好。他以“独秀山民”为号，主要是从政治意义出发的。怀宁的独秀山并不出名，它能为世人所乐闻，倒是陈独秀的关系。他以“独秀”之名提倡新文化运动，又以此名参与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以此名终身。当他改用此名以后，世人并不知道就是陈仲甫。吴稚晖正是这样，他说：“见独秀两个名词，尚以为是个绝世美男子。后我在《新青年》发起时晤到，正如韩退之所状苍苍者动摇者的形貌，令我叫奇。”后来，人们则只知“独秀”而不知其原来叫陈仲甫了。

章士钊和吴弱男

吴业新



章士钊

章士钊先生为我国著名的爱国人士、著名的法学家和学者，解放后曾历任全国政协常委、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本文作者系章夫人之内侄，文中较全面地介绍了章士钊和夫人吴弱男的生平以及与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友谊；并着重介绍了章士钊先生参加爱国学社，留学日、英，主编《民主报》，创办《甲寅》杂志等经过；以及同情共产党，营救李大钊、陈独秀，投向人民为祖国繁荣、统一所作的种种贡献。

参加爱国学社

章士钊先生，字行严，笔名黄中黄、孤桐、秋桐，烂柯山人，湖南长沙人。幼年家境较困难，进私塾读书，17岁母亲病故，为生活所迫去一乡亲家当私塾先生。20岁离开家乡出外求学，在武昌认识黄兴（克强），二人在两湖书院同住一宿舍，成

为莫逆之交。不久便到南京江南陆师学堂学习军事。入学考试时，先生以一小时作数千字交头卷，文辞敏异，得到学堂总办俞明震的赏识。

1903年，发生拒俄运动，各省学生纷纷起来响应。有的组织了拒俄义勇队，准备抗击敢于入侵之敌；有的对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公开地进行了揭露和斗争。当时，江南陆师学堂学生也卷入了这场运动，先生是该校学生领袖，提出“废学救国”主张，与同学林力山率领退学学生30多人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章太炎等人组织的爱国学社。他们一边上学，一边进行军事操练，准备为国出力。蔡元培带头剪去头上的辫子，穿上号衣，与同学们一起受军训。先生被聘为军事教习。除参加学习外，还常写文章投稿《苏报》，鼓吹革命。

这时，邹容由日本回国也参加了爱国学社，与先生同住一宿舍，成为同窗好友。爱国学社并非官办，只因大家有共同理想而走到一起的，所以师生关系较为密切。当时，章太炎教国文，对他们很器重，时常往来，意气相投，常在一起喝酒，纵谈天下大事。最后在章太炎的倡议下，章太炎、邹容、张继和先生四人结拜为兄弟。其时，章太炎撰有《驳康有为书》，邹容写成《革命军》，先生为《革命军》题签，并为出版而奔走。

编译《大革命家孙逸仙》

孙中山先生开始宣传革命时，很多人对他不了解，不少人把也当作“草莽英雄”，清政府更诬蔑他是“大海盗”，对革命思想的传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一天，先生在友人王侃叔家看到孙给王写的信，“长至数百言，用日本美浓卷纸写，字迹雄伟”，非常惊异，因此对孙中山不胜钦佩。不久从友人处获得日本人宫崎寅藏所作《三十三年落花梦》一书，内容是介绍孙中山的革命事迹，他很高兴，便用在南京陆师学堂学到的一点日语知识，不分

昼夜地把它编译出来，题名为《大革命家孙逸仙》，以黄中黄笔名公开出版。他在序言中称赞孙中山是：“近今谈革命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孙逸仙非一名之私号，乃新中国新发现之名词也，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章太炎为这本书的题词是：“索虏昌狂泯禹绩，有赤帝子断其噬，掩迹郑洪为民辟，四百兆人视兹册。”诗的大意是：有辫子的女贞族消灭了汉族国家，汉刘邦斩蛇起义，以汉代秦，孙中山继承了郑成功、洪秀全反清复明的意志，4万万同胞都应该阅读此书。这本书的出版，对驳斥清政府诬蔑孙中山先生是“大海盗”的谰言、恢复孙中山的革命面目、激发广大民众的革命思想，发挥了显著作用。

孙先生原名孙文，字逸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为躲避清政府的耳目和日本当局的监视，化名“中山樵”。按照日文，“中山”是姓，“樵”是名字。先生在编译这本书时，将真姓和假姓并在一起，写成“孙中山”。书一出版后，便广为流传，以后得到孙先生的默许，就这样假姓变真名，成为革命史上一个有趣的典故。

主编《苏报》 鼓吹革命

1901—1905年是辛亥革命理论鼓吹时期。这时，不少革命党人集中于上海，以租界为掩护，以报纸为阵地，大肆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苏报》是当时鼓吹反清、进行革命最为积极的一面旗帜。1903年5月，《苏报》馆主人陈梦坡爱章士钊文才，聘请他担任该报主编。当时先生22岁，革命积极性很高。他担任主编后，除对报纸版面编排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外，特别是内容上，从渐进转向激烈，树立起反对清政府和反对康有为保皇党的革命大旗。例如：首先向读者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他写的《读〈革命军〉》一文，认为是今日国民教育的第一教科书，继之，又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按语”指出：“……

中国宣告革命，殆为全国公认，如铁案不可移。今日之新社会，已少有为立锥之地。必欲悍然不顾，一旦满政府谎而屠之，则有为摇尾乞怜于宰夫之前，殊不值通人一笑（时有起用康有为风说）。不仅如此，有为坚持与革命为难，则当今蚩蚩之辈，何所增减于一有为，诚恐天下壮士，不惜援引先生（指章太炎）之春秋大义，剗刃先生之腹而甘心焉，斯亦无可奈何之事。”刻骨露言，毫无讳饰，表明反清、排康革命宗旨，助长民愤，为力不小。后来他又写了一篇《杀人主义》。文章中说：“读法兰西革命史，遥想当年，杀气冲天，悲声遍地，独夫民贼处于末路，而英雄志士豪兴勃发，不可遏止。今日之情况亦如此，借君颈血，助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此外，他还写了《释仇满》、《汉奸辨》、《代满政府筹御汉人之策》、《俄据满洲后之汉人》等革命性十分强烈的文章，在社会上风行一时。

对此，清政府则视如眼中钉，决心镇压。由大学士张之洞、湖广总督端方及两江总督魏光焘主持其事。他们利用早已收买的外国人福开森，与租界当局勾结，于1903年7月7日将《苏报》馆封闭，并逮捕了章太炎、邹容、龙泽厚、陈吉甫、钱允生等6人。龙是保皇派，陈钱等都是小职员，不久都予释放，章被判徒刑3年，邹2年。邹不幸于1905年出狱前病死，章于1905年出狱后东渡日本。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的简单经过。先生作为《苏报》的主编，应是主犯，而没有被捕，原因是查办大员江苏候补道俞明震是先生在南京陆师学堂的校长，暗中徇情，得以幸免。

组织爱国协会 进行暗杀斗争

《苏报》被封后，先生从宣传鼓动工作，开始转向实际革命斗争。经筹划，黄兴和他首先赴泰兴访龙砚仙，赴南京访魏肇文（两江总督魏光焘第三子，方从日本归），为革命组织筹集经费，而后同去长沙筹建华兴会。1903年7、8月间，在长沙彭渊

恂家中开了第一次代表会，参加会议的共12人，其中湘籍的10人（除黄兴、章士钊、彭渊恂外，主要的有刘揆一、胡瑛、柳大任叔侄等），外籍的2人（福州翁巩、无锡秦毓蓁）。以后，黄兴化名黄薰午，在明德学校当教员，主持华兴会工作，最后发展会员达两万人。是年秋，先生返回上海，除创办《国民日报》、开设东大陆图书译印局，印发各种革命小册子，继续进行革命宣传外，并租赁昌寿里、余庆里、梅福里四所房屋，作为日日报编辑部、秘密议事和招待党人之用。一时国内外党人闻风会合，招待所有人满之患。1904年初，先生与杨笃生（守仁）等又组织暴动暗杀团，名为“爱国协会”，杨被选为会长，先生为副会长，会员有黄兴、蔡愕、蔡元培（子民）、陈独秀等人。当时他们主要行刺的目标是清廷大吏铁良、良弼。这时正值广西巡抚王之春卸任赴京，路过上海。王原在皖任巡抚时，该省议筑芜屯铁路，皖人主张筹款商办，而王则坚决反对，拟以路权为质，向法国人贷款，致路未筑成，皖人恨之；同时，他平时主张割地联俄，党人非常痛恨。因此，爱国协会假借旅沪皖绅名义具柬宴请王之春于“一枝香”饭店，派万福华前去行刺。王不疑有他，果如约前往，不料万临时手枪失灵而被捕。万被捕后，先生独自前去探监，也遭逮捕。由于回答问题言语不慎，致使革命组织译书局遭到当局搜查，张继、苏鹏、徐佛苏等10余人被捕入狱。因涉嫌，黄兴与一位道员郭人漳也在逮。^①当时他们在狱中生活极苦，每餐只吃到1碗饭和20粒咸豆，但都很乐观，谈笑自若。一天大家围坐一起，楚囚言志，互谈出狱后的打算。先生表示，他出狱后将到西湖边开一片牛肉店，学司马相如卖食佐谈；其他人所谈，大都与此不远。惟有张继酷爱京戏，经常哼一段《文昭关》：“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腰间空悬三尺剑，不能报却父母冤……”借以抒发悲愤心情。后来由于黄兴、蔡愕等人奔走营

^① 后来郭人漳得南昌抚署电保，两天后即释放，黄兴以随员名义一同被释放。

救，40天后都被作为嫌疑犯交保释放，而万福华却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据章夫人吴弱男回忆：万系皖人，缝工出身，被拘时，初判监禁3年：刑期垂满，众犯人不堪狱中虐待，谋暴动，拥万带头，事败，故被加科徒刑。辛亥光复，中山先生自海外回沪，飭交涉员向英国领事要求，获得提前释放。

初会中山 游学英伦

1904年冬，章士钊先生流亡日本，寓东京若宫町27番地。不久，黄兴亦迁去与他同住。“适中山孙先生由横滨携小行囊独来东京，旨在联合留学生，议起大事”。经杨度介绍，孙中山亲自前往他们寓所和他们相见。这是三人初次见面，他们纵谈天下大事，非常投机，从此经常往来。章先生回忆当时情景：“中山喜，翌日，吾若宫町宅，有先生足迹见临。克强与吾皆初见先生。吾昨岁草《孙逸仙》册子，以前知尤相契合。楼下席广窗明，主客失次，三人或蹲或卧，按地图，议天下大势，殊未易一二数；俄而集留生，为大会盟之议起。先生辩才无碍，指挥若定，吾徒倾心折服，难以形容。克强性异虬髯，帜鄙自树，太原真气，户牖冥濛。时则汪兆铭之流，头顶辮髻，手摩讲章，出入梅谦次郎之门，洋洋与同舍争一日之短长，顾木然无动于衷也。”

章先生到日本后，看到该国明治维新后的进步与繁荣，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检讨过去的革命活动，认为自己“才短力脆，躁妄致敌，未达壮年，了无学殖”；主张大党初建，应有所分工，“显其才力，资其性分，缓急文武，各任所宜”；提出苦读救国，立志留学读书。孙、黄二公不允，但又不能挫其志，因此他便进了东京正则学校，专攻英语，为去欧洲留学作准备。在此期间，他受聘实业女校，教中国留学生古文。他用学习到的英文文法，讲解《古文辞类纂》，深受学生欢迎。于是他将讲稿整理成册，名为《中等国文典》，寄回国内出版。该书出版后，风行一

时，不少学校用它作教材，有的教授认为“这是开眼界的第一课”。



吴弱男

这时，吴弱男已早两年到东京，在青山女子学院攻读英语，行将毕业。1905年加入同盟会后，在民报社任处理中山先生英文来信秘书。据她回忆：“同盟会最初女盟员不多，加盟最先者为何香凝、秋瑾，余姊妹略迟。此外尚有廖仲恺之妹冰心及孙少侯之妻，冰心患肺病早死，孙妻系家庭妇女，始终未出头露面。吾兄（炎世）妹（亚男）三人入盟之介绍人为合肥吴旻谷，吴是皖人入盟之第一人。”在她担任《民

报》职务期间，美国共产党女党员柯尔德曼（Miss E. Goldman）和俄国作家高尔基与中山先生已有书信往返。章太炎出狱后，也流亡到东京。他经常和吴弱男之父吴保初通信，因初到无固定住址，吴保初回信总由吴弱男转交。因章太炎的介绍，吴弱男与章士钊开始结识。当时同盟会初建，留学生纷纷参加，惟独章先生立志苦读书，不愿入盟。中山先生爱其才，知道章行严一向钦佩吴弱男，在章太炎、张继、孙少侯等人劝说无效后，又囑吴弱男做他的工作，然而始终未能改变他的主张，党人非常失望。最后还是黄兴表态：我深知行严的性格，敢保证他忠贞不二，听他自己决定算了。这样大家才欣然放心。后来先生回忆说：“当同盟会旗鼓大张之时，正鄙人闭户自精之候。”1907年4月，他的《中等国文典》在上海出版，收到稿费，他使用这笔钱离开日本，经上海前往英国，进入苏格兰大学攻读法政，兼攻逻辑。当年同舟赴英的有杨昌济先生^①和合肥李寅恭、张绍南夫妇。吴弱

^① 杨昌济即杨怀中，杨开慧烈士之父，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授。

男毕业回国后，在天津女子师范及苏州景海女校任英文教员年半，然后也前往英国。他们于1909年4月在伦敦结婚。在英五年期间，他在北京《帝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許多政论文章；1910年《民立报》在上海创刊，他负责拍发伦敦专电，对当时的政坛起了不小的影响。当时，宋教仁就经常从报上剪下他的文章，装订成册，作为参考。因此，后来有人说，章士钊是宋教仁的灵魂。先生回国后，在南京游府西街拜会宋教仁，主人捧出剪报巨册，两人不禁相对大笑，成为莫逆交。

主编《民立报》 主张两党制

武昌起义后，中山先生从海外归来，路经伦敦，希望先生担任他的秘书长，一同回国。因家累关系（时其子章可、章用已在英出生），迟迟未能成行。次年春，又奉电召，才不得不放弃即将取得的硕士学位，全家离英，返抵上海。到宁时，秘书长职已由胡汉民担任，黄兴要他当部长。他说：“我有铁饭碗在，难道公忘却？”于是，他便逾越了铁门槛，以一个非党身份，^①担任了党的机关报《民立报》的主编。这时值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乘炮艇去汉口，与副总统黎元洪会谈，先生与夫人都以《民立报》记者身份，充任随员前往。《民立报》社设在上海。他担任主编后，主张独立办报，言论自由，以中庸之道讲。他的理想是在中国建立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内阁制，对党的组织，他提出“毁党建党说”，主张通过政见协商，组成两个党，共同参政。由于他的政见有别，引起了党内一部分人的不满与责难。有人责问于右任：党报为何要非党人士主持？同时，在建都与汉冶萍借款问题上，还发生了报纸社论和政府相对立事件。虽文章都不是出自先生手，而他是总主笔，不得不负其责，为此，他提出辞职。黄兴、

^① 民国成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章士钊亦未加入。

于右任一方面做党内工作，一方面坚决挽留，特别是报社协理吴忠信淋漓相留，他坚决未肯。他说：“凡事都有个理，不可以感情用事。”离开《民立报》后，他和扬州王无生另外办了一份《独立周报》，他照旧执笔不倦，但锐气已一落千丈。不久得知王无生接受袁世凯的津贴，不禁大为扫兴，从此搁笔，报纸停刊。他主持《民立报》，虽然时间不长，外界的反映还是很好的。当时有“天下有得看的，看《民立报》；有得听的，听《民立报》”的说法。

会见袁世凯 积极讨袁护国

1912年2月，清朝皇帝溥仪退位，孙中山辞职，窃国大盗袁世凯登上了临时总统宝座。我的曾祖父（吴长庆）与袁世凯的嗣父（袁保庆）有旧。1881年，他以浙江提督（后任广东水师提督），帮办山东海防军务，驻守登州。袁在河南家乡没有出路，率领数10人投奔。曾祖很不悦，只将袁一个人留下，其余都给资遣散。最初，叫袁在营随张謇^①读书。1882年朝鲜发生内乱，他奉遣出兵朝鲜，袁随军前往，从此发迹。袁投奔登州时仅23岁，不久便表现出很有野心。袁本性桀傲狡黠，窃得总统大权后，对革命党则使出广泛收买手段。当然章士钊、吴弱男也都是他收买的对象。在袁腾达前，吴保初和他较亲近。自从他出卖维新腾达后，便敬而远之。袁当上总统后，屡劝吴保初赴京任职，月致千金，也予谢绝。在他给海门周彦升的诗中有：“局促真如鸟被囚，横流无计释幽忧，丈夫饿死寻常事，何必千金卖自由？”就是指的这件事。共和初，南京兵乱，吴保初移居上海吴弱男家，不久便病倒不起。从生病至逝世，袁两次寄赠巨款，目的在结好章士钊夫妇，以期为他效力。但章士钊夫妇始终未为所动。

是年冬，袁世凯邀请黄兴赴京议国事。黄央先生同行。这

^① 张謇即南通张季直，清朝最后一位状元，时在军幕中。

时，先生仍因《民立报》事遭到毁谤而不快，本想暂离上海，前往北方，观察形势。因此，他便先趋天津，而后赴京。先生会见袁世凯的经过，他自己有较详叙述，谨摘录如次：“抵京后，会见杨度。^①杨屡次劝说：总统原已派孙毓筠赴沪请你，此次来如不进谒，于礼不合。于是不得已随杨进见。不久，便与袁较接近，稍知袁的秘密（指阴谋称帝事）。我十分内疚，然苦不得脱身。袁早知我是庐江吴氏之婿。他说：‘君自家人，有所见，恣言毋隐。’我闻之大为震动。这时，我妻吴弱男在沪得到袁的信（要一家迁居北京），十分焦急，函电交加，嘱我决不能为‘裙带官’，以免自污革命党人身份，为同党耻笑。其实，我本无求官意，北京大学校长的聘书已发出，我已辞去不就。不久，宋教仁被刺事件发生，宋的遗电送到总统府时，我正与袁共餐，袁太息说：‘遁初^②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我瞟了一下电文，只见到‘开诚心，布公道，尊重宪法’十个大字。我心中暗笑，遁初受袁的骗，到死还不知道。……后来，袁竟欲将杀害宋教仁的罪名强加于黄兴，诡称：头一天，黄与宋在上海同孚路黄宅议事，两人争当国务总理而决裂。我听了无比气愤，未发一言，离去。第二天，我独自一人逃出寓所，潜赴车站，驰返上海。”

抵沪后，先生拜会孙、黄，报告袁阴谋称帝，并积极主张用兵讨伐。他说：“即败，亦必为之，以免后世见责。”中山先生赞成其主张，遂派他往说岑春煊（西林，当时任粤汉铁路督办，广西实力人物），以便联合讨袁。岑一说即合，孙、黄二公大喜。于是，章先生乃在沧洲别墅私邸设宴，宴请孙、黄和岑，应邀参加的还有汪精卫、胡汉民、陈英士、于右任等。先生与夫人吴弱男各就座于席尽头之一方，起立举杯，为合作成功表示祝贺。后来章先生把这次集会称之为“革命豪帅东南盛会”。从此，沧洲别墅章宅便成了首脑秘密议事之所。

^① 杨度当时已出入总统府，为袁服务。

^② 遁初是宋教仁的别号。

会后，岑又约他去汉口，说服黎元洪。黎听了很激动，发誓说：“项城称帝，元洪敢以百口保之。”说话时，幕后就有坐探在，消息当天到了北京。当夜，黎秘密派人送路费500元给章太炎和章士钊，央速行，免为人算。以后大家都认为，元洪虽糊涂，顾不失为忠厚长者！因此，武昌之行，无效告终。

当年7月，孙中山任命章士钊为讨袁军秘书长，并起草讨袁宣言（《讨袁檄文》，见《孙中山选集》第98—99页），在宁辅佐黄兴主持军务。这时革命军力已经非常薄弱，只剩下一个南京第8师，师长陈之骥是冯国璋的女婿，师部矛盾重重，兵员不足，除守城外，几难移动一步。冷遁第9师，在第一线，韩庄败退，强敌迫近，师长兼兵站总监洪承点，徘徊徐蚌之间，不知所措。此刻，外无援兵，内困孤闹，败局已定，只时间而已。黄兴先放走江苏督军程雪楼，后促章士钊赴沪。不数日，黄欲自杀不遂，得日人保护，径航东京。“二次革命”失败，吴弱男说：“我等只有两条路可走，非逃即降，降则为帝制派，逃则为民党，势不可复留。”于是二次逃亡日本。

到日后，中山先生住在黄兴寓所，时发现伦敦《泰晤士报》、上海《字林西报》外国报纸有袒护袁世凯的文字，对民党极为不利。但当时袁勾结日方，监视孙、黄甚严，寓所派住警员三天一回报，不仅行动不便，更无言论自由。为此，中山先生嘱咐吴弱男，以她的名义致电英国康德黎博士（英国著名内科医生，原任香港大学校长，即中山伦敦蒙难援救脱险者），说明袁的本性，势难持久，奉劝各国仍应信任民党云云。电文由吴弱男缮写，由章士钊送邮局拍发。电达后，康即以本人名义致函《泰晤士报》，对袒袁提出意见，英报素重视康，将原电刊出。《字林西报》主笔英人寿优是吴弱男素识，该报因此亦转变了论调。与此同时，吴弱男还用从英国带回的打字机，为中山先生打出了不少寄往欧美的信件（该打字机后被李大钊同志借用过，这件珍贵文物现存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

1915年底，云南爆发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运动，海外党人纷纷返国讨袁。次年春，岑春煊在两广策动桂系军阀陆荣廷讨袁，缺乏军械，约章士钊去日本争取外援。日本政府眼看袁即将倒台，改变了策略，借给了100万元和两个师的炮械。回国后，岑被拥为两广护国军都司令。5月成立护国军政府，岑春煊任命章士钊为军务院秘书长。6月，袁世凯的“皇帝梦”彻底破灭，暴病身死，黎元洪继任总统。7月，章士钊代表岑赴京与黎洽商善后，在居仁堂会面时，黎握着先生的手说：“回忆民国二年在武昌说的话，感到十分惭愧。”

三办《甲寅》 三次欧洲行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先生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筹划办党的刊物《民国》，再次邀请先生出任主编。为了防止过去《民立报》事件的重演，他经过考虑，还是谢绝了。1914年夏，在黄兴移居美国费城后的授意和支持下，先生在东京创办了《甲寅》，自任主编，以后又请陈独秀、杨永泰等人帮忙。因这一年是甲寅年，故以《甲寅》命名。因寅年属虎，所以在封面上画一老虎，故当时人称“老虎报”。《甲寅》的创刊，仍然是，在高举反对袁世凯的旗帜下，以“条陈时弊，朴实说理”为宗旨。先生先后发表了《政本》、《学理上的联邦说》、《帝政驳议》、《共和平议》、《复辟平议》、《评梁任公之国体论》等文章，受到舆论界的好评。先生的文章逻辑性强，文法严谨，被胡适誉为“逻辑文学之代表”，并称“这一个时代的代表作家是章士钊”。后先生因故离日返沪，在上海继续出刊，直发行到十期被取缔方止。袁世凯死后，先生于1917年1月在北京恢复了《甲寅》，他邀请李大钊、邵飘萍、高一涵任编辑。李大钊同志在5个月内发表了好几十篇文章；另外，他还向在美国的胡适约稿。《甲寅》第三次复刊，是在1925年夏季。这次先生提出了复古的主张，当然是不合

时代潮流的。他和胡适之间，在学术问题上的争论是很激烈、互不让步的，然而私交还是好的。有一次，先生约胡合拍一张照片，并分别以白话和文言各做诗一首互赠。先生的诗文是：“你姓胡，我姓章，你讲什么新文学，我开口还是我的老腔，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将来35年后，这个相片好作文学纪念看，哈哈，我写白话歪诗送给你，总算老章投降了。”胡的诗文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①此言吾最喜。同是曾开风气人，愿长相亲不相鄙。”这件事至今引为历史趣闻。

1921年2月，得黎元洪资助，先生二次赴欧洲，对大战后的西方政治，进行考察。他原来的政治理想是代议制，但当他发现西方代议制的流弊很多时，也不免失去信心，因而企图寻求其他治国之道。在英国，他访问了文学家肖伯纳、著名学者威尔斯和社会学家潘蒂。潘是基尔特社会主义^②的代表。他主张复兴农业，对先生的影响很大。因此，他当时就用英文写了一本小册子《农业救国论》，寄回国内发表。第二年在柏林，他又根据“农业立国”精神，设计了一个新湖南发展方案，准备回国后付诸实施。因他对农业发生了兴趣，1922年回国后，就出任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以冀实现农治理想造就人才。

第二年冬，北京发生曹锟贿选总统事件，先生当时是议员，不肯受贿，便离京赴沪，担任《新闻报》主编，发表文章揭露贿选内幕，痛斥受贿议员的可耻，进而抨击代议制，重申“农业立国”的重要意义。

1928年底，先生全家前往欧洲。1930年，他一人回国，应张学良之聘，出任东北大学文学院院长，直到“九·一八”事变时为止。为照顾三个儿子在外读书，夫人吴弱男在德国著名的大学城格廷根定居。旅欧8年期间，长子在意大利从名师学画，次子在

^① 龚生指龚自珍，清思想家、文学家、经学派的重要人物。

^② 基尔特社会主义即行会社会主义，20世纪的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即不通过阶级斗争摆脱剥削的思想。

格廷根大学数学系攻读，三子在英国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吴弱男好读书，除操持家务外，还专心致意地学德文、意大利文以及拉丁文，从而使她能精通英、日、德、意和拉丁多种语言文字。在此期间，她曾应牛津大学和格廷根大学校长邀请，出席该校专门为她举行的宴会，并即席发表演讲。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他们都从欧洲返国。

营救李大钊，为陈独秀辩护

章士钊夫妇开始认识李大钊（守常）同志，是1915年在日本东京。时先生方创办《甲寅》，李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常前来投稿，大约每月会晤一次，有时留在寓所共餐，因而逐渐熟识。次年回国后，先生邀李任《甲寅》编辑。1917年秋，推荐李接替自己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职务（他专任教授，讲授逻辑学）。此后，图书馆须经常向国外发函订购书刊，李每次都要和先生商量、征求意见，并请吴弱男为之斟酌文字，于是往来频繁，如是者三年有余，关系更加密切。1920年1月，李赠送给吴弱男半身照片一张，亲笔题字，以“同志”相称（该照片为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征去）。1925年，吴弱男请李为三个孩子讲授社会学，每周到家上课两次。由于家庭间关系密切，李叫女儿星华认吴为干妈。据吴说，当时李与苏联使馆人员已经常接触，首先会面的是代办齐乞林。李能操英语，会齐时亦用英语交谈。李办事非常认真，每次会齐前，总要作充分准备，就所谈问题要点，预拟语句，请吴为之斟酌、润色。苏联使节最先来华者为越飞，继之者加拉罕，李早与秘密联系，对促成《中山越飞共同宣言》的发表，贡献独大。

1927年4月6日，李大钊同志遭奉系军阀逮捕，28日遇难。烈士被捕前后，吴弱男有如下回忆：“守常被捕前，避居苏联使馆已三月余。我尝假借为儿子签护照，去使馆见守常，劝其

火速设法出国赴苏联，并建议先化装离开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到我家暂匿。行严知风紧，亦力主速行。而守常殊镇定，迟迟未行动。不久，北方政府取得各国使馆同意，突派军警包围苏联使馆搜查，拘守常等。行严闻讯，由津遣返北京，企图设法转机。先见张学良、杨宇霆陈说，谓共产主义在国内犹在空洞谈论经济理论阶段，不宜穷治，可判彼等有期徒刑，准彼等带《资本论》等书籍，移押沈阳监狱，情节较轻者，可径行开释，如此既可遏止党人活动，亦可免生枝节。学良首肯，杨亦同意，于是入见张作霖。作霖踌躇，谓此事不可独断，须与京外11将领商量。至是行严知己无望，但仍请张分别函询11将领，不以联衔通电方式。顾不久11将领联名电至，坚称李等并非仅空谈理论，应对罢工罢学负责。于是守常等终于牺牲。”烈士蒙难后，吴弱男首先赶往府右街朝阳里三号李宅向李夫人（赵纫兰）慰问。后来，又和先生一道去长椿寺奠祭。烈士生前生活恬淡，自奉甚俭，而急人之急，则从不吝惜，因此，身后家中无分文积蓄。吴弱男与其亲友商拟筹款3千元赡养遗属。经分头奔走，有力者怕连累，躲避不及，有心者只机关、学校教职员工，以及少数同乡，而又力不从心，结果只筹集到2千数百元。当时以棺木过薄，就中支取280元，另购棺木改殓丧葬事毕，仅存1000余元，由烈士同学白眉初及陶玄等管理，以利息支持遗属生计。

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6月，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被捕。当时先生任南方政府和议分代表在上海开会，闻得消息后，立即写信给北京政府代总理龚心湛，要求释放。信中说：“判与陈君总角旧交”，“于其人品行谊，知之甚深，敢保无他，愿为佐证。”毛泽东同志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写的《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提到此事。

1932年10月，陈独秀等10人在上海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被押到南京。次年4月开庭审讯，因案情重大，无人敢为他们辩护。然而先生却自动出来为陈辩护，他以言论和行动两方面说明陈等

并未叛国，进而从法理上辩论说：“法律上并无共产党即为犯罪之规定”，因此被告之罪不能成立，要求宣告无罪。他的辩护词洋洋洒洒数千言，文理并茂，旁听席上为之震惊。但意外的是，辩护刚结束，陈便立即站起来声明：“章律师之辩护，全系其本人之意见，并未征求本人同意。”“至本人政治主张，不能以章律师之辩护为根据，应以本人之文件为根据。”这一突如其来的行动，使先生非常尴尬。最后陈被判刑8年，免了死罪，这与先生辩护不无关系。以后，先生常对人说，交友遍天下，唯有三个人难交，陈独秀就是其中之一。但是，他们以后的私人关系还是保持始终。抗战时期，先生以参政员身份住在重庆，陈独秀在江津，他还去看过陈。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爆发。第二年，北平伪维新政府成立，群丑粉墨登场。以梁鸿志为首的一伙汉奸劝诱先生入伙，被他拒绝了。于是章士钊夫妇不得不离开北平，经上海，前往香港。1939年先生到达重庆，任参政员。旅渝期间，闲暇无事，从事著作，1943年出版了《逻辑指要》，在陆军大学和警官学校讲授了一年。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伪装谋求和平，三次电邀毛泽东同志到重庆谈判。毛泽东同志抵达重庆后，先生前去看望了他。毛提起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学生旅费向先生求援的事，并表示感谢。谈判后期，有一天毛会见先生时，问：“你看怎么样？”先生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没多久，蒋介石撕毁了《双十协定》，开始全面进攻解放区。由此可见，先生是深知蒋介石其人的，当时对毛泽东同志的安危是非常关心的。

参加“和平谈判”

1949年1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的压力下，蒋介石宣布下台，李宗仁出任代总统。李上任后，为打开和谈局面，派邵力子到上海找先生从中斡旋，他表示愿意效力。于是南京方面组成代表团，准备飞往北平。不料，在代表团人选问题上，新华社突然发布广播，予以挡驾（先拒绝彭昭贤，后拒绝甘介侯）。李宗仁得知消息后，十分紧张。于是亲自前往上海，登门找先生，商量办法。后来，决定由颜惠庆（国民党已退休的最老的外交官之一）、章士钊、江庸（名律师）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先行飞往北平。邵力子以个人身份随同前往。在征得北平军管会的同意后，他们于2月13日飞往北平。22日，代表团到西柏坡拜会中共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同志首先接见了先生。以后，其他代表也一一分别被接见。经过会谈，和谈之门打开，他们带着毛泽东同志写给李宗仁的信，于24日飞离北平南返。

4月1日，以张治中为团长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从南京飞抵北平。先生又作为代表团的成员，二次北上。经过谈判，达成国内和平协议，但国民党方面拒绝签字，谈判于是破裂。先生与邵力子联名写信给李宗仁，揭露国民党真备战假求和的骗局。同时，先生还以个人名义，在报纸上发表了声明。从此，先生便留居北平，积极从事和平解放工作。

巨著永存“白宫”

1949年9月21日，先生作为人民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以后历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常委、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等职。章夫人吴弱男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文史馆员。从50年代起，先生便开始奔走于京港之

间，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从政之暇，致力于学术研究，将自己长期以来研究柳宗元文集的心得，写成《柳文指要》一书，于1971年出版。这部著作是集先生六七十年之心血，花费7年时间而写成的。全书共百万字，其资料之丰富，研究之深广，见解之新颖，都是绝无仅有的，对柳文的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这部著作是用古文撰写的。先生在书跋中指出：“吾之此一臃肿庞大之陈旧述作，分明一无价值，而视为两千年来传统文字体裁之最终结穴，要不为过，……”上部书成后，曾送呈毛泽东主席审阅。主席看得非常仔细，所有誉写错误之处都一一予以改正，并写信给先生说：看了，引人入胜，希望下部写好，及时送给。盖主席与先生同嗜柳文也。此书出版时，先生已达91岁高龄。兴奋之下，特仿陆放翁诗，题七言长句一首：

人生修短本难必，伊谁八五（放翁生年八十五，自称：九十衰翁心尚孩）谁九一？两人相遇应同坐，少长僧儒堪指摘。九十一翁不识公，语胡自至吾岂怪？幅巾随处一悠哉，声闻自逐宁不忆？古寺茶毗一个僧，孤忠血化千年碧，忽然讲经忽坐化，存原可取去勿惜。诗虽不如寿过之，人意胜天齐损益，胜负也于马力见，辕下一鸣人已识。吁嗟乎！长途焉用咫尺为？久暂至今持一息，二十年回试回想，新生万木森森立，老夫蠢此事何事？徒抱雄心沸衷臆，诗成笑比坠驴人，遮莫夔龙纷满壁。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我国时，周恩来总理将一部《柳文指要》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这部巨著将永远收藏在白宫国会图书馆。

上书毛主席

在十年动乱时期，章士钊夫妇得到政府的特别照顾和保护，

他们非常感激。“文化大革命”开始时，社会上出现了要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的逆流。先生认为，这样搞法是会把国家搞垮的，随便打倒一个国家领导人，中国是要遭大难的。于是他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党中央领导互相团结，如果有错误，可以批评，不要一下把他打倒。毛主席接到他的信，很快就回信表示：为大局计，彼此同心。个人别人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先生在国家危急之时，以他的卓越远见，毫不顾虑个人的得失，敢于坦率直言，这完全是出于对党、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国家领导人的爱护。

“主席想得真周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法国向我国招募大量华工。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为首，组织勤工俭学会，号召青年去法国半工半读。章士钊夫妇当时都是这个学会的赞助人。毛泽东、蔡和森同志组织新民学会会员参加赴法勤工俭学，达1700余人。由于出国经费都是募集而来，比较困难，1920年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为留法学生筹集旅费，向先生求援。先生随即向上海工商界名流募捐了一笔巨款，以示支持。

1961年经济困难时期，有一次主席对先生说：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人士。当初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子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接着又诙谐地说：现在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此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便有一位秘书送两千元到先生家，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主席发现后，又对左右同志说，这个钱不能停，还要还行老的“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又有一位秘书送来了两千元。这时先生已经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馈赠时，他激动得双手发颤，对家里人说：“主席想得真周到，他是要在经济上帮助我，怕我钱不够用。主

席怕我好面子，不肯收，故意说是还钱还利。其实这笔钱是当时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了一份力罢了。”

1961年10月，北京召开辛亥革命50周年纪念大会，章夫人作为辛亥革命老人赴京参加了这次庆祝活动。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周恩来总理一再向章夫人祝酒，称她“吴先生”。周总理的念旧心情，不言而喻。

为祖国统一鞠躬尽瘁

1970年1月，先生90岁诞辰前夕，我赴京看望他，为他祝寿。在他身边十天中，亲聆教诲，得益良多。他除对我的工作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外，并且晓以养身之术。他说：“我能够活到这样大年纪，主要是一生心平气和。”他还对我说：“国家交给我的任务，我还没有能够完成，等身体稍好些，我还要去一趟香港。”离京后，他亲自给我写了两封信，询问我的工作情况。1972年1月，在北京医院写的最后一封信说：“前接书，正拟作复，适检书跌倒，右腿受伤，验云骨折，入居医院，已达两月。……我留病院尚不知多久，能出院与否，也未可料，故我在病院时愿得复书。……”老人如此高龄，在病中仍对我放心不下，使我接到这封信时，不禁心酸泪下。

1973年春，老人已经92岁高龄，他果然提出前往香港探亲访友，寻求和平统一的途径。他的愿望得到党和政府的支持。周总理十分关心他的健康，亲自为他作了安排，5月25日临行时，并亲到机场送行。到香港后仅仅一月，因年龄太大，气候不适，便病倒了。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医疗队，护送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时，先生已于7月1日凌晨与世长辞！他临终前写下的几句话是：赶快报告总理，接我回去，我要回北京。先生逝世后，香港各界举行了公祭，港澳各界同胞一千多人参加了公祭仪式。骨灰由专机运回北京后，7月12日又举行了追悼大

会，党和国家领导人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郭沫若等出席了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送了花圈。郭沫若致悼词说：“章士钊先生解放前夕为国共和谈奔走。……章士钊先生为国家的统一大业，不辞劳苦，鞠躬尽瘁，始终怀念在台湾省的故旧……盼望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同年4月1日，姑母吴弱男在上海病故，享年87岁。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上海市政协举行了追悼会，政协领导人陈望道、吴若安、武和轩、赵祖康、贾亦斌等出席了追悼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中共中央统战部等送了花圈。

转眼间，二位亲人离开我们已经13个年头。回首往事，不禁黯然，但他们的革命业绩却永留青史，永远为我们所怀念。

林业界的一代师表

——记梁希教授生平

张楚宝

梁希教授是我国杰出的林学家，解放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人大代表、林垦部部长等职。本文主要介绍他一生中孜孜不倦地从事森林学研究，培养林业人才，为振兴我国森林事业所作的种种努力。

书香门第

梁希先生原名熾，留日后改名希，早年字索五，后改字叔五或叔伍，笔名凡僧、一丁、阿五等。1883年12月28日（清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双林镇（今属湖州市郊区）。故居在镇上钟秀桥东塘支湾畔（现为板桥东路7号）。双林镇是一个文化发达、人才辈出的江南水乡。

先生幼年丧父，初在私塾启蒙，稍后就学于蓉湖书院。其长兄梁煜，字纓伯，1885年（光绪十一年）科试秀才，在蓉湖书院执教。二兄梁圻，字仲恺，同年科试廪生。先生为三弟，因另有一姐（梁娥）一妹（梁晨），故排行居四。先生资质聪慧过人，饱读诗书，过目不忘，加以家学渊源，根基深厚，曾有两浙才子之目，在嫡堂诸兄弟梁焜、梁炳、梁煜、梁圻、梁烽、梁炯当中，佼佼出众。先生于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科府学入选

秀才，时年方16岁。

先生于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与双林镇宿儒姚兰蘋之女结婚，1905年生长子梁垚（后改名震），1908年生次子梁超。1921年姚氏病故，先生从此停娶，终身致力于森林事业。

立志为林业而奋斗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清政府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先生忿激之余，立志革命救国。1905年，报考浙江省武备学堂，学习西方军事。毕业后，以成绩优异，于1906年被资送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海军。由于品学兼优，曾被选拔为班长。当时孙中山先生在东京建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的中国同盟会，在东京出版《民报》，鼓吹革命。同年，比梁希长5岁的陈其美（英士）亦从吴兴到东京学习军事，他和先生相继加入了同盟会。由于他们之间有过这段交往，所以陈其美侄辈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及吴兴籍的朱家骅，都视先生为父执，对他后来的反蒋活动，始终有所顾忌，未敢遽下毒手。

先生于1907年和1909年曾两次回国短期度假。辛亥革命期间，先生再度回国参加浙江湖属军政分府，从事新军训练。不久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军政分府撤销，先生复去日本，改入东京帝国大学林科学习，并从此爱上了林业，立志引进先进的林业科学技术，为建设祖国而勤奋学习。在河合钟太郎、本多静六、川濑善太郎、右田半四郎和三浦伊八郎诸教授指导下，先生对林产制造学和森林利用学饶有兴趣。由于他悉心钻研，学习成绩超群，深受导师们的赞誉。1948年，先生在台湾八仙山见到河合、本多、川濑、右田手植的杉树，曾赋诗三绝，缅怀先师，其中一首是：“一别师门三十春，前景如梦复如尘，侯生^①头白梁生老，

① 侯生指当年留日同窗侯过先生。

何况当年传道者。”足见先生尊师重道的深情挚意。

1916年，先生从日本学成归国，初受北京政府选派，前往奉天安东（今辽宁丹东）中日合办的鸭绿江采木公司任技师。由于日方理事长大权独揽，肆意扩大伐区范围，将长白山的红松林滥伐无度，怵目惊心。梁老无力制止，忿然离去。同年应聘在北京农业专科学校林科任教。该校是我国最早设置林科的高等学校之一，即今日北京农业大学的前身。不少老一辈林学家如程鸿书、侯过、钟毅、吴恺、凌道扬、张福延等，都曾在这里任过教，为我国培育出了一大批早期的林业人才。

日本的林业科学技术，最早是从德国引进的。为了直接借鉴德国林产化学和木材研究方面的成果，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他于1923年自费前往德国德累斯顿，在萨克逊森林学院研究林产化学和木材防腐学，历时4年。虽然他那时年已40开外，却还是如饥似渴地虚心求学进修。他那严谨踏实的治学精神，给这个学院的教师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他从德国返回北京时，北京农专已改名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他受聘任教授兼森林系主任。其时奉系军阀张作霖继皖系军阀段祺瑞制造“三·一八”惨案之后，又杀害了李大钊同志等革命者。腥风血雨，笼罩北京，教育界的进步人士人人自危。为了摆脱险恶的环境，他于1928年南下杭州，受聘任浙江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主任，并一度参加中华农学会与德商爱礼司化肥公司合作在上海筹办的农业研究所，担任研究员工作。

1929年，他应浙江省建设厅程振钧厅长之请，兼任该厅技正，负责调查全省山林概况。他自夏至冬，踏遍杭、湖、宁、绍、台各州县的山山水水，先后发表了《两浙看山记》、《对于浙江旧泉唐道属创设林场之管见》、《西湖可以无森林乎》等调查报告和文章，对浙江的林业建设和杭州西湖的造林绿化提出许多中肯的意见。

1931年春，新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的朱家骅敦请先生出任农

学院长，他不直朱之为人，勉强成行，但到校甫及一月，即悄然返回杭州，贻书致朱，敬谢不敏。这一挂冠而去的戏剧性行动，人们一直传为佳话，表示敬佩。

1932年8月，他与金善宝、蔡邦华、朱凤美等60余位教师因不满浙大校长郭任远的独断专横，纷纷辞职离校。后来他应中央大学农学院院长邹树文之聘，在森林系任教，从此为创建和苦心经营中大森林化学室经历16个春秋，先后培育了一大批林业专门人才。

抗战期间，他在重庆开始接触到中国共产党的报刊，并与周恩来、邓颖超等领导同志以及《新华日报》的一些负责同志的交谈中，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抗日救亡，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他从此逐步成为一名信赖党、热爱党、坚决与反动派作斗争的民主战士。

1944年底，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大西南，桂林失陷，都匀告急，川黔吃紧。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黎锦熙等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后逐渐演进成为“民主科学社”学术性的政治团体。1945年9月3日，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决议改名为“九三学社”。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选出许德珩、潘菽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梁希等8人为监事，并发表成立宣言，提出8点基本主张和3点对时局主张，刊载在1946年5月6日《新华日报》上。1956年2月，先生被选为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直至逝世时止。

1946年冬，他随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继续参加民主革命斗争活动。南京解放前夕，中央大学教授会于1949年1月，推选梁希、胡小石、郑集等3位教授为校务维持委员会常委。他们为了维护学校，反对搬迁；为了保护同学，免遭迫害；为了保存

元气，迎接解放，挺身而出，甘冒风险，终于迎来了南京的春天。中央大学改为南京大学，梁希受任为校务委员会主席。10月1日，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前升起，9日梁希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1951年11月改为林业部）部长。解放前他坚持在教育园地耕耘，桃李遍神州。解放后，他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事业鞠躬尽瘁，做出了显著成绩。1958年，他不幸患了肺癌，先后3次住院治疗。就在这年9月，他还抱病为《人民日报》撰写了《让绿荫护夏，红叶迎秋》一文，这是他生前留下的最后一篇杰作，他念念不忘要使青山绿水在祖国国土上织成一幅翡翠色的图案。

先生由于病情日见加剧，心肺功能逐渐衰竭，经医院抢救无效，于1958年12月10日清晨5时与世长辞，享年75岁。他逝世后，由周恩来、彭真、习仲勋、郭沫若、许德珩、沈钧儒等35人组成治丧委员会，并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由贺龙、习仲勋、郭沫若、许德珩等主祭，遗体移送八宝山革命公墓破土安葬。一代宗师，从此长眠地下，但他生前留下的光辉业绩，是永垂不朽的。

桃李满天下

早在民国初年，他在北京农专讲授森林利用、林产制造等课程，是我国设置这类课程的嚆矢。他在农专连续任教7年，许多早年受过他的教益的门生如殷良弼、贾成章、白塚、叶道渊、周桢、程跻云、林渭访、乐天宇等，直到晚年都对他的学问道德，深表敬仰。后来他在浙大和中大森林系任教，仍然主讲这两门课程，但是他从来不抱残守缺，固步自封，而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对所编教材不断补充新的内容。人们在他用毛笔楷书的讲义稿上，几乎可以看到每页书眉上都有密密麻麻的修订补充材料。

他编写的《林产制造化学》讲义，内容丰富详尽。林产制造

化学是森林化学中的一个学科，是以林产物为原料的制造化学，以前统称“林产制造学”。由于林产物的机械工艺利用部分已归森林利用学中讲述，因此，他改用林产制造化学之名，编为专述利用木材或树皮、树叶、树实等副产物为原料制成他种物质的制造化学。学生读了这门课后，对木材和各种森林副产物的性质和化学利用方法有了全面了解，因而不少人在就业后遇到生产实际问题，都能得心应手，胜任愉快，没有茫然失措之感。

他讲授的《森林利用学》，主要叙述森林的采伐与运输两方面内容。由于解放前各校的森林系根本没有经费供学生前往林场参观实习，所以只能通过课堂教学获得理性知识。而他的讲述简要明了，构图清楚易解，所以读后有如身临现场，大体了解采伐运输的全部生产过程。

他讲授上述两门课程，虽然已有20多年，但他一直在边教学边修订补充，不肯将讲义轻易付印公开出版。许多未能直接受业的别校学生，往往辗转借阅他编写的讲义。人们都以他多年耗费心血编写的大量教材始终未曾正式出版，引为遗憾。但是，他在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已经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学有专长的青年学子。现在他们大多已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在林业各条战线上做出了一定的成绩，还有不少位现在台湾和美、英等国林业教育或业务部门工作。梁老当年哺育的泽惠，人们是永远不会遗忘的。

治学严谨，孜孜不倦

先生在精心教学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科研工作。他把进行科学研究看成是教学的根本，作为高等学校的教师一定既要做好教学工作，也要从事科研活动。他认为教学如不跟科研结合起来，大学教师如不投入科研课题，不接触实际问题，不探索新鲜事物，而只是抱着死的教材，照本宣科，人云亦云，就不可能有创新独到的见解，思想就会凝固僵化，难免落得个“教书匠”之讥。

他在浙大任教时，就带领助教王相骥进行松脂采集试验，研究马尾松林木在不同直径、不同方向、不同季节、不同时刻流出松脂的差异等内容。1932年，他到中大任教后，即与邹树文院长约法三章：在森林系下成立森林化学（研究）室，配备二名助教；提供必要的经费预算，购置试验仪器设备和化学药品。他自行设计并在南京订制了木材干馏整套试验设备，供科研和学生实习之用；另从德国购置了一批化学仪器和药品，使森林化学室的教学与科研器材大为充实起来。自1934年起，笔者在先生的培养下，留充助教，与王相骥助教共同参加桐籽油量分析、木素定量等试验研究工作。他又设计制造了一套樟脑制造器，经过若干次试验，樟脑的得量较浙江诸暨式和日本改良的土佐式樟脑凝结器均高。惜因当时不易获得樟材原料，致试验中断，未能进一步研究改进。他曾写了《樟脑（樟油）制造器具之商榷》一文，1935年刊于《中华农学会报》上。

1937年，抗战开始，他艰辛缔造的森林化学室移到重庆。为了扩大研究范围，突破只有两名助教的限额，他多方争取校外单位的支援，首先从中英庚款董事会请准补助研究助理两名（周光荣、周慧明），又从贸易委员会请准补助一名助教，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专题研究。1941年下半年，他谢绝农林部次长钱大鹤的邀请，不愿出长中央林业实验所，而宁肯义务兼任中林所下属的林产利用组主任，与中大森林化学室双方合作研究，由中林所先后选派张楚宝、陈桂升、梁世镇、任玮、景雷、吴亭、鲁吉昌等技术人员10余人住在中央大学，并按月拨给经费，在他直接领导下进行木材性质、木材防腐、木材干馏、木材干燥等项试验研究。自1941年秋至1946年初，双方合作研究四五年，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直至抗战胜利后才告停止。

他于1944年发表论文《川西木材强度之研究》，并与他人联名先后发表论文或试验报告多篇：

1. 《松脂试验》（1934年 梁希 王相骥）

2. 《几种油桐种子之油量分析》(1935年 梁希 张楚宝)
3. 《木素定量》(1936年 梁希 王相骥)
4. 《重庆木材干馏试验》(1940年 梁希 陶永明 郑兆崧)
5. 《中国十四省油桐种子分析》(1939、1941年 梁希 周慧明)
6. 《川西(峨眉、峨边)木材之物理性》(1944年 梁希 周光荣)
7. 《气压法木材防腐试验装置之设计》(1944年 梁希 张楚宝)
8. 《人工干燥法之研究》(1944年 梁希 陈桂升)
9. 《竹材物理性质及力学性质》(1944年 梁希 周光荣 陈桂升 梁世镇 彭叔常)
10. 《水杉(活化石)木材之性质》(英文)(1948年 梁希 周光荣)

他对中国文学和旧体诗词造诣亦很深，早为人所共知。同时他又精通日、德、英诸国文字，先后翻译发表的文章有《日本近来试行木炭汽车之成绩》(1932)、《德国采脂之新方法和盐酸刺激法》(1936)、《近世木精定量之新方法》(1936)、《木材制糖工业》(1937)等篇。抗战期间，还在重庆翻译了德文的《木材防腐手册》一书的主要部分，以及英文的《木材工艺学》一书的九章，装订成册。可惜都未曾付印。我在1941—1945年再度追随梁老从事木材防腐试验研究工作期间，曾将他的前一本译稿抄录研读，现竟还保存无恙。所惜他的翻译手稿已经下落不明了。

先生这样的孜孜不倦、锲而不舍的治学态度与钻研精神，不仅受到人们普遍赞美，也受到国民党教育部的敬重，授予“部聘教授”的荣誉。1948年，上海《科学时代》月刊刊载的《中国森林学的导师——梁希先生》一文，称颂他是“追求日新的白发青

年”，他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建国后，他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生物学部委员，终生连任。

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作出贡献

先生是建国以来以林业专家主持全国林业行政的第一人，这既体现了党和政府选贤与能，知人善任，也是广大林业工作者众望所归，一致拥戴的。当时中国所面临的是40多亿亩荒山荒地。他就任林业部部长以后，提出了“彻底消灭荒山，绿化新中国”的口号，号召大家迅速地、积极地在荒山荒地上大力造林，使河山改变旧面貌，为大自然创造新环境。他主持林业部期间，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李范五、李相符、罗玉川、张克侠、雍文涛、刘成栋等副部长的协助下，为新中国的林业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 贯彻执行了党对林业的方针政策，确定了林业工作的方针任务是：“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利用。”

他十分重视全面发挥森林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反对滥伐滥垦。早在50年代初期，他就指出：“有森林才有水利，有水利才有农田。”他说：“一山之计在于林。”

2. 积极发展了林业教育事业。林业部成立后，首先遇到的难题是干部异常缺乏。对此他采取了以下措施：（1）扩大各高等院校林学系的招生名额；（2）创办14所林业专修科；（3）进行院系调整，成立北京、东北、南京3所林学院，继续在13个农学院内设林学系；（4）发展中等林业教育，增设中等林校和农校林科10多所；（5）创办各种林业短期训练班。从而陆续培养出一大批高、中、初级林业技术人员，彻底改变了林业人才贫乏短缺的局面。

3. 建立了一支林业调查队伍。他任林业部长之初，于1950至1953年间，三次亲临西北小陇山以及泾河、延水、洛河和无定河

流域林区考察，以便了解掌握实际情况。在他的主持下，林业部建立了一支拥有4千多人的森林调查队伍。他们在全国林区开展了森林经理调查、森林资源调查和营林调查，重点林区开展森林航空摄影、森林航空调查。

4. 调动了广大青年的力量。他历来就十分重视青年的作用，认为办一切事都要把青年发动起来，才能顺利进行。1956年，共青团中央与林业部、黄河水利委员会在延安联合召开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他为举行这次大会而写了题为《黄河流碧水，赤地变青山》一文，刊登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同年，他又撰文向高中应届毕业生介绍林业和林学，希望他们勇敢地、果断地、愉快地加入林业队伍，学会绿化荒山，征服黄河，替祖国改造大自然。

主持两学会的活动

梁老全然不是那种置身于象牙之塔、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迂腐学究。他除致力于本职的教学科研工作之外，还十分积极地参加学会活动。他早期便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的执行委员和会报的编辑。1928年在浙大任教时，一度兼任中华农学会与德商化肥公司合办的农业研究所研究员。同年7月，农学会第九次干事会上，推举梁希、陈嵘、黄桔柰、沈宗瀚代表出席在印尼举行的第4次泛太平洋科学会议，后因故未能成行。自1932年他到中大任教后，又承担主编《中华农学会报》的重任，每到周末，便由学校移居农学会的角楼上，编审稿件，处理会务。他还先后在会报上发表过论文、报告10余篇。中华森林会虽然与中华农学会同创立于1917年，曾出版过7期《森林》杂志，惜不久便夭折停刊。至1928年始重建为中华林学会，改出《林学》杂志，但也断断续续，不绝如缕。林学界人士那时大多同时是农学会会员，常在《中华农学会报》上发表文章。1934年，他为农学会报主编了

1期《森林专号》。

1937年7月，他编辑出版了《中华农学会报第1——155期索引》，并写了一篇《弁言》，概述《会报》创刊于1918年，连续18年，从无一年间断，连绵155期，积累一千万字，行销遍国内，交换及海外，列为中国重要学报之一。

1937年8月，日军进攻上海，南京告急，农学会干事孙尚良随带会员登记卡和帐簿等迁移重庆。当时社会秩序动荡，各机关学校都忙于内迁，农学会寄托无门，经费来源无着，又与会员失去联系，会务陷于停顿。幸赖梁老独肩重任，商借中大农院一间房屋开始办公。先募款恢复出版《会报》，继又创刊《中华农学会通讯》（共出版82期），并在重庆、成都两地先后举行了4次年会，继续办理了几项纪念奖金征文活动。自1938年5月至1942年4月4日间，中华农学会在他的主持擘划下，不仅度过了难关，还得到蓬勃发展。由于他如此热心学会工作，受到农林学界的一致拥戴。自1937年1月被选为中华农学会理事长，以后连选连任达7年之久。1942年起，虽改选邹秉文先生继任，但因他常在国外，梁老实际上仍未能完全摆脱会务。中华农学会为纪念梁希先生主讲林学30年及主持会务之功绩，接受国内外人士捐款，设置了“梁叔五先生60寿辰纪念奖学基金”。1947年征文范围为森林化学，奖金5千元（金圆券），由一名研究生获奖。以后因国民党政府通货恶性膨胀，奖学基金急剧贬值，征文活动始被迫停止。

1917年成立的“中华森林会”，是我国第一个林学会组织。其后由于军阀内战连绵不断，经济困窘，难以维持，至1922年停止了活动。直到1928年8月，沉寂数年的林学界又重新组成“中华林学会”，梁老被选为理事之一，1941年又被选为常务理事。但因中华农学会任务繁重，难以兼顾，除偶尔在《林学》发表论文报告外，对会务很少过问了。

1946年9月，台湾林业界邀请梁老由南京前往作短期视察。

当时台湾各山林管理所都归各县政府管辖，森林被滥伐无度，后患无穷。梁老向他的老友、台湾行政长官陈仪提出建议，主张把全省山林划归省林务处统一管理。这一建议被陈仪采纳施行，对保护台湾森林，促进林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台湾林业界莫不盛赞他的功德。1948年2月，台湾林业试验所所长林渭访、台湾大学林学系主任王益滔等邀请梁老和朱惠方教授再次去台湾考察，历时长达6周。离台前，他与朱惠方教授联名提出《台湾林业考察之管见》，受到台湾林业界的高度重视，并随即在4月10日举行了中华林学会台湾分会成立大会，选出林渭访、徐庆钟、邱钦堂、黄范孝、唐振绪、王汝弼、黄希周、胡焕奇、唐瀚等为理事。今日台湾省的中华林学会已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会负责人中不少曾在大陆受过梁老等教授的教诲。

1951年2月，在北京成立了中国林学会，选举理事35人，候补理事15人，组成第一届理事会，梁老被选为理事长，广大林业科技工作者从此又有了自己的学术性组织。30多年来，中国林学会已经发展壮大，拥有会员一万六七千人，并建立分科学会、专业委员会和研究会共10余个，积极开展各种学术活动。

领导科协 科普工作

先生和潘菽、金善宝、涂长望等29位从事各种科学工作的学者，于1945年1月26日在重庆集合，发起筹备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号召科学工作者不回避自己对社会和国家应负的责任，从局限于纯学术性、超然于社会实际的活动范围，放开眼界，为争取道义上、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一切利益而团结奋斗。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于同年7月1日宣告成立。次年创刊了《科学新闻》报，由潘菽、梁希等17人组成编辑委员会，旋因抗战胜利，大部分人迁离重庆而停刊。1947年7月20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在南京成立了分会。1948年11月1日创刊了一份名为《科学工作

者》的刊物。创刊号登了梁老的一篇专论：《科学和政治》，使尚处在黑暗统治下苦闷彷徨的科技界知识分子受到很大启发和鼓舞。

1949年7月1日，在喜庆解放后的南京，88个文教科学技术单位的代表参加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第三届大会，梁老主持大会并被选为理事长。南京科协成立后，积极发展会员，团结广大科学工作者，共同建设新中国。1950年7月21日，他为《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南京分会会员录》写了《题词》，他把1945年在重庆的科协比作“一枝烛，一盏灯，或一根擦着了的火柴”，它曾经替人指过方向，引导过路径，发生了启蒙作用。

1949年7月，中华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在北京原中法大学礼堂隆重举行，周恩来、朱德、林伯渠、郭沫若、茅盾、叶剑英等同志参加了大会，梁老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之一。科代会实际就是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前身。吴玉章和梁希、李四光、侯德榜等分别当选为正副主任。在这次科代会上，梁老又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15名代表之一。

1950年8月18日，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在清华大学礼堂揭幕，全国理工农医4个方面近4万名科学工作者的代表4百多人出席了会议，吴玉章同志致开幕词，周恩来总理、朱德副主席都到会讲了话。会议历时7天，闭幕时由梁老致闭幕词。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简称“科联”）和“中华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简称“科普”），李四光、梁希分别当选为科联和科普的主席。

作为中国科普协会代表团的团长，梁老于1951年4月与茅以升、张昌绍、曹日昌、谷超豪等教授同往捷克参加世界科协布拉格大会，途经莫斯科时停留了27天，曾受到苏联科学院的隆重接待。在全苏政治与科学知识普及协会的欢迎会上，他代表中国科普协会11万会员表示谢意。并谈到在他离开中国前，在北京刚举行了一个由全国科普协会和全国总工会联合召开的第1次职工科

学技术普及工作积极分子大会。

“愿抛鲜血荐黎明”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具有革命进取精神，曾一度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革命活动。在大学任教期间，他目睹军阀混战，祸国殃民，国民党反动派腐败透顶，倒行逆施，因而义愤填膺，口诛笔伐。在他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随处可以见到他对反动统治者的鞭笞挞伐。

1931年，他在浙江进行山林调查时，对山区农民伐木平坡，夷山为田，造成水土流失的现象是这样论断的：“自有天地以来，从无官家为小民作永久计划，则饥来逼人，小民自决，岂能顾及娥江下流乎？且小民也不识娥江也，何罪之有？”同情谁、斥责谁，真是跃然纸上。

1945年2月，重庆文化界以郭沫若同志为首，发表了《陪都文化界对时局进言》，反对内战，反对投降，反独裁，争民主，要求成立有中国共产党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并发起了广泛的签名运动。梁老和许多文教科科技界知名人士都签了名。《新华日报》于2月23日在显著地位刊登了这篇宣言。国民党右翼惊惶失措，力谋反扑。陈立夫、朱家骅以晚辈自居，亲笔致函梁老，希其声明名系别人代签。梁老不为所动，并在复信中说：“名系亲手所签，并非有人代笔，备承关注，甚表谢意。”他们对他奈何不得，后又派特务头子徐恩曾登门拜访，用威胁的口气要求梁老登报否认参加签名，又遭到他的拒绝。他这种临危不惧、威武不屈的革命气概，受到周恩来同志和许多爱国人士的敬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学校迁回南京，他的体貌虽较前益见清癯，但精神矍铄如故。1947年春，他应邀在女青年会礼堂作为题为《科学与政治》的公开演讲。他说道：科学工作者应当过问政治、讨论政治、必要时改造政治，改造到它适合于科学的需

要。要教政治适合于科学，必须反封建。

1947年5月20日，沪宁苏杭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学生5千多人，在中共中央5月5日发出的坚持放手动员群众进行反美反蒋方针的指示的影响下，在南京举行反内战游行示威，遭到国民党宪兵警察的残酷镇压，造成了30多人受伤、40多人被捕或失踪的“五·二〇”惨案。梁希等民主教授闻讯，无比愤怒。第二天一清早，就前往探望伤员，奔走营救，促请学校当局向国民党政府交涉，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同学。直到后来学生全部获释，他们才如释重负，重返教学岗位。从此以后，梁老还常与潘菽、金善宝、涂长望、干铎、施雅风、汪季琦、冯秀藻、张楚宝等每一两周举行一次秘密座谈会，互通信息，传阅党的书报刊物，传递解放区广播电台的胜利喜讯。为了避人耳目，聚会地点经常变动。有一次借为潘菽师母祝寿之名，在曲园酒家楼上会餐聚谈。还有一次，由潘老陪伴护送马寅初老先生，两人同乘一辆三轮车，到约定的城南一个不易引人注目的地点——颜料坊63号张楚宝家中楼上集会，由马老作了国民党政府经济日趋崩溃，面临覆灭的形势报告，大家听了莫不精神振奋，喜见解放之期已不在远。这样的座谈会持续进行约一年之久。

1948年5月，南京大中学校学生为纪念“五·四”29周年，从5月1日起就开展各种纪念活动，并发表《纪念五四，保障人权，保障教育，抢救民族危机宣言》。梁老于5月4日下午出席了在中央大学举行的“自然科学座谈会”，与潘菽、涂长望等几位进步教授先后发言，历时3个多小时。当天晚上，他又应邀参加在中大操场举行的营火晚会，无视特务掐断电源的捣乱破坏，镇定自若地登台讲话，鼓励同学们说：“天色就要破晓，光明即将到来。”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一时革命歌声高唱入云。他在同学们严密保护下返回农学院。他作了可能遭到国民党反动派毒手杀害的思想准备，当天夜里，濡墨写下一首七绝投寄友人：“以身殉道一身轻，与子同仇倍有情。起看星河含曙意，愿抛鲜

血荐黎明。”

1949年元旦，新华社发表《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宣告人民解放军将渡江南进，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中央大学校长周鸿经等弃校逃跑，校务无人负责。教授会于1月31日举行全体大会，决议组织校务维持委员会，公举梁希、胡小石、郑集等三位教授为常务委员。他们随即于2月2日联名保释被逮捕的4名学生，同时布告对以前被捕、后经开释的72名学生和曾传讯未出席的学生50名，以及一年前因领导游行请愿而被勒令退学的学生一律取消处分，恢复学籍。这一甘冒风险、保护革命青年的光荣事迹，已经载入南京大学的史册。

1949年4月1日，南京大专学校学生一万多人游行请愿，要求真和平，反对假和平，又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毒打，有4人被打死，81人重伤，115人轻伤，37人被捕。梁希等3位常委闻讯，随即前往医院和学生宿舍探望，并亲切慰问伤员，叮嘱要妥为护理，注意安全，不要在黎明前再蒙受损失。

国民党反动派图穷匕见，将梁希、潘菽、涂长望等民主教授列入黑名单，妄图施加毒手。中共党组织特派地下党员护送他们分别离宁，脱离险境。梁老于1949年4月5日到达上海，随即搭乘外轮去香港，再从海路经由天津，于5月初抵达已经解放了的北平，激情满怀地参加了6月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会后，他回到解放已有两个月的南京。8月，他被南京军管会任命为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9日，他受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部长。他还先后于1949年和1954年两次当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一、第二届常务委员，又于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过一届人大历次会议。

梁希先生毕生做学问精勤严谨，教学生诲人不倦，做工作精益求精，待人接物，是良师，亦是益友，生活之道，既朴素，又廉洁。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他是我国杰

出的林学家、教育家和政治活动家。1983年12月28日是他的诞辰一百周年，全国政协、九三学社中央、中国科协、中国林学会、中国农学会于12月15日在北京联合举行纪念大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主席许德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习仲勋、方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周谷城、严济慈，全国政协副主席杨静仁、钱昌照、周培源、邓兆祥、屈武等出席了纪念会。方毅同志在会上讲话，他回顾了梁希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一生，赞扬他是“中国共产党的真诚朋友，我国林业界的一代师表，我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

忆我与梁思成老师十事

罗哲文

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和古建筑学家，曾任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及北京市城建委员会副主任等职，是梁启超之长子。本文主要介绍梁思成对古建筑艺术的研究、人材的培养以及对古建筑的保护等方面的种种贡献。

我学艺于梁思成老师，转眼已经45年了。我从他那里不仅学到了古建筑方面的知识，也学到了其他方面的学问。建国之初，我从清华大学营建系调到文化部文物局以后，30多年中，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帮助。在他诞生85周年之际，怀念之情涌上心头。特选了其中的十件事简记成文，以为纪念。

一、启蒙学艺

1940年，我国唯一研究古建筑的学术团体——中国营造学社，因日寇入侵，从北平辗转迁移到了我的家乡四川宜宾附近的南溪县李庄镇，并登报招考练习生。我幸运地被录取了，从此就与古建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先是受教于刘敦桢老师，替他整理抄写西南古建筑调查报告的文章，并绘一些插图。不久，思成老师见我绘图的技术有培养前途，便商得敦桢师的同意，把我调到他那一组来学习与工作（当时中国营造学社分为法式与文献两

组，思成师主任法式，敦桢师主任文献）。

我至今难忘的是思成师那种对学艺青年耐心细致传艺的精神。他从绘图板、丁字尺、三角板和绘图仪器的使用方法到削铅笔、擦橡皮等小技都一一地把手教给，并注重谈了线条的艺术性问题。他说：“你别看画图都是由一条条粗细不同的线条所组成的，但是把线条组织起来就是艺术，特别是建筑图纸，比工程和机械图纸要求的艺术性更高。不仅是花纹图样，装饰艺术的图纸有艺术性，就是结构图纸也有艺术性，比如用不同粗细的线条来表示斗拱、屋檐的层次，表示断面和轮廓等等。就是线条的交结也有艺术，要恰到好处。”他连鸭嘴笔和圆规的用法，蘸墨，拭墨的方法都作了详细的示范。他还特意安排了刘致平、莫宗江两位先生对我进行指导。

有一次我得了病，发高烧。其时学社因躲避日寇飞机的轰炸，搬到了乡间。那里没有医生和医疗条件，他就特地跑到镇上请了同济大学医院的有名的唐大夫前来为我看病，亲自给我端水吃药。在旧社会师傅对待徒弟有这样的盛情，是极为珍贵的。

二、出版“汇刊”

《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是我们这一学术团体的机关刊物，也是发表学社同仁研究成果的主要阵地，曾经在北平出版过六卷，每卷四期，发表了许多重要的古建筑调查报告与论文，从内容和印刷质量来说，都是一流的刊物，深受国内外学术界的好评。但是自学社南迁后，流离辗转，由长沙而昆明才住不久又迁四川，印刷、纸张、装订、出版极为困难，尤其是在李庄乡下就更加困难了。但思成先生深知，一个学术刊物是这一学术机关的生命线，如果一个学术机关学术团体没有自己的学术刊物，它也就难以存在了。为此，他想尽了一切办法要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恢复这一刊物。在他的倡导下，学社的同仁也都积极响应，一起动手，

同心协力。《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七卷终于问世了。我们是用药纸、药水手写石印，不仅有文字，还有平、立、剖的墨线图。照片也是用描绘的方法予以石印的。从设计版式、抄写文字，描绘线图和照片，石印、折页、装订成书，完全都是学社同仁一手完成的。思成先生的五台山佛光寺详细调查报告文字和图大都是我抄写和描绘的。在工作的过程中，梁老师又给了我许多的教导。当书的封面包装完成的时候，梁先生的欢喜心情至今犹在眼前。

三、重庆描图

1985年我和郑孝燮同志应日本奈良县的邀请，参加由上田繁洁知事主持的在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我们在日本大阪一下飞机，接待我们的日本朋友、奈良县原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学术部主任菅谷文则先生就很热情地询问我：

“太平洋战争后期，美军反攻日本进行轰炸时，东京、大阪等等城市都遭惨重的轰炸，惟独保存古建筑文物最多的古都奈良和京都幸免于难。据前年访问日本的中国北京大学教授考古系主任宿白先生说，是梁思成先生建议的结果。不知您是否能证实这件事？”

他这一问，我就想起了1944年的一个夏天。那天思成老师要我和他一起去重庆，帮他做一些工作。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

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那次去重庆是我平生首次进大城市。有两个事从未领略过的，一是我初次与电话打交道，开始真把耳机拿反了；二是先生请我去吃冰淇淋，大夏天吃冰冷食品还是第一次，印象很深。结合宿白同志所说的，我才真正把这件事肯定下来。先生确实做了一件保护人类共同文化财富的大事。

同时郑孝燮同志还提供了一个旁证。1951年的一天，梁先生突然把他叫住说：“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好的消息。日本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可惜。”这时他几乎流下泪来了。

1985年访问中，日本现在建筑史的老一辈著名学者，京都文化财研究中心理事长，80余高龄的福山敏男也发表意见：认为梁思成先生不仅对中国古建筑有精深的研究，而且对日本古建筑也甚是精通。他出生在日本，早年生活在日本多年，对日本的情况甚是熟悉。他提出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个古都的建议是完全可能的。

回北京后，我立即打电话询问了宿白同志，他说他确是于1947年梁先生在北大的一次讲话中听他说过，曾经建议不要轰炸京都与奈良。

四、 古建简目

1948年冬，梁思成先生毅然拒绝了国民党派飞机接往台湾的邀请，在清华大学等待解放军的到来。不久，清华大学解放了，他以愉快的心情积极学习、工作，如城市规划、建筑设计、建筑教育、国徽设计等等。他还发动许多建筑系师生一起参加。这里仅记述有关古建筑文物的保护问题。

1949年1月，北乎和平解放。党中央深知梁思成先生是对古建筑文物素有研究的专家，对全国古建筑的情况最为熟悉，为了在解放战争中保护好祖国文化遗产，特地派人到清华大学来请梁

先生提意见、想办法。他慨然应允了，并组织了建筑系的部分教师，一起动手，以飞快的速度，编出了一本长达百页的《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从翻书查资料到刻钢版、折纸页、装订、包裱封面，如出学社七卷汇刊那样，自力更生用手工劳动完成，一共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我还担任了全书的钢版腊纸刻印工作。封面设计和书中版式的排列是在梁先生的指导下，朱畅中同志（现清华大学教授）的手笔。

这一简目编者的名义为中国建筑研究所。其原因是抗战胜利以后，营造学社的工作人员都在思成先生的带领下，全部来到了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了继续古建筑的调查研究，特设立了一个中国建筑研究所，以保证此一工作不致中断。遗憾的是由于解放前的条件日益困难，经费缺乏，教学任务的加重，古建筑的调查研究，没有进行，营造学社也就等于名存实亡了。这本《中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也就成了中国营造学社的一份珍贵纪念和向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的一份献礼。

这份简目虽然极为简要，但是它却包含着这一学术团体多年的成果。把它发到解放军中之后，不仅在解放战争时期起到了保护古建文物的重大作用，而且在解放初期开展古建文物调查、保护、研究工作上起到了积极作用。它已经成了新中国文物保护史上的一个早期重要历史文献。

五、新都方案

北平解放以后，先生除了建筑教学，古建保护之外，还致力于都市规划的工作。他有一个设想，想把北京这一座世界罕有的古城全部保护下来。这在《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一书中已有了反映。他设想出了一个在西郊建“新北京”的方案，并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1950年我被调到文物局前，我曾给他画过新北京的简图，抄写过报告。先生曾对我说，北京城是一个中国古代城

市规划保存下来的实物杰作。如果将包括城墙、城门、街巷、牌楼、宫殿、王府、坛庙、寺观、园林等完整地保护下来，这将是一个世界的奇迹。但是这一任务很困难，如果在城内建设，新旧两者必相矛盾，古建筑就必然要受到破坏，因此，必须把新的建设建在城外，这样才能两全其美。他特地为城墙提出过保存、利用把它建成环城公园的方案，并且详细计算了拆除城墙的巨大费用的帐，发表在当时的《新观察》杂志上。遗憾的是他的这一意见未能被采纳，反而招致了一些非议。

六、长城审图

1952年秋，全国开始了古建筑的有计划维修工作，国家设立了古建筑文物维修的专款，准备首先修缮赵州桥、隆兴寺、晋祠、善化寺、光孝寺等等项目。这时政务院副总理兼文教委员会主任郭沫若提出要修缮长城的建议。文物局便把这事作为大事来办，郑振铎局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让我先作勘查，搞出规划设计来。我对北京居庸关、八达岭进行了初步勘查之后，画出了一个草图，并去清华大学向梁老师请教，请他审定。他当即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并在图纸上签了审定的名字，这张图纸我还保存着。他所提的这些意见，以后一直作为我维修文物的指导性准则。我印象最深的三点是：一、古建筑维修要有古意，要“整旧如旧”，也就是后来我们写入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和文物法的“保持原状”的原则。他特别强调修长城要保存古意，不要全部换成了新砖新石，千万不要用洋灰。有些残的地方，没有危险，不危及游人的安全就不必全部修齐全了，“故垒斜阳”更觉有味儿。二、休息坐位的布置，他说这也是艺术，在长城故垒之下不能搞“排排坐吃果果”的布置，要有点野趣。后来我就照他的意见搞了些略加整理的自然石桌凳，随意安排，不求规则，效果甚好。三、是种树问题，他提出在长城脚下千万不能种高大乔

木，以免影响观看长城的雄姿，树太近了高了，对长城的保护也不利。

30多年来，我参加过许多次长城的维修讨论，他这三条意见我都一直坚持，已经成了我自己的指导思想。

七、牌楼调查

有些年青同志可能还不知道北京城内最繁华的地点东四、西四、东单、西单等地名的来历。原来东四、西四各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各有单牌楼，简化成了东四、西四和东单、西单。前门还有五牌楼，东西长安街也有牌楼，大高殿、历代帝王庙前的大街上、东交民巷、西交民巷等等都有牌楼。这些牌楼、牌坊是古老北京重要的街景，有很高的价值。但是自从城墙城楼决定要拆之后，牌楼就成为“进攻”的主要对象了。一场论战围



移置陶然亭公园的长安街牌楼（“文革”中被拆除）



帝王庙前日景德街牌楼



西四牌楼



北海大桥上的金蜃牌楼



西交民巷敦文牌楼

绕着牌楼而展开。主张拆的一方是认为牌楼妨碍交通，必须拆除才能解决。另一方不主张拆的认为一是要保护古建筑和古都风貌，二是可以用街心广场转盘方式来解决。我当时是“敬陪末座”的一名实际工作人员，自始至终参与其事。一是保，一是拆，各陈理由，各抒己见。他们都是我的老师、前辈或是领导，有郑振铎、张奚若、梁思成、翦伯赞、吴晗、薛子正等人。吴晗当时是副市长，主持讨论，他的主张是拆。此论遭到了这些专家学者们的坚决反对。思成先生据理反驳，并提出了从交通规划上解决矛盾的办法。张奚若、翦伯赞、郑振铎等都力主保护。郑振铎是吴晗同志的老师，也未能把他说服。一连开了好几次会都未得结果，有时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

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与文化部文物局共同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北京城区的牌楼，包括一些其他古建筑进行调查。由我代表郑振铎，由闻立鹤代表吴副市长（闻系吴的秘书），参加的人有北京文物组的侯锴、容少祖，文物局文整会的曾权、袁中山等。我们查阅了所有牌楼的历史，拍了许多照片，绘了图，资料甚是丰富，都由闻立鹤保存在市政府。结果，许多牌楼还是没有保住。最后由周总理出面找思成先生做工作。思成先生以文学家的富于诗意的语言，描述了帝王庙牌楼在夕阳渐落西山的景色。看来周总理也已知不能保，但未明言，而以李商隐“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诗句来回答了思成先生，并作出了保、迁、拆三种处理方法。即在公园、坛庙之内的可以保下来。大街上的除了国子监成贤街的四座外，都迁移或拆除。东四、西四牌楼、东西交民巷、前门五牌楼、大高殿三座牌楼和帝王庙牌楼都拆了。东、西长安街牌楼迁到了陶然亭，“文革”中被拆除。

八、保护团城

1953年一股要扫掉北京古建筑的极左思潮在一些人的思想中

泛起。开马路要笔直，开车要无阻拦，大街上表现古老北京街景的牌楼、牌坊已在拆除之列，与紫禁城角楼相匹美的大高殿习礼亭拆走了，西长安街金代庆寿寺双塔拆毁了，眼看轮到团城了。

思成先生对团城的存废问题，忧心忡忡。我们文物局当时住在团城，又是担任保管之事的，更是日夜不安。郑振铎局长叫我写一篇团城的文章、照片要多，文字不计，发表在“文参”上。我理解他的意思，是要留下资料吧！我为了保团城之事，几次到都市计划委员会找先生商量。他也是心急如焚，把苏联专家也动员了出来，赞成保护。我曾在团城上，两次接待了他和苏联专家，共同寻求办法。最后思成先生不得不去面见周总理，恳陈意见。周总理亲自两上团城进行实地勘察，决定中南海围墙南移，马路稍一缓弯，把北京这一重要史迹和文物保存了下来，为子孙后代留下了珍贵遗产。决策之明晰在总理，而曲直周旋，来回奔走，得以玉全，先生之功不可磨也。

九、避雷安针

我国古建筑多为木构，最怕火焚。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杰阁层楼、巍峨宫殿、离宫别馆由于被火焚烧，顷刻之间化为乌有。一种是人为的纵火，近代又增加了电线走火等等。

另一种则是雷电起火，这种例子很多很多。如解放以后，河北遵化清东陵康熙景陵大碑楼失火，易县清西陵光绪崇陵配殿失火等等，不计其数。雷火古往今来都是古建筑、特别是木构建筑的大敌。但是几千年来一直未能采取过防雷措施。

1957年7月30日的一个上午，思成先生来到文物局找到郑振铎局长和我，说是明十三陵的楠木殿昨晚被雷击着火，情况如何尚不知道。这一大殿全为楠木，是唯一的大型楠木殿，应立即去看一下，于是我们三人驱车前往，在车上我们心中都十分焦急，忐忑不安，不知究竟烧到什么程度，如果被烧光或烧得倒塌了，

那将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极大的损失。因为此殿不仅是楠木结构，而且在建筑历史、艺术、科学三方面都具有重大价值。车子好不容易开到了十三陵，我们远远望见黄琉璃瓦的棱恩殿大屋顶，心中好象一块大石头扑通落了地。楠木大殿只是后槽金柱的柱头顶被雷劈裂一大块，虽然已经烧焦，但未延烧起来。

在回城的路上，先生和郑振铎局长商量，古建筑要设法安避雷针才行。那天晚上，正好他们两人都要参加周总理召开的会，要我立即写了一个简要的情况，两人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周总理立即指示由国务院下通知，全国重要古建筑都要安装避雷针。

十、临别赠言

在十年浩劫中，听说先生受到了各种难以忍受的批斗，但又听说他能理解，处之泰然。只是对一些古物、书刊被毁而伤心。我想他会相信这样的日子长不了，党和人民终会胜利的，所以我很放心。但我不敢去看他，怕增加了他的“罪行”，因为我的罪名也是很多的。

1972年的春节，文化部干校突然开恩让我回京探亲了。后来才知道周总理批准恢复《文物》、《考古》两个刊物。经王冶秋同志推荐，国务院已下调令要我到《文物》月刊去工作，干校阻拦不住，才让我探亲的。我回到北京之后，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听到先生已住在北京医院的消息。我找到病房，这时他正输完液，看到我来了，他非常高兴。这时只有林洙同志守在他身边，她见了我高兴得几乎流泪。她说：“他可想念你们了。这几年没有人敢来看他的，你今天怎么敢来了？”我说我的罪名虽多，但都不能成立，帽子虽多都快一风吹了，我不会连累先生的，也不怕连累我。先生此时精神顿然好了起来，问长问短，问东问西，特别是营造学社、清华建筑系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熟人情况。我象竹筒倒豆子般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参加保护古建筑工作及向周总

理写报告保护古观象台以及如何保“黑帮”、“黑线”的情况都告诉了他。并向他透露我可能要调回再搞文物工作的事。他更高兴了，说：“文物工作有了你这个‘保’字派，我就放心了。”

临行时，先生对我说：“你如果能很快从干校回来搞文物工作就太好了。文物、古建筑是全民的财富，是全人类的财富，没有阶级性，没有国界的。在社会发生大变化的时候，改朝换代，各种战争，不知破坏了多少文物和古建筑。这次‘扫四旧’也破坏了许多文物和古建筑。在变革中能把重点文物保护下来，‘功莫大焉’。望你多多努力。”

他好象还有好多话要说，但时间已晚了，只好依依而别。我回干校后，果然接到了调回北京的通知。可是当我踏上归途的时候，从广播里传来了为先生举行追悼会的消息，我心中不胜悲痛。我心中默祷：“尊敬的老师，你的临别赠言我当永记，一定为了保护全民族全人类的文化遗产尽我力所能及的力量。”

杨爱源轶事

卢 宣 朗

杨爱源为阎锡山最信任的将领之一，跟随阎锡山30多年，历经了晋绥军的发展、壮大与衰亡，并历任晋绥军主要军职。本文作者曾任杨爱源的秘书长，这里主要介绍了杨爱源与阎锡山的关系，以及几次征战与事件中的种种表现。

杨爱源，山西五台县门限石村人，保定军校第一期步科毕业，历任山西陆军第6师师长，晋绥陆军训练总监。北伐时，任山西陆军第2军军长，北方国民革命军右路军副总指挥（负实际责任，总指挥徐永昌仅挂名）。北伐成功后，任第3军团总指挥，第3集团军整理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务（委员长阎锡山兼）。1928年冬月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0年阎、冯反蒋时，任第3方面军前敌副总司令（负实际责任，总司令徐永昌仅挂名），在陇海路指挥作战。战事失败，阎锡山下野赴大连，杨爱源任晋绥警备副总司令（徐永昌任总司令），负临时维持山西军事的责任。是年冬月山西军队由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改编，杨爱源被编为陆军第34军军长，旋兼任山西清乡督办，实授二级陆军上将。陕北红军东渡抗日时，杨曾任晋绥军“剿匪”总指挥，阻击我红军。接着任山西新编陆军总指挥。1937年抗战军兴，任第6集团军总司令。1939年任教导军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总司令阎锡山兼），并任第2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

战区各级干部训练委员会副委员长，代行委员长职权（委员长阎锡山兼）。抗战胜利后，任太原绥靖副主任（主任为阎锡山），直到太原临解放时逃往南京，转逃台湾。

综合杨爱源的一生，系阎锡山手下最忠实的坐头一把交椅的人。兹就我所知道的他的一些情况简述如下。

“打听杨爱源下落”

1917年阎锡山应段祺瑞的要求，派陆军第1旅旅长商震率部援湘，杨爱源任该旅第1团营长，军队开抵湖南湘潭地区，全旅被围缴械。当时阎仅有两旅军队，本钱被毁灭一半，得讯之余，绕室彷徨，莫知所措，最后除唉声叹气外，只说了句“打听杨爱源下落”，别的一概没问。识者从这一点早知阎对杨的私人关切之至。不久，杨由俘虏营逃回，即升任团长，以后更一直飞黄腾达了。

随同商震卖车皮

1921年阎锡山联合奉军打败冯玉祥后，夺得绥远地盘，商震为绥远都统，杨爱源率第6师驻扎丰镇。平绥路由于战争关系很长时间不通，平津方面商品不能运到绥远，绥远方面土产不能运销平津。迨战事一停，商人亟欲运货，而铁路车皮多控制在军队手中，乃想方设法向军队购买车皮；为了避免沿途税关指索，并贿通驻军派官兵押运。计由包头到天津一往返的车皮费、押运费，不下数万元。商震在绥远都统任内头半年，出卖车皮所得闻达400余万。杨爱源驻丰镇也扣有少数车皮，曾同商震一样搞了好几次，师部人员有的分了些余沥。后来绥远卖车皮的风声被阎锡山知道，要严厉查办，商震得悉，先发将替他专办该项勾当的亲信中校副官郝某枪毙，以郝私擅盗卖搪塞了事。当郝某被扣

时，我记得杨曾密电商震为郝缓颊，复电说接讯较迟，已经执行。其实去电到时郝尚羁押。

训练总监

1922年杨爱源充任晋绥陆军训练总监，特别强调孙子“节短势险”的战斗训练，所作的讲话和对各部的视察指示，都严格要求在200米以外不得放枪。山西队伍在北伐等战役比较以守著名，不无他的影响。

定县瞎突围

1927年山西出兵北伐，分左右两路，左路出平绥路，右路出平汉路。杨爱源率第2军的3个师（第2、第6、第12师），和炮兵3个团，机关枪半个团（那时山西只有机关枪一个团）出正太路，截击平汉路奉军。初攻很顺利，第2师、第6师连占正定、新乐、定县等县，前线进至清风店一带，才被敌人顶住。军部和总预备队第12师到达定县县城后，被奉军戡翼翹军3个师迂回包围。第12师师长杨效欧以定县城大、兵力不敷分配，坚主撤守西关。激战5昼夜，阎锡山派第10旅卢丰年旅1个营增援无效，到第6天的拂晓，决计突围撤退。守西关的全部官兵，由西门突围向曲阳转进，经行唐、灵寿、获鹿等县退回娘子关，清风店方面的两个师同时撤守井陘一带。从定县西关突围之前，原认为一出关门必有重大阻击，伤亡不少，可是出关没碰着敌人一枪一弹，很觉诧异！事后侦知，戡翼翹因为得悉后方涿州被晋军袭击占领，已经解围而去。杨爱源这一突围，真是瞎突了。

众矢之的

由于山西北伐兵力以杨爱源第2军为最雄厚，一般人对右路军期望很大。迨定县撤退，全局改取守势，各方责言都丛集于杨的一身。杨认为原定北伐整个出兵计划，规定了各军作战进度，某军某日应达到某处，第2军完全按规定的进度进展，其他各部多未依限达成任务（袭击涿州部队也迟到五六天），以致奉军能够齐集兵力反击第2军，第2军奉令撤退，根本没有错，今竟成了众矢之的，实在冤枉，因而要我为拟辞职电稿。我说胜败兵家常事，打了败仗，众人责难，打了胜仗，众人要转而恭维，北伐战争一定胜利，莫说奉军把我们赶回山西本境，就是赶到黄河，最后他们还是失败的，何必愤懑这一时。他固执要把辞职电发出。次日阎锡山复电慰勉，并通电各部，把失败之咎归到他自己身上，以杜众口，杨始释然。

察哈尔省主席

1928年11月阎锡山由北平给杨爱源一封密电，促他赴平。我同杨前往，得知阎请准南京发表杨为察哈尔省主席，当即转车到张家口就职。省府秘书长和各厅处长都系阎直接选用之人，杨以军人初任政务，看到他们不大买帐，内心颇感不快。有次因为交给秘书处办理的一件公事，秘书长栗迺敬延搁未办，杨大发脾气，亲写一手令将栗撤职，要我即刻发表。我委婉说明机关办事手续与军队不同情形，劝他不要操之过急，同时保证告诉栗以后多加注意，免有积压，杨才渐渐气平，把该撤职令收回，未引起人事纠纷。

对反蒋战争无信心

1930年2、3月间，反蒋各方代表齐集太原，怂恿阎锡山发动反蒋战争，空气日浓一日。杨爱源曾由张家口回太原摸情况，我于其返回察省后驰往面询。杨问我外间对时局的看法，我说就是非论该反蒋，就利害论反不得。他问为什么？我说：“北伐之役，奉军被我们驱逐出关，老张（作霖）挨了皇姑屯一炸弹，小张（学良）‘岂尝须臾忘我哉’。但以他帮我们反蒋没有好处，因为平、津不能让给他；如他帮蒋打我们，平、津他垂手可得，小张又怎能放过这个机会？所以我认为战事打起来，奉军定坐收渔人之利。”杨听完我的话，围着桌子转了好几圈，叹息地说：“太原完全主战，我们如说打不得，他们要骂我们是汉奸，只好跟着走，前途希望当然是很少的。”

阎锡山下台后的过渡替身

阎、冯反蒋战争失败后，阎锡山为了缓和蒋（介石）张（学良）对他的攻击，避免山西老巢的覆灭，决定下野赴大连。行前给杨爱源一封亲笔信，上写着：星如（杨的别号）转启予（商震）、次辰（徐永昌）、翠崖（孙楚）、宜生（傅作义）、印甫（赵承绶）、子梁（周玳）、毅如（杨效欧）、舒民（李生达）、治安（王靖国）、光甫（杨耀芳）诸弟：我决计下野，今后政治由启予负责，军事由次辰、星如负责，次辰、星如担任晋绥警备副总司令，希望诸弟精诚团结，善为应付，共渡难关等语（原函大意如此）。当时山西将领反对商震很甚，徐永昌没有什么实力，军政的烂摊子实际落在杨爱源肩上，原来阎锡山总司令部的公事，逐日送杨宅处理，杨成了这一过渡时期阎的替身。

蒋介石对杨爱源的收买

阎锡山下野以后，蒋介石看到杨爱源在山西的实力地位，特别使了一收买花招。那时山西金融很紧，忽一天由太原祥记公司（孔祥熙的股本）秘密送给杨爱源50万元，说是南京电拨的，不到一月，又密送40万元。杨收到该款初很踌躇，认为这事应付不好，必致引起山西内讧。于是邀集各将领把款公开，大家商定各部分配数，由各部造具正式领据请领，杨将各部领据汇总寄蒋，连一“谢”字都未写。蒋见抓鸡不着，白蚀两把米，不但没有挖掉阎的墙脚，并且没捣乱他的窝子，甚为丧气，后来才转而设法笼络徐永昌那些人了。

接受张学良改编

1930年冬天，华北杂牌军队都由张学良（驻天津）负责改编。改编方案，山西只留四个军，番号为商震的第32军，徐永昌的第33军，杨爱源的第34军，傅作义的第35军。但山西将领内部争执甚烈，有的要商震专任山西省主席，让出32军军长，有的要傅作义专任绥远省主席，让出35军军长，争得一塌糊涂，尤以孙楚活动最力。杨爱源为了维系山西内部不破裂，多方疏通，结果增编了一个护路军，以孙楚为军长，一场纠纷才告消弭。

讨伐石友三

1931年夏，石友三（全部约五万人）由彰德进攻河北的奉军，前锋已过石家庄。这时，山西军队除商震第32军能够带动两旅出击石军外，其余多主张接受石友三代表的请求，援石反奉。张学良洞悉个中情况，一面拉拢驻正太路阳泉一带的宋哲元军

(约3万人)威胁太原，一面致电杨爱源和山西各军师长，促其通电表明讨石态度。我记得原电大意为：颇为诸兄拟一电稿，文曰：声讨石友三罪状，希于明早6时前拍出。完全是哀的美敦书式的通牒。杨爱源当晚集齐各军师长商议，孙楚、杨效欧等人仰在沙发椅上，气鼓鼓地一说三摇头，坚决不发这个电报。杨爱源反复解释，要学总司令(指阎锡山)过去应付省外事变抓火候的精神，现在不到反张(学良)的火候，而且面临宋哲元反窝的危险，苦劝大家忍耐，把电报发出。各将领以张学良代拟电稿作法过于迫人，仍不肯发。这时天快拂晓，我建议只要发电赞成讨石，电文词句尽可修改，不成问题，大家这才同意将电文删改拍发，平安过了一关。

山西军阀的“省庆”

张学良打垮石友三后，鉴于山西局势的不可靠，除在改组山西省府时安置了奉系几个委员和厅长外，暗中布置夺取山西地盘。适值阎锡山潜从大连返回五台，虽然以省亲为名，实际图谋东山再起。于是张的进攻山西更振振有词。一面利用反蒋战争失败后进驻山西的一些杂牌队伍，如孙殿英、鲍刚、张人杰等从中掣肘，一面调遣他的直属部队准备从平绥、平汉两路入晋，先头的白凤翔骑兵师已经开抵寿阳，距太原只有60公里。太原情况岌岌可危，内部意见又极不一致。张学良为了不战而胜，在弯弓待发之时，电召杨爱源等到北平相商。杨临行前密嘱我为准备第34军的交代(杨为该军军长)，到平后来电告诉已往德国医院治病，情节紧迫可想。不料仅隔几日，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全国人民奔走呼号，共赴国难，张学良不能不取消进攻山西的打算，把开到晋境奉军撤走，转而优待和安慰山西将领。除原编的山西各军师长仍旧供职外，任命杨爱源为山西清乡督办，孙楚为会办。我接到杨任清乡督办的电令，转电北平德国医院告知，

杨复电叫我在太原为他发出就职通电。不久，杨由平返晋，报告，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五六天后找他谈话，说现在国难当头，国内应团结一致，不应发生别的问题，入晋奉军已经调出，你们迅速回去等语。这是个意外的转变。同时，原来要驱逐阎锡山离晋之事也搁置不提，旋竟任命为太原绥靖主任，使他重行登上土皇帝的宝座，山西局面仍然照旧。因此有些人说，“九·一八”国难，倒成了山西军阀的“省庆”。

新 编 陆 军

自陕北红军东渡抗日那时起，阎锡山为了大量扩充军队，陆续成立防共保卫团20多个，后改编为山西新编陆军，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直辖24个团，没有中间组织。我曾同杨说，这样编制，不仅不利作战，抑且不利训练，特别是将来对外抗战（当时日本侵略日甚一日，太原方面感觉对日战争不能避免），这些散团，实有拨归别的部队的顾虑。杨同意我的话，但是不敢向阎申请。果然“七七”事变爆发后，新编陆军的24个团完全分割拨属其他部队，杨所担任的第6集团军，很少自己基本队伍，因而在指挥作战上每有呼应不灵之苦。结果第6集团军的抗战只是避战，日本人来了就走避。杨常以未听我言请求把各团编师致被分割为失计。

迁 就 孙 楚

杨爱源练兵有他一套，作战却很不行。由于孙楚一向是他直系部属（杨任团长，孙任营长；杨任军师旅长，孙任师旅团长），而且有点小聪明，一个作战计划，能同时提出三几个方案任凭选择，所以杨在各个战役中的指挥，常常依靠孙楚，孙说攻就攻，说守就守，说退就退，他本人很少主张。孙在杨面前渐渐表现骄横无状，特别是当一些将领的集会上，对杨的傲慢态度，使旁人

处之，必觉万分难堪，而杨常是若无其事。1938年，6集团军总部驻山西临县时，孙楚任副总司令，同杨闹意见，几个月不见杨的面，参谋处送阅的稿件，孙每画个大圈圈掷回。我得悉此情，劝杨设法消弭，杨当同我遣赴孙处探视，并邀孙聚餐，欢若平生，芥蒂尽释。太原军人每谓孙楚不易指挥，只有杨爱源能迁就他，才能得到他一些协力，情形确是如此。

教导军代总司令

教导军总部直辖13个旅，共39个团。内有7个旅、21个团，系原来抗日决死队等改编的新军，政治工作人员受过共产党的培养教育，因而这7个旅后来成了革命抗日的军队。可是阎锡山任用的许多落后军官，一直同政治人员闹摩擦，控告旅团营政治领导同志的文件日必数至。杨爱源摸透阎锡山的心计：重视新的政治人员，企图改变队伍的暮气，加强其统治力量。于是在上项摩擦的初期，总是说我们那些旧军官怎能合得拢朝气蓬勃的新人物？常采搁置不理的态度。后来看到愈争愈烈，向阎请示解决办法。阎为此事专下了一个手谕说，新军军政人员纠纷，概由他亲自处理，任何人不得过问。用意为使新的政治人员安心，旧的军官不再闹意气。教导总部接到这个手谕以后，凡属新军军政人员互控文电，统检齐摘由封送阎锡山核办。实际阎所谓由他亲自处理，因为无法解决，也只是搁置不理而已。及至1939年12月新军7个旅全部起义，脱离阎锡山，加入我八路军并肩抗战后，阎在某次干部大会上宣布这回失败咎由他负，但他与杨爱源仍有时骂他们用的军官都是些死人。

任战区副司令长官时期

1939年杨爱源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以后，随同阎锡山在

克难坡战区司令长官部办公（未东渡黄河前，长官部驻宜川县秋林镇）。当时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日见阎的宠任，想夺杨的地位而代之，王的爪牙乘机纷纷活动。首先是借杨的特务团（即警卫团）收容了王部某师的逃兵一事滋闹，将该特务团营长某拘捕拷打，杨派人前去查问和处理，遭到拒绝，使杨大为恼火。接着又匿名具呈阎锡山，说我（当时任杨的秘书长）包围副长官，把忠实干部排挤殆尽，此人不除，第2战区必将受其大害。杨得悉后，气愤地跟我说，这是王靖国一伙取瑟而歌，迫他走路，要我忍耐一两月，一同赴成都休养（他的家口在成都）。我劝他不必灰心，让我离开，他执意不肯。适阎锡山亲笔函我慰留，我迟至3个月以后，才托故请假离晋。在我未走期间，第7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由前方来克难坡，同我谈杨爱源近来处事如何不对。我说：“你这些话是否从王靖国处得来？”他说：“治安常有电报来往，所以知道。”我把王如何想篡取杨的地位，如何给杨难堪原原本本详细告诉赵，赵才明瞭，于次日早专找阎锡山说：“司令长官如不信任副长官，可叫他到后方休息，否则应该维护他的威信，免得有人倾轧他。”阎听了，极力否认，随即当众宣布（杨在场），今后无论什么公事，须送副长官核办，不能径向他请示。通过这一回合，王靖国收敛了代杨的野心，杨自然安心做他的副司令长官，打消了到成都休养的念头了。

乘机而逃

1949年4月，阎锡山看到太原快解放，杨爱源有被活捉之虞。特在南京（阎已先逃南京）用重金雇专机飞太原把杨救出。阎的最亲昵的妹妹——五姑娘和他的外甥梁化之都仍在太原死城中（后来再派飞机接他妹妹，因解放军炮火过猛，飞机无法降落，他妹妹见逃出无望自杀。梁化之系在太原解放时自杀），独汲汲于救杨，说明杨同他的关系之深。

· 唐绍仪史料 ·

〔编者按〕唐绍仪是我国近代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历史人物。清朝末年他曾留学美国，回国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奉天巡抚、署邮传部尚书、赴美专使等要职；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曾为第一任国务总理，后任财政部长、南北和议代表等职；1938年9月底，在其寓所为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

唐被杀后，当时的外交部长王宠惠为此提出辞呈；汪精卫等人要求蒋介石说明真相，缉拿凶手；张继要求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国民政府发给治丧费，通电明令褒扬，缉拿凶手；将其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但社会上对唐之死因却众说不一。或曰蒋介石为排除异己而为；或谓特务判断错误所致；也有的人说唐是因汉奸罪而被杀。为此，多年来很少有人提及唐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广东省珠海市政协于1986年12月下旬召开了“唐绍仪史料研讨会”，40多位与会者大都是各省市从事有关史料、档案研究的学者、教授以及知情人士。与会者提供的大量档案、史料澄清了许多史实。现选载《两次“南北和议”中的唐绍仪》、《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件事》、《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等3篇档案、史料以供参考。

两次“南北和议”中的唐绍仪

陈正卿

在第一次“南北和议”中

1. 拥袁共和

1911年10月10日，武昌事起，盛宣怀被撤职，唐绍仪接任邮传尚书。但唐对形势心存观望。直至袁世凯复出，经梁士诒传袁话给唐说：“南方军事尚易结束，北方政治头绪纷如，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①他才积极活动。此后，唐便与梁士诒、洪述祖密议：“乘此机会，仿照美、法，将中国帝制，改造民主。”^②但又因：“观察今日国家大势，统一中国，非项城莫办。”^③所以共同定下了拥袁共和方针。

11月1日，清廷命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7日，唐入京商定办法，次日，即向袁密陈此意。其时，“项城虽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④29日，汉口英领事馆提出三项议和条件：停战、清帝退位、袁世凯为大总统，公开支持拥袁共和计划。12月9日，袁世凯即奏派唐绍仪为南下议和总代表。11日，唐由汉口转上海。在汉时，黎元洪劝唐赞成共和，“唐使唯唯”。^⑤17日到沪，当夜即往惜阴堂与立宪党人赵凤昌见面，明确表示：“此来以共和政体为鹄的，来日所议，仅为成此局之步骤耳。”^⑥并于次日即

①③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② 《辛亥革命史料》，张国淦编。

④ 《八十三天皇帝梦》，文史资料出版社。

⑤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新中国武装和平解决记》。

⑥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辑。

向张謇、黄兴吐露：“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之要求。”^①当时上海的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虽已结盟，但张謇因辛亥初专访彰德，已与袁商定安定时局方针，所以革命党人在和议中实际处于被动地位。再因黄兴等对袁世凯抱有幻想，望“项城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②所以和议一开始，拥袁共和即成为三方一致的意见。

从12月18日起，和议分明暗两条线围绕两个议题进行。一是鄂、陕、皖、晋、苏几省停战事宜，一是求和平达到之方法。此时唐绍仪居间传达，白日与伍廷芳在市政厅侃侃对议，夜间与黄兴、汪精卫在惜阴堂加紧密谈。12月20日，伍廷芳提出：“此次改革，必须完全成为民主。”唐因南方尚未作出必举袁为大总统的保证，进退两难，只好连夜与汪精卫、张国淦密商召集国民大会讨论国体问题的策略，并即电袁世凯。之后，他一面面询黄兴，保证“若举袁世凯为总统，则清帝退位不成问题。”^③一面穿梭京、沪，往访奕劻等人，力劝实行共和，并“反复言之，老庆（奕劻）亦谈之声泪并下。”其后，则以唐绍仪主谋，以此宗旨由袁世凯奏请施行，并表示：“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④对唐绍仪此番苦心，袁世凯也配合默契。他一面指使段祺瑞、廖宇春与黄兴、顾忠琛接洽，以取得篡权另一层保证；一面上奏清廷说：“唐绍仪计无所出，苦心焦思，以为只有速开国民大会，将君主、民主交付人民公决统一”^⑤。仍为唐和自己谋取“孤臣孽子”的“美誉”。

2. 袁唐生隙

12月29日，南北双方开始协议国民会议召集办法。但因25日

① 《张謇传》，刘厚生著。

② 《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一辑《闵尔昌旧存函电》。

③ 《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纪念论文集》下册。

④ 《八十三天皇帝梦》。

⑤ 《辛亥革命》第八册。

孙中山回国抵沪，国内形势发生新的变化。南方民军因孙回国，主战呼声日高。29日，孙中山为统一独立各省力量，在南京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并于次年元月1日由各省代表推选担任临时大总统。对黄兴等人的联袁倒清计划，孙中山指出：“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①孙到沪后，唐绍仪立即以北方总代表名义约见，因“孙、唐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盖，握手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②唐的思想亦受感染。但袁世凯因临时政府的成立，感到极为忧虑和沮丧，便用战、和两手向南方施加压力。他边唆使姜桂题、冯国璋通电请战，边电示唐绍仪向同盟会抗议“力阻其实行”。但出乎意料，唐竟以“无法办理”为托辞拒绝^③。同时，唐南下以后，竭力排斥奉袁命监视和议的保皇党人严复、许肃等参预密谈，于是严、许返京见袁，“备述民军之不足畏”，并说：“唐绍仪非议和也，乃往献江山耳。”^④这即使袁对唐顿生疑意。而此时唐绍仪对和议的态度是“为顾全大局，与孙文、黄兴推诚协商，稍稍迁就，以冀合拢”^⑤，则更使袁产生了极大的猜忌。但袁世凯却要弄了两面派手法，他表面上以南方国民会议在沪等要求万难接受，并斥为“欲以寡人专制”。^⑥内心则为“大总统问题有难言之痛”，最好“暂时停顿，以遂私怨”^⑦。这就使唐陷于困难境地。1月21日，他说：“予遣唐专为讨论大局，他非所知。若果不称职，当罢免。”^⑧暗中却密令梁士诒电示唐辞职。并宣布即日起由其自任总代表，与伍廷芳对话。在对待南京临时政府的态度上，可说是袁、唐生隙的触发点。

① 《孙中山年谱》。

②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辑。

③⑤ 《张謇传》。

④ 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

⑥ 《辛亥革命资料类编·新中国武装和平解决记》。

⑦⑧ 杨玉如著，《辛亥革命先著记》。

3. 公开破裂

袁表面上对南方杀气腾腾，但内心因南方气势日盛，北方亦“蒿目四顾，棘手尚多”，所以并不敢动兵，仍盘算在民、清双方进行投机。因此，他罢唐后，又密令唐暗中协助谈判。孙中山为打消他的疑虑，立即声明：“虽暂时承允，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①但袁世凯仍放心不下，一面抓紧段、廖与黄之间的“实力军人”谈判；一面又密电唐绍仪：“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②孙慨然应允之后，唐即致电段祺瑞等42名北洋军将领通电请清帝退位，南北局势愈见分晓。但此时张勋却计划反攻南京，唐绍仪为担心和局再变，即密电袁世凯请其设计杀张。因经阮忠枢开脱，张才得免，但唐因此为北洋将领所忌恨。清帝退位后，和议主要转入定都、组阁、善后等问题谈判。斗争的中心焦点亦变成孙中山为巩固共和制度同袁世凯的矛盾。据柏文蔚说：唐绍仪此时“对同盟会非常忠实，并向孙中山建议，用政治手段对付袁世凯。一个北方代表能有此苦心孤诣之建议，可谓难能可贵。”^③确实，在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曾希望用迁都南京、袁南下任职、承认临时约法三项条件，防止袁的背叛。2月16日，唐绍仪北上迎袁先行，孙中山嘱托他：“惟先生周知南北之情事，除委专使欢迎项城袁公外，更请公道达一切，务请袁公即日南来，以副重望。”^④说明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但此时国内外舆论都不赞同孙中山的主张，即连原与革命党人结盟的张謇也为袁划策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飞籍掉闾，在少川心知其意而妙用之。”^⑤而唐绍仪回京后却未按张

① 《民立报》1911年12月30日。

② 《共和关键录》。

③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辑，柏文蔚的《五十年经历》。

④ 上海图书馆1986年10月编，《孙中山遗札》。

⑤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

善心意办理，他向袁转致了孙中山的亲笔函，并“极主袁南行。”^① 27日，迎袁专使到京。29日，袁世凯即策划曹锟第三镇兵变。黎明，唐即晤袁，询问此事，适遇见曹正向袁报告纵兵暴乱事，“始知大总统下令之谣不诬，”^② 因此“极忧闷。一则虑南北新旧因此生隙，二则虑军纪从此败坏。”^③ 对袁的认识更深一层。

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孙中山“笼袁”计划失败，他即想用内阁权力限制袁。当时陆军总长一职关系重大，南方因袁任总统，“各部军官均以陆军总长非黄兴不可，请唐绍仪转告袁氏。”实际在此之前，“清帝未宣布退位，季新（汪精卫）、少川即曾私议，克（黄兴）仍掌陆军或参谋。”^④ 但袁世凯不让，唐“再三电商，袁总不允。”^⑤ 再加张謇从旁助袁，表示：“陆军宜毁正而黄副，”^⑥ 革命党人抵御不住北洋派与立宪派的联合进攻，只好放弃。唐便请黄“担任南京留守使，掌握南方军事，保全实力，以待变化。”并即向孙中山建议“南方应保留五个军，在现有一、二军外，应再充三、四、五三个军，王芝祥任直隶督军，柏文蔚任山东督军，”^⑦ 在两翼监视北京。这些建议的另一佐证，即后来的九百万元比国借款案。袁心腹此时“伺隙攻唐，袁亦阴纵之。”^⑧ 但此款真正用途是有一部分接济了孙中山或黄兴，“仅向德国订购最新式之武器，其价值就约在三百万元左右。”^⑨ 所以也遭到完全倒向袁世凯的立宪党人攻击，连张謇亦说：“吾党中不明此中关键者，迫之过甚。”^⑩ 但内阁中最关键一职还是总

①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辑，柏文蔚的《五十年经历》。

② 刘成禺著《世载堂杂忆》。

③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④ 《孙中山致章太炎函》。

⑤ 《辛亥革命资料》。

⑥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⑦ 《近代史资料》1979年第3辑，柏文蔚《五十年经历》。

⑧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⑨ 刘厚生著《张謇传》。

⑩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四。

理，孙、袁双方相持不下，立宪党人曾有举唐之说，后因陈其美反对，唐绍仪改荐伍廷芳。伍廷芳亦表示：“吾与少川，尽瘁国事，始终不懈。”^①最后由赵凤昌出面，建议唐绍仪参加同盟会而任总理，其理由为“新总统的第一任内阁，是新旧总统交替的一个桥梁。所以这总理必须是孙文、袁世凯两位新旧总统共同信任的人物。”^②当时南北双方急于求和，再加上唐南下后，孙、黄“从未目之为敌军代表，”^③所以表示赞同。唐此时本人愿望是“为大局图久安之策，最大宗旨即图孙、袁之合作。意乘翰旋全局之后，双方对彼均有情感与历史，故身受重任而不辞。”^④3月23日，唐绍仪任内阁总理，3月30日，由蔡元培、黄兴介绍，孙中山主盟加入同盟会。其时，“会场全体鼓掌赞成……，唐思考移时，签字认可，起立宣誓。”^⑤随后，他即北上，主持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工作。袁世凯对他参加同盟会，心中大大不快，“不满之辞，逐渐露骨。”^⑥加上他凡事“总考虑同盟会的向背。凡以为不可实行的，必至总统府要求缓办或改变，”^⑦这就使袁世凯十分恼火。4月5日，参议院迁移北上，孙中山计划派兵一万随行。对于这个部署，唐绍仪也积极赞同，后因黄兴妥协而取消。同时，他对美国政府监押的革命党人邝佐治，竭力加以营救，后经过交涉被释^⑧。并且又对仍仇恨共和的军队，尽力给予打击。袁世凯为笼络张勋，曾特拨兵饷30万元，唐绍仪拒签，只允以3万元，这使袁、唐矛盾大大激化。

5月2日，北京发生“六国银团”抗议事件。唐绍仪组阁后，六国银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方可借款的条件，遭唐拒绝。此

① 《辛亥革命》第八册。

②⑥ 刘厚生著《张謇传》。

③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辑。

④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⑤ 《居觉生先生全集》下册。

⑦ 李宗一著《袁世凯传》。

⑧ 《总理年谱长编稿》上卷，1935年11月版。

时同盟会也因条款中有尽快解决南方军事的要求，故支持唐的主张。而六国银团一贯强横成性，一面放风说唐“有排外举动”，一面向袁表示：这有损于各国“友谊”。^①“袁对唐本已不满，再加上帝国主义主子的唆使，乃决心倒唐。实质上，唐绍仪及同盟会与六国银团的这一次交锋，是辛亥革命后，民国政权企图保持部分独立主权的反映，但因袁世凯出卖而失败了。紧接着，发生了唐绍仪为履行南北和议，任命王芝祥督直的冲突。唐绍仪坚持践约，袁世凯则拚命抓住老巢直隶地盘。双方相持不下，段祺瑞等群起围攻唐绍仪。此后，袁即未经内阁副署，任命王芝祥为南京宣慰使，冯国璋任直隶总督，将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责任制完全破坏了。6月15日，唐绍仪留下辞职呈文，避到天津，袁、唐关系公开破裂。对于这一严重事件，当时革命党人因陶醉于和平空气里，没有认识到这是关系维护约法的原则问题，只有陈其美致电袁世凯责问：“唐总理固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②但袁却狡猾地散布“唐贪污潜逃”的谣言，以掩盖问题的实质。

关于袁、唐破裂的原因有二：其一是二人对共和制态度不同。袁世凯是伪装共和的野心家，而唐绍仪青年时留学美国，深受西方民主感染。辛亥前，清廷腐败，民心激昂，唐与张謇、熊希龄等“凡过沪必就商大计，进图改益，待时而动。”^③1908年，他出使美国，“益悟其共和政体之利于国计民生。”^④因而他南下后，“名为清廷代表，实则事事为革命军设计。”^⑤确实具有一定的民主共和信仰。其二则是他企图调和同盟会与袁世凯矛盾的计划失败。他说：“欲治理中国，非项城诚心与国民党合作不可。然三月以来，审机度势，恐将来终于事与愿违，故不如

① 李宗一著《袁世凯传》。

② 《民初政争与二次革命》。

③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辑。

④ 《辛亥革命》第八册。

⑤ 冯自由《革命逸史》。

早为计也。国家大事，我又何能以私交而恂公义哉？”^①表明了他维护约法的原则立场。

1916年袁帝制阴谋公开，唐绍仪、蔡元培、汪精卫三人联名电袁声讨，袁世凯接电哀叹：“鹤卿、精卫二人来电如何措辞，殊不足异。独少川以数十年老友，尚对我如此，如何可堪？”^②袁、唐彻底决裂。

在第二次“南北和议”中

1916年袁世凯暴毙，段祺瑞把持政权。次年7月，孙中山因段毁法乱国，揭起护法大旗，从而形成西南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对峙的局面。下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美、英为争夺日本在华独占权，策划中国南北二次和议。当时日本迫于形势，只得承认：“英、美欲干涉南北和局，日本以顾全中国体面，未即赞成。此时中国当局，务宜速筹统一，并发表妥协办法”。^③同时，国内人民也因连年战乱，渴望安定，所以，和平呼声确实日益高涨。经过一年多酝酿，议定在双方代表人数、地点、会议名称对等的情况下开议。此次和议，自1919年2月20日至5月30日公开谈判两次，其后北方又改派王揖唐为总代表南下试探动向，被南方拒绝。延至次年春夏间，北方直、奉军阀与西南桂、滇军阀秘密谈判一次，因而历时近一年半之久。关于此次和议，有些研究者认为，是南北军阀、政客的一次分赃会议。^④但和议中双方代表，尤其南方代表在“五四”运动中的爱国热情及孙中山为维护护法事业同南北军阀的斗争，对中国社会产生了一定影响。唐绍仪自辛亥和议任北方总代表后，此次又出任南方总代表。他表

①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② 冯自由《革命逸史》。

③ 《近代史资料》总38号。

④ 《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2期。

示，“与孙中山无论如何不能背道而驰。”^①客观上，他确实协助了孙中山的活动。现将唐当时的活动概述如下！

1. 坚持法律解决

1918年和议初筹备，孙中山即表示：“文以为南北和议，”
“当以取消非法机关，恢复旧国会为唯一无二之条件”，^②提出了法律解决的原则。其时，唐绍仪正在日本进行倒段活动。归国后，北方直皖两系因争权夺利，已由安福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唐致函徐说：“此次公之被选，是否适合民国约法，姑俟天下定论。即舍法理而谈事实，公已志在平和，自应以平和为第一义，先事收束”。^③表达了对徐非法总统否定及希望和议的双重意思。但孙中山因广州军政府被岑春煊、陆荣廷桂系军阀篡夺，恐结果为双方武人瓜分权利，于国无益，”故“不主开和议”。唐经孙中山启发，亦觉悟，“赞成中山先生之主张”，并“在暗中运动”，力阻和议开成。^④但因国内外形势变化；英美五国公然恫吓中国，孙中山只得认可和议召开。但旋即又告诫部下：“不因和议迁延”，要“为正义而战”。^⑤唐就任总代表后，虽未公开赞同孙的意见，但其态度：“从旁窥测，似近于不欲和之一派。”^⑥但其忽赞同开议的原因，“动机于世界大势之变迁与国内情势之危难”，所以他认为“最切要之点：一为段氏与日本协同乱国之国防军裁撤问题。二为我国代表在欧洲和平会议争回青岛问题”^⑦与孙中山态度相近。

但南北军阀主张开议的目的仅是争夺私利，即所谓事实问题。直皖争夺中央政权，陆荣廷觊觎副总统职务，滇军则以“滇黔军驻川军队问题，为本省重要问题”^⑧，想做窥伺中原的西南

①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② 《民国日报》1917年11月25日。

③④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⑤ 《孙中山年谱》。

⑥⑦⑧ 上海档案馆档案。

王。唐绍仪对此公开表示：“不是为西南算柴米油盐的”，并不与广州军政府直接通电，其“不满于军府者，以桂系故”。^①因而西南军阀也认为“唐少川态度不明，但多偏向于国会，漠视西南，别具野心”。^②从和议开始，法律、事实孰先孰后，唐即与滇、桂军阀存在分歧。

鉴于和议开幕，南北双方陕战犹殷，而北方仍继续调兵入陕，孙中山指出：“陕、闽不解决，则不讲和，当始终坚持此旨”。^③再加各界舆论的推动，因而陕战和中日密约便成首议话题。2月13日，李纯提出调停陕战五项办法，但26日于右任来电谓陕战未停，北军仍继续进攻。28日，南方提出北方交出中日密约和附件原文，以及陕战北方应迅作答复要求，被北方代表拒绝。唐绍仪便限北京政府48小时内开诚布公声明，否则南方即单独通告和会破裂。对于唐不遽然破裂的作法，桂系及政学会群起攻击。而唐绍仪认为：“老段跋扈，日人又从中操纵，必欲使和议早日决裂，双方再以兵戎相见，渠正好在欧洲和议上停止不统一之中国代表发言权”。^④此后，唐荐任的陕西划界专员张瑞玘密电南方，说陕西民军陆坚等部已归顺北方，陕战已无界可划。^⑤所以南代表密商后，只得应允开议。4月9日，和会二次开议，唐绍仪继上次围绕陕战、中日密约所提的六项要求外，又提出以“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为首要的十三项条件。这首要条件，不论是对非法总统徐世昌，还是毁法擅权的段祺瑞，都无异是劝降书，也是孙中山护法斗争的最基本内容。因而北方表示：“倘是绝对主张恢复国会，则北方对于时局现状，实无回旋之余地”。^⑥5月13日，和议二次破裂。

① 《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②⑤ 上海档案馆档案。

③ 《国父批牍墨迹》。

④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⑥ 《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在和议此阶段中，唐绍仪与北代表力争外，还谋求与孙中山配合。和议初，孙曾主张唐赴巴黎出席和会，但后考虑，“今以南北问题未妥，少川先生不能往”^①，故望徐谦、林森等多向“不明用意而生反对者设法疏通”^②。在两次开议中，唐不负重托，坚持法律主张，并表示：“我终身不脱国民党，中山为国民党首领”，“愿恢复国民党与孙中山之关系”^③。一次停议后，孙、唐曾计划“以南北和议应于欧会未终以前结局，以请该会帮助主张公道及保证所议有效”^④。后因二次破裂未果。唐在和议中为坚持孙中山法律解决主张，几次排除了滇、桂军阀干扰。唐继尧曾企图通过李纯勾结徐世昌，实现滇黔军驻川计划，并允以“旧国会制宪、新国会选举总统”折衷方案，唐绍仪随即回电：“至法律问题在和会上让步，负责者固感困难，而流弊亦多”^⑤，以示反对。岑春煊篡夺军政府后，为换取权利，勾结直系军阀，企图：“牺牲护法主义，置国会于不顾”^⑥，几次散布流言说：“唐少川充当总代表，系自愿负责，能了固佳，否则岑当出而收拾”^⑦。但唐断然表示：“无论他等如何，我总不听便了”^⑧。时人评价：“法律问题，南方代表亦无其他，恐除少老当然留心外，鲜肯留意者”^⑨。5月7日，二次开议破裂前夕，唐在孙中山处为法律问题商谈了三个小时，共同商讨了护法救国八项要求。并因唐、孙日接近，“中山力助少川”^⑩，孙洪伊与政学会对孙中山攻击更烈。

2. 坚持救国主张

上海南北和议前夕，适逢巴黎和会召开。会上中日矛盾激化。其时唐绍仪致电北京政府说：“查青岛为德国租地，非属地

①② 《历史档案》1984年第三期。

③ 上海档案馆档案。

④⑤⑥⑦⑧⑨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⑩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可比。日使所称，显系遁辞。国土存亡，关系甚大。望勿稍瞻徇，以竟全功”^①。因而在开议后，唐绍仪抵制了日人松井对于参战借款，“不可提出和议”^②的要求，并也回绝了所谓“南北均可借款”的拉拢。但北京徐、段政府坚持卖国媚日，所以“五四”运动火山般爆发了。5月6日，和会专题讨论了山东问题，南北代表在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推动下，致电巴黎和会，重申中国人民的正义主张。并于同日，唐绍仪致电徐、段政府，指责其镇压爱国学生的罪行。5月13日，二次开议最后一天，唐绍仪向北方代表提出八项条件，其中一、二、三条为：不承认欧洲和会山东问题意见，宣布一切中日密约无效，裁撤日本扶植的参战军、国防军等。并声明：北方代表欲开议，必先承认以一、二、三条为主的八项要求。北方代表对此无法答复，只好宣布引退。但徐世昌的大总统位置，却是由皖系军阀的财、力促成的。“财者，即日人有协助我北方款之意”，“力者，芝泉（段祺瑞）之参战军必有确实保证”，故其对“参战军问题百方解释”^③。因此南北代表辞职，正中他下怀。唐绍仪在开议前，曾因徐世昌力主和议，对徐抱有幻想，但徐此时举动，让唐大感失望。7月13日，徐世昌派于宝轩到沪探询南方动态，约见唐绍仪，唐告之说：“徐氏有无决心，有无办法？如有办法，和谈即可开议。否则开亦无益”^④。关于唐绍仪提出的救国主张与法律解决的关系，政学会曾指责“救国而不护法”。唐得知后，急令刊登此类文章的和平通讯社更正，并按真意撰各种谈话，掲載各报。6月14日，唐致电广州参众两院说：“仪对于和平会议，主旨在政治与法律并重”^⑤。而政治救济之策“首先系八条中一、二、三三条，北方有无诚意赞同，国之存亡，实卜于此”^⑥。在民族存亡的关头，

①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一辑。

② 《民国档案》1986年第一期。

③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④⑤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⑥ 《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一辑。

这一主张应是无可厚非的。

但此时唐对于恢复和议又抱有期望，起因有二：一为对外关系，南北不能统一，不利于中日交涉，一为广东问题。“自桂系操纵军府后，又先后侵夺了广东督军及省长职权，祸害地方，民怨沸天。唐绍仪在和议初，曾有粤军回粤、桂军回桂”计划，后因唐继尧担心“牵动川局”，引起滇军回滇的连锁反应，故“先向少川切商，万勿提出”^①。唐绍仪才暂未提议。此时因广东问题恶化，所以他希望能于和议一体解决。

8月13日，北方政府派王揖唐任总代表，西南群起反对。桂系因前与龚心湛洽，主张龚任总代表，故反对甚烈。此事，孙中山独具卓见，指出：“世间岂有与现为吾亲友之人言和之理，吾人尚须议和者非敌人而谁”^②？并会见王说：“解决时局的唯一方法在于恢复旧国会，若能办到此层，和局今日即可成立，不必再开会议”^③。这种只问能否护法，不问代表为谁的方针，得到了唐绍仪支持，并为承接上次停议焦点，他多次表示“对人本无问题，唯视八条能否容纳为前提，非先承认条件不与开议”^④。并又特别强调指出：“对非亡国各约撤废、国无可救，北若对此三条毫无诚意，和纵有成，国终灭亡”^⑤。后又声明：“若不以去就争，而西南则陷于卖国从犯地位”^⑥。唐绍仪的这种态度，客观上推动了当时爱国运动的发展，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热烈欢迎。正如日本侵华元凶之一山县有朋所说：“唐于中国在上世界上现存之地位不甚注意，而唯发挥其自美学得之主权论。唐表面对于日本表示好意，实则非真心也”^⑦。

① 上海档案馆档案。

② 《总理全集》第二卷。

③ 《民国日报》1919年9月23日。

④⑤⑥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⑦ 《近代史资料》总38号。

3. 协助孙中山联段抗直倒桂

1918年5月，滇桂军阀排挤孙中山，改组军政府，孙即愤然指出：“南与北如一丘之貉”。后在和议中，孙又目睹“岑、陆勾结，欲相机牺牲国会”^①的阴谋，更确立了倒桂的决心。由于北方直、皖争斗加剧，南北直桂勾结亦更趋紧密。这种结盟对护法事业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孙中山为“临机变计”，使“吾人计划畅行无阻”^②，遂制定了联段抗直倒桂计划。王见孙时，不敢回答恢复国会要求，但此时已有段祺瑞“终能赞成中山主张”^③的说法。况皖系内部徐、靳两派剑拔弩张，徐树铮专横跋扈，段甚担忧，“即与东海接近，愿与南方真民党结手”^④。1919年底，孙中山在大陆报宣言：“段系赞成其主张，但厄于地位不便公开”^⑤。孙、段结盟初露端倪。同时，滇系唐继尧因与桂系争夺驻粤滇军统辖权，桂直密议“未遂云南所求”^⑥，所以孙与段、唐两方基本达成默契。唐绍仪此时仍表示：“与中山虽今时势不同，而关系犹昔”^⑦。但因处境、见识不同，故对岑、陆仍具幻想。相反岑春煊看出了唐偏孙的倾向，即指使章士钊等人提出了：“不用总代表，改由分代表接洽”的会议规则修改方案。岑春煊说：“彼时少川愿干就干，不干另想办法”^⑧。策划了撤唐求和的诡计。

鉴于中日军事协定的再度延期，以及“军政府则谋直接包办，军阀则预备各个投降”的事实。唐绍仪于1919年10月15日辞职未获准后，又于次年1月29日致电军政府“要求只要将中日密约及军事协定取消，即可赞成废弃总代表名目”^⑨开议。但唐这一“灰心弃职”的做法，却遭到非常国会、伍廷芳、唐继尧等反

①② 《国父全集》第三册。

③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④⑤⑦⑧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⑥ 上海档案馆档案。

桂各方拒绝。唐继尧致电唐绍仪说：“望少老力主其事，不为所惑”^①。程潜也请孙中山“劝唐公不再辞，力挽危局”^②。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因伍廷芳及海军反对，退回了唐的辞呈，打消了桂系撤唐求和的阴谋。

1920年2月，北方曹锟、张作霖、李纯三督与岑春煊、陆荣廷暗商解决时局办法五条：一、由中央召集省议会联合会，修改制定宪法。省议会联合会开会时，南北国会同时停会。二、西南取消自主，全国公认徐世昌为大总统。三、中央设弼政、参议各若干人，由各省推荐，中央政府特聘、任命。四、民国六年后，所有中央政府与各国订立之条约、协约、密约等各附件，一律付弼政院审议。五、事实问题。西南各省兼海军情形不同，由各当局与中央政府直接商洽议定^③。这就暴露了桂系军阀背叛护法、阴谋权利的真面目。消息传出，西南一致反对。孙中山致电西南将领：“反对分赃和议”，“扑灭桂贼”^④；唐继尧也急电唐绍仪：“请设法开议，以期打消彼辈阴谋”^⑤。同时，孙中山已确与段接洽，徐世昌也因段真主和，答应王揖唐为总代表。而“少川以中山受徐，故对段态度亦弗研究”。再“对日外交，段赞成改变，并请少川设法办理”^⑥。所以，唐绍仪在“法律、外交、事实三种得圆满解决”的基础上，开始与王揖唐密议。王揖唐应允：“少公提之八条，一概承认。唯删去第七条临时二字。关于法律、外交两条，均加附条”^⑦。但唐绍仪“恐为北恩，持重不敢进行”^⑧。此后，岑春煊公然扣压广州非常国会经费，国会只得迁移上海议事。伍廷芳因此携带军政府印信、公款来沪，宣布与岑、陆彻底绝裂。孙、唐等已在筹划全面讨桂计划。而章士钊此时受岑春煊指使，则在上海工部局会审公堂起诉伍廷芳携款潜逃案，“少公正

① 上海档案馆档案。

②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③⑥ 上海档案馆档案。

④ 《孙中山年谱》。

⑤⑦⑧ 《近代史研究》1980年第一辑。

设法打销”^①。4月16日，孙中山召集唐绍仪、伍廷芳等召开紧急会议，公开宣布讨桂。并同时指示朱执信加紧联络皖系军阀福建督军李厚基策应粤军回广东讨桂。4月25日，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宣布脱离军政府，孙中山计划在云南重组军府与国会，但为唐继尧担心失去老巢而推却。唐绍仪配合孙中山，抓紧实行二事：1.在上海组织四总裁办事处，全面布置讨桂。以便“对内有统一之机关，对外有正当之名义”。防止“彼方假窃名义，将以伪乱真”^②。2.进一步与段联络。5月初，唐绍仪派人至北京密议，段祺瑞应允“对于恢复旧会，在沪开议及取消协约等条件均可办到”^③。孙中山亦认为，“芝泉（段祺瑞）近日大有觉悟，自乐与共图国事”^④。6月2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发表四总裁联合宣言，否认岑、陆把持之军政府，并恢复南北和议。但此时北方直皖战争爆发，段祺瑞失势下野。徐世昌又倒向直系，任梁士诒为总代表，抓紧直桂两系的和议与结盟。孙中山、唐绍仪联段和议计划失败，但西南讨桂的时机完全成熟。

8月12日，粤军在漳州誓师讨桂。皖系南方残存势力李厚基、卢永祥接济弹药，并从侧翼配合。同时广东民军纷纷响应，桂军抵敌不住。9月9日，孙、唐、伍致电谭延闿、程潜等，命湘、赣各军出兵广西，直捣桂军后路。岑春煊面临崩溃局面，桂军兵、饷两绌，与徐世昌只以80万元军饷言和，以求苟延残喘。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等为此联合通电说：“以法理论，七总裁缺四，广州已无军政府。岑、陆私人签字之条件，只等废纸，绝对不生效力”^⑤。从和、战两途彻底击败桂系。

10月31日，粤军攻占广州，岑春煊仓皇出逃，讨桂战争胜利。唐绍仪随孙中山回广州任职。这一时期，唐对桂系的斗争虽

①②③ 《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一辑。

④ 《孙中山年谱》。

⑤ 《民国日报》1920年10月25日。

不够坚定，但他协助孙中山联段抗直倒桂的作用是应予肯定的。

虽然1919年至1920年南北和议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只是各派军阀、政客播弄其间，勾心斗角。但因唐绍仪尊重了孙中山的领导和意见，因而对维护护法救国运动作出了一定贡献。

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期间的几件事

唐有淦 唐观挺

1929年4月至1934年10月，是唐绍仪主政中山县的时期。这是他从1921年起脱离政界后重新从政的一个转折，其间1929年担任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1931年3月起兼任中山县县长。从当内阁总理到当一个县的县长，在历代名人中是一个罕见的事例。笔者之一的唐有淦，当年耳闻目睹过唐绍仪主政中山县时中山港区一系列建设措施。现将唐绍仪主政中山县的几件事罗列如下，作为唐绍仪生平活动资料的补充。

中山港建设的规划和实施

1929年2月，南京政府19次国务会议通过决定，将孙中山家乡的中山县定为全国的模范县，并且该县成立训政实施委员会，进行“训政”。4月29日，训政会在县城石岐成立，唐绍仪担任主席，唐绍仪、郑道实、蔡昌三人担任常委，委员还有孙科等九人。唐绍仪发表了就职宣言。新任模范县县长由担任过孙中山英文秘书的李禄超担任。不久，广东政府主席陈铭枢又改派他们亲信黄居素任县长。1930年5月，黄居素慑于唐绍仪的威望，将县政府从石岐迁到唐绍仪的家乡唐家，借用唐、梁两姓的祠堂办公。这早是唐绍仪的意思，为此唐绍仪还专题向南京政府阐述过唐家适合为县府所在地的理由。由于黄居素任县长期间与唐绍仪多有不合，经唐绍仪的活动，南京政府于1931年初对《中山县训

政实施委员会组织大纲》进行了修改，将原大纲“广东省政府对于中山县长之任免须得委员会同意”的条文改为“中山县长在训政期内由省政府任用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主席兼之”。于是唐绍仪得兼任中山县长一职，开始实施他雄心勃勃的中山港建设计划。

所谓中山港，就是唐绍仪设想在唐家的前启环沿海地区，开辟一座可停靠5千至2万吨级轮船的“南方巨大良港”，以取代香港、广州港的部分对外贸易地位。从1929年2月开始，唐绍仪连续向南京政府报告，以孙中山曾与程璧光商讨在此地建设军港等五个理由，阐述了建港的重要性，又提请南京政府将无税口岸从香洲（今珠海市政所在地）转移到唐家，并在唐家设立海关分关。1930年1月成立了唐绍仪、李禄超等九人组成的建港筹备委员会。同年5月，唐绍仪又把中山港以“六十年为期，期满归省政府管理”的经营方法上报南京。在唐绍仪的频频呈请下，南京政府于5月中旬批准了唐绍仪的请求。1931年12月唐绍仪代表县政府与荷兰某治港公司在广州签订了测量的第一期工程的合约。第一期工程包括：一、建筑前环、后环两个大型深水码头；二、在前环“急流仔”经槟榔石至蛇洲尾一带，建造一避风塘和一条防浪堤；三、开辟从唐家至前环、后环的道路；四、在炮楼仔（前环最高的山头）修建一座50平方米的信号台。第一期工程如能完成，即可开辟唐家至石岐、省澳港和南洋的货客运航班。由于中山港建设的声势很大，在香港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轮方面极表不安，恐其夺去香港的地位，其政要人物，甚至呼中山港为敌港。

唐绍仪对建设中山港曾做过不少努力，他除了多次邀请省的要人及专家来唐家，考察港区地文构造，而且千方百计从各方面筹集资金，从南京政府那里也弄来了十几万元。并且印发了《中山港建设大纲》，散发到港澳和海外，得到了部分华侨和港澳商人的赞助。经过几年的努力，后环简易码头、信号台、通往前后

环的交通也修整完备，往石岐的航班也开通，并有不定期的航班开往港澳。但是在唐家建设大型港口，多少属于唐绍仪个人的主观愿望。该地流沙沉积较快，产生许多当时不能解决的技术问题，特别是建港需耗资巨大，这是他任职期间每年赤字十多万元的财政收支所不能负担的，并且修建中山港并得不到南京政府、广东政府及他的同事们的真正支持。因此1934年10月唐绍仪因“兵变”去职，中山县政府不久随之迁回石岐后，中山港的建设事项再也无人问津。解放初，我人民解放军在此建立解放万山群岛联合指挥部。经过几十年的扩建，已成为海防前哨的要塞。

与中山港配套的港区建设

中山县政府迁唐家后，原县城石岐镇仍是全县的经济、文化中心，据统计当时石岐镇的常住人口已达9万人，而作为县政府的唐家只有7千人。唐绍仪主政期间，对石岐的建设仍是比较关心的。较为突出的是继前任黄居素之后，他先后拨出10万多元整修了孙文中路、孙文东路、民族路、民生北路，并建筑了一个公园，改善通往雍陌温泉的公路设施，但从整体上他还是把唐家的建设作为重点。唐家未作为县府所在地前，只不过是一个小集镇，区公所所在下栅。唐绍仪上任后，以唐家县政府所在地，并筹建中山港为由，提请省府将唐家所在的第六区（包括今珠海的唐家、金鼎两区及中山市一部分）改为中山港区，将中山港区所属的翠亨村定为全国模范村。其后制定了一个围绕中山港建设为中心的中山港区建设配套计划。其中计划和实施的有：

（一）在国民经济方面：设立民生实业公司。以县长兼任总经理，以先施公司、大新公司的投资为主要股东（先施公司的创办人马应彪和大新公司的创办人蔡昌都是训委会委员，蔡昌是常委），广泛筹集资金，兴办企业。比较大的企业是在后环兴建的煤油局。该局主要负责人是南朗（今属中山市）的程天斗，他从

海外和澳港筹集资金，购进了一套炼油设备，加工了“宝塔牌”五加仑装的煤油，畅销省港澳和新加坡，与香港“蚬壳公司”的“星陵”相抗衡。该煤油局所属的“工商炼油公司”与“岐关东路股份公司”是当时中山的两大企业，在唐绍仪去职后停办。此外还有一个农业试验场，由训委会秘书、农业专家唐有恒主持，但办了不久，因欠缺经费也倒闭了。唐绍仪还调整了渔农政策，从部分渔霸、蚝霸手中收回了他们垄断捕捞业的权利，申令让渔蚝民“自由开采”，曾一度使唐家呈现了一片产销两旺的热闹局面。“环海归帆”是当时的唐家八景之一，但是好景不长。

（二）在交通方面：唐绍仪拨款修整了从唐家至大金顶的公路，与岐关公路相通，称为岐关公路唐家支线，又修通了唐家镇至中山港的主要通道，使岐关车辆可到达前后环码头，并建了一座唐家车站。还在那洲、会同之间的空地上办了一间西南汽车驾驶学校，前来培训的除了内地外，还有港澳学员，驾驶执照在港澳也获承认。该校停办后，其训练场直到解放后仍使用。此外还采纳了陈庆云（国民党空军元老之一，训委会列席委员）的建议，准备筹建一座飞机场。在中山港成立典礼上，请当时担任西南航空署长的张惠长率领双翼飞机在留狮山附近的平地上作起飞降落表演，准备将飞机场的地点设在该处。

（三）在文教卫生方面：唐绍仪拨款在石岐建了迎阳公园，中山温泉凉亭和私人出资整治了共乐园，并计划在留狮山（旧名流尸山）筹建一座中山公园。该园于1932年“双十节”举行奠基典礼。动工几个月，花去了款项一万多元。去职后停工，现在留狮山仍保留着他题字“中山公园”及公园的遗址。县政府还在唐家山房路一间旧式大院里开设了“中山港公立医院”，只开设西医门诊和少数产房，除挂号外全部免费。1933年夏，唐绍仪还邀请了香港玛丽医院和广州中山医学院联合组成的医疗队来唐家，准备给全民检查身体，后只检查了小学生即终止。县政府根据唐绍仪的提议设立了民众教育馆。唐绍仪任县长后每月拨给1300元

经费，组织文体活动，曾举行过中山港第一届体育运动会。唐绍仪的儿子唐榴、唐桂等筹办了“中山港体育会”，中山港足球队曾代表中山县足球队赴省参赛，取得省运会足球第一名。

唐绍仪任内对发展全县的教育事业相当重视。唐绍仪在训委会的提案中，多数的是关于建设中山港的事项，其次就是教育方面。一份《廿年度的教育计划》的提案，就洋洋数千言。“平民识字运动”也是他倡导发起的。兼任县长后每月拨给经费2000元。教育经费前任县长每年拨给22万元，唐绍仪增至27万元，占全县财政支出的30%以上，另动员社会力量支持办学经费每年达70万元。任内全县小学增加了100多所，中等学校从6所增至9所，并选派学生请广州岭南大学代培。在兴办教育事业的活动中，唐绍仪最为重视的是翠亨总理纪念学校（今名中山纪念中学）的创办。1929年9月训委会通过创办总理纪念学校决议，由孙科主持筹建。孙科从南京、广州方面筹集了38万元，从1931年开始筹建，到1933年经费用完，尚差10万元才能完工。唐绍仪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成立了唐绍仪、孙科、钟荣光等7人参加的校董会，决定抽拨6万元作为学校常经费，另唐绍仪一面专题报告省府，一面在省府未批准之前截留下应上缴省府的16万元护沙费，拨到筹办纪念学校使用。在唐绍仪的支持下，纪念学校于1934年竣工，1935年开学招生。

（四）在市政建设方面，唐绍仪继前任县长黄居素之后，继续在唐家的各街道铺设了水泥马路，修建了山房路和大同路两条主要干线，1932年3月环中大道、皓东路、后环路也先后完工。皓东路完成通车时，陆皓东的夫人及儿子陆少东赶来唐家主持剪彩。在修建水泥马路之前，先进行了下水道排水工程，在马路中线深60公分的地下安置一条下水管道，各管道互相连接，四五十米左右设一沙井。另唐绍仪拨款在山房路84号建了一座水塔，打了三口新水井，将井水抽到水塔上作为自来水供应，唐绍仪曾设想把附近的“龙潭”水引来唐家，兵变后停止，自来水塔也被拆

掉。

轶事数则

唐绍仪在家乡的轶事较多。

其一，唐绍仪在中山县训政实施委员会成立后，提出了一个允许九洲仔石蚝由乡民自由采取的提案。当时广东省财政厅为了扩大征税款数项，不顾蚝民死活，硬性将九洲（今珠海市九洲港一带）海坦包标给个别豪强垄断开采，广大蚝民怨声载道。蚝民派代表向唐绍仪上诉，唐绍仪经过调查后，即在训委会上提出了上述提案。提案通过后，唐绍仪又与九乡群众协商，制定了一个九洲乡民采蚝章程，规定九洲附近天然蚝由蚝民自由采取，不须缴纳税款和领取牌照。此章程公布后，得到了9乡3000多蚝民的拥护。

其二，则是唐绍仪对唐家乡镇的建设事项，布置得较为得体。如修建山房路时，有多座“土地公”挡在路中间，民工不敢动手。唐绍仪知道，赶到现场，只见他用手杖向“土地公”敲几下，即令民工拆除。唐家作为县城后，农民养的牛经常跑到街道，既不雅观，又影响卫生，于是唐绍仪派人在镇西南的马山脚下，建了数百平方米的牛舍，把全村的牛都圈在那里，群众都很乐意，称为“牛城”。街道下水道的沙井盖，开始使用时群众不很爱护，有的人故意把它翻过来，有的人甚至偷去当铁料用，唐绍仪跑到建设局，叫铸工在沙井盖上加上“盗买与盗卖，均罚50元，报信或引拿，均6成充赏”，从此再也无人敢偷了。

另外还有值得一提的事就是将共乐园（今名唐家湾公园）赠送给家乡。唐绍仪在清廷任职期间，常返乡小住，1909年前后，按清廷御苑格局在家乡建了一座“小玲珑山馆”，存放他在奉天巡抚时从俄商手中赎回的一件国宝——小玲珑水晶球。在辞去民国内阁总理后，大约在1914年前后对该馆进行了扩建，命名

为共乐园，他自写对联“开门任便来宾客，看竹何须问主人”，表示群众可以自由来参观，邀请汪精卫、胡汉民等来作客。1921年后又专营共乐园，从国外引进了大量植物花石充实园内。1932年，唐绍仪召回家属，摆了十几围酒，召集合村父老乡亲开会，当众把共乐园赠送给乡民委员会。为了防止亲属在他死后反悔，唐绍仪要求他的亲属都在赠送书上签名。此后共乐园成了全村群众的公产，现已成为珠海市重点旅游场所之一。

唐绍仪被日蒋争夺及被刺经过

郑会欣

日寇对唐绍仪的拉拢劝降

1937年12月中旬，南京沦陷，日寇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1938年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声称“帝国政府今后不与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國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①这一所谓新政府，即是由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之傀儡政府。虽然此时伪华北临时政府已在北平粉墨登场，但因其成员多系声名狼藉之北洋政府遗老遗少，就连日本官方也认为“此等人物并不能使中国人信服”，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此时便集中在唐绍仪、吴佩孚等人的身上，也就是所谓“南唐北吴”计划。

据国民党特务^②报告，日本帝国主义制定的这个新计划有以下几条：

“甲、使国民党右派领袖与抗日领袖分歧，拉拢前者，成立全国性之政府于南京。

乙、通过国民党右派，拉拢军阀及其军队，使抗日阵线松懈，必要时乘机瓦解之。

^①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二分册，9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

^② 国民党特务指的是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驻沪特务伯良——化名南湖等人。

丙、联络英、美、法、德外商及其资本家，阻挠对华贷款及其军火供给。

丁、通过外商资本家，拉拢中国资本家至日方，使抗日经济金融，陷于停滞状态。”

同时，日寇还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步骤，这就是：

“一、经唐绍仪关系，拉拢戴季陶、居正、吴稚晖、何应钦、张群、吴鼎昌、刘湘、龙云及桂系财政巨头，使唐组织全国政府，取蒋地位而代之。

二、由交通系叶恭绰等拉拢两广资本家拥唐，唐与日方条件为承认满洲国，取消北平临时政府。”^①

在拉拢唐绍仪组织伪政府的活动中最为卖力者为陈中孚、任援道等人。陈、任二人为此事还专程到东京会见日本首相近卫、外相广田以及军部要人，日方亦委派陈、任到上海游说唐绍仪等人以“救党救国”之口号，组织伪政府，与日合作。^②

同时，日本内阁和军部为加紧进行对唐绍仪、吴佩孚的劝降工作，亦派遣白田宽三到上海等地积极活动。其办法是先在全省网罗一批失意政客、北洋余孽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或约法会议，然后再制定约法并选举唐绍仪、吴佩孚为正副总统，再由总统任命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如果唐、吴表示拒绝，日本亦决定于占领津浦路全线之后，不惜以绑架方式，将唐、吴挟至南京，迫其就范。^③

其后，自称为唐绍仪代表的温宗尧与日本特务松室孝良、白田宽三等秘密会晤。在这一切活动未能奏效之后，1938年3月，日本帝国主义又在南京扶植起以梁鸿志为首的另一个傀儡政府。

到了5月份，正当日军大举进攻徐州，妄图全线占领陇海、

① 第八十二号情报，1938年1月12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下略）

②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1月24日。

③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2月17日。

津浦铁路之际，拉拢和劝诱唐绍仪的工作又开始积极进行。5月16日，日本军部暨外务省顾问船津到沪，随即便与江天铎等秘密会晤，商洽成立伪政府之事。船津声称，日本内阁依军部之主张，已一致决定于日军攻下徐州，打通津浦、陇海两线时，即将华北临时政府与南京维新政府合并，在南京成立一个“统一政府”。至于人选，日方仍决定由唐绍仪、吴佩孚任正副总统。船津并称，日本政府已决定由他和谷正之（日本驻华大使）二人专门办理此事。船津表示：“唐绍仪若愿出任组织统一政府，这是再好不过的。”^①

5月19日，江天铎与船津第二次会谈时，船津再次提出，只要新政府同意中日和平五原则（即彻底根除抗日思想，共同防共，经济合作，内蒙自治，必要地点驻扎日本军队），日本政府即与该政府开始和议谈判。^②

6月，日本内阁改组后，为了进一步贯彻其“以战养战、以华制华”的侵略方针，日本帝国主义更加加紧策划建立伪政权。

7月3日，船津奉调回国，紧接着日本又任命土肥原为驻中国特务总机关长，到上海进行拉拢劝诱唐绍仪的工作。^③9月下旬，土肥原曾到唐绍仪家中与唐秘密会晤，但没过几天，唐绍仪就在家中被人暗杀。^④这一切都表明，自南京失守至唐绍仪被刺的这段时间里，日本帝国主义一直没有放弃对唐绍仪的劝降工作。

唐绍仪在抗战初期的态度

唐绍仪自从1934年被陈济棠赶出中山县后，即长期寓居上海法租界。抗战爆发后，唐绍仪的一些故旧亲朋曾多次劝他离开上

①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19日。

②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1日。

③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7月5日。

④ 《今井武夫回忆录》，第115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

海，广东各界社团还联衔电催唐绍仪南返，并汇去旅费二万元，但他都置之不理。南京沦陷后，唐绍仪的态度一度有所动摇。据国民党驻沪特务报告说，唐绍仪在上海与日本特务确有接触，曾先后与楠本（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松冈洋右、松井石根等会晤。相传唐绍仪同意“一俟军事上达到相当败绩程度，即进行与日议和。”^① 2月7日，由北平到上海进行汉奸活动的张英华在与唐绍仪会谈后亦对人说：“少川意颇活动，但须于日军占领津浦全线后，再看大局如何演变，始能作个人最后决定”云云。^②

然而，唐绍仪深知自己毫无实力，即便是就任“大总统”，也只不过是一傀儡。同时，国民党政府不断派人游说，劝其保持晚节，因此他也不愿担当汉奸之名而遭人民唾弃，故态度逐渐转而坚决。2月21日，当温宗尧将与白田宽三谈判情形转告唐绍仪时，唐以年迈而竭力推辞，并劝温宗尧也不要干，“温愤然退”。^③

5月20日，江天铎在同船津经过两次密谈后，将日方企图告知唐绍仪，唐绍仪即对江天铎说：“你再见到船津和其他日本要人时，你可对他说，我们说话，彼此要说心里话。我以为中日议和，第一，要停战，如若战都不愿停，而说议和，岂不是欺人之谈？所以，议和时，第一要停战。第二，议和谈判时，要双方声明将以前所成立的各种协定一概取消后，重新再来。因为不如此，你这个和议协定成立后，他今日来个廿一条是这样的，明日又来个淞沪协定、梅何协定是那樣的。所以，和议谈判时，要将以前的所有协定一概取消，重新再来一个协定。他说要彻底反对国民党一层，我们要问他，是不是要反对中国每一个人呢？他是因为国民党抗日才反对的，中国人也是抗日的，他是不是也要反对？设若他说一到和议成功就不反对中国人，你告诉他，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呢。和议成功，国民党也就不抗日了。这样一来，他

① 第九十八号情报，1938年1月28日。

②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2月8日。

③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2月25日。

当然就不要反对国民党了。”^①这番话足可代表此时唐绍仪的态度。因此，当谷正之就任驻华大使后要求与唐会面时，唐绍仪则予以拒绝。^②

蒋、孔等对唐绍仪的笼络

在日本极力拉拢唐绍仪充当汉奸的同时，蒋介石、孔祥熙等也加紧对唐进行笼络，不断派人游说，并以委任其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及馈赠津贴等种种方式，劝其保持晚节，不要为敌所用。

首先，国民党政府派遣唐绍仪女婿诸昌年等专程赴沪，劝其脱离日伪包围，立即移居香港。行政院长孔祥熙还亲自致电钱新之，让钱向唐绍仪转致敬意，电文曰：“少老在沪，谨严自守，远道聆讯，钦慰交加。乃因相隔两地，躬候无从，只能聊致馈贶，藉表敬意。少老如有所需，拟请随时电告，自当照汇”云云。^③同时还向唐绍仪表示，若其能到武汉，即当委任他为外交委员会主席，共图国事。且对唐竭尽奉承之辞：“少老纳豪，外交硕果，声誉懋著，国事前途，利赖实深。”^④

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还不断派遣唐绍仪的故旧好友，专程赴沪活动。4月份，唐绍仪之旧友罗家衡由广东到上海，劝唐力持镇静，以保全晚节。据闻，罗家衡此次来沪是受吴铁城、曾养甫等人之托，负有劝说唐绍仪尽快脱离上海这块是非之地，移居广东的使命。^⑤罗家衡在上海活动后，即奉令赴武汉向孔祥熙汇报进展经过，孔对罗之活动备加赞许。回港后罗家衡又给唐绍仪发来密函，称“中央对我公将来出主和议，甚表同意。日方条件

①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1日。

②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7月25日。

③ 孔令侃致钱新之密电，1938年3月21日。

④ 孔令侃致许性初密电，1938年4月26日。

⑤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4月18日。

程度如何，望由竞庵（江天铎字）兄向日方先事探知”^① 5月初，章士钊亦从武汉经香港到上海。据章士钊在上海的律师帮办彭希民称，章士钊“系在汉受中央之囑，专事来沪探讨唐少川意旨，并影响唐在中央领导下一致对日。故章到沪后，仅与唐晤面两度即返港也。”^②

很明显，国民党政府此时不遗余力地拉拢唐绍仪，其中包含有两重目的。其一，由于唐绍仪是国民党的一名元老，又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在国内外都有一定影响。如果唐绍仪果真被日本人拉去做傀儡，显然对国民党政府的名声极为不利。所以蒋介石、孔祥熙等不惜采取种种方式，竭力加以阻止。其二，此时国民党政府虽然一方面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但意图与日本早日和议的幻想却一直没有破灭。然而日本则已明确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因此若能拉拢唐绍仪等人，让他们以其私人资格与日方进行周旋，这样既可探知日本关于和谈的内容与条件，又可不陷于被动地位，同时还可以稳定唐绍仪等人的动摇心理。恐怕这才是国民党政府拉拢唐绍仪的最重要目的。

唐绍仪被刺经过

1938年9月30日，上海各家大报都以醒目标题报道了唐绍仪被刺的消息，这一爆炸性新闻立即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密切注意。

关于唐绍仪被刺情形，国民党财政部特务南湖曾在10月2日的密电中详细报告了这一事件的详细经过。

刺客谢志磐，广东人，住大东旅馆51号。近数月来，经常出入唐绍仪家中，因此唐宅仆役都以为谢是唐之熟人，未加防范。事前唐绍仪的一位朋友曾经警告过唐，说谢志磐的胞兄弟是国民党特务，提醒唐小心从事，但唐却不以为然。

^①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0日。

^② 南湖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5月27日。

9月30日上午9时许，谢志磐乘汽车到唐宅，随同前来的还有两名假古董商，携带古物8件，以兜售古董为名要求见唐。待唐绍仪在楼下客厅看货时，刺客乘仆役上楼取款之际，遂用利斧向唐头上砍去。唐当场倒卧在沙发上，血流满面，刺客则悄然逃遁。待到仆人们赶到时，唐已人事不知，斧头还嵌在头上。当即被送往广慈医院抢救。终因唐绍仪年迈体衰，加之失血过多，于当日下午4时许去世。

唐绍仪被刺消息披露后，沪上舆论一时大哗。有的报纸暗示唐之被刺系受日人指使，也有人怀疑是国民党特务所为，议论纷纭，莫衷一是。对此，财政部特务经调查，确认这一暗杀事件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干的。在刺唐案发生两天之后，财政部驻沪特务即发来密电称：“刺唐绍仪之谢志磐，系苏浙行动委员会委员，即蓝衣社干部分子。”^①

唐绍仪被刺身亡后，国民党政府为掩盖事实真相，同时也为了稳定其他一些动摇分子的情绪，10月5日，国民党政府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孔祥熙等名义下令褒奖唐绍仪，同时拨付治丧费五千元，“并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国史，用彰政府笃念勋耆之至意。”^②

抗战初期，尽管唐绍仪的态度一度有所动摇，尽管唐绍仪周围的许多人以后充当了汉奸（如温宗尧、陈群、陈中孚、任援道等），但唐绍仪本人却始终未答允出任伪职。在国民党特务的情报中也没有发现唐绍仪叛敌之迹象。

① （1123）（1124）致孔令侃密电，1938年10月2日。

② 《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90号，1938年10月8日。

阎锡山与段祺瑞的勾结

周 玳

黎元洪任总统之际，企图利用他人取代阎锡山主山西军政大权。此事被段祺瑞秘密透露给阎，阎潜回山西，黎计划失败。从此，阎恨黎入骨。在府院之争中，阎总是支持段祺瑞。本文作者系阎锡山之亲信，炮兵负责人，这里着重介绍了阎响应段祺瑞“以武力统一中国”的主张，发兵湖南，最后全军覆没。

联段倒洪

1916年7月间，黎元洪听信孔庚、黄国梁对阎锡山的控诉，加以他左右四大金刚的怂恿就决心用调虎离山的手段撤换阎锡山而代之以孔、黄，以稳固他的总统地位。段祺瑞先得到这消息，秘密地透露给了阎锡山，黎的计划才落了空。这件事，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外间人很少知道，因为阎当时曾嘱我们严守秘密，以免外人“大惊小怪”。现在追述出来，供研究史学的参考。

阎锡山常向我们说，他生平所畏惧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袁世凯。1912年，他第一次到北京谒见袁世凯，不知不觉就汗流浹背，俯伏在地，行了个跪拜大礼。尽管他对袁世凯五体投地，因袁世凯对于与同盟会有瓜葛的各省都督，都一律看成眼中钉、肉

中制，必欲拔除而后快，所以对阎锡山也不例外。但是阎锡山在那种情况下，居然能够保持他的山西都督（后来改称将军）的位置，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对袁世凯极力逢迎，博得了袁大总统的欢心，而更主要的是段祺瑞对于阎锡山曲予维护，尽量在袁世凯面前帮他讲话的缘故。

为什么段祺瑞会对阎锡山这样帮忙呢？段祺瑞从小站练兵时起，给袁世凯办了若干各种各样的军事学堂，袁世凯当了总统，便委段祺瑞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最感到得意的是：全国督军、师、旅长，半数以上都是他的门生故吏。“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段祺瑞既然好为人师，阎锡山便投其所好，在他进京谒见袁世凯的时候，首先具了门生的帖子，拜见段祺瑞，三跪九叩行了拜师大礼。在谈话中间，一口一个老师，极尽恭维之能事。这样一来，段祺瑞便在袁世凯面前力保阎锡山，说阎虽然参加过同盟会，但是绝对靠得住。袁世凯见了阎锡山之后，也称许他“脑后没有反骨”，对阎锡山的戒备便放松了。

另外，阎锡山也很懂得怎样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在袁世凯执政时期，阎锡山对于军政大事，一概不闻不问。政治，有袁世凯派来的巡按使（即省长）金永炎主持；军事则一古脑儿交给了第12混成旅旅长黄国梁；自己做到了无为而治。不仅如此，每逢袁世凯有什么措施，阎锡山总是首先拥护。袁世凯洪宪称帝的时候，阎锡山也是首先劝进的封疆大吏之一。因此，袁世凯才龙心大悦，给予了一等男的封赠。

山西第12混成旅旅长黄国梁和阎锡山是山西武备学堂、日本士官学校两度同学，并曾结拜为盟兄弟。阎锡山从日本回国后，在北京拜山西督练公所总办姚鸿法的父亲陆军部侍郎姚锡光为老师。姚锡光赏识他少年老成，写信给姚鸿法，很加誉扬。姚鸿法便对阎锡山另眼看待，大为倚重。阎锡山先把黄国梁推荐给姚，使黄当上了第43协第85标的标统。这时阎锡山却只担任一个督练官和陆军小学堂的教官。直到86标标统夏学津因“交文案”被迫离

职，阎锡山自己才当上了86标标统。

黄国梁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极为爽直，什么事情都说一不二。阎锡山对他有什么指示，能办到，他就办，不能办，他就一口回绝说“不行”。因此阎锡山曾向我说：“黄绍斋(黄国梁字)这个人，只有他对我下命令，却从来不接受我的命令，他有多少事对不起我，我总对得起他。”在当时山西的军人，背地里都称黄国梁为天主。因此，两人也有些面和心不和了。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去以后，黎元洪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段祺瑞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阎锡山和山西的情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是阎锡山自己。他认为袁世凯一死，自己再没有畏惧的人了，便改变了他过去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假装睡大觉的作法，准备“发奋称雄，励精图治”起来，想把山西省军政大权都集中在个人手里，为所欲为。由于金永炎成立警备队，有30多个营，杀害了革命党和无辜百姓多人，怨声载道。阎锡山派我带人去抓他。他闻得风声，化装逃走了。

阎锡山心愿还没有实现，已经有他的仇人企图利用袁死黎继这个巨大变化，对阎锡山动手了。其中一个就是孔庚。

孔庚原是吴禄贞的中校参谋，燕晋联军失败后，投到山西，阎先委为朔方兴讨使，后又委为山西陆军第一师师长。孔驻在包头时，因为想用日本武士道的精神训练军队，激起兵变，侥幸逃出了一条性命，后来调任大同镇守使。在袁世凯酝酿称帝的时候，他首先通电反对。这一来把阎锡山吓坏了，连忙将孔庚免职，并电呈袁世凯请罪。孔庚就一怒离开山西，决心要把阎锡山推倒。

孔庚和黎元洪都是湖北人，和黎元洪左右的四大金刚(金永炎、哈汉章、黎澍、丁佛言)也都早有渊源。便在黎元洪面前极力揭发阎锡山的劣迹，决计要把他除掉。据我后来了解，孔庚的计划是与黄国梁里应外合，取阎锡山而代之。黎元洪就秘密派了

代表到太原来见黄国梁，并住在黄的公馆里。这一天，我正在阎锡山的办公室里，有人来向阎报告：“听说总统府派了个要人到太原来，住在黄旅长的公馆里。”阎锡山当时不动声色地说：“那有什么关系？由他去吧，你不要多管闲事。”

在袁世凯时代尽量压缩山西军队的编制，最后只剩下黄国梁这一旅人了。袁死后，黄国梁准备扩充军备，召集他的秘书、参谋等人拟了一个计划，要把一个旅扩充成为一个师。这个计划订得非常详尽，只剩下把师长名字填上黄国梁三个字了。计划送到了阎锡山办公室，我又正在那里。阎锡山看过以后，立刻怫然变色，把计划扔在地上，拍着桌子喊道：“绍斋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这样，干脆这个督军就由他当好了，何必还用我作傀儡呢？一点小事，他都不听我的，难道我就那么听话！”说罢，二话不说，就叫人把秘书长贾景德找来，拟了一个电报，拍发给北京黎元洪总统和段祺瑞国务总理，大意是黄国梁如何跋扈，不服节制之类。电报拍发之后，阎锡山还不解气，立刻把宪兵司令张达三找来，交给他一道手谕，立刻执行。手谕上写的是：“黄国梁着即免职，限即日离开太原。”并当面吩咐张达三，一定要监视黄国梁明天早车离太原，并不得与军官们见面。

这位宪兵司令在黄国梁当权时期，是趋奉黄国梁最厉害的一个，现在黄的大势已去，自然要严格执行阎锡山的命令了，立即派出宪兵一连，把黄国梁的公馆监视起来，限制旅部的官兵和黄见面。在这种重大压力之下，黄国梁便在第二天一早乘坐火车离开太原到北京去了。

那天早晨到车站去送黄国梁的，只有我一个人。宪兵司令张达三只派了一个连长在那里“监视”，本人也没有露面。黄国梁见了我，感慨地说：“子梁，难得你来送我，你不怕阎百川误会你么？”我淡淡地说：“那有什么？”黄国梁说：“我倒并不留恋什么旅长的位置，他要我离开，很可以预先向我说明白，我也不会不同意，何必象这样押解出境似地，逼人太甚呢？”我说：“韩

信曾受胯下之辱，大丈夫能屈能伸，这有什么关系？”接着，他就自嘲似地说：“我这次到北京去，别的没有什么，只是遇见了温静安（温寿泉字），他若向我说一声：‘怎么，绍斋，你也来了！’我却真有点难为情呢！”原来山西副都督温寿泉和阎、黄二人都是同学，温寿泉离开山西，是阎锡山授意黄国梁逼走的，不料今天却轮到他自己，难怪他有这番感慨了。不容我再出言慰解，汽笛已经长鸣，我只好匆忙作别，下了火车，看他抑郁寡欢地离开了太原。

我回到家里，就接着阎锡山的电话，叫我即刻到督军衙门去。我想，一定是有人向他报告，我去送了黄国梁，所以特地找我。这番见他，少不得要大加申斥一番了。我硬着头皮到了督军公署，阎锡山倒是提到了黄国梁，他说：“听说，你还到车站去送他。我看，大可不必！”却没有再往下说什么。接着就和我研究黄国梁这一旅的人事问题，分析在黄走后，可能发生哪些问题。我满口承担说绝对不会有啥事，我们军官学校一期同学占大多数。

黄国梁离开了太原，孔庚的里应外合计划，当然遭到了失败。

7月间，阎锡山接到黎元洪的电报，邀他进京，商量国家大计。他带着赵戴文、张树帜、陈效愚和我一共四个人，来到北京，照例住在大同寓。

这一天，他到总统府见了黎元洪回来，哈哈大笑说：“黎元洪那个神气，望之不似人君，简直是个窝囊废。难怪辛亥革命时，他藏在床底下，人家把他拖出来，硬把个都督加在他头上，他还不敢干，深怕犯了灭门大罪呢！”

第二天晚上，段祺瑞突然派了一个亲信，把阎锡山请到了府学胡同段祺瑞公馆里，去了很久，他才回来。我们看他神色很不平常，心想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发生，却又不好问他。呆了一会，他才哼了一声说：“黎元洪这小子要端咱们的锅呀！”随后，

他才把段祺瑞泄露给他的一段内幕，向我们述说了一遍。

原来黄国梁被撤职以后，孔庚的计划虽然遭到失败，但仍不肯死心，就再三鼓动黎元洪，用“调虎离山”之计，把阎锡山调到了北京，然后准备秘密派遣孔庚、黄国梁二人回到太原。只要他们一到太原，黎元洪就明令发表黄国梁为山西督军、孔庚为山西省长。这时阎锡山正在北京，要想反对也就措手不及了。

徐树铮在国务院听到了这项消息，私下报告了段祺瑞，段念师生之谊，忙把阎锡山找去，先把这段消息透露给他，并替他指出一条明路，叫阎锡山即日化装悄悄离开北京，间道回转太原。只要阎锡山一回到太原，黎元洪就不敢冒昧动手了。段祺瑞替阎锡山计划得十分周到，叫他次日一早乘坐京汉路车离开北京，到新乡，换坐道清铁路的车到清化，过王屋山，然后从旱路赶到太原。

阎锡山说到这里，就把他的计划向我们宣布说：“我想还是坐京汉车到石家庄回转太原，比较迅速可靠。我决定明天早晨坐京汉路的慢车动身。不过我从车站上车，难免引起他们的注意。”阎锡山一边说，一边取出了400块大洋交给我和陈效愚说：“你们两人明天一大早就赶到车站，把扬旗手和火车司机等人疏通好，叫火车开到扬旗地方，尽量开慢车，让我能够设法上了车。只要我离开北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走了以后，你们4个人都不要出门。总统府派人来找我，就推说我病了。如果总统府派人来看我的病，你们就可以撒个谎，到哪家医院看病去了。总之，要想尽方法，把他们支吾过去。等到接着我从太原来的电报以后，你们可以打个电话给总统府，说‘阎督军已经回到山西了’。在电话里，要把话说硬一点，不要露出咱们山西人的软弱劲儿。”

最后，阎锡山还说：“孔庚、黄国梁真不是东西，差点端了咱们的锅。黎元洪更不应该，为什么想出这种阴谋诡计来暗算我！”

说罢，我们就纷纷去睡了。第二天一早，我们照计而行。我和

陈效愚两人先到车站，头一关去找扬旗工人，我先给了200元大洋，他慨然答应了。再去找这次列车的司机，他也连连答应，把两百块现洋随手接过，放在车头里边，连添煤的助手，都不知道我们搞的是什么把戏。事情办妥，我和陈效愚还替阎锡山准备了一张三等车票，便到车站外面来迎阎锡山。不久，就看见阎锡山坐着洋车来到车站，浑身商人打扮，穿了一件夏布长衫，草帽的帽檐压到眉头，还戴了一副大墨晶眼镜。我们二人把他领到车站水关以外扬旗地方，就悄悄站在那里。等火车开到这里，果然扬旗手连举红旗，挥个不停，司机员把头伸到车外，向我们频频示意。直到我们把阎锡山推上车去，向司机和扬旗手分别打了招呼，车才加紧马力，一直向前开出。

两天以后，我们接着阎锡山从太原打来的电报，便依照他所嘱咐的话，给总统府打了一个电话。随后，匆匆离开北京回转太原。在动身以前，赵戴文还到府学胡同段公馆跑了一趟，面告段祺瑞：阎督军已经遵照他的指示回到太原了。

阎锡山回到太原以后，孔庚等人的计划当然落了空。不过，阎锡山却把一腔怒火集中在黎元洪身上，深恨黎元洪不该充当孔庚等人的工具。所以后来府院之争，阎锡山始终站在段祺瑞这一边，而且还派了个得力代表到安徽和倪嗣冲、张勋等人接洽。在督军团倒黎的运动中，阎锡山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闯将，可是却在背后煽动蛊惑。最后，黎元洪终于被督军团挤得无路可走，把张勋搬请进京，演了一出复辟丑剧，黎元洪也就垮台了。这时，阎锡山才吐出了这口怨气。

由于阎锡山和段祺瑞有这一番不比寻常的“师生”关系，所以在几次军阀混战中，阎锡山总是公开或暗地支持段祺瑞。他经常向我们说：“段先生正派，做事肯负责，是个爱国的军人。”

出晋远征

黎的计划失败后，阎锡山在山西的地位稳定下来了，加以他的老师段祺瑞系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正是炙手可热的时候，给阎以大力支持，阎锡山便准备扩编军队，充实力量。山西兵力原来只有一个混成旅，现在扩充为四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为商震，第二旅旅长为马开崧，第三旅旅长为孔繁蔚，第四旅旅长为赵戴文，辖四个团，实际上是阎锡山管辖。我的炮兵也由1个营扩充为4个营。这时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日趋尖锐。阎锡山一方面积极参与督军团的活动，处处与黎元洪难堪，一方面还密电段祺瑞，报告他山西兵力比以前加多了，如有使用兵力的地方，山西军队愿为前驱。段祺瑞复电，大为嘉奖说：“现在还不需，一旦用兵，一定去电征调，希望努力训练队伍，以备不时之需。”这是1917年春天的事。

张勋复辟失败，黎元洪也引咎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代理大总统。冯国璋主张对南北问题用和平方式解决，而段祺瑞则坚持讨伐“护法运动”，用武力统一中国。府院之间又产生了新的矛盾。阎锡山还是积极支持段祺瑞的。我不甚明白阎、段之间的新的内幕，曾经向阎锡山谈到我个人的看法说：“段先生离开政治，想只用武力来统一南方，恐怕这种作法会引起内部的分裂，我有点替他担心。”阎锡山听罢，微微一笑说：“你只会练兵，只会打仗，只会走直线，还懂得什么政治？可笑可喜！得了，不用分心啦，好好地练你的兵去吧。”

1917年9月初，段祺瑞突然来电报给阎锡山，大意是：湖南零陵镇守使刘建藩独立，与桂军勾结，企图倒傅良佐。命令山西派一个混成旅到湖南援助傅良佐。

阎锡山早已屡次向段祺瑞表示，愿以山西的武力作为段的后盾。现在接到段的电报，正是效忠于老师的大好机会，立刻召集

紧急军事会议。参谋长、军务处长、四个旅长和我都参加了这次会议。阎锡山首先说明情况并征求大家意见。可没有等大家表示意见，他就自己作出结论说：“依我看，启予（商震字）在外边跑的地方很多，经验丰富，声气也较灵通，最好是启予去。大家以为怎样？”大家没有反对。阎又向我说：“子梁（我的字）你也带上一营炮兵，和启予一同去。”于是就这样决定了。第1混成旅共两个团，第1团团团长蔡荣寿，第2团团团长王嗣昌，全体出动，再带一营炮兵，由我带领。不过不用带炮，只带人伏骡马，因为湖南多山，炮行动不便，要用人抬；而且湖南方面有五生的七的小钢炮，可以供我们使用。

会后，阎锡山先约商震去单独谈话，谈的时间很长。接着，又把我找去说：“方才我和启予谈了一下，他的勇气十足，信心很强，这当然很好。我知道他，因为他来山西不久，很想多立几场功劳，表现自己的能力。今年夏天郭坚来窜山西抢地盘，启予卖的力气最大，这一次叫他到湖南，出省远征，他的劲头就更足了。他认为这正是他出头露面的好机会。不过，一个人要好的心太切，有时也会误事。湖南离山西这么远，应当看事行事。你这一次随着启予同去，要临机应变，随处留心，不要凭着启予一个人的高兴，闹得尸山血海，把咱们的人都打完了。”

山西省的队伍，远征到几千里以外的湖南，这是破天荒的大事。商震以下，所有军官都兴致勃勃，劲头十足。全部人马浩浩荡荡从太原出发，坐正太路火车到石家庄，换京汉车，一直开到汉口大智门车站。从大智门车站过江使用民船。人员还好，炮兵因为有几百头骡马，费劲不小。有些骡子掉在江里，幸而沿岸水不深，想尽办法才拽了上来。我在旁边指挥照料，等到我带着炮兵过了江，商震的旅司令部已经带着第2团作为第1批乘坐火车向长沙出发了。炮兵在中间，最后是第1团。我到长沙的时候，只会见商震和旅参谋长郑逸明以及旅部的人员。第2团不等全旅集中，就已经开到前线永丰去了。

诚如阎锡山所说，在带队出发的时候，商震的劲头就十足，在长沙会见了傅良佐以后，他的劲头就更足到十二分。他一见我就满面春风地说：“傅清节（傅良佐字）可真够朋友，对咱们十分客气。他说，他早知道山西军队训练有素，作战能力很强。咱们的队伍一到，湖南就稳如泰山了。他还说，咱们的目的地是永丰，只要永丰不被南军占去，就可以保住湖南。咱们这次应当好好地卖一手，也让老总在段先生面前露露脸！”从他的口气中，不难想到，傅良佐一定给商震戴了一大堆高帽子，可是我不愿意说破，也没有把临行时阎锡山向我嘱咐的话，向他透露。由于第2团已经开拔，我们在长沙也不能稍事休息。等炮兵向傅良佐处领到了五生的七的小钢炮和抬炮的民夫，我就带着炮兵随同商震的旅司令部向湖南西南的永丰前线挺进。

由长沙到永丰，经过湘潭、湘阴。我们开到永丰时，永丰城还没有丢，王嗣昌在永丰西南占了阵地，已经与桂军对峙作战整整一天了。对面的敌军据说是广西军马济、韦永昌的队伍。

商震在永丰城里找了一所大宅院，设下了旅司令部。他在城内布置，我就带着炮兵出城来到了阵地。

我一到阵地，2团第3营营长杨爱源就匆匆跑来说：“你来了，好极了！快把炮架起来，打吧。”我说：“我刚领到的小钢炮，还没有试过，炮弹适用不适用，我还没有谱呢。”杨爱源说：“管他三七二十一，来一家伙吧。”于是我就吩咐开炮，向正面敌人猛打。广西队伍没有炮，装备也差。我的炮打过去，对面的攻势就挫下去了。

我们在阵地上迎击了两三天，第1团的队伍才开到，加在左翼，和杨爱源的队伍相连接。蔡荣寿这个人很狡猾，他的阵地在杨爱源部的后面有三里地的距离，并不在一线上。

马济、韦永昌的队伍，忽左忽右，总想突破我们队伍薄弱的环节，可是尽管他们吹着牛角号冲锋，但是一直没有攻破我们阵线。

相持了四五天，敌人看我们守得很严密，无懈可击，攻势就逐渐放松，呈现了胶着状态。

我看战地已经稳住，就想进城到旅部看看情况。同时，我还有一个个人目的：这几天天天吃米饭，我很不习惯，想到旅部去吃点面食。

全军覆没

我刚到旅部，商震忙叫副官给我煮挂面。可是，我刚端起碗吃了两口，突然就听到哒哒的枪声大作，就和旧历年节放的鞭炮一样；同时，枪弹刷刷地向我们的房内射来。我和商震都在窗户台底下找个隐蔽地方躲了一大阵。等到枪声略稀，商震帽子都顾不得戴，军大衣挂在墙上也来不及穿，向我打了一个招呼，就猫着腰一同向后院走去。这时商震的参谋长郑逸明也跟我们一同跑了出来。走到后院院墙，我和商震都翻身跳出，郑逸明是速成学堂学生，没有经过充分锻炼，身子又胖又笨，墙高的地方他爬不上去，就找了一块短墙，费了很大力气，才勉强爬过，用尽平生气力，向外一跳，不料墙外是老百姓菜园沷肥的粪窖，恰好掉到了粪窖里，闹得大家哭笑不得。接着我们就向西南方向跑出了城。喘息方定，便把蔡、王两个团长找到炮兵阵地开会。这时，有商震的几个马弁跑来了，说：“湖南第2师第4旅旅长朱泽黄的队伍，驻在咱们旅部对面。他们和南军联络上了，向咱们的旅部开枪，把咱们一排卫兵缴了械，现在枪声已经不密了，可是还在打呢！”

我说：“我带着1连小钢炮，配合上2团2营李培基的预备队，把朱泽黄打跑了再说。”

商震犹犹豫豫地说：“不知道他们有多少兵力，那一旅人也不知道在哪里，态度怎样，情况还没有摸清呢。”

王嗣昌说：“不把他打走，咱们怎么去城里住？他一兵变，

咱们就没有后路了。”

商震想了一想，说：“好吧。我和你们一块去。”于是商震和我带着李培基的预备队，还有一连炮兵，一同进了城。走到旅部附近，向朱旅一开炮，朱旅的人全跑了，不知去向。于是城里的变兵全肃清了，我们的军队没有什么损失，又把队伍带回阵地。

马济、韦永昌看我们防守严密，攻不动，就不再猛攻。一连几天，只有些小接触。后来，广西谭浩明又加上了一股队伍，战事才又激烈起来。商震连忙向长沙打电话，傅良佐在电话中说：

“已派阎旅牛团出发，即刻可到。”我们官兵一连坚守了十几天，士气已经逐渐衰落下去，现在听说援兵即日可到，就又振奋起来。

等了一天又一天，一直等了三天多，还没见援军来到。我就去找王嗣昌说：“世卿（王嗣昌字），援军说即日可到，三四天还不见来。是不是内中有什么变化？”王说：“你打算咋办？”我说：“咱们找启予吧。”我们二人一同进城，找到商震说：“咱们的队伍顶了十几天，连营长们都叫唤上了，援军还不见来。怎么办？”商震没有说什么，可是脸上似乎很不高兴。我们两人也不好说什么，就又回到阵地。呆了不过三四个钟头，传来了旅部的日日命令簿，上面写着：

“本军奉令死守永丰阵地，如敢私言进退者，以军法从事。”

我看罢，向王嗣昌说：“启予这是给咱们钉子碰呢。”王嗣昌说：“没关系，顶着干吧。”

又过了几天，杨爱源沉不住气了，向我说：“天天说，牛团即日可到。可是光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就是牛车，也早该到了，这是怎么回事呀！你们再去找找启予吧。”我说：“我不能找了，再去，要我的脑袋了。”杨爱源说：“咱们两个相跟着找团长去。”我俩一同找着王嗣昌。王说：“我在阵地不远的的一个绅士家里抽大烟，听说王汝贤、范国璋这两个人已经打出电报主

张停战言和了。也不知道确不确。”

杨爱源说：“这与咱有啥关系？”

我说：“傻子，关系太大了。王汝贤、范国璋是北京政府派来援湘的总副司令，他们停了战，咱们不是也好了么？”

我们扯了一阵，也没有结论。这中间我曾碰见商震。他说：“我派在长沙的留守司令丁鸿谋来电话说，长沙情况很好。我和督军公署打电话，傅清节的副官也说，援军早已出发，就快到了。咱们只有坚持等待援军。”

过了几天，王嗣昌又向我说：“我在绅士家里听说，自从王汝贤、范国璋发出通电以后，逼得傅良佐离开长沙逃走了。谭浩明已经从衡阳、湘潭到了长沙。衡阳一带驻有北军两个师，谭浩明经过时，也没有打。我想：哪会有这种事，一定是谣言。”

我大吃一惊说：“这还了得，找启予去。”我们两人一同来见商震，把上项传闻的消息一说。商震也着急了，连忙打电话找丁鸿谋说话，丁鸿谋也不知去向了。留守处有一个人接电话说：“傅良佐走了十几天了，临走时留下一个副官，傅说：只要永丰前线来电话就说牛团即可到，现在这个副官也不见了。”

商震一听，才知道自己上了傅良佐一个大当。当着我们似乎很难为情，莫可奈何地说：“咱们也往后撤吧。”决定当夜撤兵。

这天夜里我们按计划悄悄往后撤。马、韦的队伍也没有追击。从永丰撤到了湘乡，在曾国藩的祠堂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天放明，商震就让再往前走。全旅人马就以急行军的姿态往湘潭前进。离开湘乡时，我因钢炮携带不便，都沿途扔下了。

我们走得很急，一路上还不断遇见老百姓成群结队拿着铁锹、刀、矛之类拦截我们的去路，少不得还要和他们周旋一番。下半天5点左右走到了湘潭城外。湘潭是水旱码头，人烟稠密，市面相当热闹，士兵因为一天没吃饭，枪也没架，就向官长请求进城。我说：“不敢进城。王世卿的话要是真的，湘潭城还不早被敌人占了，还是在城外山上宿营比较妥当。”蔡荣寿极力主张

进城。营长们也都说：“一天没吃一点饭，士兵们都饿成这样子了。咱们进趟城，不用住下，买点吃的，让他们吃饱了，再出城，好好休息一夜，明天也好继续前进。”王嗣昌在旁一语不发。他平时就不大爱说话，这次的谣言是他听到的，他也不辨真假，就更不好插嘴了。商量半天，还是主张进城的居多。我说：“你们进城，我可不去。”于是，全旅的人都随着商震进城了，只有我带着几百名炮兵在城外一个山上小村子里住下，拿出些大米，叫老乡给我们煮饭。饭还没有煮熟，就听见城里面枪声大起。我一听，就知道商震他们准是遇上伏兵了。连忙把饭拿来，不顾生熟，就胡乱吃了下去，一面吃饭，一面派了个人到城门口打听消息。这个人不久就喘吁吁跑回来说：“四面城门都紧闭了！”我想：“关起门来打，好比瓮中捉鳖一样，这还有个跑！”也顾不得商震他们了，连夜带着我这几百名炮兵，向长沙前进。这时我们真如“丧家之犬，漏网之鱼”一样，慌忙往前逃命。

走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七八点钟光景，到了一个地方，名叫易家湾。我们正预备稍微喘口气，喝口水，便遇见了一支队伍，人数不过一连，却枪械齐全。遇见我们，便托起枪来，向我们做出预备放的姿势。其中有一个人拿着一把军刀，不问青红皂白，就恶狠狠地迎头向我劈来。我看刀光闪闪，已逼近我的眼前，无路可走，只有把两眼一闭，准备在他的刀下作鬼。说时迟那时快，还未容那人的军刀劈下来，就听见一个人大声喊道：“都是熟人，不要动手！”我一听声音很熟，睁眼一看，原来站在我面前的是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他是我在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唐生明笑嘻嘻地向我说：“子梁学长，受惊了！”我一见是唐生明，不禁暗自道声惭愧，大概我又有活命了。便问：“你怎么会在这里？”他说：“现在一时也说不清楚，总之，湖南的军队现在都变了，你们不是要往长沙么？也不必去了。还是奔岳阳吧。王金镜的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在岳阳，还是到那里去好些。”我这时惊魂甫定，如醉如痴，也不知道应当向他说些什么。还是唐生

明念在同学的情谊，替我考虑得相当周密。他想了一下说：“我可以送你坐外国邮船到岳阳去。不过，只限你一个人，还得请你把手枪交给我。你的部下我可以替你雇民船绕道湘江，送到岳阳。不知你以为怎样？”我连连称谢，顺手就把手枪取出交给了他。我的秘书、军需也要求随我同坐邮船，唐生明摇头表示不能办到。于是我一个人被唐生明派人送上了邮船。邮船停泊在湘江时间很长，我在船上远远看见我的部下坐上了民船，一桨一桨地款款向前开去。一直到中午以后，邮船才开出湘江，向北前进。

我安然到达了岳阳，进城找到长江上游总司令部去看王金镜。王金镜一见我似乎十分意外，噢了一声说：“你怎么回来了？”我就把上项情况，详细说了一遍。他说：“我已经得到了报告，你们的队伍在湘潭被南军俘虏了，听说正向武冈送呢。你们这一次大概全军覆没了，我给你一点钱，你先在岳阳住下来，收容你们的流散队伍吧。”

我在岳阳找了一家客店，叫做悦来店。我到了店里，洗了脸，吃了饭，便给阎锡山拍了一个电报，当晚又发了封长信，报告全军覆没的经过。这一天我还写了许多招帖，写明我的住址，在城门和街上冲要的地方，张贴起来，希望我的队伍和路过岳阳的山西部队能到旅店里找我。

我在悦来店住了一个星期，到岳阳前来找我的队伍有几百人，他们一个个衣裳褴褛，满脸风尘，连秘书、军需等人，也如此狼狈。他们说：“唐生明给我们雇了民船，从湘江开出，不过十来里地，就遇见一个卡子。卡子上驻有一连人，大概都是广西队伍，叫我们缴械，我们把枪缴了，一个人也没有伤，都被撵下了船。本想再坐船，怕又遇上卡子，只好顺着湘江边，徒步走到这里。”后来我们又住了几天，又收容了一些流散的山西士兵，便决意带着队伍回转汉口，再回山西。临行时，又详细地给阎锡山写了封信。

到汉口，住在人和栈，我又写了若干招帖。住有三四天光

景，听说商震也到了汉口，住在福昌旅馆。我到福昌旅馆一看，随他同来的还有他的军需官宫瑞生。商震见了我当时很高兴，却又似乎很惭愧，不象前些时那样器宇轩昂了。据他说，他脱险的经过是这样的：

他带着队伍进了湘潭城，不料中了敌人伏兵之计。敌人预计我们队伍必从湘潭经过，就在城里楼上楼下四面埋伏。我们军队一进城，便将四门紧闭，放起枪来，还有人高嚷：“缴械不杀！”大家措手不及，也没有抵抗，就都缴了械，老老实实作了俘虏。随后集中起来被送到武冈，押在当地的青年会里。由于商震会说英文，先和青年会的执事人搞熟了，随后又认识了会里的外国人，关系搞得很不错。商震就要求外国人设法营救。外国人开始答应把他一个人悄悄放回。因为款项都在宫瑞生身上，商震就要求把宫一同放出，随后再找机会把几个重要军官也陆续放回来，外国人一一答应了。这一天夜间，他们把后门打开，将商、宫二人放了出来。王嗣昌、杨爱源、蔡荣寿、李培基等人，也将陆续来到汉口，因为商震临行时曾和他们约定在汉口会面。

我和商震谈了一会。他神态萧索，没有谈起什么时候回太原，我一时也没有和他详细计划，准备等杨爱源等来后再说。我离开福昌旅馆时，宫瑞生悄悄递给我一迭交通银行钞票，我塞在衣袋内就走了。

回到人和栈，我又打了一通很长的电报，向阎锡山报告。第四天，陈效愚（名增智）就奉阎锡山的委派来到汉口。他找上我邀商震一同回去。商震当时唯唯诺诺，不置可否，只是再三说：“自己带队南征，全军覆没，实在对不住老总。”陈效愚不得要领，就回转太原去了。

不了了之

隔了一天，王嗣昌到了汉口，径自跑到人和栈来找我。他向

我谈的经过，和商震说的大致相同。只是他过去和青年会毫无关系，这次很感激青年会的救命之恩，再三向我说：“青年会很有用，咱们回到太原，一定要帮助青年会的事业，大大地发展发展。”过了一会儿，我就听见后院人声嘈杂，连喊“救火”，随后还有人大喊“救命”。我向窗外一看，外面已经烟雾弥漫。后院住的都是寄寓在旅馆的流娼，共有一二十人，不知怎么，酿成了火灾。我一看情势不对，忙说：“不好，着火了，快走！”我抢了一件短大衣披上就往外跑，王嗣昌赤着脚连鞋都来不及穿，随我一同跑出了旅馆。火势凶猛，眼看着人和栈付之一炬了。我们二人匆匆跑到福昌旅馆，商震看见我们这样狼狈，吓了一跳。忙叫宫瑞生替我们准备两套随身衣服和零星用品。因为福昌旅馆房价高，用度太大，我们就在附近另找了一家小旅馆住下。第二天，杨爱源、李培基也来了。只有蔡荣寿还没有到。

这一天，阎锡山的副官荣鸿胪又来到汉口，他向商震再三说：“老总说，军家胜败，古之常情。老总叫你们一定要回太原，老总决不怪你们。”商震当面一再表示：“多谢老总。”可是荣鸿胪走后，商震还没有动身的意思。宫瑞生向我们透露：“湖北督军王占元很赏识商震，想留他在武汉帮忙，而商震因为自己投到山西不久，这次出兵，就打了个大败仗，全军覆没，没有脸再回太原了。大概很想留在王占元这里。”

我听到这个消息，和王嗣昌一商量，便联名给阎锡山拍了一通急电，说明这些情况。没等荣鸿胪回转太原，阎锡山的副官长李德懋带着一个中校副官又来到了汉口。李德懋向我们传达了阎锡山的意思，表示他是奉命来迎接我们同回山西的。这一来，商震感到情面难却，也无法推诿了，这才同意，一路回转太原。

我们几个人一同从汉口到了石家庄，商震向李德懋说：“请副官长先回去，向老总报告。我们在这里等蔡荣寿来了，一同回去。”李德懋看见商震已经离开汉口，料想不致再有其他情形，便把中校副官留下，他一个人先回太原复命去了。

我们在石家庄又等了两天，蔡荣寿也回来了。第二天傍晚，我们就乘坐正太路火车回转太原。在太原车站，阎锡山派副官前来迎接，还备有一些马匹，我们几个人都乘上马径奔督军公署，那几百名残兵也有人分别予以安插。

我们到督军公署和阎锡山见面，事前我以为他少不得要申斥几句。不料他态度非常安详，从从容容地问了几句话，就说：“你们洗洗脸，吃饭罢。”这一天他准备了一桌非常丰盛的酒席，给我们“洗尘”。在酒席中间，阎锡山只和我谈些琐碎家常，提到湖南作战的事，他仅仅一笔带过。他说：“这一次战事，因为段先生和冯总统有矛盾，才发生这样的事。事先我一点不晓得，累得你们吃了一场苦头。”这几句，便轻轻把我们败战的责任卸去，大家似乎吃了一服安心丸。开始看见满席美酒佳肴，还有些食而不知其味，现在才放下心，饱餐了一顿。我曾问他：“王汝贤、范国璋的电报看到了么？”他说：“看到了。”我说：“我们那里却一点影子也不知道。”我没有再扯下去，他也没有往下谈，接着就又换了话题，谈起山西省近来一些生活上的琐细问题。我们是8点钟到的督军公署，一直到10点左右，阎锡山说：“天不早了，你们回去休息吧。”我们一个个才离开了督军公署。

这一次出征失败后，在山西军界，也引起了一些的变动。蔡荣寿因为作战不力，调到第4旅任第10团团长；杨爱源升任第1团团长；第2团团长仍是王嗣昌。

但自此以后，在山西军政界常说两句讽刺的话，一句是“大将南征胆气豪”，一句是“交枪没有收条”。这是嘲笑这次山西军出省远征的。

阎锡山投日反共见闻

秦 骊 张仲孚

1939年晋西政变后，阎锡山深感自己处境艰难，于是暗中与日寇勾结，欲借日本人的势力消灭解放区的八路军，以发展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实力。本文介绍了他如何派人与日伪政府勾结，如何将军队、干部送给日本人，以及抗战胜利后的情况。

关于阎锡山1939年12月晋西政变等详细情况，已由赵瑞和陈长捷等撰文，在《文史资料选辑》第29辑和第40辑刊载，不再重复。现在谈谈我亲自参与阎锡山与日寇媾和目睹的事实。

派干部去太原与日寇勾结

晋西事变后，阎锡山觉得处境艰难，三面受敌，形势孤立。如在西安之胡宗南时有打击吞并之势，新民起义后提心吊胆，时刻惧怕决死队八路军消灭他；侵略太原之日寇屡次威胁压迫他投降作汉奸。凡此种种，都给他很大压力，故在1940年7月，指示其亲信将领王靖国派长官部上校参议张仲孚，持王靖国的亲笔信，潜往太原找日伪“兴亚皇军”司令蔡雄飞联系，企求与日寇合作，共同剿共。（蔡雄飞原是晋绥军第19军68师副师长和王靖国系保定军官学校5期同学，与张仲孚是东北同乡，又有长官、部属的关系，私交密切。）信中云：“雄飞学长：前函奉悉，幹

旋合作，面陈会座（阎锡山），颇为赞许。特派长官部上校参议张仲孚，持函到并（太原）联系，请大力协助转介日方，顺利进行。详情由张面陈不赘，敬祝勋安。学弟王靖国手启。7月10日。”

在张仲孚由克难坡去太原之前，王靖国一再嘱咐说，若未见到蔡雄飞，要绝对保密，妥藏信件，万一在途中或在太原发生意外，速将信件撕毁。当时蔡雄飞的“兴亚皇军”司令部，驻防在孝义县属之兑九峪。张仲孚计划由隰县石口镇通过大麦郊，到达兑九峪。王靖国对张仲孚选择的这条路线不同意，认为大麦郊到兑九峪之间有一段路，是真空地带，八路军经常在这个地区活动，危险性大。王靖国决定，派其军部少校副官刘宗康，利用安清道门的关系，偕同张仲孚到洪洞县。他们找到当地安清帮、托洪洞县伪警察所长，起出良民证，于7月18日乘火车到太原，以商人的身份，住在太原市米市大街佛照楼旅馆。

张仲孚在7月20日下午见到蔡雄飞。因为王靖国给蔡雄飞的信，藏在张仲孚的被套里，当天来不及交出。张仲孚在蔡的家中吃完晚饭，到夜里十一点钟回到旅馆，决定21日上午8点钟将信送给蔡雄飞。不料在21日天明四时许，张仲孚被日寇宪兵队抓走。经蔡雄飞与日寇小林参谋交涉释放，当日上午9时，由日寇宪兵队长陪同张仲孚会见了小林参谋和蔡雄飞。12时许回旅馆取出王靖国的亲笔信，交给蔡雄飞。当天下午7时许，由小林参谋和蔡雄飞，陪同会见日寇山西派遣军军部筱冢参谋长，并设宴招待。筱冢表示：他从前在包头时，和王靖国、赵承绶很熟识，现在很愿意通过王靖国的关系，早日和晋绥军达成友好协议，共同剿共。9时许举行会谈，筱冢提出一个双方合作草案，指定阎属第7集团军，赵承绶部驻晋北原平、崞县一带；第8集团军孙楚部驻晋南临汾、运城一带；第13集团军王靖国部驻晋东阳泉娘子关一带；阎锡山的长官部驻太原；直属部队驻榆次、太谷一带；并欢迎阎锡山到北平就任华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职，主持华北大局。太原长官部由副长官杨爱源主持。日军部队转移到外线，内

线防御另由晋绥军负责绥靖地方。并抽调一部分晋绥兵力，配合日军进行扫荡，消灭山西境内之八路军。

这个草案由张仲孚带回克难坡。张仲孚走出日寇军部大门，正遇伪省长苏体仁派秘书坐汽车在门外等候，接张到苏体仁公馆。苏体仁一再表示，日军确有诚意，希望阎锡山从速与日寇达成协议，早日脱离蒋介石政权，返回太原，恢复力量，和日军配合肃清山西境内之共军。次日筱冢参谋长派人送来夏布，各种罐头、洋酒和雪茄烟等，大批礼品分送王靖国等。

后来王靖国又派长官部少将参议兼平遥县长白太冲，到太原回复日寇所提的合作草案，通过蔡雄飞达成汾阳协议和阎锡山亲自参加的安平会议等协定条款。

派部队投敌改编为剿共军

阎锡山阴谋派部队公开投日反共，又怕社会上广大群众舆论攻击，便耍了个花招。他令驻孝义县之骑兵军军长温怀光，派部队深入沦陷区（日占区）抢征食粮，一面暗中派人指示蔡雄飞通知日寇，届时派日军包围，以便改编为反共部队。温怀光即派他所属骑1师师长赵瑞、骑4师师长杨诚，率部深入到平遥、汾阳之间日占区，净化村附近抢征食粮。日寇早有准备，从汾阳、平遥、介休、分路出兵，将赵瑞、杨诚两师部队，包围在净化村。当时赵瑞、杨诚不了解阎锡山投日阴谋，还电请阎锡山派部增援解围，但援兵不到，日寇紧逼村沿。赵、杨两师长根据阎锡山曾讲过“存在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的话，立即派副师长段炳昌手持白旗向日寇投降。日寇令他们先行放下武器，并将官兵4000余人运回太原市内后小河营房受训。经过一个月训练，编为山西日伪剿共军。赵瑞编为第1师师长，杨诚编为第2师师长，每师辖两个团，没有军部。日寇为了方便掌握这两个师的伪军部队，由太原日军军部派一个中佐参谋，带一排日本兵，组成剿共军指导

部，实质上这个中佐参谋就是赵瑞、杨城两个傀儡师长的太上皇。因一切粮秣、被服、武器、弹药等，均经过这个指导部批发补给。赵瑞之第1师开往沁县、襄垣县的盘镇，在日军指挥下反共；杨城第2师开往晋东南陵川县、长子县，在日寇指挥下，反共反人民。

蔡雄飞曾经亲自和我谈过，他说赵瑞、杨城二师投日是阎锡山准备回太原与日寇合作反共的条件，但抗战区人民，还不知道这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

派干部进入日伪政府

1942年春，阎锡山令我回太原，帮助汉奸省长苏体仁整改山西日伪警备队，他说：“如果你能利用这个机会掌握些部队，到抗战胜利后，够一团编一团，够一师编一师，够一军给你编一军，这叫曲线抗战。”我未经考虑就接受了这个卑鄙任务。到太原后，经齐骏鸣（阎日联络代表）介绍与伪省长苏体仁晤面。他把当时山西全省日伪警备队现状作了介绍。他说，全省辖四个道，共计八十多县。每县警备队有的三个中队，有的四五个中队不等，（每中队相当一个连）每县由县长兼大队长，另设副大队长一人，由当地日军派指导官一二人。他准备增加省道机构，统一领导，让我拟一编制计划草案。

到5月初，我把这个草案送交伪省长苏体仁，他说，日本军部尚未通过，需要和当地日寇驻军研究才能决定。不料，6月间的一天拂晓，我生病在床，睡梦中，日寇宪兵队数十人突然包围了正丰饭店，闯进我的住室，将我逮捕，同时将饭店两位伙计逮捕。在太原，凡是和我认识的朋友，都被逮捕，共30余人。经过20余日审讯，严刑拷打，就逼我带三部电台，到太原做谍报工作。我把我怎么来的情况向他们说明，就又把转移到日军部管押（地址在坝凌桥8号原荣鸿庐公馆），我一看在这里管押有百

余人，大部分是阎锡山派来作各种类型工作的人。一直到8月间，才被释。

正在这时，日伪警备队，由警务厅组织警备队干部教育队，准备增编省保安队司令部和道保安队指挥部，让我们也参加了三个星期的训练。1942年9月初，伪山西保安队司令部开始增编，司令由伪省长苏体仁兼，副司令由蔡雄飞兼任（司令部编制相当军部编制）；全省有4个道，每道增编保安队总指挥部，道尹兼总指挥，另设副指挥一人。雁门道保安队副指挥秦良骥（秦骧的号）；河东道保安队副指挥汤家模；上党道保安队副指挥张龙华（前刘茂恩军师参谋长）。保安队司令部编直属干部学校一所，招收学生培养下级干部；各道指挥部，直属干部训练所一所，轮流训练现役干部和军士（指挥部编制相当师部编制）。日寇为了便于掌握监视，在保安队司令部设专职名为辅佐官一员，由日寇退役中尉城野宏担任，他自定为保安队少将辅佐官。每道保安队设指导官一二名，由当地日军派现役中、少尉充任，全省保安队及一切伪军，都归日军部少佐参谋岩田清一负责掌握。各县的保安队虽撤去当地日驻军派的指导官，但一律由日寇县顾问兼指导官。所谓指导官，是专门掌握监视那些傀儡司令、副司令、指挥、副指挥等人言行的，稍有嫌疑，即行逮捕，并以通共产党罪名，用刺刀挑、警犬咬、活埋等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致死。

据我所知，阎锡山先后指派到日伪保安队中上级军事干部20余人。这些人，被阎锡山陆续派到日伪区，掌握伪保安队，插入中下级干部，起了反共反人民的桥梁作用。

从1943年春天起阎陆续派大批中下级干部到太原。除一部分经他住太原办事处政治代表靳祥坦与日寇直接联系安排工作外，还有许多不经日寇联系，由阎直接指示日伪省道保安队负责人，设法安插尤多。

1944年春，阎锡山给伪省长王骥一封亲笔信，云：“你我患

难多年，现仍是同舟共济，行者居者同样有功，并希加强防共，县与县组织联防，以免共产党利用县与县边境活动。”王骧对这封信感到非常兴奋。有一次，王骧对我说：“拟撤换保安副司令蔡雄飞（蔡系东北人）职务，让你接替。”但经过和日军部研究，他们提出要剿共军第1师师长赵瑞接保安副司令职。过了不多时，蔡雄飞调伪山西省府参事，赵瑞接替伪保安副司令，与王骧研究征得日军同意调整保安队组织机构，进一步加强了反共措施。各道保安队划分联防区（三县或四县划为一个联防区），选一核心县县长，为联防区联队长，另增设副联队长一员，联队部相当一个团部组织（雁门道就组成8个联防区）；除此外，保安司令部又增编2个直属大队，各道指挥部增编1个至2个直属大队，每大队500余人（相当一个营），经常控制在省道作为机动队。总而言之，建立联防区增编直属大队，代替日寇接防反共。日寇逐次抽调兵力，增援南洋群岛，对英美作战。

1945年春，阎锡山派前骑兵军军长温怀光，秘密到太原改编伪保安队及剿共军，加委赵瑞为新编军第1军军长，秦良骧为第1师师长，李勃为第2师师长，汤家模为第2师师长，杨城为新编第2军军长，段炳昌为第4师师长，何焜为第5师师长，邢震华为第6师师长。1945年7月底，伪保安司令赵瑞，调集保安队省道直属大队3千余人，由他亲自指挥讨伐。名为在晋中交城、文水、平遥、祁县、徐沟讨伐共军，实质是接受了阎锡山指示，经常与阎管区保持交通联系，不断扫清这几县八路军地方武装。正在赵瑞讨伐之际，突然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原的日寇如丧考妣，将储藏的军火物资，日夜进行破坏。爆炸声隆隆不绝，人心惶惶。此时伪省长王骧深恐八路军先行进驻太原实行接收，而保安司令赵瑞又讨伐未返，便令我担任太原城防，并派人调赵瑞率保安队火速返太原，以应情况突变。我立即派人星夜骑自行车到徐沟北转达，次日早晨赵瑞率队赶返太原。在太原的日寇眷属，误认为八路军进城，万分惧怕，纷纷逃出城外，在山沟

露宿。日寇军部通知眷属勿惊，一面阴谋收缴保安队枪枝，一面由榆次调来一个联队，分布在太原各城门。日军部通知伪保安副司令赵瑞：次日7点所有在太原城内的保安队集中在东门里体育场，听候军部点名。次日早晨发现各街要道口架设机关枪，城门紧闭。当时赵瑞召集紧急会议，经研究，认为日寇利用点名要缴保安队的枪。于是商量对策，决定主要干部不参加点名，把现有保安队轻机枪及体力健壮部队留一半，不参加点名，全副武装在原地待命，令我化装出城，指挥城外营房阳曲县保安大队及剿共军干部教育队。如果城里发生冲突，听枪响，便从小北门攻进城内接应，城里撤出城外，占据东西两山上，以便与阎军楚溪春北上大军联系。日寇发现应到保安队人数不足半数，主要干部很少参加，便发生了怀疑，临时改变计划，捏造了个假情报说，现太原西山河口一带，发现八路军8000余人，距太原只60华里，命令保安司令赵瑞率城内所有保安队迅速开出城外，在汾河西岸大小柳树一带布防，这场风波才算结束，为阎锡山保住了4万余人的保安队。

“固守”临汾纪实

梁培璜

作者是阎锡山的得力部将，曾任过国民党第6集团军副司令等职。1947年底，他奉阎锡山之命固守临汾。为此，他采用各种措施进行顽抗，甚至不惜用最残酷的“焦土政策”、投放毒弹等手段，与人民解放军对峙达数月之久。这里作者叙述了几个月中顽抗的具体经过。

抗日战争刚刚结束，蒋介石便妄想把中共抗日武装部队从日寇手中解放的地区抢夺过去。当时，在山西方面，决定由阎锡山负责“打通”正太铁路，由胡宗南负责“打通”同蒲铁路。侵占这两条铁路沿线的解放区以后，再向全省扩张。山西方面的内战，便是在这样一个阴谋下开始的。

我在抗战末期任阎锡山部61军军长，一向驻防晋南。胜利后，负责接收临汾。临汾是晋南的重镇，在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和抗日战争初期，这里一向是晋南的政治和军事的中心。

国民党整编部队后，以军改师，我改任61军副军长，由原任第13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为军长。蒋介石发动内战不久，又实行扩军，我先后又担任过阎部第7、第8和第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晋南地方武装总指挥，仍驻防临汾。

1946年夏秋间，阎锡山便将驻防晋南、晋北的部队逐步调往太原附近，准备集中全力以实现他“打通”正太铁路侵占沿线解放区的阴谋。王靖国奉令将驻临汾部队带走时，他突然向我跪下

去磕了一个头，连说：“临汾重托给你，希望你务必保全它。”我当时真是受宠若惊，不知所措，只好连连答应一定遵命照办。他这一手，的确对我起了很大作用，使得我决心以死相报答，誓保临汾。

当时晋南解放区范围很大，同蒲铁路以东都是老解放区。胜利后，阎锡山只从日本人手中接收了几个大点的城市，王靖国将部队带走以后，我便积极着手整理晋南地方武装团队，以增强我的实力。

胡宗南进犯晋南及撤军经过

1946年7月上旬，胡宗南派他的精锐基干部队整编第1军军长董钊，率部从陕西强渡黄河进入山西运城，准备向晋东南解放区和沿同蒲铁路沿线推进。阎锡山于胡部进入山西后，即加派我为太原绥靖公署驻临汾联络处主任，负责与胡部进行联系，以便协助与配合胡部进犯解放区。董钊刚到运城，我即赶去欢迎，并为之切取联络。

我和董钊见面后，他提出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胡宗南决定的一个名单交给我，要求撤换原来由阎锡山所委派在晋南的大批专员和县长。我接到这个名单时不知应如何答复，便与驻在运城的太原绥靖公署晋南行署主任裴深研究。我们认为胡宗南这种作法是包藏祸心，想趁机抢夺山西地盘，如果此例一开，一切都完了。

阎锡山在同意蒋介石派胡宗南部队进入山西的时候，便已料到了一定会发生这种情况，早有一个决策，只能“放弃军权，一定要保持政权”。我和裴深便决定，对董钊交下的人一个也不接受。但为了不在这个问题一开始就和他们闹意气，决定由我委婉回复董钊说：“原有在晋南的行政专员和县长，对地方情形都非常熟悉，目前正是用兵的时候，为了有利于配合部队作战，暂时不宜更换。如果你们能从八路军手中抢到一个县，即由你们委派

县长，抢到一个行政专区，由你们派专员，再由山西省政府承认加委。”这样既没得罪他们，又保住了政权，同时还可以鼓励他们加速去进犯解放区。

我把董钊从运城接到临汾不久，胡宗南便兴冲冲地赶到临汾。他来了，便不断找我和许多人了解有关晋东南八路军和解放区的情况。当时他非常骄傲，常常大言不惭地说他对“打通”同蒲铁路有很大的把握。

胡在临汾作了一个多月部署，便亲自指挥第1军第1师第1旅，于9月间从临汾东面沿临汾、浮山公路进犯解放区。我即指派浮山县县长亲率该县保安团充当向导，并打头阵。走到离临汾30多公里的上阳、官雀时，即碰了解放军。这个一向为胡宗南所吹嘘的“天下无敌第一军”的第一旅，虽有全部最新式的美械装备，一下就被解放军和地方人民武装打了个落花流水，全部被歼灭，连旅长黄正成、团长刘玉林……等都当场被活捉。胡宗南原以为拿出这支“王牌军”一定可以“旗开得胜”，结果却变成“出师不利”。当时使得胡、董、连我在内，都大吃一惊。解放军这次对胡部进犯的严厉惩罚，并没有使胡等接受应有的教训，最后他把这次失败归咎于许多客观原因，并迁怒于地方和他配合不力。

东犯失败不久，董钊又亲率第1师由临汾西犯解放区，结果又同样被解放军打得一败涂地，又把副旅长陈诚武和旅参谋长以及师部军需处处长等给活捉去了，还俘虏去了几千人，连团长打死了好几个。

东西进犯接连失利以后，胡宗南便悄悄地溜回陕西去了。只留下一个整编第30师鲁崇义部，驻防临汾。

阎锡山的打算

董钊率领所部离开临汾以后，反动派再也没有力量向解放区

进犯了。到1947年8月间，鲁部一个整编旅准备开赴宜川，留在临汾的仅有的一个师也在开始抽调。过去我指望胡宗南“打通”同蒲铁路，使临汾不致成为一个突出的孤点，现在连靠他帮助守住临汾也没有把握。我不得不于8月10日飞往太原，向阎锡山面报请示。

当天下午，阎锡山设便餐招待我，并叫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等几个总司令作陪。饭后，阎对我作了一番指示，原话大意是这样：我希望你在临汾象大同的楚溪春一样，用一个师为基础，守下临汾来。我让王靖国给你挑选一个师，开到临汾去，作为基础。同时，准你在临汾成立与正规军团级一样的补充团，能成立多少就成立多少。所用干部，让王靖国帮你在军官团挑选，用飞机送去。所需武器装备，由你在临汾库存中先行动用，再行报备。另外，你在临汾所指挥的十几个地方保安团，也可以逐次提升为正规军。以上这些，是为了使你用一师为基础，逐次扩大，能编一个军就编一个军，能编两军就编两军，用来保守并扩大临汾。至于晋中方面，我最少能抽出两个军，准备随时对临汾援助。

他说完这段话以后，又很慨叹地说：“我对于临汾，因为有了抗战期间的关系，实在把它作为第二个太原来看待的。我很希望你能够扩大临汾，将来我每年去到临汾小住，于愿足矣！”我听了他这些话以后，当时只是唯唯答应。赵承绶连忙在旁帮腔打气说：“太璞（我的别号）你去干吧！在必要的时候，我来帮你。”

这次我在太原留了一个月，忙于向各方面接洽办理有关回临汾扩充部队的问题。这时王靖国是6集团军总司令，我是他的副总司令。他依照阎的指示，选定了66师，准备开赴临汾后，即将师长姜福生调升为61军副军长，准备在临汾扩军时去当军长，师长空缺由副师长徐其昌升任。我提出先成立两个补充团，把61军留在临汾的小部队都参加进去，他们也同意了。所需干部，经王靖国和我一同挑选了二百多名编余军官，先分批用飞机送走。

我离开太原时，向阎锡山等辞行，他们又勉励了我一番，无非还是叫我要想尽一切办法把临汾守住，保持晋南这个重要据点。

扩军、构筑工事、抢粮

我于9月10日从太原飞回临汾。10月下旬，胡宗南又来抽调驻临汾部队。整30师师长鲁崇义，奉命带了一个整编旅，空运西安。这时，胡部仅有一个整编第30旅和重炮兵连、辎重团等留驻临汾，由旅长尹澶洲负责领导。

临汾原来由鲁部担任城防守备。胡宗南先后抽走该师两个整编旅以后，当即显得空虚起来，我不得不积极着手加强和成立部队，准备配合胡部去临汾设防。首先我把一些杂七杂八的部队拼凑起来成立了两个补充团，由董再孝、储锡麟分任团长。其次是对12专区（临汾专区）专员王正平所统率的两个保安团、临汾县保安团等，加发了一部分重机枪、迫击炮等武器，充实了装备。这是开始对扩军作应有的准备。

王靖国调赴临汾驻防的66师于10月间才由文水县向南开拔。走在祁县附近，该师汤家模团的副团长曹某，突然率领该团一部分人起义，将一个企图顽固反抗的营长打死后，投向了人民解放军。由于这一原因，该师直到12月初才到达临汾。原来预定来临汾当军长的姜福生，也没有同来。这样，扩军的事只好推迟下去。

66师到达后，我当时认为有两件大事必须马上同时进行：

第一件事，是要迅速完成“固守”临汾的工事。最重要的是必须在临汾城城壕外加筑16个护城碉堡，在东关外加筑10个，使这些护城碉与外壕工事联成一体，相互配合起来，作为第一线工事。其次，是除在城墙上构筑暗工事外，还要在城墙腰上再筑一道暗工事。因为临汾城墙很宽厚，能并行两辆卡车，在城墙腰上

筑的这道暗工事是最坚固的，这是第二线工事。另外，还在城内自来水塔上和鼓楼等较高的建筑物上面，建立起各种观测所，以便指挥炮兵，并建立好炮兵射击网图，作为第三线工事。那时我认为只要把这一系列的工事完成后，“固守”临汾，便有相当把握。一经决定，我便亲自督率，不分昼夜，加紧赶筑。当时整30旅也完全听从了我的安排，工程进度很快，到1947年年底前后，便基本上完成了。

第二件事，是加紧抢劫人民的粮食。阎锡山对所部军粮一向是叫部队主管官直接去向地方搜刮的。这时在临汾的部队和由吉县、蒲县等处逃来的保安团队，都要负责供给粮食。因此，我决定叫66师师长徐其昌以该师的一半人去临汾担任构筑工事，另一半由徐亲自带领去襄陵，分别支援吉县专员苗雨田部和蒲县专员郑继文部去汾城等地抢劫粮食。这些部队在抢粮的过程中，穷凶极恶地向人民勒索，逼死了不少农民。我当时是只要能把粮食抢到手，也就不管人民死活了。到1947年年底，抢来的粮除供给驻临汾的部队和机关需用之外，还有大量的存储。

部队组成情况

1947年底运城解放以后，解放军和晋南人民武装部队，便向临汾采取了大包围形势。到1948年3月初，就越迫越近。正在这个紧急关头，胡宗南又要把最后留在临汾的整30旅全部调回去。

3月5日，旅长尹澧洲来见我，说他已经得到命令，定于3月7日开始分批空运，当即进行城防交代手续。7日，西安派来10架运输机，尹澧洲带了一个步兵营飞走了；8日，又来10架运输机，准备再装走一营人。正在装运时，包围临汾的解放军从东南方面连续不断地向机场发射重迫击炮弹。当即有3架飞机命中着火，其余的飞机驾驶员一看不对，连忙起飞逃跑。这样一来，整30旅其余的部队便无法运走，只好仍然留在临汾，改由该旅副旅长谢

锡昌暂代旅长职务。

临汾地区原来还设有一个军事总指挥部，由我负责。我当时以情况紧急，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将在临汾所有部队均归入“临汾地区总指挥部”的系统下，从事作战。当时计有：整编第30旅3个团（不足之数由辎重团顶补）；第66师3个团；新成立的两个补充团；临汾专署两个保安团；临汾、襄陵、浮山、安邑、夏县等五个县各有1个保安团；此外还将蒲县专署两个保安团合成1个团；吉县专署也是两团合成一个团，共有19个团，约两万人左右。这些七拼八凑的队伍中，只有整30旅装备较强，但由于他们欲走未成，人心很不稳定。66师虽可靠，但装备不甚好。其余的那些保安团，不但装备差，大都没有作战经验。

我决定从3月8日起，完全防守临汾城关护城壕以内的全部工事和车站等若干据点，以减轻伤亡，并将这一部署分别报告阎锡山和胡宗南。

3月10日，王正平向我建议，为了更好地动员全城人力物力，最好组织一个“保卫临汾总指挥部”把党、政、军等都包括进去，成立一个统一机构。即将原来由董钊、鲁崇义、尹澶洲等所主持的“党政军联席会报”和由裴深和我所主持“临汾领导小组”都合并成为一个整体，以便集中力量，“固守”临汾。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由我担任保卫临汾总指挥，以66师师长徐其昌、整30旅代旅长谢锡昌兼副总指挥，成立一个办公厅，由王正平为主任，下设秘书、赏罚、人力、供给、情报、防毒等组，把一些逃到临汾的专员、县长等都安置在里面。

3月下旬，我给阎锡山一个电报，大意是说：如果让临汾继续成为一个孤点，最后必无法应付。因此，我建议他早日商同胡宗南速派兵恢复运城据点，以分散解放军的兵力，使临汾减少压迫；并请他补充一次兵员和粮食，作持久准备。阎复电说：“建议甚是，但我意必须固守临汾，只要你能固守到一个月，我必有办法来支持你。”我当时接到这张空头支票，还认为阎当真会有

什么办法来支援我，内心很高兴。不料过了两天，在太原的杨爱源、赵承绶、王靖国、梁化之和“铁军分子”多人纷纷来电，主要内容几乎一样，都是要我“为保卫太原而固守临汾”，另外便是一套大道理，好象怀疑我没有决心守下去。我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这就是阎锡山“支援”我的好办法。同时，我也意识到，太原同样是被解放军包围，他们自己正在自顾不暇，哪有力量来支援我？因此我复电王靖国说：“今后我将一意作战，不再提援救临汾之事。”以表示我有决心“固守”下去。

当时临汾城外解放大军云集，我们再无法出去抢劫农民粮食。城内存粮估计至多只能维持到5月中旬。我只好通过整30旅的电台，向蒋介石请求，要他从5月中旬起，向临汾空投面粉一万袋，同时电阎备案。

“焦土政策”与“死命顽抗”

临汾专员王正平，自被阎锡山提升为晋南行署副主任以后，反动劲头更足。他曾给阎锡山一个电报，说临汾战争开始后，他决心实行“焦土政策”，不惜一切以抵抗解放军，并倾其全力以协助我固守临汾。阎复电大加褒奖，说他以一文人，能够实行焦土备战，英勇可嘉。我看到这一电报后，也就以焦土政策的彻底执行者而自命。在这一反动到极点的思想支配下，使我造成了以下种种的滔天罪行。

解放军主力从3月8日开始对临汾缩小包围圈，从东南方面进攻尧庙飞机场。经过一昼夜激战，即将机场占领。我为了保持临汾对外的联系，使此孤城仍可依靠空运得到接济，决定在城内修建一个飞机场。10日，王正平亲自去寻找适当地点，选定了鼓楼东北一个7百多公尺的空地。我认为至少得1千公尺，才能使小型运输机降落。于是，我让人把需要用的地段划出来，所在区域内的民房，由县政府派人登记后，公家出一张借据，言明等

战事过去，再照原样归还，拆下来的材料，均由公家使用。当时划定拆除的民房有40余间，立刻派兵将居民赶走，把房屋拆除。经连夜赶修，到月底，这一机场就完工了。4月4日，临汾空运又得到恢复。

从3月下旬到4月初，解放大军主力部队向东关和电灯厂、车站等处猛攻。东关外第5号和第3号护城礮，坚持顽抗。双方争夺激烈异常，伤亡很大，两礮得而复失者数次之多。我因外无援军，内又空虚，每天死伤几十名到一百多名，怕不好坚持，便于4月4日两礮最后一次被解放军占领后不再去争夺。而企图在东关东门内又拆去一段民房，赶筑了第二道工事，使东关城上第一道工事与这新筑的工事相互配合，使第一道工事更加坚固。当天，阎锡山派来的61军副军长娄福生刚到，我即委派他为保卫临汾总部副总指挥，叫他在东关负责办理此事。这次预计要拆民房2百余间，虽有保安团士兵催逼居民拆迁，但进度很慢。

4月9日，这一线工事刚完成一半，当夜解放军即突破两处，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将东关解放。10日拂晓，防守东关的66师由城东外壕退入临汾西门，经我清点人数，全师只剩下1400多人。我便找王正平和娄福生总结这次东关失守的经验，认为主要是拆除民房构筑工事进行得太慢。应对临汾东城毗连东关部分的外壕立即加强，并积极着手去城内构筑第二线工事，同时设法补充兵员。

当时我只将东关战斗的激烈情况和失守经过向阎锡山报告，同时说明我将继续“死守”临汾。我那次虽未向阎请援，他也感到情势危急，回电时主动提出，决定派高倬之、沈端两军立即向灵石集结，准备救援临汾。我得到阎的这一复电，大喜过望，马上就公开出去。一方面借以鼓励士气、安定人心，同时也希望解放军把主力抽调去打援，以减少对临汾的压力，使我获得喘息时间，调整防务，补充兵员，最重要的是抢构工事。

解放军方面可能也得到了阎将派部队增援临汾的情报。不久

即发现其主力向赵城、洪洞方向移动。临汾战事立即缓和下来。我把解放军调动情况电告阎锡山，叫他通知增援部队，严密注意解放军的打援。

此时我趁机，将大部分保安团队拨补66师和整30旅，并把没有饭吃的学生和从别处流亡到临汾的青年，都强迫他们去66师当学兵；另外还叫县党部和部队政工人员到后方医院去鼓励动员轻伤病员重上火线；同时，还重新调整了全城防务，以临汾东门到西门为分界，以66师守北半部，以整30旅守南半部，共同对付解放军主力。为了鼓励士气，我又给了30旅13亿元，给66师7亿元。他们当时都觉得太多了，我认为必须重赏，才有“勇夫”。过去阎锡山对经费控制很严，那次对临汾却特别放宽，他专门派了一个上校部附栗瑛与少校军需王以正主管经费，当时商民兑往太原的钱都存在临汾，留供部队开支，直到临汾解放时还存有现款40多亿，掠夺之巨，由此可见。

当时最重要的还是加紧构筑工事，我决定再拆毁民房800多间，以坚固房屋作为基础，迅速构筑成与城墙等高的第二线工事。当时由姜福生负责督修，不分昼夜地进行。一星期后，解放军主力从赵、洪再度转向临汾时，这一道工序基本上赶筑完了，其他方面的部署和准备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

在构筑工事的同时，还配合使用了“地道战”，以加强对临汾的守备和对付解放军的地道战。我过去还不懂得这一套，这是1947年底运城解放，城内不相统属的守军三个团被全部歼灭时，安邑县长张毓桐、夏县县长侯辅国率领了他们的保安团逃到临汾告诉我的。张毓桐的保安团参加过地道战，我把他们配属于第一线工事，以外壕打地道去听音，并作基线地道构筑。解放军进攻东关，便是利用地道推进至地堡，攻略防御工事。除了车站外，其余地方都是以地道对付地道，反复攻夺。双方的地道经常在半途碰在一起，互相对炸。双方这样挖过来挖过去，前后碰头对炸达50多次，战事的激烈由此亦可想见。

由于当时逼得很近，解放军经常在前线喊话，我也学到这套办法，去向解放军喊话。因为66师在祁县附近起义的部队中，有曹副团长的家眷被扣留在临汾。这些起义部队都随解放军去临汾作战，是熟识的。我便针对这些人去进行喊话活动，但没有起什么作用。

滥事轰炸、发射毒弹

阎锡山派部队增援临汾只是一纸空文，当时他手上能机动使用的部队仅仅两个军，一听说解放军准备打援又不敢前进了。当时临汾的确很紧急，阎便改派飞机前来轰炸扫射，企图减轻解放军的攻势。当时阎手上只有两架轻轰炸机和几架战斗机。我便要求它们每日早晚各来一次，除向解放军进行轰炸扫射外，还要求他们在临汾上空多作盘旋以鼓舞士气。

与此同时，胡宗南方面也派来更多的轰炸机和战斗机，还有两架夜间来轰炸的飞机。这两架夜间轰炸的飞机带的炸弹很多，可以盘旋轰炸3个小时以上。这样日夜都有飞机在上空助战，轮番轰炸，使解放军大部队的活动受到很大影响。我当时最害怕解放军夜晚进攻，总是利用对空报话两用机亲自和这些驾驶员联络，尽量留他们在上空飞行，让他们不断投掷照明弹，并让他们控制炸弹，在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时候才进行轰炸。

当时虽有这两方面的飞机天天前来，日夜在上空助战，我仍以为不足，又多次去电阎锡山要他向蒋介石请求，增派重轰炸机前来。当时在北平的重轰炸机较多，经我请求后，蒋同意了。如临汾东关被解放军占领后，即由北平方面派来重型轰炸机一队（5架）到临汾作区域性轰炸。东关房屋密集，成排的炸弹集中投下去，烟尘起处，屋瓦飞扬，血肉横飞，肢体遍地。每次炸弹声音刚过，一片呼娘唤女的惨叫声和哭喊声在城头上清晰可闻。我记得，当时有人向我说，那里解放军不多，大都是老百姓，我

还回答说：“谁叫他们不走，炸死一些有什么关系！”当时我根本不管人民的死活。

在“固守”临汾的过程中，更加灭绝人性的是还发射毒气弹和使用毒气。我原来没有这些东西，1948年3月中旬，在临汾城内修建小飞机场时，挖掘出日寇在投降时埋藏的日本三八式毒气山炮弹一大堆，我非常高兴，立即电阎锡山请准整理后留临汾备用。经过整理，可用的有140枚，惟弹头的雷管已全部烂坏。我再次电阎请求补充。平日向阎要东西，他从来没有这么痛快。这次隔了几天，机场还没有筑成，他已派飞机前来空投了。不但所需雷管如数照发，还另外送来8枚装有雷管的同一式样的毒弹作样品。因空投时有两包落地时自行碰炸，损失4枚，其余144枚全部交与66师山炮营。当时我特别说明：“非经我下令，不准随便动用。”

我第一次使用毒弹是3月底。记得这天黄昏时，解放军主力正发动攻势，我得到参谋的报告，说解放军大兵团现正经过车站西北方村庄向东移动，目标甚大，想系进攻东关。我认为这是使用毒弹的时候，即令山炮营迅速向那个地区发射毒弹10枚。因发射后天已黑下来，观测不清楚，效果如何无法知道。

4月下旬，66师防守的东城外一个小据点被解放军攻占。这是防城工事第一次被解放军所突破。我命姜福生督率66师一部分士兵，务必夺回这个据点。他正在准备使用炮弹时，我又决定让他使用毒弹20枚和山西土造重磅炮弹20枚，以配合进攻。扼守这个据点的解放军，虽被毒弹和重磅炮弹猛烈轰击，伤亡很重，仍然坚守，我们没有抢回来。

使用毒气，是在3月下旬才开始的。一次我主持开会时，有人提出，手榴弹上面绑上辣椒面，炸开时可以使人咳嗽流泪，难过异常。我认为这是好办法，可以仿效。当即由王正平命令临汾县政府大量征集辣椒面。不料分发到部队后，士兵都拿去调菜吃了。王正平叫人将辣椒面掺上煤油，士兵分到后，却用清水洗过

吃。辣椒面已将搜尽，无法补充。王正平又向我建议，在总指挥部办公厅添置一个“防毒小组”，找几个人来制造毒气，以代替辣椒面。我同意了。不久，王找来了日伪时期当过临汾伪县长的李植三。他懂得一点制造毒气的方法。我起用了这个汉奸，把他委派为总指挥部防毒组长。他家存有一批杀虫药，我全部收购。另外还找到临汾师范学校化学教员段某，叫他把该校储存的化学药品中，凡可制造毒气的也都拿了出来，和李植三一同制造毒气。没有几天，第一批液体毒气制造成功。他们送给我看时，是用一斤装的空酒瓶装满毒液16瓶。我叫人马上试验，将毒液分装在小瓶内，绑在手榴弹上，抛掷出去与手榴弹同时爆开后，果然毒气熏人，比辣椒面的效果高得多。我认为很好，便决定叫他们继续赶制。到临汾解放前夕，这种毒液共制出了五批，均由参谋处中校参谋张瀚分配给各师旅参谋，转发给士兵使用了。

在阻碍临汾解放的战争中，这批毒气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使进攻的解放军遭受了不少损害。当时我实在是有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

疯狂顽抗 终于被俘

临汾自1947年底被解放军包围后，就不断发生战斗。从1948年3月8日起，解放军主力便大举进攻。我“固守”临汾数月，一切灭绝人性和惨无人道的办法都使用了，也无法挽回失败的命运。临汾解放前夕，死尸遍地，全城已无一处完整的房屋，连地也被掘得到处坑坑洼洼，这是我实行“焦土政策”的重大罪行。到了5月17日，城内粮食已全部吃光，军队断了粮，居民更多日不能举火。我要求蒋介石从16日起空投面粉一万袋，一直没有消息。这时，真正的弹尽粮绝，精疲力竭了。但是我受了阎锡山“铁血团”组织的影响，明知临汾解放是旦夕之事，仍图作最后顽抗。

17日下午6点钟，解放军采用地道爆炸的办法炸开了东城北部城墙200多公尺后，即蜂拥冲入城内。我当时还下命令给66师务必倾全力逐线防守，不能轻易撤出其他据点。

夜间，胡宗南派来的轰炸机到达上空时，我仍与他们通话。因解放军已经入城，无法进行轰炸，飞机才离去。

夜间10点左右，30旅已不再听我的命令，他们秘密撤出临汾，集合残部逃往汾河边鹤峰堡，准备向西突围。66师退往鼓楼附近，仍在挣扎，城内多处发生巷战。最后我还叫张瀚通知山炮营，把所有的毒弹，全部向从城墙缺口处拥入的解放军轰击。但这时炮兵营的士兵也大都逃跑了。当时我也知道再也无法挽救败局，便找姜福生商量。姜也认为用不着再到太原去当俘虏。正谈到这里，王正平突然赶来，他说我们手下还有不少干部，应当带领他们突过汾河，进入西山，再设法送他们到太原去。这时，姜又跟着改变口吻，同意突围。我便拿起电话叫徐其昌立即率领残部经过西关突入西山，逃往太原。他逃出后腿部负伤，由人背着跑了一段即被俘。

我和姜福生等带着几百人突围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我们连打带跑，许多人都各自逃命，队伍已溃不成军。突过汾河，到达西山脚下时，天色微明，经我清点，随同逃出的只有两三百人，个个疲惫不堪。我叫姜福生带领这些人先走，我自己留后继续收容。我当时考虑：19军军长史泽波和他的师长杨文彩在长治被俘后，于1948年4、5月间都被释放，回到临汾。我报告阎锡山之后，他立即派飞机将他们押解太原。我如果回太原，也一定要受到阎的军法处分。这时跟着我的随从只有5个人，我们避入麦田中，第二天中午，为解放军的瞭望哨发现后被俘，结束了我前半生的罪恶生活。

（沈醉整理）

太原战役阎锡山残部被歼记

郭宗汾

作者曾任国民党华北“剿总”副总司令等职，1949年1月底与傅作义一起在北平起义。在这之前，他一直是阎锡山手下的得力部将之一。本文详细介绍了太原城内外的工事情况，太原战役中阎部的军队部署，以及负隅顽抗最后被全歼的经过。

我写的太原战役，是从晋中战役赵承绶所指挥的部队完全被解放军歼灭以后，山西的主力部队几乎完全丧失战斗力，阎锡山不得不把原来准备守汾阳、榆次、忻县的部队撤退回来，在太原附近南北不过60里，东西不过50里的狭窄地带内背城而战。当时解放军在汾河以西约有一个纵队的兵力尾追由汾阳撤退的部队，直薄太原城西南的汾河桥附近。阎锡山仓促派兵在大、小王村进行堵击，太原城直接受到了攻击。这时是1948年7月中旬，到了1949年4月下旬，阎锡山的残部在太原城下便全部被歼。太原战役前后历时9个月。

太原防御工事情况

叙述太原战事以前，应该先谈一谈太原防御工事的设备情况。

阎锡山为保持其封建割据的局面，自1920年起，即在山西布置省防工事，并从上海买到几门船台炮，准备在太原附近构筑永

久炮台。当时在他左右办事的晋南镇守使张培梅，曾亲自率领参谋人员在太原东西两山侦察地形，选择了不少要点，准备在一些要点上逐步地建筑永久工事，作为太原要塞的骨干。这些要点的位置即：城东南的南坪头，城东的大窑头，城东北的风阁梁，城西的代客头，城西南的神堂沟高地，以及扼守太原盆地南北两口的许坛、新城等地的交通枢纽。1925年起，北方军阀及其所利用之土匪互相攻击，山西已成为攘夺的目标。阎锡山乃进一步筹建山西省防工事，组织了山西省防工事委员会，以其参谋长朱绶光为主任，以我（时任参谋处长）为副主任，开始在南坪头构筑第一个炮台；为了炮台的后方交通，还专辟了一条公路与省南公路干线相连接。1936年，为了准备抗日战争，蒋介石拨了一笔款，要阎锡山在晋绥东北边界构筑国防工事，利用这个机会又对太原城防工事作了进一步的加强。日寇侵占太原后，也在太原城周构筑了不少碉堡，直接控制各工厂、矿场、车站、机关等。日寇投降后，阎锡山又在这个基础上大筑碉堡，想用他的碉堡战法，来巩固他的反动统治中心——太原。

1945年8月30日，阎锡山由晋西回到了太原，第二天即召集他的高级军政人员开军事会议。阎锡山指示：要挨门逐户地检查，不让一个共产党隐藏下来。他估计太原城内至少有5千个共产党员从事地下活动，要用政治力量肃清；在军事上，要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第一步站不稳决不要急走；第二步要以太原城墙为基础，向前推进碉堡群，形成最坚固的核心，逐渐推展到各卫星城市。各城市由于地位不同，碉堡的数量亦不能尽同。联系各城市的铁路、公路，要全部构筑护路碉，期能守望相助，把山西全省均用碉堡控制起来。所以自阎重返太原城的那一天起，一直到解放军逼近太原城郊止，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天不做工事。除兵工外，尚组织了一万来人的工程队，并由日本战俘组织了各种技术队，来帮助做工。所有胜利后日寇留下来的一些建筑材料，完全用在建筑城防工事上。当时太原的兵工各厂，每日能拉

成几吨重的有刺铁丝，十几吨重的竹节钢筋，西铭水泥厂每日能生产百吨水泥，也均用到构筑碉堡上。当时有人说：法国的马其诺防线耗费全国的财物，山西的碉堡也用尽了全省的财物，可以想象其耗费之大。

所有各大城市的碉堡位置，阎锡山均要一一过目，亲自研究决定，派他的侍从参谋亲到各区去绘制碉堡位置图，或者由各地区负责守备的军官亲自带上绘好的图案来阎锡山面前汇报，由阎作最后的决定。碉堡的质量由于要求不同，差别很大，也需要他拿主意。所以，哪些碉堡是主要的，哪些是次要的，哪些是伪装的，哪类碉堡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形式，上面的设备，如射口、出入口、展望孔以及与其他碉堡相通的暗道等等，他都用心。他觉得旧式射口、展望孔目标太大，容易被射中，还亲自同工人研究了一种圆球射口，将步枪、轻机枪插入圆球射口内，既不暴露射手的任何部分，还可扩大射界。阎锡山常说：“工事、武器的形式，如果不是最高负责人来亲自决定，靠技术人员决不能做到好处。”他在这上面的确下了不少功夫。到了1948年7月，阎军在晋中战役中惨败，战事转到太原城下时，仅太原附近的碉堡就有6千多个。这6千个碉堡分为大小不同的若干个碉堡群，最南的一群在武宿飞机场，一团兵力去守碉堡也容纳得下；最北的一群在周家山，也能容一团兵力，上面设了一个相当师指挥据点的守备司令部；最东的一群在罕山。阎说，罕山象一个巨人的头，必须坚固地守住。由这个头样的峰向西延伸下来有几条山脉，象巨人的两臂、两腿，踏在汾河岸上。太原城是巨人的心腹，只有将这个头健全起来，才能万无一失。太原的碉堡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大多是以一个主碉为中心，四周有几个小碉堡，火力互相支援。另外还有倒打工事，也叫暗碉，背向外方，向主碉方向开射口，准备进攻的部队攻占主碉时，它在背后开火。所以一个碉堡群，有两层明火力，一层暗火力，均系交叉火力。主碉四周均有外壕、铁丝网等障碍物围绕，以防手榴弹及炸药包炸毁。太原城

内街道上设街心碉，与路旁民房下的暗工事配合联系；新南门（有狮门、虎门可容300人利用的掩蔽部及工事）、省政府、军区司令部这三个大建筑物，形成抵抗中心，军事负责人到守城时准备亲自守在里边指挥作战，阎锡山准备在新南门的工事里作最后的挣扎。汾河以西因地形复杂，守备费兵太多，决定划为机动地区，以较少的兵力控制若干碉堡作根据，进攻的兵力大就弃守一部分，等到进攻的兵力转移再恢复，实行阎锡山所说的机动运动战。目的是使这个地区的经济力量不至过早的为解放军所利用，以空间换取时间。他以为这个布局如果得以实现，依靠汾河西这个区，三四十万军民需要的粮食可以自给，东西两山的煤、矿石，可以供给各厂燃料、原料继续制造武器，他即可以长期地守下去。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快会打起来，他可以等到大局转变。

1948年春解冻前后，他亲自召开会议检查工事进度，发现在汾河西岸由汾河桥至南堰一带计划内的碉堡，由于运输力不够，材料未备齐，兵工及工人均缺，尚未开工。他怀疑当时负责这项工事的刘奉滨副总司令有意贻误工作，而大发雷霆。这天开会是在晚上，虽然已过了12点，他非通令当下把任务交代给段楼华负责不可。大家跟着他忙了一夜，调动了各方面的力量，第二天算是开了工。刘奉滨几乎受到极严厉的处分。其他地区的工事，虽然按计划做了，质量上也发现很多问题。东山上有几个碉堡是用石块干砌的，没有加灰浆，用炮兵实弹射击去打，一打一个大洞口。尚未开战，即已失去对碉堡的信心。阎锡山让把所有碉堡的门均从外边加上锁，钥匙由连长以上的军官掌握，不得连长的许可，官兵谁也不许从碉堡里出来，武器弹药存在里边，吃的喝的也存在里边，大小便也要在里边，门的启闭有一定时间，要在军官监督下实行。守碉的部队，有的是建制部队，有的是临时招募的失业军官，出现了碉堡多兵员少的情况。

阎锡山还亲自指导编写过碉堡战法，但是他的部下并不相信

这一套。他在会议上叫嚷了一番，听的人唯唯诺诺，回去也没有人传达，等到用起来还是老一套。而且太原的碉堡虽然做得不少，地图上划起来密密麻麻，到现场一看，还是寥若晨星，到处有空隙，临时又做了些野战工事。阵地连起来了，守兵又觉得太少，真是捉襟见肘，到处是漏洞。

太原防守部队及布防情况

太原防守部队一部分是由太谷向太原撤退的队伍。这一股实际上是溃退，因为总指挥官山西保安副司令赵承绶被俘，其基本部队第33军军长沈瑞也被俘，师长卢鸿恩被击毙，另一师长韩春生被俘后没有暴露身份，夜晚化装逃回。部队由团、营长带着乱跑。第34军军长高倬之虽然逃了回来，但部队已失掌握。师长王徽矩逃出来以后，感觉难以交代，索性又返回解放区。没有官了，部队当然溃散。另外有由日本战俘元泉福少将、今村上校带领的两支部队，是由日伪军混合编成。元泉福被炮击受重伤后，自料已不能活，令其参谋长将其击毙。今村带回来了七成队伍。几万人的大部队就这样放了羊，有的被截击，有的自动散伙回家，回到太原收容下来的不到两万人。另一部分是由汾阳撤退回来的刘效曾的43军军直属部队及其所属的第46师阎俊贤部。这一部分第二天走到文水、交城之间受了伏击，丢盔弃甲，行李辎重几乎完全丧失，官兵损失近半。

再一部分是由榆次城撤退的赵瑞部第八总队，他的张寿芳团已在东阳镇被歼灭，剩下两个团撤退的时候没遇到截击，完整地回去了。最惨的是驻忻县的刘鹏翔师，他们原来的任务是死守忻县，眷属们早就调集在一起，专、县政府的人集中在这里的也很多，一有撤退消息，争先逃命，人多行军队伍长，又没有秩序，部队掩护不过来，途中又有石岭关之险。特别是在榆次等城撤退以后，忻县的撤退早在解放军预料之中，沿途设伏，步步截击，

走了一半路，部队已无法掌握，都向太原跑，就这样散散漫漫地回来了一些。这就是守太原的主力部队集中期间的情况。

为什么阎锡山能在这样狼狈的情况下，支持八九个月呢？这里边有个原因即是蒋介石在晋中战役以后，很快就亲自来到太原，了解情况，把驻西安的第30军黄樵松部及驻榆林的第83师马海龙部，用飞机送来太原，进行了支援，使山西部队得到了很大的鼓舞，得以重整旗鼓，继续顽抗。下面谈一谈守城的情况。

先是赵承绶在晋中战役失败的前夕，阎锡山已经感到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因而有“临阵易将”之举，让我去替他指挥作战。我当时名义上还是阎锡山的参谋长，但参谋长的实际责任已在我1947年6月去南京时派赵世铃代理。我在1948年春回太原以后，工作尚未接手，已有消息外调。阎锡山让我去太谷接替赵承绶的命令下达后，我带了两列铁甲车，上面搭乘了一部分机枪及八八野炮。行至榆次南的修文站，驻东阳的张寿芳团已被解放军歼灭，铁路被阻不能前行。天明以后阎锡山在电话上告诉我，有北平来的大批空军掩护赵承绶部突围，让我尽力援助。我把铁甲列车开到破坏点附近，用炮火配合空军轰炸，并指示突围方向，诱导他们向榆次方向突围，但是他们走的是去徐沟的路，并且在天明前即已被歼，当然是白白地轰炸了一阵。我了解了情况以后，赶快回榆次告诉阎锡山。他先让我布置榆次城防，后来又叫回太原。我回太原以后才知道，解放军的追兵已在河西插到汾河桥附近，于是在这里就开始了太原防御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当时在大南门里灰碓堆上放列的炮兵射距仅有4000来公尺，打了一个下午，天黑我回到太原绥靖公署去见阎锡山。他现出了极为恐惧的样子。他让我赶快草拟一个防守太原的作战计划，并且让我赶快把跑回来的部队编制起来再布置出去。他说不然会自乱的。当时真有些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防守太原的计划，参谋处本来是有方案的，并且经常拿出来修改，但到此时，双方情况均非始料所及，必须大大地缩小守

备圈，集中一定数量的兵力机动策应。所以当时除决心放弃榆次、忻县两大据点外，太原外围据点也必须舍弃一些。城北的周家山原来设有据点，由杜显甲任司令，他自动地撤了下来。城南的武宿飞机场没有兵可派，也自动放弃了。城西原来就不准备多摆兵，把由晋源县撤回来的程继宗的工兵约3个团放在西铭水泥厂附近。刘效曾军暂在河西整顿。城北以风阁梁、丈子头、向阳店为前沿，尽可能多保持生活区。城南以亲贤、许坛、南坪头、王家坟高地为前沿，用重兵保持城北、城南两个飞机场，以免同外间失掉空中联系，而以武宿飞机场为钓饵，想在这里用机动部队与进攻部队进行局部反击，以消耗进攻部队的实力。城东的防守是阎锡山煞费苦心的一个所在。罕山据点非常重要，但距太原城60华里，没有足够的兵力守不住，后面的联系也非常困难。阎锡山决定要李佩膺率部分“雪耻奋斗团”去守，李佩膺有病，迟迟不去，阎锡山以为他是托故，要王靖国派人抬上他去，再不去即用他们那反动组织“铁军”的纪律制裁他，李无奈何勉强去了，但伏下了后来起义的根子。李佩膺是上党战役被解放军俘虏的一个师长，经过学习放了回来。阎锡山也令他在“返干团”学习了一个时期，组织了“雪耻奋斗团”，李是里边的一个次要干部。罕山后面是孟家井，形势不好，易攻难守，所以城东的主要防线设在右接王家坟经淖马、牛驼、黄家坟之线，这条线上有比较坚固的工事。当时的初期计划，就是这样的。因为兵力太少，再大的范围守不过来。

这时山西的部队名义上是两个集团军，分辖5个军，及若干炮兵、机枪、迫炮等特种部队。第8集团军总司令是孙楚，第13集团军总司令是王靖国，副总司令为刘奉滨、于镇河。刘奉滨后改为孙福麟，于镇河因在大同指挥第38师，改为温怀光。但是他们经常在阎锡山身旁参预谋议，一般没有实际上的统御指挥权。5个军的负责人为第19军军长曹国忠，辖第37师（师长赵显珠）、第44师（师长许森）、第68师（师长武世权）；第33军军长韩步

洲，辖第38师（师长田尚志，这个师驻大同，归于镇河指挥）第46师（师长阎俊贤）、第71师（师长张忠）；第34军军长高倬之，辖第44师（师长杨栖凤，杨死改委李子法）、第45师（师长郑继周）、第73师（师长祁国朝）；第43军军长刘效曾，辖第39师（师长刘鹏翔）、第42师（师长陈震东）、第70师（师长郑汶河）；第61军军长赵恭，辖第66师（师长栗林荣）、第69师（师长郭宏仁）、第72师（师长王桦）。另外有第8总队，总队长赵瑞；第10总队，总队长晋村（今村的中国名字）。总队均3个团，相当于师。特种部队有机枪师，师长宫子清；迫击炮师，师长齐国勋，后改贾毓芝；铁甲车部队司令韩文彬，有铁甲车3列，专在太原附近及环城铁路上使用；炮兵部队司令侯远村辖4个团，其中野、重炮各一营，余为各种型式的山炮；工兵部队司令程继宗，辖3个团，与步兵装备同；青年团团团长傅海云，约一团力量；警卫总队总队长刘有泰，均系自动武器；特务团团团长毛富澍，山西省保安部队副司令许鸿林，太原警备部队司令赵晋，实际上均已无固定部队。

当时的部署也不是完全按军以下的建制。城北丈子头起为刘鹏翔师、武世权师、阎俊贤师、张忠师，由军长韩步洲负责指挥；河西刘效曾，后调双塔寺；城南为陈震东师、祁国朝师；城东为赵瑞总队、晋村总队；城东北黄家坟为许森师、赵显珠师，由军长曹国忠指挥；高倬之军有两师控制在城内；赵恭军在汾河桥两岸各村控制，其余部队均在城关附近，补充整顿，并在驻地作自卫工事。

争夺机场及策反工作

蒋介石在8月上旬飞来太原，对阎锡山作了一番更具体的了解，知道他仍然是顽固到底的，于是加派飞机赶运援兵，想在华北保持这一反动据点，但他又怕阎锡山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太原

早晚要丢，他打算把太原兵工厂彻底炸毁，不让解放军利用。对这一点阎锡山颇不同意。阎企图拿这兵工厂作为他“复兴”的基础，阎锡山在山西割据多年，凭恃的就是他有兵工厂。后来又发展为二十几个单位的西北各厂。兵工厂一毁，其他各厂也就不好活动了，经济命脉一断，军事上也就没有希望了。特别是这时，阎锡山恃兵工各厂为久守太原的法宝。但阎要依赖蒋介石的援救，必须敷衍蒋，所以阎答应先要周到准备，决不会留给解放军。蒋介石另外又召集杨爱源等高级将领讲了一番话，当天就返回南京。走前向阎锡山说，必要时一定来太原同他共守。

1948年9月中旬，空运增援部队虽然是一连两连的来，但是到这时候，已经来了第30军的4个团，30军的军部及直属部队，还带来戴炳南一个整师又一个团的建制，打算到山西来补充。过去30军协守过临汾，从部队里跑回山西的约一团人。另外还打算由榆林运第83师来。这时阎锡山心里有了底，由各县跑回来的部队也渐渐地整顿起来。解放军这时采取的是稳步进攻的方式，在太原周围由小型武装部队掩护行政人员建立了人民政权。虽然天天有战斗，损失并不大，战事多是在守备地区以外的地方进行，太原附近出现了暂时沉寂的状态。这时楚溪春在河北，向阎锡山来信邀我出去帮忙，阎锡山前边答应了，在我准备走时又后悔了，发表我为第15兵团司令官。这个番号是国民党第8集团军改换的，原第8集团军总司令孙楚调为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阎想用这个位置来阻止我离开山西。同时，他把守备太原的部队区分为两个大区，从城北丈子头以东斜划了一条线到汾河西的董茹，两个飞机场也划在内，由第15兵团负责。王靖国的第13兵团担任另一半守备任务。由于我在9月下旬还是托故去了北平，以后一直没回来，两个守备区的办法也未实行，整个太原守备仍由阎锡山直接指挥。

9月末10月初阎锡山亲自组织了一次出击，令杨爱源、孙楚亲自出城去督战。部队是他们挑选的孙楚的嫡系部队郑继周师及

从决死队中跑回来的坚决反共的李子法师。出击的目标是武宿飞机场。他们听说那里的解放军不多，想找点便宜，以激励士气。第一天出击，解放军避开了，让他们走到了飞机场，一无所获，等他们要回来的时候，在北营以东设了埋伏，结果两个师都被俘虏，杨爱源、孙楚受了一次严厉的责备。有人说：阎锡山10月9日要大过生日，这一下只有黯然神伤了。但是蒋介石的祝寿专使徐永昌却是按时前来的，未尝不是一点点缀。

阎锡山向南出击的部队损兵折将以后，解放军很快把兵力转移到东北区，攻袭风阁梁、丈子头两高地。这直接威胁了北飞机场。武世权师和刘鹏翔师也组织了反攻，由飞机掩护着，使用了不少的大炮，其中有山西仿造的八八式野炮，射程12000公尺。这一仗规模也很大，阎锡山自己指挥，在有飞机活动的时候，部队就进一段，飞机一去即退回来。第二天（10月18日）北飞机场将失去效用的时候，阎锡山让杨爱源副主任、王怀明省参议长飞往北平请求增援。

杨爱源、王怀明等到了北平以后，在北平的一些同阎锡山有旧关系的山西人，想把他拉出来，早日结束太原的战事。有的劝他出来，有的考虑同解放军商谈，走政治解决的路子；但均遭到阎锡山的拒绝。他说他“要做历史上的人物”，要死心踏地蛮干到底。正在军运紧急，大家粮都不够吃的时候，他要北平办事处给他运棺材板，表示他以身殉城的决心。并且把他的老母送出太原。说是怕到最艰难的时候他母亲出来动摇他，影响他的决心。

太原的机场是守城的生命线，10月上旬的出击，本来准备把武宿飞机场拿回来，但出击失败，就再也不作恢复这个机场的打算了；北飞机场，因为解放军在风阁梁高地的东北侧用炮兵轰炸，不敢使用了；仅余的南门外飞机场当初是按照美军顾问的要求修建的，跑道最长，也经常受到阻击，飞机中弹多次。阎锡山逼令王靖国、梁化之派人在本防区内进行搜索，清除解放军，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现。驾驶员要求建立新飞机场，否则以后就只能空

投，不能降落。阎锡山不得已，到汾河西，西山沟内修了八九条跑道，供临时起飞降落，勉强使用。为此，又加强了河西的兵力，扩大了守备范围。后来阎锡山飞往南京，就是由河西山沟内飞机跑道上起飞的，军需物资从这里运来不少。

入冬以后，解放军似乎是在休整，对逼近各守备区的前沿并未积极进攻，只是在东山区这一要点（实际也是弱点）有些重点进攻。罕山是阎锡山逼李佩膺去守的，守罕山的人都是由李挑选的老部下。他受过解放军宽大政策的教育，这时在前线决然起义了。罕山是东山的最高峰，解放军得此据点后，对太原的进攻可以居高临下了。阎锡山想在孟家井再建一个据点，但条件不允许，便一泻数十里，退到淖马以东的高地上。

阎锡山在这一带派第30军黄樵松部据守。黄部是西北军的老底子，抗日胜利时受孙连仲指挥。高树勋在冀南起义后，这个部队因为同孙连仲的关系跑了回去。蒋介石把他们调到西安整编，孙连仲一下台，部队就被胡宗南收编了，这次被派来增援太原，内心自然有些不愉快。解放军策动他们的副军长黄樵松（军长鲁崇义未到太原）起义，商定在黄的防区内闪开一条路，让解放军插入城内，活捉阎锡山，迫令阎下令缴械。不料，黄樵松多年的战友，且有兰谱关系的戴炳南师长表面上答应同他起义，暗地里却报告了阎锡山。阎开始不很相信，戴跪地明誓，阎马上请黄樵松来开会。时已深夜，黄未加警惕，一入阎锡山的绥署大堂，随即被安置于一室，卸去武装，黄乃被捕。俟后用飞机送往南京，被蒋介石杀害，解放军留在黄樵松军的人员亦一同遇害。这支部队以后就由戴炳南指挥了。

接着解放军又做策动赵瑞部队的工作。赵瑞部在淖马防守，他的参谋长孙士文是被解放军俘虏后释放的，由于有这个关系，解放军的人与他们有来往。事为阎锡山的特务所发觉，把孙调走了。但赵瑞系赵承绶的旧部，这时赵承绶也派了一个副官，以被释放的名义回了太原，并且给赵瑞带了信。因此阎锡山对他也产

生了怀疑。正在这时，赵瑞所守的淖马炮台被解放军攻克，阎锡山大怒，令王靖国督促赵瑞反攻。赵知道，反攻取胜是不可能的，完不成任务，又免不了受阎锡山的严厉处分，乃假反攻之名把部队展开在战壕里，暗暗地通知自己的嫡系部队溜出来向解放军投降，相从的有七八百人，非嫡系部队不知底细，没敢动。城东阵地为此一时敞开了一个大缺口，后来由第30军延伸右翼把它补了起来。

阎锡山受到这两次的教训后，越发凶残了，不但部队里加强了特务控制，行政人员、市民也都用他的所谓“组织”力量组织起来。解放军派到第46师阎俊贤部去做策动工作的人，就被阎锡山杀害了，阎俊贤也坐了一个时期的监。好在解放军派去的人始终没暴露阎俊贤接受策动的事实，阎锡山才把他放出去。

守太原城的4个大据点中，淖马的地形较复杂，很不好守，所以在它后面有几条预备阵地，一直到东城墙都有碉堡。另一个据点是牛驼高地，阎锡山说它是枣骨子阵地，咬不动，吞不下，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守兵第10总队晋村部，是由日俘及伪军混合编成，是在晋中战役中跑回来的比较完整的部队。阎锡山用很多的手段，来羁縻他们，给他们的死者开了追悼会，说他们是为大东亚同盟而牺牲的。解放军初攻这个据点时，用的兵并不多，但是打得很激烈。打了两天，停顿了下来，阎锡山以为是胜利了，大肆宣传，并派其秘书长亲往劳军，写了最肉麻的劳军词，好象太原城几十万人的命运都寄托在这几百个日本战犯手里似的。但是没有几天，解放军再次进攻，这些家伙支持不住了，照样垮了下来。这时出现了一个很不合理的阵地线，守兵处处在解放军阵地瞰制之下，勉强挣扎，伤亡日增。

最后的顽抗及全部被歼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给了阎锡山一个很大的

打击。蒋介石给他的补给中断了，他自己同陈纳德订立的运输物资的合同也不能履行了，驻北平的山西兵站办事处还存有不少的军用品，也都被交出来。阎锡山在北平、天津一带的官僚资本，虽然由杨爱源、王怀明等督促着处理了不少，把现金转移到上海去，但北平这个空运基地失掉了；山西的军政人员的不少家属均在北平，北平一解放，必影响这些人的情绪，所以军心、人心均更涣散。

当北平决定和平解放时，我们曾用电报通知阎锡山，希望他能同情我们的做法。但是他回电说：“共产党一定要用士兵诉苦的办法，去杀死你们的军官；要用人民诉苦的办法去杀死你们的文官。到你们知道是受骗的时候，你们还要来找我。”这时他已让川至制药厂的药师制造了几百安瓿烈性毒药（只要用牙齿咬破，由口腔咽下，两分钟即可毙命），发给他的高干、基干们每人一瓶，让大家带在身边随时备用。他自己也表示了与大家同生死的决心。

北平和平解放后，蒋介石知道太原不能久守，又不愿把阎锡山牺牲掉，曾打算让他突围到西北去，并让胡宗南接应他。而他以为守下去还有希望，一突围便散伙了，未同意。他决心在太原死守，等待机会。他希望美帝国主义能守住青岛，能由空中接济他，而且大同还有他一师人守城也能声援他，同时绥远问题并没有同北平一起解决，他幻想同西北联系起来等待时机。但是自淖马、牛驼两个主要部分失去以后，城东南的双塔寺和城东北的黄家坟成了两个突出部分，原来的弧形阵地，现在凹进来了，只要这两个据点再被吃掉，城南城北的东西向阵地即无法存在，城内也将不好再守下去。阎锡山为巩固阵地，决心缩短战线，加强这两个据点。他令刘效曾拼凑两个师的兵力去守双塔寺高地，让曹国忠带3个师守黄家坟高地，原来在风阁梁的武世权师抽下来归还曹国忠的建制，戴炳南军守东城墙及东门外高地，高倬之军抽下来准备在太原城内作巷战准备，汾河以西再度放弃，由赵恭军守汾河桥两岸据点，韩步洲带两个师守兵工厂及其以北新城新

店据点，第83师守新南门及新南关，第10总队仍留城东北角。当时城内还可拼凑200门炮，清库中搜罗了不少弹药，均分配到各炮位上。这时每门炮只有一个老炮手，其余均用步兵代替。阎还把一切可抓到的人，全部推上前线。阎锡山说：“把所有的人才、物力都用上，失败了也不后悔，不要打完了仗还有可用之兵、可用之财给敌人留下，那是最无能的。”

北平和平解放后，阎锡山又苟安了两个月。3月29日，他突然飞往南京，表面理由是国民党政府派代表到北平和谈，有关山西的条件需要他去南京商定。实际上是他的老秘书长贾景德（在南京任铨叙部长）有意把他救出去。实际上，他走后，太原仍然由他控制着，他每天打三次电话，大问题还是由他决定。他设了个五人小组，由梁化之、王靖国、孙楚、吴绍之、赵世铃等“集体”领导，梁化之有最后决定权。他来的电报由梁化之先看，发表不发表由梁根据需要决定。由于梁的威信差，实际上是群龙无首，士气更加低落。大家嘴里不说，心里知道阎锡山是不会再回来了。阎走得很仓促，倒也开了个会。会上是梁化之提议，非他亲去一趟不可，怕南京代表把山西送了礼。阎也表示要亲自去，还说马上就回来，连长年不离左右的五妹妹也没带，显然是为了安大家的心。

4月上旬，太原外围的解放军逐渐增多，特别是炮兵的数目大大地增加了。在这个时期，赵承绶曾到过赵恭守区的前沿，意在促进和谈。而城中的反动派们拒绝他进城。谈是谈不成了，只好打了。到了4月17日，解放军全线进攻，炮火特别猛烈，所有重要一些的据点都挨了不少的炮，阎锡山自己夸耀为“难攻不落”的炮碉瘫痪了。守城的几百门炮，不敢再打了。因为发一炮不知要引回来多少炮。通信联络全被破坏，指挥系统也被打乱，各个据点各个碉堡陷于各自为战的状态，不能互相支援，互相策应了。而解放军的攻势则如疾风扫落叶一样。

首先被歼灭的是守在向阳店以南的韩步洲军的阎俊贤、张忠

两个师。张忠师里有一个团受过解放军的策动，在全线炮火掩护下，解放军乘势攻入该师的防区。对阎俊贤师，是由侧后插进去的，师司令部首先被攻克，部队乱成一堆，几乎没有什么抵抗，就垮了。攻兵工厂区的解放军在地下工作人员的配合下，先控制了各厂，部队象尖刀一样一直插到了大北关。阎锡山准备在垮台以前破坏兵工各厂的打算，也没法子实现了。解放军把阎俊贤、张忠两个师长送进城里，要他们让城里的反动派们放下武器。城里的反动派反过来要求解放军退出北飞机场，以表示政治解决的诚意。他们幻想这样可以请阎锡山派飞机把他们这些人都接出去。

接着解放军就攻黄家坟高地。这个据点的守将是曹国忠。曹是陈长捷的部下，平遥作战时任师长，被解放军击伤过手指。他们在解放军优势炮火的进攻面前，有人主张退到城里去，但城里的阎军不欢迎，想突围到大同，谁都知道根本不可能，最后被迫放下了武器。守东城的第30军，挣扎到最后，戴炳南军长假报死亡，藏到他妻姐家里的夹壁墙内，打算化装逃走，为其卫士所揭露，捉了出来。

守双塔寺据点的是刘效曾军。刘是王靖国的旧部，是“铁军”里边的中坚分子，抗战以前为王靖国师的补充团长，一直被王提拔到当军长。他抵抗得最有劲。如今双塔寺的两个塔上留有无数的疮疤，就是他们顽抗的痕迹。但是最后他们也支持不住了，要求回城内。王靖国答应了，但回城途中，被解放军解决，部分在双塔寺就被俘了。守新南关的第83师，为了清扫射界，曾火烧新南关几百户民房，企图作垂死挣扎。但到解放大军压来的时候，蛮劲并不大。守汾河桥的赵恭，乘吉普车过桥，暴露了目标，被解放军击毙。部队失去指挥，没有了抵抗力。城外的据点就是这样一个一个被解决了的。

城里的守军以高倬之军为主，警卫总队也是一部分力量，晋村的第10总队也退入城内，这些部队都是顽抗到底的。破城是从

东南角开始。阎锡山从历史上得来教训，知道这里是个关键据点，曾在城墙后面准备了一个“月城”，就是在城墙后面又斜砌了一道矮墙。附近的新南门的工事也很坚固，能容二三百人。

阎锡山在太原解放的前一天发来一份电报，让“政治解决”。梁秘而不宣，等别人逼问他时，他把电报掏出来念了几句，放在蜡烛上烧掉了，随后他自己去安排后事了。这时李冠洋提议让吴绍之拟个信稿送解放军，表示愿意放下武器，进行政治解决，孙楚他们也同意这样办。先决定派韩步洲出去送信，他答应了，拿上信出去走了两小时又返了回来，怒气冲冲地说：“我是铁军，我不能送这信。”说时手摸手枪作要打人的姿态。大家面面相觑，不敢作声。有人估计，他是同铁军商量后表示这样顽固的态度的。时间没有好久，解放军已攻下鼓楼，并在鼓楼上插上了红旗。这时才把那封信从大门缝里塞出去，而解放军从侧门、后门插进来的人，已堵住了掩蔽部。阎锡山曾说过，守城时他要在那里指挥。但是，阎锡山已走，又没有负责人去，加之第30军在破城之后已不好控制，乱成一团。解放军很快就插入城内，街道上的据点没有起到多大的阻碍作用。各方面的解放军象几把尖刀一样一齐插入太原绥靖公署，从掩蔽部里把副主任孙楚及其以下的军政人员都捉了出来，从而结束了这一场战斗。时间是1949年4月24日清晨。

陈棺竞选国大代表

赵 遂 初

1947年，作者以天津市总商会常务理事和三青团员的身份，四处游说，弄虚作假，获得了5万多张国大代表选票。不料，国民党为拉拢民社党和青年党，竟用指派圈定手法，将作者费尽心机弄到手的“国大代表”取消，以仅获16票的民社党人代之。为此，作者于1948年3月下旬“国代大会”召开前夕，在南京演出了一场陈棺竞选“国大代表”的闹剧

抗日战争期间，我由山西移居天津，改行经营颜料商业。1928年晋绥军进驻天津，我曾一度被任为天津市东六区（即南市三不管地区）警察署署员。1945年日寇投降后，我被选为天津市油漆颜料同业公会理事长，又当选为天津市总商会常务理事。次年12月，国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决定于1947年选举所谓行宪的“国大代表”。我想弄个国大代表，不但可以在政治上有出路，还可以名利双收。

当时天津中统头子李实斋（山西人）为了给中统天津区长甘舍棠竞选国大代表，组织山西旅津同乡会，拉选票。三青团头子王任远为了竞选，也千方百计想插手总商会，竟把年近半百的一些理监事吸收为三青团员（我也在内），组成商业分团，以澡塘业公会理事长王鸿绪担任主任。王、李二人也都向我表示好感，争取我作为他们竞选的支柱。我为了利用他们的势力来达到自己夺取国大代表的目的，也虚与委蛇，表示同他们合作。他们给我

出谋划策，帮助我奔走拉拢。我则来了个反利用，并充分利用帮会的关系，为自己活动。我由颜料同业和同乡亲朋垫出竞选费用，并用“专诚拜访、虚心领教”八字诀，走遍各行各业公会和不少理监事的家。这样赶到选期迫近，我已水到渠成。投票之日，各选区绝大部分监选人员都和我有了直接、间接的联系，彼此见面，会心一笑。结果我以得票5万张以上而获选，在华北五省二市所选出的六名无党派签署代表中名列第一。但5万张选票并不是合法取得，而是请人填写假票，大把大把地塞进票匣，弄虚作假而来。

不料国民党为了拉拢民社、青年两党，竟然采取了指派圈定的手段，把我这个耗尽心血才弄到手的国大代表取消了，而代之以得票16张的绥远地区民社党人杨凌云。这不仅使我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而且同业、亲友所垫的竞选费用，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清偿。我日夜苦思，筹谋对策，终于想起古代庞令明“舆榘决战”的故事，决计假借“护党”为题，用陈棺行动来作孤注一掷。

1948年3月8日，我用民选国大代表名义，在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主办的天津《新星报》第一次发表了我告同胞书（当时天主教办的《益世报》和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均拒绝登载）。

3月18日，天津《新生晚报》根据我的谈话，发表了以“赵遂初拚到底，明日起程赴南京，出席国大，要买棺材，以示决心”为题的一则新闻。我因恐受到阻挠，于19日夜通过天津旧英租界工部局警官和“万里号”轮船船长的帮会关系，潜入“万里号”轮船，蹲在火房，起程赴沪。

我在“万里号”轮船上又起草了一份《再告同胞书》，于抵沪后交上海《大公报》发表，表示“决于大会召开之日，协同民选合法代表，集体进入会场，作历史的‘护宪’流血。”等等。随即于3月25日只身进入南京，会同全国各地被迫退让的签署代表盛紫庄、马文车等200余人，在国民大会堂附近的钟南中学成立民选

代表办事处，与当局展开了一场“殊死的”斗争。

蒋介石在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于3月27日上午在中央军校官邸邀请签署合法代表14人谈话。官邸内外，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我等14人被全副武装的警卫带领进一间大客厅。客厅里用15张沙发椅摆成圆形，蒋介石坐在正中一张铺着虎皮褥子的沙发上，身后围坐着陈立夫、吴铁城、张厉生、谷正纲等人，代表们背后站着许多便衣侍卫。蒋介石用示威的姿态，虎视眈眈地扫视着我们14人，开口第一句话就说：“赵遂初，你在《大公报》的宣言，我看见了。”我说，我还有第一次宣言，同时立即打开皮包，取出那张天津《新报》。这时有两个侍从迅速逼近我身边监视着我的举动。蒋接着说：“赵遂初，你晓得我是党的总裁吗？”我反问说：“你知道我不是国民党员吗？”蒋闻言愕然，立即转头向陈立夫问道：“怎么搞的，把社会贤达搞到这里来了？”陈答说：“他不是国民党员，是青年团员。”蒋才松了一口气说：“团员就是党员。”我说：“团员就是党员，为什么还搞党团统一？”蒋语塞，回顾坐在他左右的签署代表说：“大家要知道，今天不能单纯讲理，也不能单纯讲法，为了政治上的关系，要迁就事实。”各代表闻蒋言，都感到惊讶。我接上去说：“还政于民，关系百年大计，国家元首能说不讲理、不讲法吗？”蒋不理睬我的话，怒气冲冲地转向其他代表说：“谁愿退让，我自有办法！”那十几个代表都一致表示坚决不退让。有一代表说：“我宁愿牺牲厅长，也要当选证书。”又有一代表说：“我现在对总裁声明脱党，我是人民签署当选的代表，根本与党无干。”蒋见谈话已陷僵局，即囑侍从预备点心，希图缓和气氛。这时陈立夫发言说：“请各位代表，先回寓所，改日再行商谈。”

各代表返回钟南中学办事处，立即集合全体代表，报告会谈经过。全体大哗，群情激愤，一致通过决议，于28日（国大开幕的前一天）由颜泽滋等10个代表，进入国民大会堂实行绝食，阻止大会开幕，其他大部分代表分头包围选举总所和国民党中央

党部请愿，不达目的，决不撤退，我负责陈棺大会堂事。我随即用380万元法币购得棺材一口，由少数代表协助抬到钟南中学。我还应美联社记者的要求，站在棺材上拍了照。

签署代表准备进入大会堂绝食和我准备陈棺大会堂的消息传出后，蒋介石慌忙于29日晨再邀签署当选代表40余人举行会谈。我首先对蒋介石说：“我今年四十有九，我的生命只有两天了。为国家民族牺牲，在我的生命史上是光荣的。”蒋介石假惺惺地对我说：“你不能死，死有重于泰山，有轻于鸿毛。”不料正当我坚决表示说“不成功，便成仁”之际，突然有几个代表起立，表示“服从总裁命令，愿意退让”。蒋介石自然十分高兴，连声对那些代表说：“好的，好的。”可是代表当中却吵成一团，会谈立刻陷于混乱。我和绝大多数代表立即退出，返回钟南中学，召集紧急会议，筹谋对策。

当我们在钟南中学召开紧急会议之际，大批警宪，包围并封锁了钟南中学。签署代表在戒备森严的钟南中学的铁栅栏内，面对着警宪举手高呼：“你们这是什么国民大会！这是狸猫换太子的滑稽戏！假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投的票是假票，选出来的总统是假总统！”谩骂声和嘘声，此起彼伏。围在铁栅栏外的警宪奈何我们不得，互相苦笑，又不停挥舞大棒，驱散围观的群众。我摆在钟南中学门里的棺材，亦于当日晨被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派武装警宪劫夺而去。当时有代表主张向法院控告洪兰友劫掠棺木罪，有的代表则说：“就让洪兰友自己用去吧！”

蒋介石用高压手段强制签署代表退让失败之后，又授意于斌、胡适等人以第三者身份出面调解，也遭到绝大多数代表的拒绝。签署代表还想乞灵于反动派的法律，向南京高等法院对“违法代表”之职业、妇女团体代表选举事务所主任谷正纲等人提起诉讼。南京高等法院并未正式开庭审理，竟以“缺席裁判”宣告谷正纲等人为无罪。

蒋政府鉴于威逼诈骗都不成功，乃转变花招，使用利诱收买

伎俩，并由于斌再次出马。于斌用亲切口吻对我说：“赵同乡（其实他是黑龙江人，我是山西人），只要你肯于接受退让，我担保：第一，在总统就职之后，发表你总统府顾问；第二，凡是你竞选花的竞选费用，全部由政府贴补。我们是大同乡，请你仔细考虑我的意见。”我对于斌说：“美联社记者已经拍了我站在棺材上的像片（以后这个照片在美国《生活》杂志封面上刊登过），中外皆知。你既然说我们是同乡，请你替我想想。我接受这个条件，退让了代表，我还值半文钱吗？”于见话不投机，便声明说：“我是代表陈立夫部长的意见，那么我就转达陈部长吧。”接着陈立夫在中央党部邀我一个人到他的办公室谈话，又向我提出于斌所提的退让条件，并说：“政府还准备邀请各位担任戡乱委员。”我大声对陈立夫说：“头可断，代表不能让！”陈立夫脸色一变说：“蒋先生要竞选总统，你却抬棺材。现在还是头可断，你也太厉害了吧！”陈又说：“你不是疯子，你为什么要这样疯闹？”我说：“只要发给我当选证书，我立刻可以不疯。”陈凝思之后，无精打采地说：“那么你和王处长先谈谈吧。”（王是负责主办发证手续者，记不清他的名字。）

蒋政府见收买手段也告失败，乃一面派密探在开罗饭店我的寓所钉梢跟踪；一面扬言将给我以法律制裁；同时还放出我要自杀的谣言，企图暗害我。因此我又在报上发表声明，加以揭穿。

我们签署代表所采取的绝食、陈棺等等手段，并日夜包围总选举事务所和中央党部实行疲劳请愿，最后总算获得结果。由职业、妇女选举事务所发给我和少数代表当选证书，并说明委以戡乱委员名义，发给薪资，借以弥补竞选损失。可是这时大会已将闭幕，我报到后只出席两日就结束了。当时在蒋介石淫威之下，我独敢于同他顶撞，何所恃而不恐呢？无非为个人名利所驱使，故不惜破釜沉舟，成功是英雄，死亦不失为好汉，打的亡命之徒的主意罢了。

两广事变的前因后果

李 默 庵

1936年，正值日寇加紧侵略我国之际，广东陈济棠与广西当局联合，以北上抗日之名，欲出兵问鼎中原，从而构成了一场内战危机，史称“两广事变”。本文作者原系国民党32集团军总司令，现为“黄埔同学会”副会长，寓居美国。这里，他着重介绍了“两广事变”的肇因及解决经过。

我在今年3月曾为文谈50年前1936年春，参加解决两广事变，免去一场内战危机的经过。但几乎全在叙述广东军事的演变，而未谈及广西问题之如何解决，且更未提及当时盛传该次事变是肇因于一个迷信的奇谈怪论之说，特补述之。

黄绍竑是广西人，时任浙江省主席。当两广事变酝酿期间，蒋介石氏似拟乘机解决两广的分离问题，曾令黄绍竑先生参与其事。事后黄先生曾有回忆的记录，堪称信史，因为他是真正的决策参与者。兹摘述其所记要点如下：

两广事变的前因后果

这是黄绍竑在他写的《五十回忆》一书内第16章第一次主政浙江文内的小标题。1936年3、4月间，两广当局突以抗日名义，声称要出兵北上抗日，构成一场反南京反蒋的内战危机。但

事实的演变，即广东多数陆军及全部空军，都表示服从中央，脱离广东。其军头陈济棠，被迫出亡香港，原广东政权解体。广西势孤，即随而转变，接受调停，言归于好，使多年久陷分裂的两广问题，因此而得到和平解决，亦属意外幸事。至于为什么突然发生此次异动，有两种传说：

A. 肇因于江湖术士说：据黄绍竑《五十回忆》文16章内记称：“两广为什么突然发生异动，后来我到广州，才知道清楚。原因是一个占卜星相的江湖术士，发痴一般的信口胡言，说某人应败，某人当兴，某方不利，某方兴旺。这种没凭没据的荒谬之谈，竟有人信以为真，而作为政治军事行动的指导，活象旧小说、旧戏剧中一个卖卜测字的人几句谰言，马上变成拿鹅毛扇的军师一般，说来真是好笑。同时我还听到好多神怪的奇谈。”

B. 机不可失的传言：这个说法，传遍当时的广州。我率军进驻广州后，亦亲闻多人道及，现在中年以上的粤籍人士，必多尚能记忆。所谓机不可失，在发动事变前，解释为机会不可失去，遂据以采取行动。及其失败，则又解释为因飞机失去而失败^①。大凡迷信的说法，都是模棱两可的。

先是自宁粤分裂后，广东邻近香港，又有其优厚经济上的特殊条件，除截留属于中央所有岁收外，又私自经营经济事业，几年安定，收入丰富，钱多了，遂又私自扩建陆军、空军，增强了其割据独立的力量。该省军头陈济棠，一时有“南天王”之称，自视甚高，促发其企图乘时问鼎中原的野心。

当时又正值日本压迫我国日甚，自古北口中日局部战争后，迫签了何（何应钦）梅（日本驻天津陆军司令官梅津美治）的丧权辱国协定。允汉奸殷汝耕在冀东成立敌伪政权，脱离国家政权体制，以及其他种种忍让措施。全国舆论哗然，提供了纯为私利的野心家，冠冕堂皇的好借口。

^① 两广事变的解决主要是余汉谋、李汉魂、邓龙光、黄光锐等陆空将领宣布拥护中央，特别是空军脱离陈济棠，投靠中央的举动，致使广东军政解体，广西势孤，两广事变因而结束。

据传陈济棠有兄陈维周（译音），略识堪舆，能看地理风水，并懂为人看相，可判吉凶祸福，一些江湖术士，群相附从，煽动了陈济棠派陈维周，借故持函代表他赴南京谒蒋，实际是要看蒋氏的相，发现其气色并不开朗，随后又到奉化看蒋家祖坟的风水，亦不觉特别。归后很为得意，遂集合江湖术士，扶乩决疑，请到某神仙，乩批有“机不可失”之语。因此配合国内的反日情势，触发了陈济棠早存问鼎中原的野心。又深知广西李、白与蒋氏向存宿怨，提出联合出兵抗日的金字招牌，一拍即合。是以有此次突发的两广事变的行动。真是举世无双的荒谬，实属可笑。

解决广西问题

当两广酝酿事变的情报传到南京后，蒋介石氏似即决心先解决附从的广西问题。据黄绍竑《五十回忆》记称：“在4月间，我突然奉令调任广西军务善后督办，所遗浙江主席，任命白崇禧接充，并调李宗仁为军委会委员。我于5月初奉召到庐山谒蒋，曾力陈我不能回广西的诸多理由，蒙蒋氏谅解。遂即电广西李、白，表示我决不回桂就职，并劝他们尊重中央意旨作妥善的解决。”

广东问题解决后，广西仍成僵局，黄绍竑是最终能避免一场浩劫的关键人物。兹抄录其所记经过如下：“我到了广州，双方已在调兵遣将（当时默庵奉令率第10师、83师，进驻四会，预拟为入桂之右翼军），积极准备作战。我晋谒蒋先生，申明我的意见，仍望尽我的力量，担任调停工作。蒋先生对这个意见表示允可。我遂来往于广州、香港，从事接洽。同时也有很多电报给广西，都得不到什么要领。情势一天一天地恶化，好象非用兵不可的样子。蒋先生要我担任讨伐军总司令的名义，逼得我非常为难。这时参谋总长程潜先生亦在广州，我对他说：“情形虽未能即刻好转，但并不是完全绝望。据我的观察，用兵三个月，未必即能解决，善后问题，更属困难。如能迁延三个月，也许倒有和平解决希望，愿

虑事实，与保存国家元气，静候一些时间，要比立刻用兵，合算得多。因为过去国内许多纠纷，起初无非是当事者一些面子上、意气上的争执，彼此互相激荡，遂成为狂波而不可收拾，并不是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非用武力解决不可。假使我们设身处地为广西打算一下，突然转变，自有其许多困难，如能假以时间，使其从各方面着想，亦必能自己寻求其解决之道也。’他对我的见解，很为赞同。如是我同程总长到黄埔（蒋氏到广州即驻节黄埔）去见蒋先生。我将意见陈述，幸蒙采纳，由我同程总长分别再电他们，作最后的和平之斡旋。不久得到他们的回电，提出一些解决条件，并希望我同程总长到广西去商量。我们将来电呈蒋先生核阅后，蒙大度宽容，差不多都完全允许了，并派我们乘专机到广西去。经洽谈后，李宗仁亦愿随机来广州谒蒋。一场内战危机，终获解决。”

最后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善后督办与会办。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广西问题至是得到表面的解决，仍保持了桂系独立割据的原状。

结语和我的观感

这次两广事变，双方调兵遣将，几至兵戎相见，虽因形势演变，广东问题平定于先，所剩广西问题，亦因调解成功，致未酿成又一次害国害民的内战。但其结束之道，仍走了过去多次内战结束的老路。只要由失败的地方当局表示再度拥护中央，照顾了双方情面，维持了一个假的统一局面，即换得了中央允许地方仍保持独立割据的原状，作为暂时的结束。偶有意见不合，即又发生另一次的变乱。这就是过去循环不已，打了几十年内战的原因之一。其主要关键是在国家始终没有真正统一。

· 订正 补充 质疑 ·

对《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的补充订正

王 寿 山

《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刊有陈长捷所写的《1939年晋西事变的前后》一文，其中第一、二、三节所述关于新军起义地点、领导起义人员、番号及当时参加起义的军队等，与实际情况有些出入。我当时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司令部供给部长，兹就我所了解的分述如下，以供参考。

(1) 晋西事变发生在1939年12月12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第二纵队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晋西吕梁山隰县义泉镇(非义棠)。

(2) 当时起义的领导人，为决死第2纵队司令部政治主任韩钧、第6区行政专员兼决死2纵队司令部政治委员张文昌，当时司令部纵队长为艾子谦(非韩钧)。

(3) 在汾西及隰县地区内起义的军队，是决死第2纵队所属的3个旅9个团。兹将军队番号及团级以上负责人，详列如下：

1. 山西陆军独立第2旅旅长为艾子谦，旅部政治主任为韩钧所辖第4、5、6三个团。4团团团长王英青，政治主任李曙森，5团团团长钟舍生，政治主任李晓村，6团团团长陈雉卿，政治主任刘英。

2. 山西陆军第196旅旅长为白英杰，旅部政治主任为徐云，所辖游击第3、15、16三个团；游击3团团团长曹诚，政治主任李文炯，游击15团团团长杨育才，政治主任高诚，游击16团团团长贺鸿庆，政治主任张范。

3. 山西第6区保安旅司令张文昂兼，政治主任彭永年，所属

游击第10、11、12三个团。游击第10团团长刘毅民，政治主任高梓华；游击11团团长张龙韬，政治主任金树源；游击12团团长李之法，政治主任郝德青兼。

当时起义的新军，除决死第2纵队所属各团队外，其他新军，如由薄一波政委所领导的决死第1纵队，尚在晋东南太岳太行山一带；由戎子和政委所领导的决死第3纵队尚在晋南曲沃太岳山地区；由雷任民政委所领导的决死第4纵队，尚在兴县、临县地区，分别配合八路军作战，以后纷纷起义。当时领导起义的2纵队负责人，为了坚持团结、抗战到底，避免事态扩大，一面派队掩护，一面将所有主力，经孝义、汾阳、离石等地，向兴县、临县方面转移。在广大群众及各方面进步力量的支持下，终于击败了阎锡山的联合进攻，安全地与决死4纵队在临县会合，正式脱离阎锡山的封建统治，又在临县猛力追歼赵承绶、郭宗汾两部，即由克虎寨渡过黄河，经陕北葭县等地和解放区八路军联成一片，大大增强了抗战力量。而阎锡山阴谋策划歼灭新军抗日力量的目的，完全被粉碎了。

关于《对〈我所知道的陈 诚〉的质疑》的订正

宋瑞珂

《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240页毛啸岑对杜伟《我所知道的陈诚》一文提出的质疑说：“1927年3月，进入吴江的部队是独立21师严重部下的63团，团长是陈诚。他在黄埔军校时，是孙文主义学会（反共的组织）会员，他这个团的营连长很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指导员除王超凡与群众接近外，其他指导员的态均不甚鲜明。”这一段话与事实不符。国民革命军第21师63团自在广东开始成立，我即在该团任连长，愿将所知，提供参考：

1. 姑不论陈诚是不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当时任用营连长的职权，不在陈诚而在严重。严是邓演达的好友，他是坚决主张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拥护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人，怎么会自相矛盾任用“很多”的反对三大政策的人当营连长呢？

2. 63团的营连长，在广东出发前，都是由严重从黄埔军校1、2、3期学生中调来的。第1营营长宋希濂，第2营营长赵敬统，第3营营长王敬久都是第1期的。王是由军校第5期入伍生第1团的连长调来升营长的。赵原是在18师任营长的，由于反对其师长胡谦任用同乡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来到21师，先在63团军士连任少校连长，新兵到后，即任第2营营长。赵对本营连长的更换是直接找严重委派的，如原来明令发表特务队（即警卫连）队长宋瑞珂调第1连连长，宋尚未到差，赵就先来对宋

说：“暂缓去第1连。”并立即到师部找严重，又明令改调第6连。赵在平日谈话中，对“孙文主义学会”分子非常不满，认为他们是“二民主义”（即不要民生主义）。宋、王二人在桐庐战役负伤，赵敬统阵亡。1927年3月到吴江县城时，第1营营长职务由中校团附周至柔兼代，第2营营长由少校团附霍揆彰兼代，第3营长由师部副官处长肖乾调充。他们都不是“孙文学会”会员。肖乾于“四·一二”事变时，离开21师。“黄埔同学会”的反共分子说肖是“CP”，经第1期同学李青（当时在浙江警备师任团长）力保，并邀去任中校团附，才免于被扣押。连长中韦日上是黄埔1期，邓士富是黄埔2期，其余都是第3期的。严重在黄埔军校当过1、2、3期总队长。连长人选都是由严调选来的。第1连连长李维钧到杭州后即离开，严重由61团军械员王轨平调来任连长。第2连连长周化南，第3连连长在桐庐浪石埠阵亡，第4连连长邓士富，第5连连长钟祖荫，第6连连长宋瑞珂，第7连连长董世扬，第8连连长杨少初负伤由营部副官杜浙代理，第9连连长卢世英，机枪连连长韦日上，特务队队长王岚重伤残废由队附郑维四（黄埔四期）代理，侦探队队长孙嘉傅，通讯队队长由孙树伦（黄埔四期）代理。到“四·一二”事变时，有的连长经严重准假，有的连长自动移交给连附暂代不假而走。钟祖荫、宋瑞珂、卢世英、周化南、郑维四、孙嘉傅、孙树伦等7人，都在得知严重因不满蒋介石倒行逆施而去职，由陈诚升代师长即离开的。留在团里的只有邓士富和王轨平，后来他们二人都代理营长。至于韦日上和董世扬什么时候离开，我不清楚，因为我于4月13日就离开21师了。王轨平到10月间也离开了。1928年春，王轨平在航空署掩护大队任连长时，到“黄埔同学会”去登记，负责人说，有人填表说王是“与共产党接近者”，要他找上在职的同期同学3个人证明。王找了宋瑞珂、张廷孟、毛邦初3人签名盖章，才准予登记。邓士富是由“省港大罢工”的工人纠察队里调来21师的。工人纠察队里“孙文主义学会”分子是进

不去的。1927年4月13日，宋瑞珂、郑维四、孙树伦等同时离团，到南京三新池去洗澡，遇见17军第2师政治部主任吕魁文（黄埔3期莫斯科东方大学肄业）说，“你们21师的干部都是共产党，你也是共产党员吧？”宋说“是你这个留俄学生介绍加入的，要坐牢我们一道去！”当时有一些人说话不负责任，随便指为“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或指为共产党员。63团于“四·一二”事变时，离开的7个连长当然不是“孙文主义学会”会员，没有离开的两个连长，又有那种情况，怎么能武断地说“这个团的营连长很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呢？”

3. 63团是在4月20日前后到达吴江的。上午到达下午即行追击，午夜到达苏州，在吴江停留只有半天。我连官兵仅在驻地擦枪、整理草鞋和吃了一餐饭，连上街去看看吴江城内是个什么样的时间也没有。毛文说：“吴江县党部委员沈复镜曾对我说：

‘3月中旬代表县党部到陈诚团部接洽公务……。’陈诚当时标榜革命，很尊重邓演达和严重，他决不会“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国民党县党部委员的谈话中”，无中生有地说“这个团的营连长很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给自己脸上抹灰。至于我们这些连长、指导员，根本没有见到县党部委员的影子，他们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团的营连长很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呢？

4. 毛文说：“指导员中，除王超凡与群众接近外，其他指导员的姿态均不甚鲜明。”21师的连指导员多是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1926年10月，在广州时，由学校分发来的。有的先当连附（当时排长统称为连附），如63团第6连连指导员赵希杰，先是该连连附，将出发时，才调为指导员。总之，也是由严重委派的。在桐庐战役或伤或死，到吴江时只剩下第5连连指导员吴某，机枪连连指导员叶迪、第9连连指导员王某、第6连连长赵希杰。

叶迪广东淡水人，家境贫苦，曾极力支持农民运动，9连王指导员是共产党员，他待士兵亲如手足。在行军途中，我常见到他替病兵背枪，有时陪着病兵很晚才到宿营地，赵希杰四川郫县

人，未入黄埔之前，在乡教小学时，即与当地的土豪劣绅作坚决斗争，提及土豪劣绅即咬牙切齿。他与我经常轮流同各排士兵打地铺，同吃同住共甘苦。他常夜间不解绑腿合衣而眠，便于起来查夜为士兵盖毯子；如逢过节，他亲下厨房同炊事员一起作菜。过杭州后，司务长失踪了，赵主动要求自兼司务长，同全连士兵感情融洽。我不知怎样才算是“接近群众”。3月下旬，63团到常熟后，接到东路军前敌总指部政治部通知，说江南一带土豪劣绅多，叫少贴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周至柔召集各连代表宣布的。赵希杰非常气愤，6连全连官兵都很愤慨！我们立即买回一百张颜色标语纸，全连能写字的一起动手写，从我连驻地常熟北门外，一直贴到兴福寺都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的标语，以示抗议。4月11日，我们开到南京下关，赵接到东路军前敌总部政治部的通知，让所有指导员去上海受训。我问赵怎么办？赵说“不去上海，拟去武汉。”我说“要走就乘调训机会搭船走，以免迟延发生阻碍。”赵坚决拥护三大政策，同士兵或同民众讲话，总是不离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到蒋介石背叛革命反共时，赵又毅然决然前往武汉，这样坚定的政治态度，能说是“不甚鲜明”吗？

5. 毛文说“我那时正在江苏省党部任秘书长，从县党部的报告和县党部委员的谈话中，就记忆所及……”既未接触过63团，又未作调查研究，仅凭坐在省党部里听汇报，就断定说“这个团里的营连长很多是‘孙文主义学会’的会员，”和“指导员的态度的不甚鲜明，”这样写出的资料，怎能符合历史事实呢？

又，241页毛文说：“就陈诚这个首鼠两端的人，不可能密电请释。”1931年秋，陈诚在吉安电请释放邓演达，当时十八军的旅长肖乾，团长方靖、宋瑞珂、孙嘉博和中校团附曾伯、曾孝纯等都知道这件事。同页还说：“邓死后，不到半年，陈诚就做了蒋介石的干女婿。”宋美龄介绍谭祥给陈诚是在1930年11月间，结婚是在1931年12月。邓演达被蒋介石杀害，是在1931年11月29日深夜。所以不是“邓死后，不到半年”，而是不到一个月。

《珍妃其人》失实之处

谢景芳

· 贵刊第92辑中刊出商衍灏先生《珍妃其人》一文，其中有数处失实和错误。为免以讹传讹，订正如下：

原文：“珍妃姓他他拉氏，满洲世族，镶红旗人。”据《清史稿·裕泰传》，珍妃的祖父裕泰为满洲正红旗。而其堂兄志锐传亦如之。比较权威的材料是珍妃的亲侄唐海圻的回忆，也可证实其家属满洲正红旗。^①

原文：“长叙的胞兄为广州将军长善，于同治八年到任，光绪十年解职，在广州前后二年。”实际应为在广州前后共16年。

原文：“珍妃与其姊瑾妃，自幼即随长善在广州。”珍妃生于光绪二年，长善在同治二年已去广州，如何能随往？

原文：“长善喜橐文士，曾聘文廷式教其姊妹二人读书，书房在广州将军署内。当时姊妹年龄皆幼。珍妃的哥哥志锐、志钧亦随长善在广州，颇有文名，与文廷式极相契合。”这一段文字多为臆测之词，失实甚多。据《文廷式年谱》（钱仲联编），文廷式于光绪三年“客广州将军满洲他他拉乐初长善幕府”，并非为“授读”事。时珍妃年仅两虚岁，瑾妃也仅四虚岁，怎能授读？“长善喜橐文士”，“好结纳名流”，其时除文廷式，还有于式枚、梁鼎芬等多人在幕下；再有，即令珍妃姊妹确在广州，而当时长善嗣子名士志锐，亦可授其读，非必延文廷式为师。盖“文廷式教书”之说是讹传胡思敬《戊戌履霜录》卷四言：“始

^① 《我的两位姑母——珍妃、瑾妃》，见《文史集萃》第三辑。

珍妃、瑾妃幼时随父任居广州，从文廷式受学。”其实，珍妃之父何尝居于广州，纯属穿凿之言。

志锐与志钧也不是珍妃的亲哥哥。志锐，“父长敬，四川绥定府知府”。^①据《碑传集补·志将军传》所记：“绥定君卒官，君（指志锐）莪莪孤贫”，其伯父广州将军长善无子，“爱公兄弟”（志锐、志钧），“挈以偕行”，后志锐为长善嗣子。而兄弟二人遂同在广州，与诸名士交游。珍、瑾二妃乃长叙之女。据唐海圻言：“我祖父长叙，有三个儿女，即我父亲志锐，和两个女儿瑾、珍二妃。”^②故志钧、志锐是珍妃的堂兄。因此，所谓长叙“官户部右侍郎时，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嫁第二女与署山西巡抚布政司葆亨之子为婚”，其实并无其事。因长叙的二女即珍妃，时仅两岁，何言出嫁？按《大清会典》所载：凡旗人女子十六岁以下者，均予选秀女，“未经阅看之女子及记名女子，不准私相聘嫁”。长叙怎敢私下将未成年的女儿许配他人？另外，所谓“署山西巡抚布政司”究是何官职？当时山西巡抚是曾国荃。葆亨是光绪三年八月才由福建布政使改任山西布政使的。^③

原文：“长善于光绪十年卸广州将军任，珍妃姊妹始随同还北京。”这一说法不见任何史料记载，概亦是作者据上文所做的推测之词。光绪十年以前，志锐、志钧均已中进士而居北京，瑾、珍二妃姊妹怎么会一直居于广州，且其父母一直在北京。如果推测合于逻辑，姊妹二人根本不在广州。

原文：后妃“按宫内名目分为九等：即皇后、皇贵妃、贵妃、妃、贵嫔、嫔、贵人、常在、答应”。按：实际清制宫内后妃位分只分八等，其中并无所谓“贵嫔”一等。

原文：“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九上谕：……瑾妃、珍妃均著

① 《清史稿·志锐传》。

② 《文史集萃》第三辑。

③ 《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第三册。

降为贵人，以示薄惩，而肃内政。”然后，作者认为，“将珍妃交皇后严加管束，幽禁于宫内西二长街百子门内牢院，命太监总管首领看管，从此与光绪隔绝，不能见面。据此，珍妃于甲午十月幽禁，距戊戌尚有四年，外间传说因赞助新政而被罪的话，征诸史实，毫无其事，不辩自明。”然事实并非如此。据张尔田《清代后妃传稿》、《东华续录·光绪122》所载上谕，也并没有“严加管束”、“看管”、“幽禁”字样，怎便就打入冷宫？另外，在《传稿》中却记有，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复瑾、珍二人妃号。金梁《光宣列传》也记：“逾年仍封妃号。”《清史稿》卷214也记有：“逾年，仍封珍妃。”可见，妃号既还，怎可能从此幽禁不得见光绪呢？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卷66，认为戊戌政变后，珍妃被杖责幽禁。这一说法的有力证据是清宫大太监小德张的回忆^①和唐海圻的回忆。一个是直接参与清宫重大史事的当事人，而另一个是受害者的至亲。因此，可以断定，珍妃是戊戌政变后被打入冷宫，不得与光绪见面的。在《梁启超致李提摩太函》（《戊戌变法》第一册419页）中说：当时，德菱女士对梁启超说：政变初作，“珍妃、瑾妃皆侍膳时可见。”

原文第4部分第1行：“先立一个端王的儿子溥儁为太阿哥（即太子之意）。”“太阿哥”应为大阿哥。

珍妃之死，据当时目击者太监王祥回忆确在慈禧逃往西安的当天，即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而不是“七月二十日前。”^②

原文：“民国三年，隆裕皇后逝世，与德宗景皇帝（即光绪）合葬于西陵九龙峪（景陵）。瑾妃是时已称皇贵妃，乘时由宫女墓地将珍妃迁葬于景陵妃嫔寝内（帝后墓称陵寝，妃嫔墓称园寝，在景陵东侧小山谷内）予谥立碑称：‘愍恪珍贵妃之墓’。”文中数处“景陵”应为“崇陵。”景陵位在遵化清东陵，为圣祖仁皇帝玄烨（康熙帝）陵名。光绪帝载湫虽谥号曰“景”，而陵名

^① 张仲忱《一个太监的经历》见《文史集萃》第6辑。

^② 《晚清宫廷生活见闻》。

曰“崇陵”，在河北易县清西陵。谥号与陵名本不是一回事。

另外，文中尚有一些事，令人难以置信。如“珍妃受贿案”中，称“珍妃景仁宫的太监等，共同交内务府慎刑司立毙杖下，前后打死的太监六十余人”。这样的宫廷大案，正史及私人日记、笔记无一处可查，揆诸情理，一个受贿案打死这么多人，也是不可能的。

以上仅就所见，略为订正，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指教。